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



序

当今世界的主题、格局和 90 年代的走向

现在正处于世纪之交。人们都在关注 21 世纪世界形势以及我国进入这个世纪的位置。这一切都离不开现实，即当今世界的主题、格局和 90 年代的走向。

世界主题的变化

每一个历史大时代都包括若干个发展阶段。这些不同发展阶段，也可以称为小时代或现时代、当代。我们所处的大时代没有改变，即处在人类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逐步过渡的时代。但是，世界主题变化了，说明小时代改变了。所谓世界主题，就是指在一个时期内世界上带有全局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小平同志在 80 年代中期接见外宾谈话中多次指出：“国际上有两大问题非常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还有其它许多问题，但都不象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1]“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是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2]这个判断改变和突破了过去的一些陈旧观念。我们在五、六十年代曾作出两个判断，即：“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甚至迫在眉睫”；“当代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用革命制止战争”。综观本世纪的发展，世界主题发生了一次重大转换。大体可以说，以 70 年代为界线，前一阶段的趋势是战争与革命，后一阶段的潮流是和平与发展。当然，这是从相对意义上说的。从本世纪初到 70 年代前期这个阶段，世界的主题是战争与革命。这个期间发生了史无前例的两次世界大战和无数次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革命，这是一个风暴的时期。侵略成性的帝国主义在不到 30 年中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空前的战争惨祸。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亚一系列国家通过无产阶级革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与此同时，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兴起；通过各种不同形式的斗争，先后有 90 多个国家宣告独立，帝国主义的殖民主义体系彻底崩溃了。进入 70 年代中期以后，战争与革命的风暴过去了，世界大潮转向和平与发展。其原因，一是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新科技革命和一系列调节，70 年代以后进入相对稳定阶段，国内没有直接革命形势；二是第三世界国家取得民族独立后，摆在面前的第一位任务是发展民族经济和文化，现时尚不具备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经济文化条件；三是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由于种种原因，社会主义的吸引力下降了。列宁在本世纪初所写的《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中曾经指出：从 1871 年巴黎公社失败到 1905 年俄国革命，这是一个没有革命形势和风暴的沉寂时期，这时“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已经结束了。东方还没有成熟到实现这种革命的程度。”[3]从本世纪 70 年代以后，世界又进入一个新的“沉寂”时期。在这种形势下，和平与发展问题突出出来了，成为世界的主题。小平同志提出的“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这个重要论断，已被国际上一切有识之士所赞同和接受。

和平问题是当代世界的第一个主题。和平问题，主要是指维护世界和平，防止发生新的世界大战问题。这是当代人们最为关切的一个重大问题。因为战后科学技术首先在军事领域里发生重大突破，出现了杀伤力极强的核武器和先进的运载工具——各种射程的导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苏两个超

级大国奉行实力政策，进行核军备竞赛和冷战共处，世界上空笼罩着核战争乌云。如果打起核大战来，将是人类的一场浩劫。世界人民把防止核大战看成是生命攸关的头等大事。过去我们曾经有过这样一种认识，即认为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甚至迫在眉睫，我们要立足于大打、早打、打核大战。经过实践检验和重新认识，小平同志已改变了这种观点，作出了符合实际的估计，即认为，由于世界上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但是制约战争的和平力量在发展，只要世界人民与和平力量共同努力，世界大战是有可能避免的，世界和平是可以维护的。小平同志作出这个论断的依据有二。一是和平力量在不断发展，和平力量已超过了战争力量，中国、第三世界国家、东西欧各国、大洋洲国家都属于和平力量。二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军事上势均力敌，他们掌握了全世界核武器库中95%以上核武器，都有毁灭对方数十次的力量，打起核大战来，不会有胜利者，这就使得双方谁也不敢轻易动手。通过世界各国人民的斗争，和平力量的增长，美苏从对抗转向对话，以及苏联的解体，一直笼罩全球的军事抗衡和紧张气氛大为缓解，世界大战不再是不可避免的了，世界出现了和平的现实前景。

当代世界的另一个主题是发展。第三世界国家取得民族独立之后，摆在他们面前的首要问题是发展民族经济和文化。几百年资本主义殖民主义统治的结果，世界经济发展的严峻现实是，南北之间，即南半球广大发展中国家（约占世界人口的3/4）与北半球发达国家（约占世界人口的1/4）之间，也就是富国和穷国之间，在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上的差距很大。这是世界范围的一种不公平现象。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小平同志指出，第一，靠自力更生。发展中国家为振兴民族经济和文化，要把基点放在依靠自己力量的基础上。第二，靠南北对话。发达国家的政治领导人要有政治远见，伸出友谊之手，去援助发展中国家，这样做不仅对发展中国家，而且对自身也有好处。不可能设想发达国家的持续发展能够建立在发展中国家长期贫穷落后的基础之上，第三，靠南南合作。发展中国家之间应在各个领域里进行广泛合作，扩大经济和科学技术交流，取长补短，互通有无。

苏东剧变以后，世界主题是否发生变化？小平同志认为，主题未变，但一个也没有解决。就和平问题来说，“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4]“一个冷战结束了”，是指由于苏联的衰落和解体，美苏之间的冷战结束了。“另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是指在苏东剧变以后，某些西方国家加强了对第三世界、对社会主义国家内政的干涉，插手这些国家的内部事务，妄图把自己的模式强加给这些国家。就发展问题来说，西方发达国家依靠国际经济旧秩序，垄断世界商品市场、金融市场，通过压低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的进口价格，抬高发达国家制成品和高精尖产品的出口价格，进行不等价交换，同时进一步加强了资本输出，从而使南北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由原来的几倍扩大到十几倍、几十倍，甚至上百倍。这是当前国际形势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和标志。从世界的发展角度说，除了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外，还有一个发达国家的“再发展”问题。但是，这是属于另一种性质的问题。总之“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5]

邓小平同志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的论断，说明世界形势的特征发生重大变化，它要求我们修正和更新观念，重新认识和确立新形势

下的任务。以前是在战争与革命风暴的洗礼中，形成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并存和对抗的格局；现在则是在和平与发展的环境中，各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实行竞争共处，在竞争中检验社会制度的优劣，优胜劣汰，以分胜负。

与当代世界的主题和平与发展相适应，我们必须坚持稳定与发展，专心致志、聚精会神地搞社会主义现代化，而没有必要象过去那样把备战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争夺综合国力优势的激烈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在今后和下一个世纪居于有利地位。正如英国《外事报导》周刊在一篇文章所说：“赢家将不是枪炮最多的国家，而是拥有素质最好的劳动力、最高的生产率、最有才能的设计者和精明的长期投资者的国家。”

世界格局的改变

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主要指的是世界格局的改变。所谓世界格局，是指一个时期在一定力量对比基础上形成的一种相对稳定的国际结构。从历史上看，世界格局持续的时间越来越短。1648年威斯特伐尼亚格局持续了150年的和平秩序。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形成的世界格局维持了10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1945年雅尔塔会议所确立的雅尔塔格局，即美苏“两极对峙”的世界格局，经历了45年以后，由于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苏联的动荡、衰落和解体，已经被打破。“两极对峙”结束后，国际形势的明显特征是：美国成为世界上的唯一超级大国，更加有恃无恐地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妄图建立“美国领导”的世界新秩序，但由于自身衰落，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日本、德国的经济实力进一步增长，加速从经济大国向经济、政治大国过渡，急欲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成员；东西方对峙结束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即西矛盾突出出来，美国、日本、西欧共同体之间的经济战和贸易战愈演愈烈，有可能成为今后一个时期世界的主要矛盾；第三世界国家，涌现出一批新兴工业化国家，如亚洲的“四小龙”、南美的墨西哥，还有一些人口大国，如印度、印尼、巴基斯坦、巴西等，正在崛起，它们在世界政治和经济中的地位日益提高；中国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顶住和打破了西方国家制裁我国的逆流，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与前苏东国家的动荡、衰落和西方国家的萧条、不景气相对照，中国一派繁荣，成为世界的“一枝独秀”，得到国际社会的一致称赞和重视；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虽处于严重的政治经济困难之中，但仍不失为一个大国，是唯一能够摧毁美国的国家，它在世界事务中继续保持一定的影响。总括起来可以说，旧的世界格局已被打破，新的世界格局尚未形成，目前正处于世界各种政治力量重新组合、新旧格局的交替时期。当前国际形势总的特点和趋势是：走向多极格局，局势有所缓和，矛盾复杂多变，世界并不安宁。或者说，战略格局多极化，世界矛盾复杂化，经济竞争尖锐化，武装冲突局部化。总之，双极已被打破，单极也不可能，多极是发展趋势。世界多极化的趋势是一个积极的发展，它彻底打破了一、两个超级大国主宰世界的局面。

本世纪20年代前夕，世界上仅有60个国家，现在世界有190多个国家。这么大的一个多样化的世界，由一个国家说了算不好，由少数几个工业发达国家说了算也不好，世界上的事情，应该由各国协商解决才好。不管世界怎样多极化，中国都是多极世界中的重要一极。小平同志指出：“美苏垄断一切的情况正在变化。世界格局将来是三极也好，四极也好，五极也好”，“中国算一极”。[6]世界各国有识之士，都在重新认识中国和重新估量中国崛起

的意义。将来怎样的多极格局才能形成稳定的国际结构，这有待形势的发展变化，现在还难以完全看清楚。但是，可以肯定除了美国、日本、德国、中国、俄罗斯外，还有一些发展较快的人口大国将在未来的多极世界格局中起重要作用。在多极世界格局中，中国应当而且能够成为重要一极。这既靠国内的改革和发展，也靠积极的外交活动。

90 年代的世界走向

90 年代，在多极化趋势加速发展的过渡时期，世界的趋势和走向是：

——世界和平出现是较为现实的前景。90 年代的国际形势经历了大动荡、大分化之后，一方面，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依然存在，世界仍然充满矛盾和冲突，动荡不测因素在增加，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冲突层出不穷，愈演愈烈；另一方面，毕竟“冷战时代”已经结束，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大潮，紧张气氛大为缓解，发生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很小，世界和平出现了更为现实的前景。这对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对各国的发展，都是难得的机遇。

——西方各国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复杂化和尖锐化。过去西方各国为了对付苏联威胁，步调比较一致。在苏东剧变后，苏联威胁已不复存在的条件下，西方各国之间的矛盾突出出来。其中，美国同日本、同欧洲共同体的矛盾，德国同欧洲各国，尤其是同英、法之间的矛盾，表面化和尖锐化了。在当代世界所存在的东西矛盾、西西矛盾、南北矛盾、南南矛盾中，西西矛盾突出了，有可能发展为主要矛盾。

——60 年代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高潮转向低潮。80 年代末和 90 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致前所未有的严重挫折。经过一段时间的激烈动荡后，有些国家政党开始趋于相对平稳发展。其主要情况是：前社会主义国家，经历各派政治力量的较量和两种不同制度、政策的对比，坚持马列主义的政党在艰难的环境中继续奋斗；受苏东剧变冲击最大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有些蜕变为社会民主党，有些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稳住了基本队伍，党内状况有所改善。受冲击较小的亚非地区的共产党，目前已趋于平稳。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者通过各种不同形式进行反思，从苏东剧变中吸取经验教训，以便更健康地发展。中国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引下，在逆境中不仅在世界 1/5 人口的土地上坚持住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大发展，中华大地发生巨变，社会主义事业蒸蒸日上、欣欣向荣。社会主义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在曲折中前进的。

——经济优先已成为世界潮流。这是时代进步和历史发展的必然。当前对每个国家来说，最重要的是经济实力，悠悠万事，唯经济发展为大。“发展是硬道理”，不但关系到各国国计民生、国家长治久安，也关系到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各国之间的竞争和较量，归根结底是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竞争和较量。经济日益成为当前国际关系中首要的、关键的因素。各国都在通过加速发展经济，奔向现代化。

——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越来越大。从本世纪五、六十年代，首先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后在世界范围内兴起了一场以微电子技术为中心，包括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航天技术、海洋工程技术、生物工程技术等领域的新技术革命，即历史上第三次科技革命。在当代，“科学——技术——生产”的周期日益缩短，18 世纪为 100 年，19 世纪为 50 年，目前只需要 3—5 年；科学技术在生产增长因素中的比重日益加大，已由本世纪初

的5—20%到70年代的60—80%左右。科学技术已变成第一生产力。据科学家们预测，到本世纪末和下世纪初，科学技术在一系列领域，特别是信息、生物工程和新材料技术三大技术方面，将出现新的突破。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必将促进生产力的更迅猛的发展，促进人类生产、生活、思维等各个领域发生难以预料的变化。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能否在即将到来的更伟大的21世纪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特别是高科技的进步和发展。高科技已经成为带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制高点。因此，世界各国都在制定科技、特别是高科技发展规划，并作为国家发展战略和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性日益加深。现代科技缩短了地域之间的距离。人类面对的许多挑战往往超越国界的限制，当代出现了许多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性问题。例如，经济关系、贸易交往、科技发展、生态平衡、环境保护、减灾救灾、预防犯罪、禁绝毒品、反对恐怖主义、防止核扩散和防治艾滋病等等。这些问题不具有社会制度的属性，在这些问题上各国之间存在着共同的利益，需要而且能够进行合作，为人类造福。

上述6条，就是90年代世界的主要趋势和走向。认识趋势和走向，是为了把握趋势和走向，以便为我们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应付面临的种种挑战，胜利地迈向21世纪。

由国际科学与和平周中国组织委员会、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和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共同发起和组织的邓小平和平与发展战略思想学术研讨会于1994年11月8日在北京召开。参加研讨会的有高放、曹长盛、张中云、吴仁彰、宋一秀等著名学者。与会各位专家学者紧密围绕和平与发展这个主题，从各个不同侧面进行了研讨。在广州经纬集团、北京三友家具公司和丛凤辉女士的积极支持和赞助下，使研讨会顺利召开，并在会后组成了论文集编委会，对几十篇论文进行筛选、整理和编排，确定以《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为书名出版。其中，丛凤辉女士做了大量的具体工作。

我认为，这本文集，对于人们了解当前的国际形势，把握邓小平的和平与发展思想，他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战略，以及我国的对外政策是会有启迪和借鉴意义的。

赵 曜

1995年9月20日

注释：

- [1]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6页。
- [2]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5页。
- [3] 《列宁全集》第18卷，第582页。
- [4]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44页。
- [5]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3页。
- [6]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3页。

主编的话

今年是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50 周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50 周年，联合国成立 50 周年。在 50 年前的半个世纪里，人类饱尝了两次世界大战的苦果，中华民族也受尽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欺压和凌辱。50 年后的今天，中国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虽然也走过了几十年艰苦曲折、坎坷不平的道路，曾获得过建国初期“三大改造”和抗美援朝的辉煌胜利，也经历了三反五反、反右斗争、四清运动的磨炼和考验，品尝了大跃进带来的成果与苦果，遭受了 10 年动乱的浩劫，但终于迎来了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新曙光。从此中国人民走出了迂回曲折的低谷，开始了振兴国家与民族的伟大事业。

这一伟大事业的总设计师、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代领袖——邓小平，以高瞻远瞩的宏才大略，大刀阔斧的超人气魄，描绘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蓝图。

在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及其和平外交战略的指引下，我国改革开放 17 年来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全国城乡面貌日新月异，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好一派巨龙腾飞、山欢水笑、百鸟啼鸣、百花齐放的国富民乐和国强民安的景象，中国永远甩掉了“东亚病夫”的称谓，永远摆脱了“一穷二白”的面貌，她正在向世人展示东方大国的英姿与风采。

如今，世界进入了和平与发展的新时代。如何抓住和平时代提供的发展机遇？如何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建设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历史和时代赋予当代中国人民的光荣使命与重大责任。因此，作为中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我们有责任和义务承担研究邓小平的和平与发展的战略思想，探索如何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社会发展的道路的理论工作任务，以便更好地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向前发展，为祖国的腾飞、民族的振兴作出应有的贡献。

为此，国际科学与和平周中国组织委员会、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北京市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北京市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会在第六届国际科学与和平周期间联合主办了“邓小平和平与发展战略思想学术研讨会”。会议于 1994 年 11 月 8 日在北京新华通讯社新闻大厦多功能厅举行，国际科学与和平周中国组织委员会主任高潮、新华通讯社社长郭超人等出席了会议，会议由北京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长强卫主持。

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北京、广州、武汉等地的研究机构和各大专院校的专家学者共 153 人，收到学术论文 40 多篇。在上午的开幕式上发言的有：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冯征，中央党校科社部主任赵曜教授，中央党校国际政治教研室张中云教授，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副局长李君如，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三科研部副主任冷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仁彰，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高放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宋一秀教授。在下午的自由讨论中有 20 多位专家学者作了发言，整个研讨会自始至终洋溢着浓厚的学术气氛，既严肃认真又生动热烈，会议圆满成功，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目的。

为了把学习、研究和宣传邓小平的和平与发展战略思想的活动深入开展下去，为了保存和宣传这次学术会议的成果，本次会议的各主办单位的工作人员组成了论文集编辑委员会，精选出其中一些优秀论文编辑成此书，作为对第六届国际科学与和平周的贡献和纪念。

目前，我国的图书出版业受商品大潮的影响和市场经济规律的制约，许多具有高深水平的社会科学专著和论文集难以出版面世，这难免会造成许多遗憾和损失。对此，我和广大理论工作者一样深感忧虑。作为北京大学的哲学硕士，我深感我有责任和义务为促进中国社会科学理论工作的发展，进而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社会发展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因此，我积极努力地联合广州经纬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何仕强、北京三友家具公司总经理王书林共同出资赞助了这次研讨会及国际科学与和平周的有关活动，并在各主办单位领导的大力支持和工作人员的努力下，成功地组织了这次研讨会并编辑、出版此论文集。这是全体论文作者最新的科研成果之一，是全体工作人员包括编委会成员一年来辛勤工作的硕果，也是我为中国社会科学繁荣与发展献出的一片心愿。

论文集共收入 37 篇论文，以《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为书名问世。由于我本人的水平有限，在主编此论文集的过程中难免会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错误，在此，我恳请广大读者（包括作者们）给予中肯的批评指正。

作为本书的主编，我要特别地向全体作者和编委会全体成员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大家的精诚合作与奉献！同时我也非常感谢当代世界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和友好合作，使此书得以顺利出版发行。愿中国的社会科学理论研究更加繁荣！

让科学造福于人类！

让和平永存于人间！

丛凤辉

1995 年 9 月 20 日

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

邓小平和平与发展国际战略主题思想的划时代意义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冯征副会长在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
(1994年11月8日)

主席、女士们、先生们、同志们：

第6届“国际科学与和平周”活动内容之一——“邓小平和平与发展战略思想”学术研讨会现在开幕了。我代表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向会议致以衷心的祝贺！向应邀参加这次盛会的专家学者表示热烈的欢迎和崇高的敬意！

邓小平同志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邓小平同志的国际战略思想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际和平运动的理论指南。当前，我们正在深入学习《邓小平文选》第3卷，其中有相当多的篇幅是分析国际形势，论述国际战略和我国对外政策的。这充分反映了邓小平同志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在引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取得胜利的进程中、始终密切注意观察国际上的风云变幻，分析各种矛盾斗争的变化，把握国际形势发展的全局，高瞻远瞩，制定相应的新的国际战略，并及时调整我们的方针政策。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国内建设的发展息息相关，总是密切地联系着的，能否对整个国际关系的基本格局进行科学的分析和判定，并充分利用外部条件来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进祖国统一进程，关系极大。研究邓小平和平与发展战略思想，对于领会和挖掘邓小平同志丰富而深邃的思想内涵，对于阐述他在当代中国作为总设计师的崇高地位与巨大功绩，对于我们在改革开放的阶段里更加统一认识，步调一致地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步伐，对于促进世界和平运动的发展，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估计，历来是关系到决定我国建设目标、方针、步骤和布局的战略问题。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我们一直强调战争迫在眉睫的危险，认为新的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要立足于早打、大打。因而在建设方针、布局上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去搞三线建设，影响了经济建设的正常进行。邓小平同志根据80年代以来国际形势发生的许多重大变化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经过深思熟虑后，指出：从帝国主义加紧剥削、掠夺发展中国家和争夺世界霸权的本质来看，战争的危险确实存在，但是人民不要战争，制止战争的力量远远超过企图发动战争的力量，由于战争形式和条件的变化，靠战争来解决问题，对敌对双方都不利，而且由于世界新科技革命不断蓬勃发展，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地位日益突出，这种形势无论是美国、苏联、其它发达国家都不能不慎重考虑，认真对待。据此，他在1984年就正式提出了当代世界带全球战略性问题是和平与发展问题的重要论断，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1]邓小平还就如何走向和平与发展，多次阐明了自己的思路与见解。这一论断，是对三个世界理论的发展与超越，把观察国际问题的视角提到了“人类的高度”，在世界矛盾进一步变化的条件下，合乎逻辑地把视角扩大到人类的命运和前途问题上。这一论断，为我们党和国家调整内外政策，提供了科学的精神武器，

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而受到全世界除极少数反动分子以外的普遍称赞与欢迎。10多年来世界形势的发展和90年代国际政治的现实，充分证明邓小平同志上述论断的预见性和准确性，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特别是深受帝国主义国家欺压和剥削的国家和人民无不由衷地敬佩邓小平同志作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和战略家所具有的理论勇气的深邃的洞察力，邓小平同志把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争取我国发展的良好国际环境作为我国外交战略总方针，也正是从这二理论高度思考问题的具体体现。

和平与发展是相互依存，互为条件的。发展需要和平，和平离不开发展。中国的发展需要一个长期的和平国际环境，中国的发展也对世界和平稳定起重要作用。当前世界的主要任务，就是要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共同发展。南北关系，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差距日益扩大，发展问题不解决，势必影响和平问题的解决，因此，邓小平提出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上来认识，只有创造条件使发展中国家发展起来，和平才有保障，发展才有可能。所以，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发展、繁荣的国际条件，又是世界各国发展与繁荣的战略前提。要解决这个问题，不仅要靠南北对话，而且要靠南南合作，南南合作还可以推动南北合作。可见核心问题是南北问题。邓小平同志的这些思想观点，在其国际战略思想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内容极其丰富，值得我们很好地领会和深入研究。

这里还要指出，第6届国际科学与和平周把“邓小平和平与发展国际战略思想学术研讨会”列为重要活动项目，具有特别的意义。这是因为邓小平的国际战略思想同国际科学与和平周的宗旨是相一致的，全面地理解和把握邓小平这一战略思想，可以使国际科学与和平周提到一个新的水平。因为维护世界和平始终是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而科学又同和平与发展问题紧密相关。科学的进步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科学的进步又必须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科学与发展也密不可分，发展既包括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包括科学的发展，邓小平的一个重要理论贡献就是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当今没有科学技术的发展，就不可能有经济、社会的发展。因此，第6届国际科学与和平周把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作为研讨会的内容，既可以推动当前全国学习《邓小平文选》走向深入，也使在中国举行的国际科学与和平周大为增色。

我们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是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振兴民族精神，促进四化建设和祖国统一大业为宗旨的。我们的全部活动，是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中有一篇重要文章，题为《振兴中华民族》，是他的全部思想的精髓，也是他一生奋斗的目标。而振兴中华民族的唯一正确途径就是他指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国国情、中国特色，必须研究中国的现状，也离不开研究悠久的历史和中国历史文化。把传统与现代结合起来，是我们面临的重要课题。正因为如此，我们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参加主办这次研讨会，并同大家一起学习和研讨邓小平的和平与发展国际战略思想。这次研讨会会有这么多的研究国际问题的专家学者与会，我深信大家一定会发表许多精辟见解，使我们这一次会议取得更多的成果，共同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争取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和外部条件而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预祝会议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注释：

[1]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5页。

邓小平和平与发展战略思想的理论和政治意义

张中云

8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根据自己多年对国际形势变化、发展的悉心研究，创造性地提出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并指出国际上还有其他许多问题，但没有这两个问题带有全球性、战略性和关系全局的意义。他把问题提到这样一个高度，其深刻的含义需要我们认真探索和研究。

概括了国际形势变化的新趋势和新特点

争取世界和平，谋求经济发展，这一直是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劫难后的世界各国人民最为关心和希望解决的切身利益问题，因此，这也就成为许多政党、政治集团和负责的政治家进行活动的重要口号。1948年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创办的机关报，便取名为《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1978年社会党国际第14次代表大会专门研究和讨论了称之为“两个具有广泛意义的彼此相关的议题，即和平问题与发展问题”。然而，由于两方面的原因，和平和发展这两个问题被冲淡了。一是接着而来的东西方“冷战对峙”，北约组织和华约组织开展了轮番的扩军备战，世界大战的各种因素几乎已经显露；二是二战结束后世界各种问题日益增多，诸如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对立和磨擦，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还有民族问题、领土问题，乃至人口、失业、环境等问题，都引起人们的关注，要求给予解决。

就世界来说，关系全局的到底是什么问题？国际形势的变化及其发展趋势究竟是把什么问题突出起来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有没有面临共同需要解决，因而可以合作的问题？类似这一系列的问题，人们的回答是各异的，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也难于取得共识，甚至出现对立。在国际问题上没有共同的语言，找不到可以彼此进行合作的立足点，这对任何国家的发展都不利。问题的关键在于人们的观念和思想认识能否随着时代的发展潮流前进，能否确切反映国际形势发生的新变化、新趋势。

邓小平同志正是在这方面高于同时代人，他看到了人们视而不见的问题，抓住了人们抓不到的关键问题。

世界和平，可以说是全世界人民普遍关心的头号问题，因此，为争取和平而开展的各项活动接连不断，数不胜数，但究竟维护世界和平的可能性如何，有的表现出心中无数，有的在理解认识上抱否定态度。总的看，人们处于担忧、恐怖和无奈之中，邓小平同志不拘泥于传统的分析这个问题的思想方法和观念，而是从现实出发，观察了有资格打世界大战的美苏两国的动向，制约世界战争的社会因素和技术因素的增强，以及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明确提出世界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和平已不仅仅是不要战争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世界其它各类问题的解决，它占有比其它问题更加突出的地位。邓小平同志认为，美国和苏联的紧张关系趋于缓和，东西方谈判逐步取得进展；各国政府开始相应调整政策，世界各国维护和平的情绪和力量明显增长；毁灭性核武器的发展和扩散，使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一旦发生战争，核武器就会给全人类带来巨大损失。所有这些因素综合起来，维护世界和平是可能的，有希望的。这一结论和判断是有充分根据和说服力的。

经济发展，是决定世界各国在世界发展中的地位和命运的核心问题。当

世界战争象达摩克利斯剑悬挂在头上时，人们是无法再去考虑其它问题的。然而大约是 70 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世界战争形势的缓和，经济发展问题自然就突出起来。国家的利益和安全，归根到底维系于经济发展水平和以经济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经济发展问题，一般政治家和国务活动家只看到它只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是不发达国家尽快赶上经济发达国家的问题，是由发达国家来帮助解决的问题。这就是说，是孤立地看待这个问题的。邓小平同志却不同，他把问题提到世界范围的高度，提到南北相互关系和影响的高度。邓小平同志提出，发展问题首先涉及到世界人口 2/3 或 4/5 的发展中国家的处境，与发达国家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其次也涉及到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发展速度，再发展问题；第三还涉及到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与进步的问题。小平同志尖锐地提出，南方要改变贫困和落后，北方也需要南方发展。南方不发展，北方还有什么市场？发达国家应该清楚地看到，第三世界经济不发展，发达国家的经济也不可能得到较大的发展，这就会对世界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带来障碍，发展问题要从人类发展的高度认识。这是全新的提法。

邓小平同志对和平和发展赋予这样的含义和意义，正确反映了国际形势发展的新趋势和新特点。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已越来越多地赢得世界人民广泛的赞同和共识，并付诸以具体的行动。1994 年联合国大会讨论问题之多与以往没有什么区别，然而和平和发展却是本届大会确定的主题。和平和发展已成为当今讨论国际问题最常用的概念了。

丰富了马列主义时代观的内容

根据列宁主义关于区别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不同时代性质和特征的原理，我们当今所处的时代，仍然是列宁所揭示的、由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所开辟的新时代，即开始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现在人们估计，这个时代延续的时间，可能不会比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时间短；

人类历史发展已经开始进入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这已为 20 世纪的历史所证明，本世纪上半期，是社会主义取得了世界性大发展，大胜利的时期。人们对此坚信不疑，就连布热津斯基也承认，共产主义“称雄于 20 世纪的大半部历史”。而当以后共产主义运动出现困难，发生曲折，遭到局部的暂时失败时，有人便对此表示怀疑，认为关于当今时代的提法要改变，或者认为，原先列宁关于我们所处的时代的提法不科学。

自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集体领导下，党对理论和国内外一些重大政策作了拨乱反正，然而关于时代问题，并没有提出纠正和代之以新提法。通览《邓小平文选》第 3 卷，虽看不到有关当今时代观的详尽表述或对原有时代的提法作出评价，但从相关问题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小平同志坚定地认为，社会主义的一系列胜利，尤其是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成就，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已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这实际上是肯定了列宁所揭示和论证的现时代的性质和发展方向。现仅举几处为证：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35 周年庆典大会上，邓小平同志指出：“三十五年来，我国不但完全结束了旧时代的黑暗历史，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也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 [1]

1987 年，邓小平同志在同来访的捷克斯洛伐克总理谈话中谈到，中国若在下世纪中叶，社会主义经济水平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了，“这不但是给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条路，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

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 [2]

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谈话中，针对一些人因苏东各国演变而发生信念危机鲜明地指出：“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象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 [3]

仅仅是以上几处内容，就要比一般地肯定原来关于时代的提法更加具体和更有说服力了。

由于本世纪后半期，社会主义发展落后于资本主义，并进而遭挫折，国际形势的变化出现和平发展的新趋势、新特点，有人对原有时代提法的科学性、准确性产生怀疑或疑惑不解，这并不奇怪。其中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将时代的性质和特点等同起来；二是对时代特征的新变化由于受到传统提法的束缚，未能及时作出新的概括，这个问题由邓小平同志的关于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问题的创造性提法所解决。

在这之前，从列宁到毛泽东，列宁主义者和共产党人都是把时代的性质和特征作为统一的概念使用的。这在客观上也是反映了那个时期的实际情况，即刚刚开始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其主题或主旋律就是革命和战争，其他问题列居次要地位。如列宁在1918年发表的《社会主义与战争》一文提出：资本主义“已经使生产力发展到这种程度，以致人类面临这样的抉择，要么过渡到社会主义，要么一连几年内，甚至几十年地经受‘大，国之间为勉强维持资本主义（以殖民地、垄断、特权和各种各样的民族压迫作为手段）而进行的武装斗争’”。[4] 1977年，即60年之后，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仍然认为：“毛主席告诉我们，只要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这个社会制度不改变，战争不可避免，不是相互之间的战争，就是人民起来革命，绝不会有什么持久的和平。”

坚持这样的传统观念，就难以说明这样的现实问题：由于社会主义出现暂时低潮，资本主义处于相对发展，既没有革命形势，也没有迫在眉睫的世界战争，时代是否改变了。如果不能对时代面临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作出新的理论概括和回答，就会导致在根本原则问题上发生动摇。

邓小平同志提出和平和发展这两大问题正好是同先前的革命和战争的提法相对的。它以无可争辩的事实表明，在我们所处的大时代中，在时代性质和发展方向不变的情况下，其主要内容是会随着各种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决不是僵死不变的。现在看来历史上的革命和战争，曾推动和导致了资本主义的部分死亡和社会主义的胜利，而现今出现的和平和发展，从长过程来看，是有利于全人类的共同进步的，也是有利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因此，决不因为时代主要内容的变化而改变了时代的性质和发展方向。相反，这恰恰反映了时代的发展和进步，反映了时代的新特点。

邓小平关于当代世界两大问题的概括，使我们对时代的认识深化了，即在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既伴随有革命与战争的特定内容，也会出现和平与发展的特定内容。这就使列宁主义时代观的内容更加丰富、更加符合历史发展的实际。

展示了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目标和任务

邓小平同志关于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突出问题的论断，既是对国际形势发展新变化、新特点和总趋势的科学概括，又是对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面临的共同目标和任务的明确提示。它反映了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

愿望和利益的一致，以及开展广泛合作的基础。

当今和平和发展替代革命和战争，这是国际形势变化确已存在的事实。但由于我们过去受“左”的思想影响，对革命形势估计过高和对世界战争形势估计过于严重，而未能更早地把握住新情况，仍把社会主义国家的安危和前途与世界革命和世界战争联系在一起，忽视了经济建设应占的中心位置，分散了人力、物力和财力，不止一次地失去利用和平环境，发展经济的机遇。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又是人口最多，并具有一走实力和影响的社会主义国家，她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和在国际上的行动都会在上世界上产生较大的影响，可以左右一定的国际舆论导向和行动投向。

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新论断，对中国人民来说，第一，明确了把国内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际有利条件和理论依据；第二，确定我国对外工作的基本方针和任务，实现对外政策的两个重要的转变。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根据形势分析，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很危险很迫近的看法，因而也就改变了过去为适应对付迫在眉睫的战争，而实行的许多决策，诸如“一、二、三线的建设布局，‘山、散、洞’的方针”[5]“等，我们可以利用20年，甚至更长些的和平时间来从事经济建设，争取到下世纪中叶，实现“三步走”的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中国不只是和平发展的单方面的受益者，它还是世界和平和发展的积极推动者和贡献者，使世界各国人民受益。因为不仅是中国人民一贯热爱世界和平，坚持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而且是中国拥有庞大的人口、丰富的资源、广泛的市场，对促进世界经济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此外，根据小平同志的思想，我们的对外政策，由过去一段时间针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搞“一条线”的战略，转变为“谁搞霸权就反对谁，谁搞战争就反对谁”的全方位的反霸维和的战略，这就意味着我国独立自主地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同一切实行平等与和平政策的政党建立正常关系，开展积极合作，从而使和平和发展的进程更加健康。

邓小平同志认为，和平和发展也不单是中国人民的希望、要求和利益所在，而且也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希望、要求和利益所在，这就指明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彼此合作的基础。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也需要中国。各国需要在这方面谋求尽可能多的合作点，消除尽可能多的分歧点和障碍。

和平与发展，目前还没有非常稳定而良好地展现在我们面前，我们也不是可以不费力地坐享其成。相反，目前的状态还是令人极不满意的。苏联的解体，并没有使两霸一起消失，而不过是代之以美国想一家独霸和西方七国群雄称霸。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存在，就是战争根源的存在，就是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和实现世界经济全面协调、健康发展的障碍。正因为如此，在苏联解体之前的那个时期，邓小平同志对“两大问题”作出的估计是，和平是有希望的，但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而在这之后，即1992年，他在南巡谈话中又明确指出：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

在目前这种形势下，中国人民怎么办，应该做些什么来解决这两大问题。邓小平同志说：社会主义中国应该用实践向世界表明，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永不称霸，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在经济上，中国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速经济发展，在推动解决南北关系的同时，采取通过新的途径加强南南合作，以南南合作的新成就，来促进和加快南北关系，使世界经济的关系在平等、互利、合作的基础上全面发展，以经济促进和平。

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中国这样做，不仅是从中国的利益出发的，和平与发展，是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目标和任务，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开展的合作，必将推动人类历史的进步。

（作者是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国际政治教研室教授、博士生导师）

注释：

- [1]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9页。
- [2]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5页。
- [3]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3页。
- [4] 《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325页。
- [5]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7页。

从毛泽东“三个世界”战略论到 邓小平“和平与发展”主题论

宋一秀

毛泽东晚年依据世界格局的变动，提出了三个世界理论，从 70 年代初开始，从战略高度调整了我国外交政策。而邓小平重新复出后，分析了世界格局的新变动，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理论，这不仅进一步调整了我国的外交战略，而且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一、三个世界理论给我们开辟了道路

关于三个世界理论，是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战略思想观察国际斗争局势的科学概括和总结。这一理论的形成经历了一个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过程。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世界逐步形成东西方两大阵营对抗的格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开始实施冷战政策，反苏反共的叫喊声甚嚣尘上。毛泽东通过对国际形势的全面分析，洞察了美国等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战略意图。1946 年 8 月，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时深刻指出：美国反苏战争的宣传，“是美国反动派用以掩盖当前美国帝国主义所直接面对着的许多实际矛盾；所放的烟幕”，这“在目前的实际意义，是压迫美国人民和向资本主义世界扩张它的侵略势力”。因为，“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1] 这里，毛泽东首次提出了“中间地带”的观点，比东西方两大阵营对抗的格局，更符合当时国际斗争格局的实际状况。

50 年代中期，毛泽东依据当时国际斗争的新情况指出，当前世界斗争的重点，是帝国主义借反共产主义之名，行争夺亚洲、非洲地盘之实。他认为，当前世界的矛盾除了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外，还存在着两类矛盾和三种力量。两类矛盾；一类是帝国主义跟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即美国跟英国、美国跟法国之间的矛盾；一类是帝国主义跟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三种力量，第一种是最大的帝国主义美国，第二种是二等帝国主义英、法，第三种就是被压迫民族。这一看法是“中间地带”观点的深入展开。

60 年代，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不结盟运动方兴未艾。中苏两党两国矛盾加深，并进一步扩大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向美国闹独立的倾向愈演愈烈。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了国际斗争的新动向，他认为世界局势正出现“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局面。他在先后会见英国元帅蒙哥马利和法国议会代表团时说，我们不感到英法是威胁，并希望英法强大起来。毛泽东已不把帝国主义看作铁板一块，随着苏联对外搞霸权主义，越来越嚣张，毛泽东断言苏联已经变为“社会帝国主义”，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力图称霸世界。从而，毛泽东逐渐形成了“两个中间地带”的观点，即把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称为第一中间地带，把西欧、日本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称为第二中间地带。亚非拉发展中国家被称为“第一中间地带”，是因为这些被压迫的国家和民族要求独立和解放；而其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被称为“第二中间地带”，是因为它们一般都不愿意打仗。这里可以看出，与“中间地带”、“两类矛盾，三种力量”的观点相比，“两个中间地带”的观点又有

了明显的丰富和发展。这表明，“三个世界”理论的雏形开始形成。

1971年10月，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当时，西方某些国际问题专家正在鼓吹美、苏、中“大三角”理论，对此毛泽东持不同意见。他说，我不赞成“大三角”，我喜欢亚非拉，中国属于第三世界。1971年中国重返联合国时，中国代表团正式宣布了毛泽东的这个观点。此后，毛泽东在接见外宾的谈话中，一再重申这一观点。这就成为“三个世界”理论的先声。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来我国访问。毛泽东会见了尼克松。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了联合公报，标志着中美两国在对抗了20多年之后，开始走向关系正常化。新的形势变化，这不仅需要对70年代世界新格局进行新的分析和理论概括，而且需要对中国的外交政策的调整提供新的理论指导。

1974年2月，毛泽东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完整地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按照这一战略观点，第一世界，指美国和苏联两个具有最强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在世界范围推行霸权主义的超级大国；第三世界，指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其它地区的发展中国家；第二世界，指处于两者之间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因此，他号召联合起来反对霸权主义。同年4月6日，邓小平率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第6届特别会议。10日邓小平在大会发言，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就当今世界的格局、三个世界划分的标准、世界主要矛盾、三个世界各自的地位、中国在世界中的定位以及第三世界在经济、政治方面面临的任务等问题，作了系统的、完整的阐述。从而宣告了“三个世界”理论的诞生。

可见，从提出“中间地带”的观点，中经“两类矛盾”“三体力量”的论述，再到“两个中间地带”思想，进而到“三个世界”理论的发展过程，这既是毛泽东深刻反映对战后国际局势不断变化的过程，也是他观察分析国际局势不断深入并做出理论概括的过程。

1978年9月，邓小平对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毛泽东同志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给我们开辟了道路。”[2]1979年3月，他又深刻地指出：“这一国际战略原则，对于团结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改变世界政治力量对比，对于打破苏联霸权主义企图在国际上孤立我们的狂妄计划，改善我们的国际环境，提高我国的国际威望，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3]这就从建立国际统一战线反对美苏霸权主义的高度，阐明了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极其重要的意义。

二、和平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

邓小平根据世界格局的新变化，把和平与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加以认识，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形成了“和平与发展”主题论。这一理论，不是对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的简单否定，而是创造性的丰富和发展。

1977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分析了国内国际形势后，对战争问题做出了新的判断，指出：“可以争取延缓战争的爆发。”[4]因为，“我们有毛泽东同志的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和外交路线，可以搞好国际的反霸斗争。”同时，“苏联的全球战略部署还没有准备好。美国在东南亚失败后，全球战略目前是防守的，打世界大战也没有准备好。”[5]1980年1月，他又说：“我们有信心，如果反霸权主义斗争搞得好，可以延缓战争的爆发，争取更长一点时间的和平。”[6]1987年5月，他进一步指出：“对

于总的国际局势，我的看法是，争取比较长期的和平是可能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7]从1977年到1987年，邓小平从“战争可以延缓”到“战争可以避免”，这是对战争问题在认识上的巨大飞跃，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从80年代初开始，邓小平根据70年代末以来世界格局的新变化，在对战争问题新判断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当前世界格局中诸种矛盾及其相互关系变动的状况，从而逐步形成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主题的思想。

邓小平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8]他又说：当前世界上主要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这两个问题带有全球性、战略性和关系全局的意义。和平问题实质是全球的政治问题，发展问题实质是全球的经济问题。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其中发展（南北）问题“十分突出”，是“核心”问题。现在世界上北方发达、富裕，南方不发达、贫困，而且相对他说，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南方要改变贫穷落后，北方也需要南方发展。南方不发展，北方不会有多大市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发展速度问题；再发展问题。因此，南北问题不解决，就会对世界经济的恢复发展带来障碍。解决这个问题当然要靠南北对话，但单靠南北对话还不行，还要加强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合作，也就是南南合作。第三世界国家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合作，可以解决许多问题，前景是很好的。发达国家应该清楚地看到，第三世界国家经济不发展。发达国家的经济也不可能得到较大的发展。

总之，南方得不到适当的发展，北方的资本和商品就没有市场，如果南方继续贫困下去，北方就可能没有出路。这个问题就是世界发展问题，这要从人类发展的高度来加以认识。

同样，发展是当代中国的主题。对此，邓小平有过多种论述，诸如“中心”、“核心”、“大局”、“主要任务”、“根本任务”等等提法。他强调，经济发展是中心，要扭住这个中心不放，不能干扰和冲击这个中心；发展生产力是大局，大家都要从这个大局出发，照顾大局，千方百计使我国经济发展起来。中国要发展，“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9]这就是说，象中国这样大的国家搞建设，不靠自己不行，主要靠自己，这叫做自力更生。但是，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同时，还需要对外开放，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来帮助我们发展。

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最好方式

1978年9月，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坚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各国的关系和经济文化往来。”[10]

中国政府始终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奉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我们把争取和平作为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争取和平是世界人民的要求，也是我们搞建设的需要。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搞改革开放，在国内需要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在国际上需要有一个和平环境。没有和平环境，搞建设是不行的。

我们在制定国内建设方针的同时，调整了对外政策。我们坚持独立自主

的外交政策，不参加任何集团。谁搞霸权，我们就反对谁；谁侵犯别人利益，我们就反对谁。我们讲公道话，办公道事。中国的对外政策，从 80 年代到 90 年代，甚至到 21 世纪，主要是两句话，一句话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另一句话是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这是我们对外政策的一个基础。中国是个大国，又是个小国。所谓大国就是人多，土地面积大；所谓小国就是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还比较穷。中国是名副其实的小国，但是又可以说中国是名副其实的大国。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中国算一个。中国这一票是第三世界的，是名副其实地属于第三世界不发达国家的。即使中国将来发展富强起来，仍然属于第三世界，中国永远不会称霸，永远不会欺侮别人，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永远不做超级大国。

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是争取世界和平，这是众所周知和持久不变的。我国将长期实行对外开放，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一切国家建立、发展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关系，我们主张用谈判方式解决国际争端。邓小平指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具有强大生命力。主要表现在：

其一，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它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实践表明，最经得住考验的不是霸权政治，不是集团政治，而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其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可以用来指导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世界总的局势在变，国际政治领域由对抗转为对话，由紧张转向缓和，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各国都在考虑相应的新政策，建立新的国际秩序。因此，应该提出一个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理论，在新的国际形势下，霸权主义、集团政治或条约组织都是行不通的，应该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代替霸权政治。这五项原则非常明确，干净利落，清清楚楚。我们应当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做为指导建立国际关系新秩序的准则。

其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甚至可以消除国际争端中的一些热点、爆发点。例如，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的主要障碍，甚至可以能发展成为两国关系中爆发性问题。如果采用“一国两制”的办法，不仅解决了中国的统一，而且美国利益也不受损害。一旦通过和平共处办法解决了台湾问题，这对太平洋地区和全世界的和平稳定都是一件大好事。

其四，和平共处原则用于解决一个国家内部的问题，也是一个好办法。根据中国自己的实践，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来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这也是一种和平共处。所以，和平共处原则不仅在处理国际关系问题上，而且在一个国家处理自己内政问题上，也是一个好办法。

总之，邓小平在考察了当代世界格局新变动的基础上，提出的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观点，从当代世界的战略高度，揭示了时代发展的本质，从而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三个世界”战略论，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作者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现代中国哲学教研室教授、博士生导师）

注释：

[1] 《毛泽东选集》1966年3月第1版，第1191页。

[2]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27页。

- [3]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0页。
- [4]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77页。
- [5]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77页。
- [6]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41页。
- [7]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3页。
- [8]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5页。
- [9]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页。
- [10]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27页。

邓小平对当代世界两大问题的战略思考

亓成章

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同志，不仅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而且是一位善于从国际与国内大视角对一系列重大问题作出正确决策的伟大战略家。当苏东国家动荡、剧变，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有的同志认为中国“必须把反和平演变作为中心任务来抓”之时，邓小平同志却以其丰富的历史经验和政治智慧高瞻远瞩地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1]“还有其他许多问题，但都不象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2]很显然，在和平与发展问题是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意义的国际大背景下，如果我们中国不抓住有利时机，加速发展经济，不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反而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任务”取代或淡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务”，那么，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有利国际环境将会丧失，“分三步走”的战略部署也将会化为乌有，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也就化不成了。可见，邓小平关于当代世界两大问题的科学论断，对把握世界全局、有预见性地指明世界局势的发展方向，以及对指导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何等的重要。

一、关于和平问题

邓小平同志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时代观。他既不固守我们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的观点，也不固守我们时代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观点，更不重复我们的时代是“东风压倒西风”、“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帝国主义“快进历史博物馆了”的观点，而是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当今我们面临的国际大势作出了深刻分析和判断。1985年6月4日，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就明确指出：“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有变化，对外政策也有变化，这是两个重要的转变。”“第一个转变，是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过去我们的观点一直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我们好多的决策，包括一、二、三线的建设布局，‘山、散、洞’的方针在内，都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3]“以前总是担心打仗，每年总要说一次。现在看，担心得过分了。我看至少十年打不起来。”[4]“根据对世界大势的这些分析，以及对我们周围环境的分析，我们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很危险很迫近的看法。”[5]“由此得出结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6]1988年6月22日，邓小平会见埃塞俄比亚总统门格斯图时进一步明确指出：“现在国际形势看来会有个比较长时间的和平环境，即不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环境。”[7]

邓小平作出“可以争取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和平”的结论，主要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

1、打世界大战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有资格，别人没有资格，中国没有资格，日本没有资格，欧洲也没有资格。“苏美两家原子弹多，常规武器也多，都有毁灭对手的力量，毁灭人类恐怕还办不到，但有本事把世界打得乱七八糟

就是了，因此谁也不敢先动手。” [8]1991年12月底苏联解体以后的俄罗斯，虽然战略武器数量少了一些，但从总体上讲，也还是有资格同美国打一场核大战的。但由于俄罗斯今天的综合实力远远比不上昔日的苏联，再加上今日的俄罗斯在内政外交上搞“西化”，因此，美苏打一场世界性的核大战就更不可能了。昔日美苏两家打不起来，今日美俄两家至少目前还看不出有打世界大战的迹象。总之，在今天要打起世界大战还不可能。当然，战争的危险是依然存在的。

2、从全球看，制约战争的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正如小平同志所说：“这个和平力量，首先是第三世界，我们中国也属于第三世界。第三世界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三、是不希望战争的。”“第三世界，包括中国，希望自己发展起来，而战争对他们毫无好处。第三世界的力量，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中人口最多的中国的力量，是世界和平力量发展的重要因素。所以，从政治角度来说，中国的发展对世界、对亚大地区的和平和稳定都是有利的。” [10]邓小平还指出：“这个和平力量还应包括美苏以外的发达国家，真要打仗，他们是不干的呀！美国人民、苏联人民也是不支持战争的。” [11]“日本人民不希望有战争。欧洲人民也不希望有战争。” [12]日本人民是世界上唯一饱尝过原子弹袭击之苦的人民，他们特别反对核战争，“为什么说欧洲是和平力量呢？因为欧洲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灾难。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能力，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才有资格发动。而战争一旦打起来，首先受害的将是欧洲。我们希望有一个联合、强大、发展的欧洲。只要欧洲，包括东欧和西欧，不绑在别人的战车上，战争就打不起来。” [13]二战后逐渐形成美苏争霸的因素不复存在，国际形势从总体上看，明显趋向缓和。全世界人民从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教训中越来越清楚地看到，除了政治因素之外，一个国家的兴衰取决于综合国力（主要是经济实力）的强弱。因此，冷战结束后各国都在调整政策，以更多精力解决自己国内长期积累下来的矛盾，把经济发展放在更为突出的位置。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成为当前国际关系的重点，综合国力的竞赛取代军备竞赛成为大国较量的主要形式；经济强国、经济集团代替了军事强国、军事集团，成为国际斗争的主要内容。从某种意义上说，地缘经济的考虑也已超过了地缘政治的考虑。总之，制止战争的力量与反对战争因素是比以前更多更大了。

3、世界新科技革命的蓬勃发展，在客观上也起着抑止战争的作用。航天技术、新材料技术、通讯技术、生物工程、海洋工程以及机器人工程的不断发展，使未来世界大战的可怕后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能激起全世界人民对世界大战的强烈反对，全世界人民对和平的追求和反对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的呼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烈和高涨得多。这使包括美国当权者在内的各国政府不得不考虑人民的要求。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使核国家由一国发展成为多国，使核战争的结局将发生既没有胜利者又没有失败者的新变化。一旦打起核大战，都有致对方于毁灭程度或近似于“核冬天”的力量，这就迫使掌握了核武器的霸权主义国家不敢轻易动手先使用核武器。现在，世界上已有2万多个100万吨级的核弹头，其总爆炸力约为200亿吨梯恩梯（TNT），如爆发核战争，用1/4核弹头就会使全世界成为“核冬天”，达到致全人类于毁灭的临界水平。1945年8月，美国投在日本广岛上的那颗原子弹，其当量仅为1.5万吨梯恩梯（TNT），投在长崎的那颗原子弹当量也只有2.5万吨梯恩梯（TNT），就造成数10万人丧生的可怕后果；而今天，

仅用一颗 100 万吨级原子弹所造成的毁灭力就是当年造成日本广岛或长崎毁灭力的 40—60 倍。由此可以想像，一旦在今天打起核大战，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样啊！

二、关于发展问题

“发展”一词的概念，其内涵十分广泛，它泛指一个事物的生长、发育过程。但在国际政治中，“发展”问题的特指含义，主要是指“南方国家”与“北方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当今世界，大多数发达国家（指富国）处在赤道以北地区，故将发达国家统称为“北方国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例外）；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指穷国）则处在赤道以南，将它们统称为“南方国家”。总的来说，“北方”与“南方”泛指“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即富裕国家与贫穷国家。因此，小平同志把发展问题亦称之为“南北”问题。

南北问题的实质是什么呢？其实质是经济不平等关系，即北方国家控制与剥削南方国家。南北国家的经济悬殊愈来愈大，是当今世界的主要问题之一。

1、南北问题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1）北方国家控制与剥削南方国家是一个主要原因。北方国家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筑在对南方国家的控制与剥削上。可以这样说，假如北方国家离开南方国家，北方很多国家的机器就要停转、汽车就要停开。如以石油为例，世界石油储备的一半以上、石油产量的 1/3 和石油出口的 1/2 以上集中在中东地区，而世界石油消费的 80% 却不是在中东，而是集中在美国、日本和西欧各国。又如矿产资源，西欧所需矿产资源的 50%，日本所需的 80% 均依赖从发展中国家进口；美国大量消耗的 36 种矿产品中也有 23 种之多依赖从发展中国家进口。南方国家是北方国家销售商品的重要市场：譬如早在 1981 年，发展中国家就吸收了美国全部出口产品的 37%，欧共体全部出口产品的 40%，日本全部出口产品的 44%；近几年，美国向发展中国家的出口的产品总量，已超过日本和西欧出口产品的总额，可见，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对发达国家来说是多么重要。南方国家还是北方国家的重要投资场所。从二战结束至 1980 年止，发达国家已向发展中国家累计投资达 6000 亿美元，为二战前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全部资本输出额的 12 倍。（2）贫富悬殊的局面愈演愈烈，是形成南北问题的又一重要原因。1950 年，发达国家的年人均产值为 2735 美元，发展中国家的年人均产值只有 276 美元，前者为后者的 9.9 倍。到 1980 年，发达国家的年人均产值上升为 8549 美元，而发展中国家年人均产值才为 757 美元，前者是后者的 11.3 倍。进入 20 年代以后，最不发达国家的数量与日俱增：1921 年，人均产值在 100 美元以下的最不发达国家就有 25 个；到 1986 年，人均产值在 250 美元以下的最不发达国家已达 36 个；到 1988 年，最不发达国家的数量已猛增到 39 个；其中，仅非洲就有 27 个。1984 年以来，非洲撒哈拉大沙漠以南就有 1.5 亿人口挣扎在饥饿线上。

2、发展问题的严重性及其解决办法：邓小平同志在 1984 年 5 月同巴西总统菲格雷多会见时，除了谈和平问题以外，还着重讲了发展问题，即南北问题。他说：南北问题“在目前十分突出。发达国家越来越富，相对的是发展中国家越来越穷。南北问题不解决，就会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障碍。解决这个问题当然要靠南北对话，我们主张南北对话。不过，单靠南北对话还不行，还要加强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合作，也就是南南合作。第三世界国家

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合作，可以解决许多问题，前景是很好的。发达国家应该清楚地看到，第三世界国家经济不发展，发达国家的经济也不可能得到较大的发展”。[14]1984年10月，小平同志会见缅甸总统吴山友时又说：“现在世界上北方发达、富裕，南方不发达、贫穷，而且相对他说，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南方要改变贫困和落后，北方也需要南方发展。南方不发展，北方还有什么市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发展速度问题，再发展问题。所以，南南合作还有一个意义，可以推动南北合作。”[15]1985年3月，小平同志在同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谈话时又说：“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欧美国家和日本是发达国家，继续发展下去，面临的是什么问题？你们的资本要找出路，贸易要找出路，市场要找出路，不解决这个问题，你们的发展总是要受限制的。……现在世界人口是四十几亿，第三世界人口大约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三。其余四分之一的人口在发达国家，包括苏联，东欧（东欧不能算很发达），西欧，北美，日本，大洋洲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共十一二亿人口。很难说这十一二亿人口的继续发展能够建筑在三十多亿人口的继续贫困的基础上。当然，第三世界有一部分国家开始好起来，但还不能说已经发达了，而大部分国家仍处于极其贫困的状态，他们的经济问题不解决，第三世界的发展，发达国家的继续发展，都不容易。……总之，南方得不到适当的发展，北方的资本和商品出路就有限得很，如果南方继续贫困下去，北方就可能没有出路。”[16]1988年12月，小平同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会见时再次强调，“和平是有希望的。发展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人们都在讲南北问题很突出，我看这个问题就是发展问题。我曾多次对一些外国朋友讲，这个问题要从人类发展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只有这样，才会明了发展问题既是发展中国家自己的责任，也是发达国家的责任。”[17]

邓小平上述谈话，内容极其丰富。他一方面正确把握了当今世界的时代特征：冷战结束，美苏力量相对衰弱；西欧、日本及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力相对增强；世界民族运动进入发展民族经济、巩固民族独立的新阶段；新的科技革命正在全世界范围内蓬勃兴起；和平因素超过了战争因素，发展问题已成为世界最主要、最突出的矛盾。发展中国家为争取发展权的斗争，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强权政治，争取建立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斗争，已成为当前国际斗争的焦点。另一方面，邓小平敏锐地指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相互矛盾又相互依存的对立统一关系。只要世界上还有3/4的人口不摆脱贫困，世界上就不可能有持久的稳定和和平，发达国家也不可能得到进一步发展。世界是一个整体，南方国家继续贫困下去，北方国家就绝不会有好的出路。因此，解决发展问题，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共同责任。就全世界来说，发展需要和平，和平离不开发展，在和平中求发展，以发展促进和平，当代世界的这两大问题是息息相关、休戚与共的。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力量，中国的发展就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发展，是制约战争力量的发展；中国发展得越强大，世界和平就越有保障。中国要同世界人民一道为人类的和平与发展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那种认为“中国发展了会构成对别国的威胁”的论调，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作者是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国际政治教研室副主任、教授）

注释：

- [1]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5页。
- [2]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6页。
- [3]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6—127页。
- [4]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页。
- [5][6]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7页。
- [7]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0页。
- [8][9]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7页。
- [10]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5页。
- [11]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7页。
- [12]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5页。
- [13]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3页。
- [14]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6页。
- [15]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6页。
- [16]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5—106页。
- [17]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81—282页。

邓小平关于当代世界主题的战略思想

叶扬

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部分

马列主义是正确认识当时的时代的产物。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是正确认识当今的时代而形成和发展的。正如我们党十四大政治报告指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1]对国际形势的正确估量，对当代世界主题的科学判断，对国际格局的准确分析以及对外关系的必要调整等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外部条件，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部分。

（一）和平的国际环境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有利的外部条件。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如果不是在和平的国际环境中，而是在战火纷飞或战争威胁始终存在的国际条件下，谁也不能把主要精力放在建设上。邓小平一再指出：“中国要搞四个现代化建设，没有一个稳定的政治形势不行。”[2]又说，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目标，“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国际上的和平环境，另一个是国内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3]可是，当我国进入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国际环境很不安宁，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推行霸权主义，搞军备竞赛，战争因素在发展，世界各地局部战争不断。这对世界人民不利，对我国现代化建设很不利。邓小平认为，在80年代我们要做三件事的核心是现代化建设，而三件事的第一件是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他还说：“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我们真实的政策，是我们对外政策的纲领。”[4]再者，我们搞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是到下个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就不仅需要和平，而且需要长期稳定的和平环境。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希望至少有七十年的和平时间。”[5]“我们诚心诚意地希望不发生战争，争取长时间的和平，集中精力搞好国内的四化建设。”[6]

（二）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对外开放、广交朋友。这也是顺利地进行现代化建设必不可少的条件。因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关起门来搞是搞不好的，必须实行对外开放。中国历史上曾一度落后，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邓小平说，解放以后“三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7]实行对外开放“并不只是对美国、日本、西欧等发达国家开放。对这些国家开放，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南南合作，还有一个方面，是对苏联和东欧国家开放。一共三大方面”。[8]在国际上广交朋友，建立互相联系、互通有无、互助互补的良好关系，同世界各国建立和发展良好的国家关系，同周边国家保持睦邻友好的良好环境，我们就能专心致志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二、对当代世界有战略性的大思路

国际形势的估量如果从大的方面说，是对时代即对人类社会所处的发展阶段的性质和方向的估量。估量时代的客观标准是，看哪种社会形态代表历史发展的大趋势，看哪个阶级居于时代的中心。资本主义时代是从英国17世纪资产阶级革命而揭开帷幕，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是从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而开创的，从而无产阶级取代了资产阶级居于时代的中心。尽管40年代末以来，发达国家借助新科技革命，生产力得到迅猛发展，

并没有使资本主义“返老还童”。近年来苏东剧变，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发生曲折，但是，作为解决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社会主义仍然是人类社会发展方向。邓小平曾充满信心地说：“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9]所以，当今时代依然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

（一）对国际形势的估计

通观本世纪的形势，大体可以以70年代为界线。从本世纪初到70年代是以战争和革命为世界主题，70年代以后是以和平与发展为世界主题，当然这是从相对意义来区分的。前一时期是风暴时期，发生了大规模的两次世界大战和无数次的无产阶级革命以及民族解放革命。在不到30年间的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的浩劫是史无前例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计有33个国家、15亿人口卷入战争，伤亡人数达3000万。在此期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社会主义国家建立，改写了人类社会所处的时代。第二次世界大战，计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20亿人口卷入战争，仅死亡人数达5000万以上。战后，欧亚和拉美许多国家经过无产阶级革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也有许多国家经过民族解放革命宣告独立，到50、60年代新兴的民族国家有90多个。那时真是“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的年代。进到70年代，这股风暴逐渐过去了，新的革命风暴又未形成。人们的认识落后于形势，仍然认为“世界战争不可避免”，“战争的危险迫在眉睫”，固守于“人民要革命，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的思维牢笼中。根据这种认识，以“备战备荒为人民”、“山、散、洞”的方针，进行一、二、三线的建设布局。邓小平经过长时期的冷静观察，科学地估量了世界形势，得出了结论。指出，由于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存在，苏美两家还在进行军备竞赛，世界战争的危险还是存在的。但是，苏美两家的全球战略部署受到挫折，没有完成。苏美两家原子弹多，常规武器也多，都有毁灭对于的力量，因此谁也不敢先动手，都不敢动。与此同时，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增长，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世界复杂得很，真正支持战争的没有多少，人民是要求和平、反对战争的。“由此得出结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我们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切的看法。”[10]

（二）对世界主题的科学判断

以上对国际形势认识的转变，也改变了我们对当代世界的局势和问题的认识。80年代以来，邓小平多次指出，“国际上有两大问题非常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还有其它许多问题，但都不象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11]又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12]这些判断是对当代世界主题的科学判断。

和平问题主要是指维护世界和平，防止发生新的世界战争问题。它为什么突出地成为当代世界一大主题呢？首先因为当时存在着东西两个超级大国搞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霸权主义是战争的根源。”[13]“战争不是小打小闹，是世界战争。打世界大战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有资格。”[14]所以，和

平问题显然是东西问题。其次因为世界战争是大打、打核大战。80年代，世界上核俱乐部共拥有5万多颗核弹头，爆炸力相当于1.5万米加(百万吨)。如果打核大战就是一场人类浩劫。邓小平说：“现在有核武器，一旦发生战争，核武器就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损失。”[15]又说：“苏美两家原子弹多，常规武器也多，都有毁灭对手的力量，毁灭人类恐怕还办不到，但有本事把世界打得乱七八糟就是了。”[16]再次因为科学技术和经济因素等综合国力的较量以及世界经济一体化，使发达国家谁也不敢把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寄托在发动战争上，邓小平说：“还要看到，世界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17]无论哪个国家都要认真对待。

发展问题主要是指发展经济和文化的问题。为什么成为当代世界两大主题的核心呢？首先因为第三世界各国获得民族独立以后，发展问题是面临的首要问题。邓小平说：“一个国家要取得真正的政治独立，必须努力摆脱贫困。”[18]如果发展问题得不到解决，摆脱不了贫困，政治独立也不能巩固。其次因为是站在全人类发展高度来认识的。当今世界上共50多亿人口，其中1/4的人口生活在发达国家，其他3/4的人口生活在发展中国家或叫不发达国家。如果不发达国家的发展问题得不到解决，世界上大多数人口在贫困中挣扎，试问全世界的经济文化和社会进步，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发展问题，能够顺利地解决吗？“总之，南方得不到适当的发展，北方的资本和商品出路就有限得很，如果南方继续贫困下去，北方就可能没有出路。”[19]可见，发展问题的解决“既是发展中国家自己的责任，也是发达国家的责任”。[20]再次因为发展与和平是紧密相联的。“发展需要和平，和平离不开发展。”[21]如果贫困落后与全世界大多数人口相伴随，那么贫困和动乱是孪生子会接踵而来，世界就不得安宁。邓小平认为，为了争取和平，第三世界要发展，欧洲也要发展，欧洲是决定和平与战争的关键地区，“只要欧洲，包括东欧和西欧，不绑在别人的战车上，战争就打不起来。所以，我们说，争取比较长一点的和平时间是可能的。如果下一个世纪五十年里，第三世界包括中国有一个可喜的发展，整个欧洲有一个可喜的发展，我看那个时候可以真正消除战争的危险。”[22]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后，世界主题是否有变化呢？没有变。因为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深圳等地，在讲话中指出：“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23]发展问题更严峻和突出，“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24]象这样变幻莫测的复杂国际局势，难于解决当代和平与发展的两大问题。

三、调整对外关系的大政策

邓小平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有变化，对外政策也有变化，这是两个重要的转变。”[25]那么，我国的对外政策有哪些相应的调整变化呢？

(一) 坚持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我们调整的对外政策就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我们“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谁搞霸权就反对谁，谁搞战争就反对谁。所以，中国的发展是和平力量的发展，是制约战争力量的发展。”[26]这样的对外政策有多层含义，略述如下：

首先，独立自主是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放在首位。独立自主是毛泽东、周恩来制订对外政策的基本立场和根本政策。周恩来说：“我们对外交问题有一个基本立场，即中华民族独立的立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立场。”[27]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时期继承和发展了这个立场，强调我们奉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必须把“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28]邓小平指责西方一些国家推行“人权外交”，妄想损害我国的根本利益，指出：“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又说：“中国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29]所以，我们奉行的和平外交政策又是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相结合的政策。

其次，实行不结盟、不打牌。建国初期，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以军事遏制、经济封锁来孤立新中国：对此，我们实行了同苏联结盟的“一边倒”政策。60年代以后，随着中苏关系恶化，这种结盟实际上不复存在。以后，我们确立了一条原则，同任何国家即使关系再好，也不结盟。邓小平说：“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30]因为不依附于任何大国和国家集团，不支持它们任何一方反对另一方，不受制于人，就能更有利于维护我国的主权和安全，维护世界和平。70年代初，针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我们搞了“一条线”的战略，就是从日本到欧洲一直到美国的“一条线”。现在我们改变了。邓小平指出：在过去人们称之为美、苏、中政治“大三角”中，我们不再靠近谁，针对谁，根据这个原则，我们改善了同美国、同苏联的关系。但是，“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31]中国不把自己绑在美国战车上，也不把自己绑在苏联战车上，总之，“我们不能坐到别人的车子上去。”[32]这样的做法并不等于中国没有自己的明确立场，我们一再申明“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中国和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的命运是共同的。中国永远不会称霸，永远不会欺负别人。”[33]

（二）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独立自主、不结盟、不打牌的和平外交政策，不意味着对外关系的无所作为。邓小平说，中国“在国际问题上无所作为不可能，还是要有作为。作什么？我看要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34]邓小平倡导建立的国际新秩序的内容有如下的几个方面：

建立国际新秩序的目的是，结束两个或一个超级大国搞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主宰世界的不公正不平等的局面，创立一个政治平等，经济繁荣的新秩序。

处理国际政治、经济事务的准则是，国家不分大小、穷富、强弱都一律平等，穷国通过发展走向富裕，富国也有所发展；在经济关系上遵循平等互利、等价交换原则，开展贸易和合作，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共同认识处理国际关系的最好方式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邓小平说，处理国际关系“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35]

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是，通过谈判和平合理地解决争端，反对诉诸武力，反对用战争手段侵入和压迫别国服从自己的意志。邓小平说：“世界上有许

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 [36]于是，邓小平倡导“一国两制”来解决中英之间的历史争端，使香港主权回归中国，这是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范例。

在国际新秩序中的世界格局是，在力量对比基础上要形成相对稳定的新的国际结构。旧的世界格局是 1945 年美英苏三国首脑在雅尔塔会议上所确立的美苏“两极对峙”的格局。它经历 40 多年，由于苏联解体被打破了。新的格局是怎么样呢？邓小平指出：“现在旧的格局在改变中，但实际上并没有结束，新的格局还没有形成。” [37]现在是处于新旧格局交替的过渡时期，力量失衡，局势动荡，地区性冲突愈烈，中东、巴尔干的热战愈炽。海湾一战，以“美国领导”为旗帜的世界新秩序正式出台。由于美国自身的“衰落”，世界人民的警惕，连美国国内有识之士对这种新秩序也不以为然。现在，对新的世界格局有多种说法，一种是所谓“一三五七”，即美国一个超级大国，美俄中三角关系，美、欧、日、俄、中五极，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另一种是所谓“一点两面三制”，即一个超级大国美国，两个超级军事大国美俄，不同范围的四个三角形结构：政治上美俄中三角，经济上美欧日三角，在欧洲地区美俄西欧三角，在亚大地区美中日三角。邓小平说：“美苏垄断一切的情况正在变化。世界格局将来是三极也好，四极也好，五极也好”，“所谓多极，中国算一极。中国不要贬低自己，怎么样也算一极。” [38]

（三）建立和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

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建立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是我国在 50 年代倡导并一贯遵循的处理国家关系的准则。在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成为当代世界主题的新时期，邓小平坚持和发展了这个准则，并使它具有如下层次的内容：

1. 建立和发展同第三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由于我国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两重身份，第三世界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邓小平说：“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 [39]这是一个根本国策。

2. 恢复和发展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友好关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我国调整和改善了同美国、日本以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关系。邓小平说：“我们谁也不怕，但谁也不得罪，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办事。” [40]

3. 恢复和发展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60 年代初，由于中苏两党意识形态的大论战，导致我国同苏东一些国家以及共产党的关系发生破裂。我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先后同苏东一些国家恢复了正常的外交关系和党际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是发展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关系的准则，也是发展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准则。

建立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同世界各国一切政党的友好合作关系。为此，我们党倡导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四项原则，同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政党建立和发展党际关系，对党与党之间遗留的历史问题，采取“一风吹”，不纠缠旧帐，不搞争论的做法。因此，我们党先后同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共产党、社会党、社会民主党恢复和建立了关系。

在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为主题的时代，邓小平认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 [41]世界需要中国，“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这就为提出

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政策奠定了思想基础，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者是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教授）

注释：

[1]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 1992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6 页。

[2]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207 页。

[3]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210 页。

[4]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417 页。

[5]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250 页。

[6]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57 页。

[7]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64 页。

[8]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 83 页。

[9]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82—383 页。

[10]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127 页。

[11]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96 页。

[12]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105 页。

[13]、[14]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104 页。

[14]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105 页。

[15]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56 页。

[16]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127 页。

[17]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127 页。

[18]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202 页。

[19]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106 页。

[20]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282 页。

[21]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 1992 年 10 月第 1 版，第 43 页。

[22]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233 页。

[23]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83 页。

[24]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44 页。

[25]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126 页。

[26]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128 页。

[27]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 321 页。

[28]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48 页。

[29]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 页。

[30]、[31]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57 页。

[32]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156 页。[33]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56 页。

[34]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63 页。

[35]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96 页。

[36]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49 页。

[37]、[38]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53 页。

[39]、[40]《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3页。

[41]《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4页。

邓小平的时代观

孟祥青 于燕燕

在《邓小平文选》第3卷中，小平同志以一位大战略家的胆识和气概，从全球战略的高度提出了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1]的著名论断。在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概括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十四大报告把它称作是“时代主题”和“时代特征”。小平同志的论断是对当代世界形势高屋建瓴的正确判断的精辟总结，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笔者认为，这也是邓小平同志时代观的核心。

小平同志的时代观可以概括为5个方面：

一、当代世界主题的新认识

在世界不同历史时期，国际关系的中心问题及人类面临的中心任务有所不同，因而，世界的主题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当世界历史发展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资本主义垄断代替了自由竞争。革命导师列宁分析了国际形势变化的特点，指出世界进入了“帝国主义时代”，并提出了两个十分重要的观点，一是帝国主义就是战争，二是战争必然引起革命。据此，可以说列宁所处的时代，国际关系围绕着战争与革命展开。当时，战争与革命就是国际关系的中心问题，就是那个时代的主题或基本特征。

二战后，特别是80年代以来，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变代，世界进入了一个不同于战争与革命时期的新的历史时期，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基本特征。这是人类历史和国际关系发展的必然结果。首先，战后40多年，西方国家之间无战争，世界范围内保持了相对和平；其次，战后形成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力量长期竞争共处，在世界范围内不存在无产阶级直接革命的形势；第三，国际竞争的重点日益从军事转向科技经济领域，竞争越来越激烈；第四，维护世界和平、谋求经济发展成为世界主要潮流。总之，正如十四大报告所指出的：“世界要和平，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经济要繁荣，生活要提高，已成为各国人民的普遍要求。”[2]

在这样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里，小平同志通过对世界形势的深入观察研究，以及对当前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特征的透彻分析，对时代主题提出了新的认识，明确指出，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和平与发展。1984年5月29日，他在会见巴西总统菲格雷多时谈到：“现在世界上问题很多，有两个比较突出。一是和平问题。……二是南北问题。”[3]同年10月，小平同志进一步指出：“国际上有两大问题非常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还有其他许多问题，但都不像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4]1985年3月小平同志再次强调：“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5]

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旧格局的逐步瓦解，小平同志又提醒人们：“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6]在南方讲话中，再次强调：“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7]小平同志的这一思想不仅向我们揭示了时代面临的中心任务，而

且还阐明了完成这一战略任务的长期性和艰巨性。

二、当代世界战争根源的新判断

马克思主义认为，战争是人类社会发展一定阶段的特有现象，它起源于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私有制和阶级的存在是文明社会战争的主要根源。恩格斯曾经指出：“只要有利益相互对立、相互冲突和社会地位不同的阶级存在，阶级之间的战争就不会熄灭。”[8]人类社会发展到帝国主义时代，帝国主义为重新瓜分市场和争夺殖民地的斗争，导致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两次世界大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爆发的。列宁明确指出：“现代战争产生于帝国主义。”[9]

毛泽东同志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战争根源的基本观点，指出：帝国主义制度酝酿着战争，“只有帝国主义消灭了，才会有太平。”[10]二战后，世界形势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特点，其中之一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未爆发的战争，而第三世界国家以至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却屡开战端，对于人类战争史上的这一奇怪现象，毛泽东生前曾进行过探索，曾指出：“美国在世界上有利益要保护，苏联要扩张，这个没法子改变，在阶级存在的时候，战争是两个和平之间的现象。”[11]这一论断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美苏两霸之间的斗争，是酝酿爆发世界战争的主要危险。

邓小平同志通过对战后国际形势的透彻分析，对当代战争根源问题进一步作出了科学论断。他一针见血地指出：“霸权主义是世界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是危害世界和平安全和稳定的根源。”[12]而世界战争的主要危险在于美苏两霸的争夺。“因为我们讲的战争不是小打小闹，是世界战争。打世界大战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有资格，别人没有资格，中国没有资格，日本没有资格，欧洲也没有资格。所以，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也就是维护世界和平”，[13]这是对战后以来动荡不安的国际形势切中要害的结论，历史事实完全证实了这一结论的正确性。

进入 90 年代，世界形势剧变，苏联的解体，结束了两个超级大面对峙争霸的局面。但是，霸权主义及其影响依然存在，霸权主义称霸世界的野心依然存在。只要有霸权主义存在，就必然推行强权政治，就会搅得世界不得安宁。因此，霸权主义仍然是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

邓小平同志关于战争根源的论断是对马克思主义战争根源理论的重大发展。他的突出贡献在于：第一，阐明了人类社会的不同历史时期，战争根源的主要表现形式是不同的。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就是战争”的结论，是在资本主义处于上升时期，帝国主义列强为瓜分殖民地争斗不休的情况下提出来的。战后，世界形势的巨大变化，出现了政治、经济、军事争夺的新形式，主要以向外侵略扩张，企图控制别国的霸权主义表现出来，由此带来了世界的动荡不安。因此，“霸权主义战争根源说”，是对“帝国主义战争根源说”的发展，二者都是对马克思主义战争根源理论的具体运用。第二，揭示了社会主义国家中只要搞霸权主义，也会成为战争的根源。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存在旧制度的残余及意识形态的历史继承性，在对外政策上也可能推行霸权主义，即企图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控制其它国家，从而成为战争的策源地。第三，指明了战争根源中的最危险因素。霸权主义搅得世界不得安宁，但霸权主义有世界和地区，大霸和小霸之分，只有超级大国所推行的世界霸权主义，才是世界战争最主要、最危险的因素。

三、维护世界和平力量的新概括

邓小平同志在对当代世界战争根源进行深刻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战争与和平的力量对比，进而得出结论：世界大战可以避免。

小平同志认为：“虽然战争的危险还存在，但是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日本人民不希望有战争。欧洲人民也不希望有战争。第三世界，包括中国，希望自己发展起来，而战争对他们毫无好处。第三世界的力量，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中人口最多的中国的力量，是世界和平力量发展的重要因素。”[14]1985年6月，小平同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明确指出：“世界战争的危险还是存在的，但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这个和平力量，首先是第三世界，我们中国也属于第三世界”。“这个和平力量还应该包括美苏以外的发达国家，真要打仗，他们是不干的呀！”[15]这是对维护世界和平力量的科学概括。

首先，强调第三世界是和平力量的支柱。小平同志多次阐述过第三世界在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斗争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认为：第三世界是反霸主力军，是和平力量的支柱，第三世界的发展就是和平力量的发展。事实正是如此。战后，第三世界的崛起，是建立在被压迫民族摆脱帝国主义统治而获得独立的基础之上的，共同的历史命运使它们之间有着团结合作反帝反殖的共同愿望。超级大国的争霸斗争，又严重威胁它们的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使它们身受其害，主权与霸权之间的矛盾无法调和，不能不激起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的强烈反抗。第三世界国家取得政治独立后，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发展民族经济，争取经济独立，它们迫切希望有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因此，第三世界过去的和当前的地位，决定了它们是反霸、维护和平的基本力量。第三世界拥有近130个国家，30多亿人口，它们的斗争，有力地遏制了霸权主义势头，打乱了超级大国的战略部署，严重削弱了超级大国控制世界的的能力，作为一支新兴的政治力量，第三世界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中国属于第三世界，邓小平同志一再指出：中国是制止战争、维护和平的重要力量，“我们奉行独立自主的正确的外交路线和对外政策，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谁搞霸权就反对谁，谁搞战争就反对谁。所以，中国的发展是和平力量的发展，是制约战争力量的发展。”[16]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一贯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为维护中国人民的主权和利益，支援世界人民的正义事业斗争。早在50年代初，我国就倡导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成为我国处理国家关系的基本准则，由于它的和平性和进步性，在国际关系上具有广泛的适用性。既适用于双边外交，也适用于多边外交，如果国际上普遍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就能有切实的保障。小平同志反复论述说，中国是一个和平稳定的力量，中国最需要和平，不希望战争。我们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就是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们希望至少20年内不打仗，更希望70年内不打仗。中国的发展对世界、对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都是有利的。中国每发展一步，和平力量就增长一分。到本世纪末，中国达到“小康水平”，制约战争的力量便会有很大增长。如果将来中国接近发达国家水平，那时就更难打起来了。[17]

其次，指出东欧和西欧都是维护和平的力量。邓小平同志指出：“欧洲是决定和平与战争的关键地区。”“现在我们根据客观的判断，认为西欧和东欧都是维护和平的力量。东欧、西欧都需要发展，越发展和平力量越大。

为什么说欧洲是和平力量呢？因为欧洲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灾难。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能力，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才有资格发动。而战争一旦打起来，首先受害的将是欧洲。我们希望有一个联合、强大、发展的欧洲。只有欧洲，包括东欧和西欧，不绑在别人的战车上，战争就打不起来。” [18]欧洲各国人民及其领导人都逐渐意识到，只有坚决阻止超级大国进一步走向对抗，才能有效地防止战争。所以，尽管一些欧洲国家属于超级大国的盟国，但他们都不愿意绑在超级大国的战车上，要求独立自主的离心倾向愈来愈强烈，特别是在涉及世界安危的问题上，更不愿听任超级大国的摆布，这对于超级大国的战争企图，起着重要的制约作用。

正是通过上述的分析，小平同志认为，和平力量超过了战争的力量，从而对当代世界战争与和平作出了新的预测，精辟地指出：如果世界和平的力量发展起来，第三世界国家发展起来，可以避免世界大战。

四、发展问题战略地位的新阐述

战后国际形势变化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第三世界登上了政治舞台，从而大大改变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有力地推动了世界格局多极化的发展。毛泽东同志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以及我国所处的安全环境，提出了三个世界的战略划分，并把第三世界看作是反帝反霸反殖的依靠力量。

70年代以来，尤其是进入80年代，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不仅未缩小，反而进一步拉大了，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越来越受到旧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制约，反过来影响着北方发达国家的再发展，给世界经济的繁荣设置了巨大障碍。发展问题已经成为全球所面临的重大问题。

发展问题的实质是什么？对世界经济乃至世界和平有何影响？怎样解决？这些问题成为人们普遍关心的重大问题。小平同志根据变化了的国际形势，在深入思考研究的基础上，把发展问题与和平问题并列，不仅明确提出了时代主题的论断，而且深刻阐述了发展问题的战略地位及全球影响，认为它是当今世界的“核心问题”。

小平同志说：“这个问题要从人类发展的高度来认识。现实情况是当今世界只有四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发达国家，其他四分之三的人口是生活在发展中国家，或者叫不发达国家。国际社会虽然提出要解决南北问题，但讲了多少年了，南北之间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并且越来越大。” [19]“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 [10]所以，小平同志认为，发展问题不仅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紧迫问题，也是发达国家面临的重要问题，它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关系到整个世界经济的繁荣和人类社会的和平与进步。

首先，强调发展问题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紧迫任务，关系到整个世界经济的共同繁荣。发展问题主要是指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战后以来，广大发展中国家政治上取得了独立，民族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但在整个世界经济中，发展中国家大多数还很贫穷，经济落后的状况亟待改变。80年代以来，由于受发达国家经济“滞胀”的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率显著下降，债务问题日益突出，国际收入急剧减少，通货膨胀惊人，资金严重不足，出现了资金向发达国家倒流的现象，再加上贸易条件恶化，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和整个国民经济都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因此，发展问题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和人民摆脱贫穷和落后来讲，具有刻不容缓的紧迫性。

同时，应当看到，发展中国家地域辽阔，人口众多，自然资源十分丰富，是推动整个世界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基础和基本因素。发展中国家的贫穷落后，无疑会影响到整个世界经济的繁荣。小平同志指出：“现在世界人口是四十几亿，第三世界人口大约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三。其余四分之一的人口在发达国家，包括苏联，东欧（东欧不能算很发达），西欧，北美，日本，大洋洲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共十一二亿人口。很难说这十一二亿人口的继续发展能够建筑在三十多亿人口的继续贫困的基础上。”[21]因此，发展问题不仅是发展中国家的紧迫问题，实际上是整个人类的发展与繁荣问题。发展中国家贫穷落后的问题不解决，人类的发展将遇到难以克服的困难。

其次，指出发展问题也是北方发达国家面临的重要问题，关系到发达国家经济的继续发展。邓小平同志在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时说：“欧美国家和日本是发达国家，继续发展下去，面临的是什么问题？你们的资本要找出路，贸易要找出路，市场要找出路，不解决这个问题，你们的发展总是要受到限制的。”[22]小平同志还曾经明确指出：“发达国家应该清楚地看到，第三世界国家经济不发展，发达国家的经济也不可能得到较大的发展。”[23]发展中国家是发达国家重要的原料产地，又是发达国家重要的商品销售市场和重要的投资场所，发达国家在经济上同发展中国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发达国家经济的繁荣不可能长期建立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贫穷之上。

此外，小平同志还强调：发展问题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重大课题，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社会主义国家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关系，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新型的平等互利的合作关系。特别是现在的社会主义国家本身就属于发展中国家，急需发展自己的经济。因此，在发展问题上，彼此是休戚相关，命运与共的。

由此可见，当今世界三种不同类型的国家都面临着经济发展问题，而且都与南北关系的状况及发展前景息息相关，发展问题确实是一个全球性和长期性的重大战略问题。

还应看到，发展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关系到世界和平与稳定的政治问题。小平同志多次阐述了这样一个思想，即发展中国家经济如果得不到发展，世界就很难安宁，世界和平很难维持。这主要是因为，经济不发达，劳动人民长期贫困，不仅容易引起社会动荡，而且往往容易被大国所利用，产生国际纠纷。同时，反对发达国家控制、剥削发展中国家，促进经济发展的斗争，是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继续和发展，对于摆脱对发达国家依附，冲破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垄断的地位，巩固和发展政治独立成果，都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而为改善南北关系，促进“南方”国家经济发展的斗争，是在更加广泛、更加深入的意义进行的反帝、反殖、反霸的斗争，也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保证。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与繁荣，增加了和平与稳定的力量。而和平的国际环境，又是谋求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在和平中求发展，以发展促和平，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是不可分割的。从一定的意义上说，和平是外部条件，发展则是当今世界的核心问题。

邓小平同志指出：“现在世界上北方发达、富裕，南方不发达、贫困，而且相对他说，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24]发展问题的实质就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经济差距不断扩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它们在世界经济中的垄断地位，控制和剥削发展中国家，并使它们保持依附状态，造

成了南北差距不断扩大，导致发展中国家愈来愈穷，而发达国家则愈来愈富。所以，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就是如何打破国际经济旧秩序、建立新秩序的问题。而“改变国际经济秩序，首先是解决南北关系问题，同时要采取新途径加强南南之间的合作”。[25]小平同志关于发展问题战略地位的一系列精辟论述，尤其是对第三世界经济发展全球影响的阐述，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解放运动的理论，揭示了我们当今时代的本质特征，对我们分析时代的基本矛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五、当今世界主题与党的基本路线相结合的新高度

邓小平同志在揭示时代主题的战略意义时，不仅从全球战略形势变化的高度着眼，而且也从国内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出发，二者结合在一起，相辅相成，达到了完美的统一，使时代主题的论断具有了新高度，使党的基本路线的理论依据更加充分，也更加科学。

时代主题的论断，既反映了当代世界的客观现实，也是我国实行战略重点转移、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客观需要。

首先，时代主题的判断，为党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的制定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

党的十三大指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党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25]毫无疑问，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首先是根据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制定的，但它没有也不可能脱离我们所处的现实的国际环境。在现时代，世界上的事情越来越联成一气了。国情和“世情”是比较、相渗透而存在的，不可能把它们完全割裂开来，一个国家所处的特定国际环境，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国情；而一个国家的国情又是“世情”的一部分，和平与发展是我们时代的历史潮流，是最大的“世情”。我们党的基本路线正是在这样一个国际背景下制定的，它不仅反映了民族的特点，而且还适应了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体现了时代精神，是民族特点与时代精神的高度统一。换句话说，时代主题的正确判断，为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提供了可能，成为制定基本路线重要的科学依据之一。

其次，时代主题的正确判断，是贯彻党的基本路线的必备条件。

加速经济建设是基本路线的中心。这个中心的确定，是根据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及改变我国贫穷落后需要，也离不开当前国际环境为我们提供的有利机遇与挑战。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多次强调必须把经济建设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明确指出：“现在要横下心来，除了爆发大规模的战争外，就要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搞这件事，一切围绕着这件事，不受任何干扰。就是爆发大规模战争，打仗以后也要继续干，或者重新干。”[17]问题很明显，要安下心来搞经济建设，光有国内的安定团结局面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国际上不爆发大战的条件作为保障。小平同志特别指出：“我们诚心诚意地希望不发生战争，争取长时间的和平，集中精力搞好国内的四化建设。”[28]“中国太穷，要发展自己，只有在和平的环境里才有可能。”[29]“为了使中国发展起来，实现我们的宏伟目标，需要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30]1989年“六·四”事件后，西方国家纷纷制裁中国、干涉中国内政。1990年7月，小平同志在会见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时再次强调：“中国要实现自己的发展

目标，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安定的国内环境与和平的国际环境。我们不在乎别人说我们什么，真正在乎的是有一个好的环境来发展自己。” [31]近年来，邓小平通过深入地分析国际形势，对世界范围内战争与和平的可能性作出了新的预测，得出了战争的危险仍然存在，“但是可以争取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和平” [32]的正确结论，如果我们不利用当前的和平环境把我们的经济搞上去，将来便会被动挨打，遗恨千古。如果我们不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保持和发展世界和平的大好局面，也不利于我们用较长时间彻底改变我国贫穷落后的面貌。所以，小平同志多年来一再告诫我们：抓住有利的国际环境发展自己。1988年，他在会见埃塞俄比亚总统门格斯图时就谈到：“现在国际形势看来会有个比较长时间的和平环境，即不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环境。我们都是第三世界国家，要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要丧失时机。” [33]1990年4月，小平同志再次指出：“我们要利用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少管别人的事，也不怕制裁。” [34]1992年年初，小平同志视察南方时一再强调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他语重心长他说：“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 [35]

那么，如何抓住时机、发展经济？小平同志反复强调要坚持“两个基本点”，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1989年“六·四”事件后，小平同志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指出：“四个坚持本身没有错，如果说有错误的话，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不够一贯，没有把它作为基本思想来教育人民，教育学生、教育全体干部和共产党员。” [36]“改革开放这个基本点错了没有？没有错。没有改革开放，怎么会有今天？这十年人民生活水平有较大提高，应该说我们上了一个台阶，” [37]“要说不够，就是改革开放得还不够。” [38]后来，小平同志进一步强调：“中国坚持社会主义，不会改变。” [39]同时也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 [40]“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 [41]总之，“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 [42]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这已经成为我们党和人民的共识。所以，要抓住时机，发展经济，实现我国战略目标，必须坚持“两个基本点”。

综上所述，没有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就无法一心一意地从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而没有小平同志对和平与发展问题的战略判断，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党战略重点的转移就会遇到更大的阻力，“左”的思想就不容易被清理，就不可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完整性和系统性。小平同志把时代主题的判断与党的基本路线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达到了新的高度，也使时代主题判断本身具有了坚实的科学基础。

邓小平同志关于时代主题的论断及其一系列精辟的阐述，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观，对于我们深刻认识所处的时代，分析时代的基本矛盾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孟祥青：国防大学世界经济政治教研室；于燕燕：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

注释：

- [1]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4页。
- [2]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第1版，第43页。
- [3]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6页。
- [4]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6页。
- [5]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5页。
- [6]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3页。
- [7]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3页。
-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08页。[9] 《列宁全集洛第21卷，第324页。
- [10]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91页。
- [11] 《人民日报》，1977年8月23日。
- [12] 《人民日报》，1979年3月1日。
- [13]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4页。
- [14]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5页。
- [15]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7页。
- [16]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8页
- [17]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7、64、82、94、104—105、233、250、282页。
- [18]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3页。
- [19]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81页。
- [20]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82页。
- [21]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6页。
- [22]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5—106页。
- [23]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6页。
- [24]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6页。
- [25]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0页。
- [26]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87年11月版，第13页。
- [27]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49页。
- [28]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7页。
- [29]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82页。
- [30]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4页。
- [31]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0页。
- [32]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9页。
- [33]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0页。
- [34]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8页。
- [35]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5页。
- [36]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05页。
- [37]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06页。
- [38]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07页。[39]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45页。
- [40]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8页。

[41]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0页。

[42]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0—371页。

邓小平和平与发展战略思想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杨君游

从 70 年代后期开始，特别是进入 80 年代以后，国际形势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二战后确立的雅尔塔体系被打破，一种新的政治格局正在形成之中。在新的形势下，邓小平同志以求实的科学态度，从战后的历史事实出发，对当代世界的矛盾和问题作了冷静、深刻地分析与研究，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邓小平同志关于和平与发展的战略思想，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一、对时代本质的准确把握

1985 年 3 月 4 日，邓小平同志在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时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 [1]到了 80 年代，国际社会的主要矛盾已集中反映在东西南北关系上。根据国际形势的这种变化，邓小平同志果断提出和平与发展这两大全球性战略问题和国际形势发展的总趋势，表明世界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也就是和平与发展的新时期。

为什么说世界已进入和平与发展的新时期呢？

从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看，战后世界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生产和资本的高度国际化，已使发达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达到空前程度。据统计材料，战前的 1938 年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列强的对外直接投资有 70% 分布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战后从 1945 到 1975 年，主要资本输出国在国外的长期投资大约增长了 10 倍。其中，发达国家相互投资已占它们全部对外投资的 70%，这一趋势仍在加强。例如，美国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已占它全部对外投资的 75%；到 1981 年末，英国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累计额占其对外直接投资累计总额的 80%；1981 年至 1984 年，日本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累计额占其同期对外直接投资累计总额的比率也从 1972 年至 1980 年的 45.3% 上升到 50%。仅从发达国家相互间投资情况这一方面看，资本主义国家间的关系确已发生变化。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在高度发展的生产国际化基础上的全面资本渗透，形成了所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和“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相互依存局面。战争曾经是资本主义国家解决相互间矛盾的一种手段，但在现在这种局面下，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殚思极虑设法避免以战争作为解决矛盾的手段。因为一旦发生战争，发达国家赖以生存的经济体系就会崩溃，各国就会蒙受灾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固有矛盾并没有消除，有时相互间矛盾还很尖锐激烈，但谁都不愿通过战争来解决，而主要通过协商、对话等和平方式来缓解矛盾。主要资本主义大国从 1975 年起建立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正是为了适应这种需要。发达国家为了获得进一步的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保持一个和平与稳定的国际环境。

从发展中国家的情况看，它们在取得了国家的政治独立后，普遍面临发展民族经济、巩固政治独立的重任。要做到这一点，最基本的前提条件是必须保持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南方国家为了打破旧的国际经济秩序，对发达国家的斗争，从一开始就使用经济手段，坚持对话与合作的方式。这种做法已经在某些局部取得一定进展。今后，它仍将是解决“南北问题”的最有效

的途径。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将长期致力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为此努力谋求与世界各国进行更广泛的友好合作，维持一个长期稳定的国际环境。“中国人不比世界上任何人更少关心和平和国际局势的稳定。中国需要至少二十年的和平，以便聚精会神地搞国内建设。”[2]

从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这一对具有截然对立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看，情况也有变化。社会主义最终会取代资本主义，这是历史的大趋势，它需要经过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一天，它与社会主义间的矛盾就不会消失。但这种矛盾在不同的阶段对国际关系全局可能产生不同的影响，有时上升为影响全局的主要矛盾，有时则被其它更具全球性影响的问题所代替。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制度的斗争史中，我们看到，在两段时间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对立矛盾曾经左右了世界全局。第一段时间是1917年至1945年这28年，斗争的主要特征是武装干涉与反武装干涉、武装侵占与反武装侵占。第二阶段是1945年到60年代中期这20年，斗争的主要特征是包围、遏制与反包围、反遏制。60年代中期以后，超级大国争霸加剧，第三世界形成并崛起，由此产生的矛盾变得越来越突出，以致到80年代，东西南北之间的矛盾运动成为牵动和左右世界全局的主要矛盾。这些矛盾表现出来的和平发展问题，其全球影响远远超过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斗争的影响，意识形态上的对立暂退次要地位。

进入90年代后，随着苏联、东欧一些国家的解体，世界处于一种新旧格局的转型时期。一方面，某些国家正欲谋主导新的世界秩序，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世界。但是另一方面，世界和平力量在争取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中将更有力地反对“一国主宰下的和平”，继续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由此而引发的矛盾仍将是今后世界长时期内的主要矛盾之一。

二、对传统观念的重大突破

本世纪初，列宁对帝国主义时代的战争问题曾作过精辟的分析。帝国主义为追求高额垄断利润，相互之间必然会围绕争夺市场、投资场所和原料产地进行角逐。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又将使它们相互间已划定的势力范围和原来形成的实力对比发生变化。后起的强国则要求重新瓜分世界。这种斗争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将引起帝国主义战争。正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这种经济基础，使帝国主义战争绝对不可避免。列宁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作出的上述分析，很快由相继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所证实。战后，斯大林沿用上述分析，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仍会导致新冲突而引发战争。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将超过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间的战争仍将不可避免。由于多种原因，这一观点在战后很长时间内左右了社会主义国家对当代战争与和平问题的看法，成为唯一的权威理论。

但是，当代国际政治的发展，并未像原先估计的那样。二战后世界上虽然爆发过多起局部战争和地区性武装冲突（除几起发生在欧洲外，其中绝大多数都发生在亚、非、拉地区），帝国主义国家间却相间无战，世界大战并未爆发。从80年代开始，世界和平因素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因素的增长，国际上更是呈现出一个相对和平的趋势。这就向人们提出了新的问题。

过去，我们对战争与和平的看法，多年来是一直强调战争的危险存在，认为世界大战很快要打起来，因而忽视了发展生产力，忽视了经济建设。

面对8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中出现的这种新情况，邓小平同志不囿于已有

的看法，从战后的历史事实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审察时机，忖度形势，对当代战争与和平问题进行了冷静、深刻的分析，作出了新的判断。这就是“虽然战争的危险还存在，但是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3]“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将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4]对于总的国际局势的看法是，争取比较长期的和平是可能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

“战争是可以避免的”这一新论断，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战争与和平理论在当代世界的运用、创新和发展。它纠正了过去我们在这一问题上的认识及其所带来的某些偏差，如多年来一直强调战争不可避免的观点，强调战争加速革命进程的观点，强调争取世界革命的全面胜利是当前主要任务的观点，等等。邓小平同志的这一新论断，以及在此基础上推断出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对于丰富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

现在，我们面对 90 年代国际政治的现实，更能感到邓小平同志在 80 年代作出的上述判断的预见性和准确性，感到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战略家所表现出的理论勇气和深邃的洞察力。

三、对中国外交的指导调整

从 1978 年底开始，中国在国内实行大胆而稳步的改革，坚定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集中一切力量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依据变化了的国际形势和国内经济建设的需要，基于邓小平同志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这一论断，中国的对外政策也在总结过去外交经验的基础上，适时地进行了重大的战略性调整，从而开创了中国外交的新局面。

第一，充实和发展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新中国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把中华民族的独立自主作为新中国外交的根本立场，以此根本区别于旧中国的屈辱外交。独立自主，首先是绝不允许任何外国侵犯我国主权、干涉我国内政，绝不在任何大国的威胁和压力下屈服，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政策。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5]

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后，根据国际关系的变化，我国继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并在外交实践中，对这一原则作了新的充实和新的发展。在新时期，独立自主首先表现为真正的不结盟，“中国同任何国家没有结盟关系，完全采取独立自主的政策。”[6]我们既不依附于任何一个大国或大国集团，也不同它们任何一方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中国不同大国结盟，有利于抵制和反对任何大国的霸权和强权行径，有利于同世界各国的交往，有利于世界战略力量的平衡和世界局势的稳定，这样就不会因为结盟关系而在某种程度上受制于人。其次，中国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的权利，也尊重别国的独立自主的权利。在国际交往中，不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来划线和决定亲疏好恶，而是根据问题本身的是非曲直，独立自主地作出判断，决定自己的态度和立场。判断是非的标准，就是看是否有利于世界和平，是否有利于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和共同发展。再次，中国外交的独立自主还体现了自力更生与积极发展对外友好合作关系的正确结合。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夜郎自大。独立自主也不是崇洋媚外、奴颜卑膝。我们坚持自力更生，同时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积极主动地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发展同世界所有国家的经济、贸易、科技等各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以有利于各国经济的共同发展和整个世界经济的共同繁荣。

第二，把和平与发展作为中国外交政策所追求的目标。为了维护世界和

平，中国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任何国家以任何借口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中国主张国与国之间的争端应当由有关国家通过谈判以和平的方式加以解决。中国大力支持联合国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进行的各项工作，积极参加联合国及有关机构开展的有利于维护和平和促进发展的活动。中国一贯反对军备竞赛，要求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大规模裁减常规武器和军队人员。中国提出许多公平合理的建议，并以裁军的实际行动表明中国的和平愿望，推动世界和平的进程。为了促进发展，中国致力于国内长期大规模经济建设并主张世界各国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加强合作与交流，主张加强南南合作，改善南北关系。

第三，继续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与合作，以此作为中国对外关系的立足点。第三世界的崛起，是战后世界的大事，它使当代国际关系产生了巨大的变革，第三世界有 100 多个国家，占世界人口总数的四分之三。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在过去有饱受外来侵略和欺压的共同遭遇，在目前又都面临经济发展的共同任务。它们既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主力军，也是解决整个人类发展的关键所在。在政治方面，中国坚决支持第三世界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斗争，支持它们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和其它一切正义行动；在经济方面，中国坚决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发展民族经济，以经济独立巩固政治独立的正义事业，并根据自己的力量和可能积极开展双边和多边的平等互利、形式多样的经济技术合作。对第三世界国家中存在的问题和矛盾，中国一贯主张各方以大局为重，互谅互让，排除外来干涉，用和平协商的方式求得问题公平合理的解决。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只有紧紧团结和依靠第三世界，在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发展的事业中，真正维护第三世界的利益，坚定地站在第三世界一边，才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并将更加有效地推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作者是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哲学与社会学系副教授、博士）

注释：

[1]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105 页。

[2]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50 页。

[3]、[4]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增订本），第 95、112 页。

[5]、[6]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增订本），第 3、44 页。

时代主题——和平与发展的确立和意义

王凤梧

一、时代问题是具有统帅性质的大问题

时代问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头等重要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把握时代的脉搏是共产党人制定正确的纲领、路线、政策的主要依据，是制定正确的路线、策略的出发点，也是世界进步事业取得胜利的基石，时代问题是具有统帅性质的大问题。

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由资本主义阶段过渡到帝国主义阶段，怎样认识帝国主义，人类进入了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成了马克思主义者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的分水岭。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第二国际的所谓“理论权威”卡尔·考茨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1914年9月出版了《帝国主义》一书，书中提出了有名的“超帝国主义”的谬论。他把帝国主义只说成是一种政策，认为国际垄断同盟的形成和存在是所谓的“超帝国主义”，即帝国主义已经联合起来了，它们之间不再存在斗争和战争了，世界进入了永久和平的时代。以后，他置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事实于不顾，从永久和平的时代观出发，1927年又出版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宣扬劳资利益的一致性，资本主义自动崩溃论、超帝国主义理论等等，全面系统地篡改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

列宁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批判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思潮中，创立了“帝国主义论”。列宁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由资本主义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世界进入了帝国主义大震荡、大变革的年代。列宁当时敏锐地看到，世界在从资产阶级旧时代向无产阶级新时代过渡，一个伟大的新时代已经降临，他先后多次对时代做过不同的表述和概括。1915年他不断使用过“帝国主义时代”；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以后，他提出过“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十月革命以后，他提出过“无产阶级专政的时代”已经开始，并且指出十月革命开辟了两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代，即资产阶级时代和社会主义时代，资本家议会制度时代和无产阶级苏维埃制度时代的世界性交替的开始。1924年，斯大林著《论列宁主义基础》一书，书中给时代下了一个定义，叫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其主题就是战争与革命。斯大林对时代的概括和总结是符合列宁关于时代的思想的，也是符合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的。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地球上2/3的领土，56%的人口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帝国主义由于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力量对比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重新瓜分世界的要求确实提到了当时历史日程上来了，1914年也确实发生了帝国主义争夺势力范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大战中确实出现了帝国主义的最薄弱的环节；无产阶级确实在帝国主义薄弱环节上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当时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很快出现了欧亚革命风暴和第三国际。由于年青的共产党不成熟和社会民主党右派的叛卖，1923年底，欧洲革命转入低潮；亚洲革命以中国革命为代表却在蓬勃向前发展，直到1927年才转入低潮。但总的来说，1923年底，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已遭到失败，资本主义进入到一个相对的、局部的、暂时的稳定时期。与此同时，苏

联在打败 14 国武装干涉取得了第一次卫国战争胜利的基础上,也进入了一个稳定时期,即和平发展的短暂时期。苏联抓住了这个短暂时期,对外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实行了和平共处的政策;对内实行了新经济政策、农业集体化、工业化和文化革命,抓紧了自身的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了极其伟大的成就,为在第二次大战中粉碎德、日、意法西斯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资本主义世界到 1929 年爆发了世界性的、空前的经济危机,这次危机延续到 1933 年,直接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确实是战争引起了革命,革命又结束了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了欧亚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并且形成了强大的和平、民主的社会主义阵营。社会主义国家的兴起,促进了亚、非、拉美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沉重打击并瓦解了帝国主义维持了 200 多年的殖民体系。不仅中国革命是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20 世纪,在世界六大洲各个角落里所做的主要事情,都可以说是继续完成十月革命中以列宁为代表的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事业。历史的实践证明,列宁的时代观和战争与革命是时代两大主题的观点,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是完全正确的,而且推动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斗转星移,从 20 世纪 50 年代末到 60 年代初,以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瓦解为标志,世界的历史条件变迁了,战争与革命的两大主题,逐步被和平与发展的两大主题所替代。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我们比较多地是讲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同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或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同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相结合,很少讲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与时代发展相结合的观点。因此,我们对时代的发展变化研究很差。从 1957 年到 1976 年的近 20 年时间里,由于没有及时认清和把握世界从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转变的这个历史趋势,一直坚持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论,坚持战争引起革命,革命结束战争论,即战争与革命是世界两大主题的观点。所以曾认为,世界大战早打比晚打好,大打比小打好,打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必然出现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1958 年,全民大炼钢铁,以钢为纲的原因之一是认为未来的战争是钢铁战争,没有足够的钢铁就不能取得胜利。文化大革命中,深挖洞、广积粮、修三线、备战备荒、大串联的“重要意义”都是为了在未来的战争中取胜。由于对时代主题的转变未能及时认识上去,影响到没集中全力进行和平建设,给经济带来极大的损失,而且也直接导致了阶级斗争扩大化。

沉痛的经验教训,使我们今天更清醒地认识到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特别是执政党,对“世情”的认识和对“国情”的认识是一样的重要。脱离了国情不行,脱离了世情也不成。世情主要包括时代、时代的主题、时代的特征、时代的任务等等。列宁指出:区别不同“时代”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历史上的个别情节),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从 1957 年到 1976 年的近 20 年时间内。我们就是因为一直僵化地固守着战争与革命是时代主题的观点,在国内、国外战略性的部署上造成一系列的失误,从而严重影响了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

二、和平与发展是现时代的主题

邓小平同志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他根据历史的变迁,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各种矛盾运动的发展变化,科学地揭示了“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已近半个世纪没有再发生世界大战,世界保持了总体上的和平。世界和平的决定性因素是社会主

义力量的发展和在它支持下的第三世界的兴起。尽管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帝国主义的本质没有改变，但是，只要越来越多的第三世界的国家和人民能够牢牢地掌握住自己的命运，社会主义事业就能够获得更加伟大的胜利，世界大战也不是不可避免的。从20世纪50年代起发生了世界第三次产业和科技革命，这次科技革命以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生物技术、空间技术、海洋技术等群体技术的发展为标志，而且直至现在还在迅猛地向前发展。由于社会生产力的迅猛发展，20世纪50年代以后，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已发展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新的科学技术革命使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结构、计划体制、劳动性质、阶级结构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资本主义国家同垄断资本进一步结合，对经济生活采取了一系列调节措施。除了实行国民经济军事化以外，资产阶级总结了统治经验，采取了调和阶级矛盾的措施。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50年代以后一段时间经济增长较快，各种矛盾有不同程度的缓和，处于相对稳定状态。虽然，资本主义出现的暂时的稳定和发展并未消除其固有矛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调节措施只能暂时缓和危机，70年代以来已出现缓慢增长的趋势，固有矛盾出现激化的趋向，但是，资本主义内在机制的变化反过来确实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按照马克思主义原理，当生产关系还允许生产力迅速发展时，革命是无望的。事实上，白领工人已经占主体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长期没有出现暴力革命的形势。当然，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还要经过革命的变革过程，但这个过程，目前看来还没有条件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来完成。现在深化和发展民主在人民群众斗争的推动下已经成为资本主义世界性的潮流，独裁统治方式在资本主义世界已经纷纷削弱和倒台。事实上各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正在发展和深化。总之，和平与发展首先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现实和人民的要求。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压迫民族纷纷取得了独立。独立后的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面临的主要问题已经不再是民族压迫问题，而是发展问题了。而要发展经济又必须有和平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总之，和平与发展是最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最现实的要求。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的贫富悬殊不断扩大，导致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强烈要求改变旧的国际经济秩序，但这种要求还不至于导致普遍战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国际范围内争夺剩余价值的斗争尽管一直十分激烈，但在当今的核时代、信息时代不一定非要使用世界大战的手段，完全可以依靠科技和发展经济实力而取胜。事实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已经半个世纪几乎没有开战了，20个左右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之间分割市场斗争激化，主要通过市场竞争和频繁的外交谈判表现出来，100多个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处境非常困难，尽管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仍然起作用，但是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无力与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用武力相抗衡。他们同样需要和平与发展。

由于资本主义的内在机制的巨大变化，也缓和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之间的尖锐对立的程度。两种制度当今谁想要用武力消灭谁，一时都很困难，两制之间战争的危险相对缩小。两制之间的主要斗争方式转向了“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和平演变”与防止“和平演变”的斗争。两制之间在前50年的战争与革命的激烈较量中，帝国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手下败将。现在两制进入了以经济为后盾，科学技术为武器，意识形态斗争

为主要形式的“和平演变”与防止和平演变斗争的新时期，社会主义面临的挑战是紧迫的、严峻的。在紧迫严峻的挑战面前，社会主义国家必须谋求经济上的大发展，而谋求经济上的大发展必须实行对外全方位开放政策，全面开放的先决条件就是世界和平。社会主义国家只有抓住和平与发展这个世界范围的两大主题，才能推动世界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事业进一步展现出美好的前景。总之，维护和平与促进发展是当今时代人类的共同愿望和客观存在。

三、围绕和平与发展调整对外关系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在正确认识国情和世情的基础上，从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和世界处在和平与发展的世情出发，确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主要内容的总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建立在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主题的基础之上的。从对立统一斗争的世情出发，确立了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坚持改革开放的总方针。因为集中精力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以使我国的面貌在十几年改革开放的年代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并得到了世人的瞩目和公认。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根据国际形势和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围绕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调整外交格局和党的对外关系。

在外交方面主要是，坚定不移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各种性质的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维护世界和平是中国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

现在我们只提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强权政治，在国家关系上，不再提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殖民主义，更不用美帝国主义、苏联霸权主义的字眼。因为无论别国采用什么主义的统治全是人家的内政，根据各国之间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我们不应该加以干涉。现在，殖民主义基本上已经铲除，如果谁在搞对外侵略，搞扩张，谁就是霸权主义，不论它是什么性质的国家，我们都必须加以反对，其目的是维护世界和平，以利于世界的发展。围绕时代主题在国际范围内只提反对强权政治，反对霸权主义，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是个重大突破。中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已经同 170 个左右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政治倾向的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并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展成为处理国际关系的普遍原则，即国家之间的关系不再以制度的异同论亲疏，完全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为了和平与发展，中国的对外开放，既包括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放，又包括向前苏联、东欧国家开放，也包括向第三世界开放。对外开放是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永远同第三世界国家站在一起，互相同情，互相支持，这种立场是不会改变的，但是也不谋求与第三世界国家结盟。中国自己不结盟，但也不反对其他国家相互结盟。因为第三世界国家普遍还不具备革命形势，所以我们对其发生的局部变革或革命只进行政治上、道义上的支持。

在党际关系方面，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总结了经验教训，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并考虑到时代变化和国内工作重心的转移，在对外关系上对有些具体政策和措施作了必要的、及时的调整与发展，使之更加适应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需要。其中最主要的是：我们坚持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发展同各国共产党和其他工人阶级政党的关系。这回项原则是 100 多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党际关系正确得到处理的经验总结，也是和平与发展时代的产

物。根据这四项原则，中国共产党不仅恢复和发展了同许多国家的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工党的关系，还同为数众多的第三世界的各种政党进行了交往，发展了关系。到目前为止，中国共产党已经同 290 多个外国党和组织建立了联系。党际关系与国际关系是两种不同的关系：党际关系是建立在一定的共同理想和思想基础上的道义上的关系，国际关系是必须严格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维护世界和平的国家关系。但是党际关系和国家关系一样，二者都不能脱离时代特点，都不能脱离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而且都要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服务。

1989 年国内政治风波以后，西方七国制裁我们，不久苏东剧变。在国际风云急骤变化的条件下，我们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坚持同所有国家都来往的战略。同前苏联、同美国、同西欧、同日本全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现已经取得双边关系上的累累硕果。

为了稳定世界局势，我们把：“一国两制”的设想，延伸到国际问题的处理上，国际上领土争端，可以先不谈主权，先进行共同开发，共同得利，一时解决不了的问题，可以先放一放，在贸易、经济、文化各个领域先搞增进了解与合作。

为了和平与发展，我们倡导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建立“一球多制”的国际政治新秩序。

为了和平与发展，我们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始终放在第一位”。在国家往来上，不再强调意识形态的分歧，只要不损害我们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就是我们的朋友。

围绕和平与发展处理国际事务，我们取得了节节胜利，并将取得更大的胜利。国际社会的问题很多，人口爆炸问题、粮食危机问题、环境污染问题、国际恐怖主义问题、世界资源短缺问题、疾病蔓延问题、世界毒品问题、和平与发展问题等，其中和平与发展问题是最主要的问题。因为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和影响其它问题的存在和发展；因为它的解决可以为其它问题的解决提供前提和条件；因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所以，今后我们必须为维护世界和平、力求发展做出更大的努力，和平与发展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任务。

（作者是首都经贸大学社会科学部教授）

论邓小平“和平与发展”战略思想的提出、实现及其意义

冯特君 王晓峰

历史在发展，社会在前进，世界面临着形形色色、种类繁多的问题，现实呼唤着新思想的指导，邓小平同志的和平与发展战略思想应运而生。1985年3月4日他在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谈话时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1]正是这一著名论断提出了新时期的战略，为我们树起了一面光辉的旗帜，指明了前进的方向，鼓舞着大家为之奋斗。

—

“和平与发展”战略思想提出的依据是什么？

邓小平这一战略思想的提出是依据对战后历史经验的总结、当今现实状况的分析及未来发展前景的预测，是有充分的、客观的、科学的根据的。

二战前，一直上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战争与无产阶级革命是这一时期世界的主题。这一时期，即20世纪的前半个世纪，帝国主义列强为了重新瓜分世界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局部战争，并挑起了两次世界大战。随之有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开辟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新时代。但是战争与革命并非人类历史的全部内容，随着世界形势的发展，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主题。二战的胜利改变了战前的国际政治格局，对战后国际社会的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深刻影响，是走向新时期的一个转折点。（一）它彻底摧毁了德意日法西斯政权，清除了世界民主化进程的一大障碍，并提出，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在反对法西斯的目标下结成联盟，亲密合作的成功经验；（二）它深刻地教育了各国人民，世界大战再也打不得了，人们希望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最后的一次世界大战。尤其是热核战争的情景人们不会忘记，它既是可怕的，更是可恨的，所以人们诅咒战争，反对战争；（三）它极大地改变了国际舞台上各种力量的对比，不仅资本主义各国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而且还出现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和壮大及新兴的民族独立国家的开始涌现；（四）二战期间，在科学技术方面从军工生产开始有许多突破。正是在原子能、航天技术及电子计算机等方面的突破，标志着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的开始和兴起，产生着极其深刻的影响。诸多因素形成的合力，决定着战后国际社会发展的方向。这一切不能不使得世界主题发生新变化。

二战结束后，又近半个世纪了，这半个世纪国际社会在二战胜利的基础上继续前进，也确实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这表现为：（一）世界和平得到了维护。战后以来，人们一直高度关注着维护世界和平、防止世界战争的问题。人们不会忘记，战后初期“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论调曾一度甚嚣尘上。人们也都记得，两个超级大国的激烈争夺，曾使世界到处弥漫着一股强烈的火药味，甚至几度濒临核战争的险境。由于全世界人民的坚决反对，终于阻止了战争的爆发。人们高兴地看到，今后世界大战很难打起来，

世界和平是可以争取和保持的。（二）世界关注发展问题。二战以后国际局势发展中最深刻的变化之一，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瓦解和大批民族独立国家的涌现。所谓发展问题，虽指整个世界的发展，但中心是这些国家的发展，战后几十年，这些国家经济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但就整体而言，这些国家水平仍然很低。80年代以来，这些国家发展极不平衡，许多国家处境更加困难，使得发展问题更加突出，世界的发展决不能长期建立在广大发展中国家贫穷落后的基础上。这一点已为国际社会所公认。应该说，发展问题的提出本身乃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三）社会主义在曲折中前进。战后初期社会主义一度呈现欣欣向荣的局面，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后来出现了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以至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社会主义事业遭受巨大挫折。但是，并不像敌对势力所断言的那样，社会主义已经灭亡了。占世界人口近 1/4 的中国大地上，社会主义在生机勃勃地发展。（四）霸权主义日趋衰落。战后两个超级大国曾经一度争霸世界，他们到处伸手，肆意横行，弱肉强食，不可一世。如今，曾几何时，不是落得一个消亡，一个衰落的下场么？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霸权主义必然衰落，正义力量一定胜利，这个历史前进的规律是不可战胜的。最后，也是推动出现上述变化的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科学技术革命的发展，不仅极大地推动了战后世界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也引发了一场社会变革，还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国际化和国际政治的全球化，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也在科学技术革命的推动下走上了互相制约、竞争共处的道路。科学技术革命的新发展，正在为人类社会开辟新的前景。

当然，当今世界的现实并不是一片祥和、天下太平。任何一个头脑清醒的政治家都会看到当今世界面临着形形色色、尖锐复杂的难题。如人口问题，1950年以来世界人口总数翻了一番；到2025年将从现在的56亿增至85亿；到2050年将达100亿。人们称之为“人口爆炸”是并不为过的。值得注意的还有地域分布的不平衡，大多数在南方国家，城乡比例的严重失调，大多数有向大城市集中的趋势，贫富差别的急剧扩大，大多数处于贫困状态。这无疑会带来一系列的经济、社会问题。因此，抑制世界人口急剧增长的趋势成了当今世界的当务之急。粮食问题是又一个尖锐问题。广大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科技水平低、农业生产长期处于落后状态，粮食短缺或匮乏现象非常严重。据估计，目前世界上至少有7.3亿人因得不到足够的粮食而处于饥饿状态。每年因饥饿而死亡者达数千万。虽然少数发达国家粮食过剩，以至限制农业生产的发展，但由于世界经济旧秩序的作用，无助于粮食问题的解决。环境问题也很严重，制止环境污染和环境损害，维护世界生态平衡，已经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强烈愿望和共同要求。国际社会已为此召开过多次会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992年6月在巴西召开了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其宗旨是制止环境进一步恶化，遏制导致贫困爆炸和自杀性掠夺自然资源趋势的发展。大会通过了《21世纪行动议程》和《里约热内卢宣言》，标志着人类在保护环境和谋求持续发展方面的共同努力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但是环境问题远未解决，甚至恶化的趋势也未能阻止。解决环境问题是全世界面临的严峻任务。国际恐怖主义问题也是当今世界中不可忽视的严重问题，是当代世界上各种尖锐复杂矛盾的反映，是国际斗争的一个怪胎，也是一种世界性的瘟疫。特别是80年代以来，恐怖主义活动日益猖獗，案件急剧增长，据统计，1980—1989年间全世界共发生各种各样的恐怖主义事件40230起，这是1970—1979年间的8400起的5倍。现在，世界上有国际恐怖主义秘密组织240

多个，国际恐怖主义分子活动的范围涉及到世界各大洲，各国恐怖组织的跨国合作日益密切，活动更加频繁，手段更为狠毒。国际恐怖主义“黑潮”威胁着世界人民的生命安全，破坏了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安宁，使本已不平静的世界更加动荡不安。此外，像世界资源短缺问题，世界毒品问题，艾滋病等疾病蔓延问题，也给世界人民带来了越来越大的危害，引起了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

虽然当今世界中我们面临着诸如此类形形色色、尖锐复杂的问题，但是其中最根本的则是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在这些全球性的问题中，国际恐怖主义从根本上说是一个和平问题；人口问题、粮食问题、环境问题、资源短缺问题、毒品问题、疾病蔓延问题等，从根本上说是一个发展问题。和平与发展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基础和关键，抓住了和平与发展这个主要问题，就抓住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和关键。

邓小平同志的和平与发展战略思想的提出，也是建立在对世界未来发展前景科学预测基础上的。在世界未来发展前景的问题上，一直存在着盲目乐观和悲观失望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实际上这些都是不正确的。从维护世界和平的前景来看，一方面，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处于新旧格局交替时期的国际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多了；另一方面，世界和平因素也广泛存在，并且迅速增长，明显地超过了战争因素而居于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避免新的世界大战是有可能的。从促进世界发展的前景来看，世界上各类国家在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之后，目前都面临着各自不同的困境，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问题尤为严重。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促进全人类的共同繁荣和发展已成为我们时代的最强者，国际社会正为此作出积极的努力。因此，我们既要充分地认识未来人类社会发展的主流是好的，是光明的，阿时也要对发展过程中的艰巨性、曲折性有足够的重视。

二

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共同繁荣和发展，是我们为之奋斗的两大战略目标，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实现这两大战略目标呢？

第一，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改革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这是实现和平与发展这两大战略目标的根本出路。

战后以来，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引起世界战争的主要因素，特别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激烈地争夺世界霸权，造成整个世界动荡不安。苏联解体之后，虽然旧的两极格局已宣告结束，但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依然肆意干涉和侵犯别国内政，妄图在新旧格局交替时期，建立由它们主宰的“世界新秩序”，从而使世界局势出现新的不稳定状态。

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还严重地阻碍了全球的发展。二战结束后，美国为了独霸世界，在全球范围内推行反苏、反共的冷战政策，挟持西方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军事包围的同时，进行政治上的遏制和经济上的封锁，而社会主义国家被迫对此进行了反封锁的斗争，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冷战”结束之后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猖獗，继续严重阻碍着世界的发展。西方资本主义大国除了要包办和垄断

国际事务之外，还加紧推行它们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发展模式，并把是否同意它们这一套作为提供援助、进行合作的条件。对于那些反对的国家动辄进行经济封锁和制裁，甚至大动干戈，直接出兵干涉。所有这一切，都严重影响了这些国家的发展。

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贯穿一切国际旧秩序的最本质的东西，因此只有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彻底改革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才能够真正维护世界和平，实现全人类的共同繁荣和发展。

第二，要重视和充分发挥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作用。战后第三世界的崛起，成为制约战争爆发、维护和平的基本因素。第三世界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发展，使之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它们奉行不结盟政策，团结一致共同反霸，打乱了超级大国的战略部署，有力地牵制了它们的侵略行为，削弱了它们的有限实力，动摇了它们的霸权地位，成为世界反霸斗争的主力军，对维护世界和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新的形势下，第三世界各国，它们的地区组织、国家集团以及国际组织部在调整它们的战略和策略，以便在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斗争中，为了维护世界和平发挥它们的作用。应该肯定，第三世界国家中还蕴藏着巨大的潜力，在斗争实践中还会创造出更好的斗争形式。可以断言，当第三世界的国家和人民完全觉悟起来，组织起来，行动起来，为维护世界和平而斗争的时候，世界和平就最终会得到维护。

世界的发展，关键的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由于世界各国相互依存的加深，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已不仅是发展中国家的自身问题，实际上是整个人类的发展问题。没有占世界人口 3/4 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就不会有整个世界的共同繁荣。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状况如何，势必造成连锁反应，影响其他类型国家的发展，乃至整个世界经济的繁荣。只有当整个第三世界国家都得到了普遍的发展，世界的发展问题才会最终解决，世界的繁荣才能真正有保障。

第三、维护世界的和平、促进人类共同繁荣和发展也是西方发达国家根本利益之所在，西方发达国家应该要为此认真履行自己的责任。

战后，有资格打一场世界大战的只有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双方为争霸世界而疯狂扩军备战，世界大战的危险一直存在，但由于世界人民的共同努力，整个世界维持了 40 多年的相对和平的局面，这里面也包括西欧、日本等西方发达国家所起的制约作用。冷战结束之后，全球形势进一步趋缓，因此西方发达国家在维护世界和平方面更应该要切实履行自己的责任。

关于发展问题，邓小平同志更是多次强调西方发达国家要在促进人类共同繁荣和发展方面做出实际行动来，指出这不但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而且也符合发达国家自己的利益。1985 年 3 月 4 日，邓小平同志在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时说：现在世界人口是 40 几亿，第三世界人口大约占世界人口的 3/4。其余 1/4 在发达国家。很难说这十一二亿人口的继续发展能够建筑在 30 多亿人口的继续贫困的基础上。

第四、中国应该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发展发挥自己的独特的作用。新中国自成立之日起，中国政府就致力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事业，维护世界和平，谋求人类的共同发展与繁荣一直是中国对外政策的首要目标。40 多年来，中国人民为实现这一崇高的目标不懈努力，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现在，

在新的形势下，中国要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加快经济建设，争取把我国早日建成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中国的发展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发展，对于遏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保卫世界和平将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发展得越有力量，世界和平越靠得住。如果说中国是一个和平力量，制约战争的力量的话，现在这个力量还小。等到中国发展起来了，制约战争的和平力量将会大大增强。中国的发展也必将促进整个世界的共同繁荣和发展。一方面，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了约占世界 1/5 人口的温饱问题并继续奔向小康，这本身就是对人类作出的一份了不起的贡献。另一方面，中国在致力于自身发展的同时，大力支持世界各国，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支持南北对话和南南合作以及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从而促进了整个人类的共同繁荣和发展。而且，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同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具有不少的共同之处，中国的发展对这些国家不无借鉴意义。因此，中国的发展必将推动整个第三世界的发展。

第五、联合国作用的正确发挥，也是实现战略目标的重要条件。联合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政府间的国际组织，成立 50 年来，虽然走过曲折的道路，但是它在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共同繁荣方面发挥了自己独特的作用。在当前世界格局由两极向多极转化的过渡时期，联合国是既面临着难得的机遇，也经受着严峻的挑战。一方面，国际社会越来越普遍重视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发展，加强国际合作以及通过协商一致解决冲突方面的作用，从而使联合国有了真正实现《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的机会，能够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另一方面，联合国也存在着从未遇到过的困难和问题，其能力和获得的资金与其所肩负的历史使命不相适应。因此，如何抓住机遇，克服困难，迎接挑战，不仅关系到联合国自身的发展，而且也影响着人类社会能否早日实现和平与发展两大战略目标。

最后，我们也要看到，推动人类社会发展和前进的是由于各种力量形成了一种整体的、不自觉的和不自愿的总的“合力”，同样地，要实现世界的持久和平和人类的共同繁荣和发展，也靠“合力”。

三

邓小平同志“和平与发展”战略思想的提出具有巨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将对中国和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

时代主题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长期以来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停留在列宁时期的论断上，停留在本世纪 20 年代的水平上，坚持“战争与革命”的主题不变，大大落后于世界形势的发展，落后于实际。应该说我们为之付出了代价。现在，邓小平同志根据长期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透彻分析战后世界的变化，经过深思熟虑，得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主题这一科学结论，这是理论上的一个重大突破，一个重大发展，一个重大贡献，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邓小平同志“和平与发展”的战略思想为我们把握时代特征，正确认识世界提供了强有力的武器。只有正确地、客观地、全面地把握了时代特征，

才能够正确地、现实地、辩证地分析和对待国际社会的各种矛盾并据此制定相应的战略和策略，去推动国际社会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邓小平同志的这一战略思想从人类面临的诸多复杂的问题中，高度概括了当代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根本问题，阐述了解决这一根本问题的具体途径，有助于团结国际上一切爱好和平、谋求发展的力量，共同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这是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共同愿望，体现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

中国人民目前正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为实现“三步走”的宏伟目标而奋斗，邓小平同志这一战略思想使我们高瞻远瞩，信心倍增，是我们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指针。它不仅指明了我们所处的国际环境，和平是主流，世界大战很难打起来，这是难得的机遇，我们要紧紧抓住，绝不能再错过这个机遇，而且也告诉我们，发展是硬道理，要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隔几年上一个新台阶，奋力把经济搞上去。

（冯特君：中国人民大学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教研室主任、教授；王晓峰：中共海淀区委办公室副主任、硕士）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5页。

邓小平对时代理论的新贡献

马仲良

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理解邓小平关于时代主题的战略思想，是深刻把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精神实质的重要环节。

一、马克思的三大时代理论是科学的

马克思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基本原理，提出了人类社会的历史划分为三大时代的理论。他说：“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展起来。” [1]

以社会形态的发展为标志划分历史时代，是马克思主义时代理论的突出特点。马克思的三大时代理论之所以是科学的，在于它是对生产力发展规律和社会经济运行形式发展规律的科学研究为基础的。

关于生产力发展规律，马克思概括出生产力发展三个阶段理论。他指出，人类生产力发展的第一阶段以手工工具为标志，手工工具是人直接操作的，人体是动力。手工工具受到人的体力限制，劳动生产率很低，生产的剩余产品很少。

生产力的第二阶段以机器为标志。机器由工作机、动力机和传动机组成，利用自然力作为动力，克服了人的体力限制，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使操作机器的工人有条件创造出大量剩余产品。

生产力的第三阶段是“自动化过程的劳动资料的生产力”。马克思在研究机器发展史的过程中，发现机器发展的两大趋势。一方面，机器的结构越来越复杂，由简单的机器发展成为复杂的机器体系。另一方面，由于控制机的产生和发展，机器体系的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使机器不但进一步解放人的体力，而且向不断地解放人的脑力发展。机器的自动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产生一个新的飞跃，产生“自动化的劳动资料的生产力”。马克思提出的这个概念很重要，他对这个概念作了详细分析。他说，在自动化劳动资料的生产过程中，人不是在生产过程中操纵它，而是在生产过程外面来调节控制象自然过程一样的生产过程。马克思的这个预言，现在已被电脑系统的诞生所证明。马克思认为，自动化劳动资料的生产力是人类生产力发展的第三阶段。

马克思认为，生产力的水平决定了人们的社会分工的发展水平。由于生产力的发展要经历三个阶段，这就决定了社会分工的发展也要经历三个阶段。

社会分工的第一阶段是社会自然分工，它是在手工工具的生产力的基础

上形成的。手工工具的生产力不能创造出大量剩余产品，人们在自然条件形成的狭窄范围内生产，人们之间的劳动分工只能由人的身体的自然差别来决定，这样便形成了社会自然分工。

社会分工的第二阶段是社会自发分工，它基本上是与机器的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相联系的。机器的产生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力，使工人可以生产出大量剩余产品，使市场交换普遍地发展起来。在市场交换的基础上，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分工，这就是社会自发分工。在社会自发分工中，人们力图通过情报了解市场情况，这样使商品生产者产生了摆脱市场自发性、力图达到生产自觉性的要求。这种自觉性的要求，只有通过社会性的生产计划才能实现。但是，在科学技术尚未达到高度自动化的水平之前，不可能实现整个社会的计划生产。

社会分工的第三阶段是社会自觉分工。自动化的劳动资料给人们提供了生产之前掌握人们的社会需求的物质手段，这样就可以做到对社会生产的预先的计划指导。这样就使社会分工由自发达到自觉，形成社会自觉分工。

马克思指出，不同的社会分工形式产生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即社会经济形式。

社会经济形式也就是社会再生产的运动方式，即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不断循环往复的运行方式。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论述了社会经济形式发展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自然经济，即以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直接结合为基础的自给自足经济。自然经济是由手工工具的生产力和自然分工决定的。手工工具的生产力创造的剩余产品很少，造成了各生产单位内部的自给自足。自然分工极大地限制了各个生产单位之间的联系，因而社会再生产基本上以各个生产体为单位，形成众多的散在的再生产群体。

第二阶段是以社会范围的市场交换为基础的社会再生产形式，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市场经济。机器的生产力创造出大量剩余产品，这样使得以生产剩余产品为目的的商品生产成为可能。广泛的社会自发分工，建立了在社会范围内进行社会再生产的经济结构，于是形成了市场经济的社会经济形式。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是价值规律。

第三阶段是计划产品经济。在自动化的劳动资料的生产力和社会自觉分工的基础上，形成了计划产品经济。计划产品经济的社会再生产以自觉的社会生产计划为主导，它不必依靠市场交换这个中间环节。高度的自动化的信息统计工具为实现计划产品经济提供物质手段。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使得极短时间就能创造极大量的产品，这样就使得生产每一个产品的劳动时间极短，短到不同种类的产品中每个产品所包含的价值量（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之间的差异不可计算，这样，以价值规律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不再适应高度自动化的生产了，计划产品经济成为推动新的生产力发展的经济运行形式。

马克思认为，在自然经济基础上形成的原始公社制、奴隶制和封建农奴制，都是一种人对人的直接依赖的社会关系。原始人互相依赖、奴隶依赖奴隶主、农奴依赖地主，这都属于最初的社会形态。在市场经济基础上形成了人们之间的以对商品交换为中介的社会关系，这是第二大社会形态，马克思称之为“现代社会”。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研究处在现代社会中的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规律的。在计划产品经济的基础上形成了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形态，这是社会形态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到了第三形态，

由于有了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有了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人们在生产之前就知道社会需要的种类和数量，能够驾驭整个人类生产，并且在极短的时间里创造出大量产品，使工作日极大缩短。那时，人们不再把物质财富当作宝贵的东西了，而是把劳动之外的自由支配时间当作最宝贵的财富。人在这段时间里研究科学和艺术，陶冶他的个性，使他的个性得到充分自由的、全面的发展。由于每个人的能力获得了提高，反过来又以一个全新的人投入生产中去，创造出更高的生产力，进一步节约劳动时间，从而进一步扩大自由时间。于是便形成了人的发展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又促进人的发展的良性循环，使人类的自由王国不断扩大和发展。这第三形态就是共产主义社会。今天信息科学的发展，证明了马克思的预见是科学的、正确的。马克思的时代还没有系统的信息科学和电子计算机，但马克思非常重视统计、簿记、情报在经济中的作用，这些其实都属于信息的范畴。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社会的预见，不是建立在主观空想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

二、恩格斯晚年的重要反思

马克思提出的三大时代理论为我们分析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规律提供了基本方法。但是，掌握这一时代分析法，还必须对具体的历史条件作具体的分析。在这方面，即使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始人，也并非永远正确。

1895年2—3月(恩格斯于同年8月5日去世)，恩格斯为马克思的《1848年到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写了一篇导言，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值得我们今天认真思考：“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这个经济革命自1848年起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在法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以及最近在俄国初次真正确立了大工业，并且把德国变成了一个真正第一流的工业国，——这一切都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发生的，因此这个基础在1884年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2]在19世纪40、50年代，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在内的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主义的胜利作出了非常乐观的判断。这种判断基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到了它的灭亡期的认识。到了恩格斯的晚年，他亲眼目睹了席卷整个欧洲大陆的经济革命及其后果，得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有很大的扩展能力、欧洲大陆经济还远没有成熟到可能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这样一个崭新的结论。可以说，这是恩格斯代表马克思主义者所作的一个严肃的自我批评。这个自我批评表现了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何等高尚的科学态度和圣洁的实事求是精神！恩格斯的自我批评并没有否定马克思的三大时代理论，而是依据三大时代理论；对现代社会中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命周期作出了更科学的判断。

从恩格斯晚年作出这一重要反思到今天，将近100年了，我们看到，资本主义制度不但没有灭亡，反而促进了又一次经济革命；即由信息科学和信息技术的新发展推动的经济革命。第5代电脑和自动控制系统的应用和信息高速公路计划的提出，又预示着这场经济革命将向新的水平推进。这一切都表明人类社会仍然处在马克思讲的第二形态即现代社会的历史时代，表明还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当然，这并不证明资本主义可以永世长存。可是，历史告诉我们，当代社会主义者必须把社会主义信念建立在对时代的科学认识的基础上。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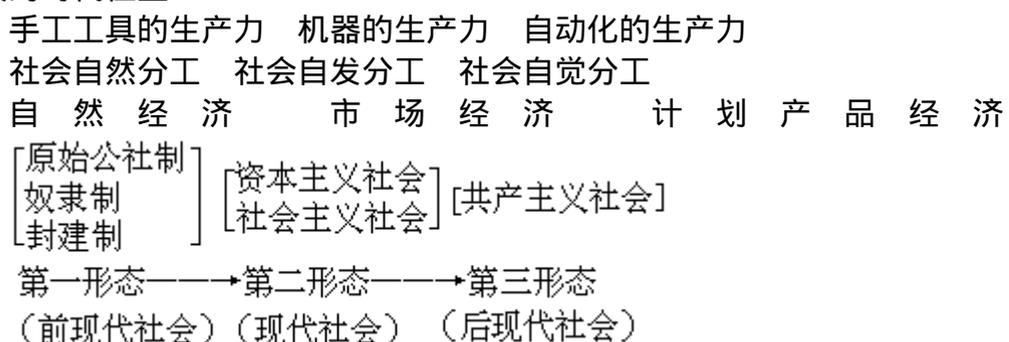
代主题的战略思想，就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对当今时代的科学认识。

三、把社会主义信念建立在对时代的科学认识的基础上

我们仍然处在资本主义控制世界市场的现代社会，这是否会得出中国不能搞社会主义，只能搞资本主义的结论？邓小平同志从当今时代的基本矛盾中得出了在资本主义控制世界市场的条件下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的结论。

邓小平同志在 1989 年 6 月说：“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现在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要鲜明。因为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现在国际市场已经被占得满满的，打进去都很不容易。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3] “为什么说我们是独立自主的？就是因为我们要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否则，只能是看着美国人的脸色行事，看着发达国家的脸色行事，或者看着苏联人的脸色行事，那还有什么独立性啊！” [4] 邓小平同志把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看作中国独立自主地实现现代化的根本保证，看作不当发达国家附庸国的根本保证，看作打进已经被占得满满的国际市场的根本保证。如果我们进一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就会发现，邓小平同志并不是从“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社会发展的一般公式出发论证中国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而是从中国如何在生产力落后的历史条件下发展起来，实现现代化的角度来论证的。两种不同的论证思路，根源于两种不同的时代观。从“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一般公式出发，根源于我们处在资本主义即将灭亡，社会主义即将在全世界胜利的时代观，而邓小平同志的思路，根源于我们处在现代社会的和平与发展时代的时代观。

明确了我国当前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基于独立自主地在国际市场中竞争的社会主义，就会对这种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得出科学的认识。邓小平同志讲：“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 [5] 也就是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并不是当年马克思预想的那种超越资本主义社会、超越市场经济、实行计划产品经济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那是第三形态的社会制度，是属于“后现代社会”的社会制度。那种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市场经济已经消亡，在全社会实行计划产品经济，我们搞的社会主义，仍然处在市场经济的时代，同资本主义处于同一个历史时代，即现代社会、第二形态的时代。我们可以用下图来表示这种社会主义的时代位置：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第二形态中，先有资本主义社会，之后，产生社会

主义社会。随着世界性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社会主义将取代资本主义，现代社会的后期，就只有一种社会主义制度了。经过国家消亡阶段，人类社会才进入第三形态，即共产主义社会。现在有一种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趋同论”。这种“趋同论”抹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的本质差别，是错误的。我们是“代替论”，即在现代社会后期，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

被邓小平同志多次批判的“左”的思想之所以跳不出“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搞计划经济”的传统观念的框框，根本原因在于持这种观念的同志仍然把我国现实生活中的社会主义当作马克思预想的那种处于资本主义灭亡时代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仍然认为现代社会只能有资本主义一种制度，不承认社会主义是与资本主义并存于同一时代的社会制度，不承认一个时代可以同时并存两种社会制度。把当代社会主义所处时代搞错了，必然不能从时代特征出发认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这正是“左”的思想的认识论根源。

邓小平同志揭示出现代社会并存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的时代特征，是对马克思的三大时代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时代理论的新贡献。

四、用科学的时代观认识当今世界与中国

邓小平同志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的战略思想，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当今世界与中国的基本思路和基本方法。

第一，改变过去认为战争不可避免的观点，把促进和平与发展作为我国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

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认为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快进博物馆了，认为世界处于资本主义即将被社会主义代替的前夜，认为两种社会制度的生死斗争必然导致战争，因此一方面要在国内准备打仗，另一方面在国际上支持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造反运动，为尽早埋葬资本主义制度作出我们的国际主义贡献。

邓小平同志纠正了这种观点。他说：“我们也改变了过去认为战争不可避免的观点，认为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和平是可以赢得的。所以我们要争取在较长的和平环境里搞建设，实现我们的目标。”[6]因此，争取世界和平与发展，不是我们一时的权宜之计，而是一个时代性的战略任务，资本主义国家，无论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发展中国家，会在这个时代中进一步得到发展，社会主义国家也会在这个时代得到发展。最终的前途仍然是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但当今时代，两种制度的矛盾和斗争还不是时代的主题，和平与发展才是主题。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贡献，就是中国社会主义者在当今时代的主要国际主义义务。

第二，中国社会主义面临的挑战，主要是现代化的挑战，而不是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挑战。

传统的社会主义观点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对立和斗争作为时代的主题。在这一时代观指导下，总是把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的和平演变看作主要挑战，因而得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在苏东剧变后，这种“左”的观念又一次抬头。邓小平同志1992年春的南巡谈话，主要是针对这种“左”的倾向的。他强调：“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7]“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

济领域；这些就是‘左’。”[8]“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9]邓小平同志从我们处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出发，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必须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要100年不动摇。

第三，大胆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经验。

因为资本主义制度曾经促进了而且现在仍然在促进生产力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而中国的社会主义仍然是处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所以，这种社会主义必然同资本主义有许多相同之处。资本主义的许多做法不仅反映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特殊性，而且反映了社会现代化的普遍性。因此，处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落后阶段的社会主义中国有必要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的经验。邓小平同志讲：“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10]不但在经济上要大胆地吸收借鉴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政治上、法律上也需要这样做。邓小平同志说：“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11]

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的经验要有一个标准，这个标准是什么？邓小平同志讲：“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2]也就是说，凡是有利于中国生产力发展的经验，都是可以被社会主义吸收和借鉴的。对中国来说，不应该脱离发展生产力去设立判断姓“资”姓“社”的标准，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资本主义制度不能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同中国现代生产力的发展有着内在联系。离开发展现代生产力去给社会主义设立标准，必然走向历史唯心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

总之，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的战略思想，指明了当代社会主义是现代社会的历史时代里与资本主义制度相并列的社会制度，把当代社会主义同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那种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处于后现代社会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区分开来，这就为制定当代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提供了科学的指导思想和方法，为我们防止和克服“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的战略思想，是邓小平同志对马克思主义时代理论的新发展、新贡献，我们应该在学习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过程中，把学习这一战略思想放在重要位置，以使整个学习更深入一步。

（作者是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

注释：

-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04页。
-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97—598页。
- [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11页。
- [4]《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11页。

- [5]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
- [6] 《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述专题摘编》第163页。
- [7]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5页。
- [8]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5页。
- [9]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5页。
- [10]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
- [11]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8页。
- [12]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页。

邓小平的国际战略思想

赵曜

邓小平同志是继毛泽东同志之后又一位无产阶级的伟大政治家、战略家，20 世纪的历史巨人，作为一位杰出的战略家，他以“政治家的风度”，总是“用宏观战略的眼光分析问题”，着眼于长远，着眼于大局。他目光敏锐，高瞻远瞩，举重若轻，处事果断，处处表现出非凡的战略眼光、战略勇气、战略胆识和战略艺术，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对国际形势的一系列科学论断和在这些论断基础上对外关系的一系列调整，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国际战略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邓小平同志的国际战略思想是我们党长期外事工作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是我国外交工作的根本指导方针。它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包括极其丰富的内容。

一、确认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

70 年代中期以后，国际形势发生明显变化，小平同志敏锐作出反映，提出当代世界主题的新的科学论断。所谓当代世界主题，就是指在一个时期内世界上带有全局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小平同志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1]综观本世纪的发展，世界主题发生了一次重大转换。大体上可以说，以 70 年代为界线，前一阶段的趋势是战争与革命，后一阶段的潮流是和平与发展。和平问题，主要是指维护世界和平，防止发生新的世界大战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奉行实力政策，进行核军备竞赛和冷战共处，世界上空笼罩着核战争乌云。世界人民把防止核大战看成是生命攸关的头等大事。过去我们曾经有过这样一种认识，即认为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甚至迫在眉睫，我们要立足于大打、早打、打核大战。经过实践检验和重新认识，小平同志改变了这种观点，作出了符合实际的估计，即认为，由于世界上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但是制约战争的和平力量在发展，只要世界人民与和平力量共同努力，世界大战是有可能避免的，世界和平是可以维护的。发展问题，是说第三世界国家取得民族独立之后，摆在他们面前的首要问题是发展民族经济和文化，几百年资本主义殖民主义统治的结果，世界经济发展的严峻现实是，南北之间，即南半球广大发展中国家（约占世界人口的 3/4）与北半球发达国家（约占世界人口的 1/4）之间，也就是穷国和富国之间，在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上的差距很大。这是世界范围的一种不公平现象，小平同志认为，苏东剧变以后，世界主题未变，但一个问题也没有解决。就和平问题来说，一个冷战即美苏之间的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即某些西方国家对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国家内政干涉的冷战又已经开始。就发展问题来说，西方国家利用国际经济旧秩序，进行不等价交换，使南北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总之，和平问题没有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

邓小平同志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的论断，说明世界形势的特征发生重大变化，它要求我们更新观念，重新认识和确立新形势下的国

际战略。与当代世界的主题和平与发展相适应，我们必须坚持稳定与发展，专心致志地搞社会主义现代化，而没有必要象过去那样把备战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我们只有坚持这种国际战略，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二、把握世界格局多极化的趋势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 1945 年雅尔塔会议所确立的雅尔塔格局，即美苏“两极对峙”的世界格局，经历了 45 年之后，由于 80 年代末和 90 年代初，苏联的动荡、衰落和解体，已经被打破。所谓世界格局，是指一个时期在一定力量对比基础上形成的一种相对稳定的国际结构。“两极对峙”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上的唯一超级大国，更加有恃无恐地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妄图建立“美国领导”的世界新秩序，但由于自身衰落，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小平同志不同意新的世界格局已经形成的观点，认为当前正处在旧的世界格局已被打破，新的世界格局尚未形成，世界各种政治力量重新分化组合，新旧格局的交替时期。当前国际形势总的特点和趋势是：走向多极格局，局势有所缓和，矛盾复杂多变，世界并不安宁。总之，双极已被打破，单极也不可能，多极是发展趋势。

世界多极化的趋势是一个积极的发展，它彻底打破了一两个超极大国主宰世界的局面。小平同志指出：世界格局将来是三极也好，四极也好，五极也好，中国算一极。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崛起，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作用将越来越大，将来怎样的多极化格局才能形成稳定的国际结构，这有待形势的发展变化，现在还难以完全说清楚。但是，可以肯定美国、日本、德国、中国、俄罗斯，还有一些发展较快的地缘人口大国将在未来的多极世界格局中起重要作用。在多极世界格局中，中国应当而且能够成为重要一极。这既靠国内的建设和发展，也靠积极的外交活动。

三、警惕西方国家打一场没有硝烟的世界大战

当代世界存在着东西矛盾、西西矛盾、南北矛盾、南南矛盾，其中东西矛盾，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矛盾更带根本性。小平同志的国际战略还是从这个事实出发的。80 年代末和 90 年代初，在西方国家和平演变战略攻势下，国际形势逆转，先后发生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社会主义遭致严重挫折。这是战后 40 多年来国际形势所发生的最重大最深刻的变化，小平同志指出：美国，还有西方其它一些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美国现在有一种提法：打一场无硝烟的世界大战。我们要警惕。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

为了对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们既搞“西化”、又搞“分化”，既保持“压力”、又保持“联系”，“两手促变”的战略，小平同志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的新的战略对策。为实施这个战略，第一，必须坚持把经济搞上去。苏东剧变，经济没有搞好是一个深层次原因，一个国家，最重要的是经济实力。国家之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经济实力的较量。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争取国民经济每隔几年上一个新台阶。为此必须进一步坚持改革开放，这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第二，必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苏东剧变，说到底是由于阶级力量对比和斗争格局的变化，共产党丢权而导致改变社会制度。小平同志认真总结了 this 经验教训，为防止和平演变，强调我国必须坚持和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他指出：无产阶级作为一个新兴阶级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本身的力量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肯定弱于资本

主义，不靠专政就抵制不住资本主义的进攻。他强调：在四个坚持中，坚持人民民主专政这一条不低于其它三条。第三，必须坚持搞好党的建设。苏东剧变和演变的原因错综复杂，是一种历史合力的结果，其中最根本的是执政的共产党内尤其是最上层，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泛滥，导致共产党蜕化变质，丧失执政地位，社会主义一步步演变为资本主义。小平同志在谈到我国问题时指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真正关系大局的是这个事。

四、坚持独立自主，维护国家主权与安全

小平同志在新的历史时期，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周恩来同志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并在实践中进一步充实和丰富了这个战略。小平同志认为，在世界上存在着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条件下，坚持独立自主对外战略的首要任务是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安全，维护国家利益。他指出：“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2]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意味着绝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我国内政。1989年政治风波过后，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推行人权外交，借口“人权”，对我进行制裁，粗暴干涉我国内政。小平同志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大无畏气概，坚持顶住了这股逆流。他说，世界上除了人权之外还有国权，国权比人权重要得多。中国必须在世界上树立“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社会主义的中国谁也动摇不了。维护我国的主权、安全与维护社会主义制度是一致的。一方面，维护我国的主权、安全，才能维护社会主义制度；另一方面，维护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不沦为西方的附庸，真正维护住我国的主权、安全。在这里，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是完全一致的。

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战略，要求在当前国际关系下，既不打牌，也不结盟。这是小平同志的一个创造性贡献。首先是不打牌。毛泽东是一位大战略家，他制定的几个重大外交战略决策带有根强的应变性。建国初到50年代末，在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封锁、遏制下，提出联苏抗美全方位“一边倒”的外交战略；50年代末到60年代末，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与中国为敌的局势下，提出建立世界范围反帝反霸统一战线的国际战略；70年代初，在主要是来自苏联霸权主义的现实威胁下，提出联美遏苏的“一条线”、“一大片”的外交战略。邓小平同志在新的国际形势下改变了这个战略，在美、苏、中政治“大三角”中，我们不再靠近谁、针对谁。我们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谁搞霸权主义就反对谁，谁搞战争就反对谁。根据这个原则，我们改善了同美国、同苏联的关系。我们中国不打别人的牌，也不允许任何人打中国牌，在世界上庄重地树立我们是一个和平力量、制约战争力量的形象。这个重大转变把我国的外交战略重点，从主要警惕苏联霸权主义、百万大军压境的威胁，转向了在坚持反对霸权主义的同时，积极谋求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内的一切国家改善和发展相互关系，努力争取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其次，是不结盟。建国初期，在新中国受到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封锁和孤立形势下，我们实行“一边倒”政策，同苏联结盟，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60年代以后，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这种结盟关系，实际上已不复存在，通过总结经验教训，我们确立了一条原则：同任何国家，即使关系再好，也不结盟。我们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所倡导和参与的不结盟运动，抱着积极支持的态度。他们所确立的独立、自主、非集团、和平、不干涉别国内政原则，不仅维护了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而且有效地

抵制了霸权主义，维护了世界和平。

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和平，酷爱和平；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要求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所以，我国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就其实质来说是和平外交政策。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是战争的根源。要维护世界和平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五、建立和发展同世界各国友好合作关系

根据社会发展规律，世界各国最终都将走向社会主义；但是，现时各国实行何种社会制度，这是各国自己的选择，别国不能干预：各国既然生活在同一星球上，就应和平共处、共同发展。基于这种认识，小平同志提出建立和发展同世界各国友好关系的战略。建立和发展这种关系的基础就是我国同印度、缅甸在 50 年代共同倡导的处理国家之间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小平同志指出：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就是说，在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代世界主题的新时期，要在世界上实现稳定持久的和平和普遍的经济繁荣，就必须彻底摒弃冷战时期按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搞“大家庭”、“集团政治”、“势力范围”的陈旧概念，而坚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唯一准则。小平同志的这个观点，是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重大突破。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同世界各国的正常外交关系，既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需要，也是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的需要。他说：中国要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安定的国内环境和和平的国际环境。我们不在乎别人说我们什么，真正在乎的是有一个好的环境来发展自己。

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包括如下几个层次的内容。首先，建立和发展同第三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我国具有双重身份，既是发展中国家，又是社会主义国家，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是我国的真正朋友。中国现在属于第三世界，将来发展富强起来了，仍然属于第三世界，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不当头并不是无所作为。其次，调整和发展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我们坚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绳，超越不同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调整和改善了同美国、日本以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关系。第三，恢复和发展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我国先后同东欧一些国家、苏联恢复和发展了正常的外交关系。实践证明，过去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奉行的国际主义原则常被扭曲，苏联曾把出兵捷克斯洛伐克、阿富汗说成是国际主义，把霸权主义同国际主义相混淆；只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靠得住、行得通的。现在，我们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看成是社会主义国家同一切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关系的准则，也是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准则。第四，注意改善和发展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需要有一个好的外部环境；在外部环境中，周边环境最为重要。基于这种认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坚持“远交近亲”，按照“巩固周边、立足亚太、放眼世界”的方针，特别注意改善和发展同周边国家的关系。

六、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小平同志在“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这个大

背景下，提出世界需要中国，“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这个科学论断，强调中国必须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反对封闭和闭关锁国。小平同志所以坚持实行对外开放，把它作为大政策和长期不变的基本国策，一是不实行对外开放，就不能改变我国长期的贫穷落后状态。中华民族在人类文明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处于领先地位，只是近几年落后了。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锁国，没有实行对外开放。小平同志多次指出：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我们吃过这个苦头，我们的老祖宗吃过这个苦头。二是不实行对外开放，就不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历史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当前，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各国经济一日千里的前进，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和科学技术交流越来越频繁和密切。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国家都不能在封闭的状态下求得发展，实现现代化。

对外开放的实质，就是吸收世界文明成果。我国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这就更加需要实行对外开放，努力吸收世界文明成果，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文明成果，以缩小同他们之间的差距。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阶段。它在几百年间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超过了以往世代的总和。人类历史发展的速度明显加快了。我国的发展有一个必要条件，就是要了解、利用、吸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和科技的一切成果和经验，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加以运用和发展，这样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作为超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先进社会制度的历史要求。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这样做，不是引进资本主义，而是吸收人类文明成果，是为了更好地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当然，对西方糟粕的东西则应剔除，绝不能学。我国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的结果，引进了大量资金，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促进了国内改革和与世界经济接轨，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强大活力。

七、建立国际新秩序

在国际形势发生重大转折的新形势下，世界上许多国家领导人、政治家都谈论一个课题：建立国际新秩序。各种方案纷纷出台。但是真正有代表性的是两家，一家是美国的，一家是中国的。美国鼓吹的是，以美国为领导，以西方宫国俱乐部为核心的国际秩序。他们强调，美国是当今世界的唯一超级大国，美国的利益要求美国领导世界，建立一个按美国价值标准为准绳的世界新秩序。克林顿上台后提出了“一个目标”（美国领导）和“三个支柱”（经济安全、军事实力、民主和人权）的对外战略主张，实质上就是要以经济实力为后盾，以军事实力为依托，以“民主”和“人权”为旗帜，对外实现“美国领导世界”的称霸野心。现时，美国无疑要充当“世界领袖”，但毕竟其国力有所下降，处于力不从心的境地，因此往往不是采取单独行动，而是在联合国的旗帜下行动，或是要西方大国为其出钱出力。中国主张的就是小平同志倡导的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这两个不同方案的根本区别是：前者推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后者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坚持建立公正、平等的新型国际关系。

小平同志关于建立国际新秩序战略的基本内容是：（1）改变不公正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关系，代之以公正合理、平等互利的国际经济关系，求得共同发展和繁荣；（2）各国不论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平等的，都有权参与协

商解决世界事务，摒弃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富压贫和由一个两个大国或几个大国垄断国际事务；（3）各国都有权根据本国国情，选择适合自己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经济模式和发展道路，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把某种特定模式强加给别的国家；（4）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国际争端应通过谈判合理解决，反对诉诸武力，反对武装入侵和用战争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对于我国与外国有争议的问题，如历史上属于我国领土、现在有争议的钓鱼岛和南沙群岛，小平同志提出了“共同开发”的创造性构想。小平同志关于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战略主张，反映了新型国际关系的本质特征，得到世界上越来越多国家的支持和赞成。它的实现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小平同志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战略思想，卓有成效地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也卓有成效地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and 人类进步事业服务，其真理性和正确性已被实践所证实。世界正在走向新的世纪。坚持小平同志的战略思想，展望 21 世纪，中国会比本世纪强大，世界会比本世纪美好！

（作者是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注释：

[1]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105 页。

[2]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 页。

世界主题的变化与我国对外方针的调整

高 放

一、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建立国际新秩序

世界主题随着世界矛盾和形势的发展而常有变化。自从资本主义于 16 世纪在西欧各国兴起之后，充满着资本主义列强争夺世界霸权的战争，和平往往只是两次战争之间的短暂间歇。到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世界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阶段。这个阶段的转折点就是以 4 次战争为标志的，即 1898—1902 年英国为重新瓜分殖民地面对南非布尔人发动的英布战争，1898 年美国为重新瓜分殖民地而对西班牙发动的美西战争，1900 年英、法等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战争，1904—1905 年日本和俄国为重新瓜分中国东北地区和朝鲜而进行的日俄战争。正是这次日俄战争引发了 1905 年俄国人民革命，从而结束了 1871 年第一个无产阶级民主政权巴黎公社失败之后长达 25 年之久的和平发展时期，开始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可以说，从本世纪初进入帝国主义时代以来，战争与革命长期成为世界的主题。特别是资本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为争夺世界霸权，发动了给人类带来空前浩劫的两次世界大战，即 1914—1918 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 1939—1945 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革命未能制止战争，战争却引起革命。两次世界大战加深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促进了无产阶级的觉醒，增强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力量，掀起了两次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高潮。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和战后初期的革命高潮，赢得了 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诞生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随后还爆发了德国革命、匈牙利革命等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还有过亚洲民族民主革命的高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东欧和东亚人民民主革命的高潮，其成果是有 12 个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战后持续不断的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的洪流使亚非拉 100 多个国家兀立崛起。而从 50 到 70 年代美、法等国入侵朝鲜半岛和印度支那半岛的战争却屡遭失败。

到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世界的主题显然已经从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这主要是由于：第一，40 年代以来西方带头掀起的以电子信息技术为先导的全方位、加速度大发展的新科技革命，使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结构、产业结构和阶级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新产业异军突起；第三产业（服务性产业）和第四产业（信息产业）的产值和人员超过了传统的第一产业（农业）和第二产业（工业），脑力劳动者和中间阶级愈益壮大。新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使越来越多国家的决策转向和平发展新科技和经济，国际上的竞争也从以军事武力争夺领土转向以高新科技产品争夺市场。第二，到 80 年代，超级大国已拥有 5 万多颗核弹头，总当量达 260 亿吨，世界上人均大约要承受 3 吨 TNT 当量的核威胁。核战争将给人类造成“核冬天”的灭绝性灾难，所以新的世界大战必须避免，而且可能避免。第三，世界人民掀起一浪高于一浪的反对战争保卫和平的运动。广大人民强烈要求裁军，禁止核试验，销毁核武器。世界各种保卫和平的组织已达数千个，参加和平运动的群众越来越广泛。第四，不仅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需要发展，而且众多发展中国家独立后因南北差距还在继续扩大，更迫切需要在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加快发展。第三世界国家不仅是维护和平的坚强支柱，而且是促进发展的雄厚力量。第五，由于新科技革命的推

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劳资矛盾和各种社会矛盾有所缓和，难以出现无产阶级革命的形势；发展中国家因面临加快发展的紧迫民族任务，绝大多数国家革命形势，也难以形成。

邓小平同志及时洞察到世界形势和主题的重大变化，于 1984 年 5 月指出：“现在世界上问题很多，有两个比较突出。一是和平问题。现在有核武器，一旦发生战争，核武器就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损失。要争取和平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强权政治。二是南北问题，这个问题在目前十分突出。发达国家越来越富，相对的是发展中国家越来越穷。南北问题不解决，就会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障碍。” [1]1985 年 3 月他进而讲到：“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 [2]

既然和平与发展已成为世界的主题，我国的对外方针就不能还是立足于世界大战不可避免，就不能还以推进世界革命为重点，而应该主要在国内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同时必须对外维护我国的独立与主权，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这是我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具有国际性质的表现，又是这一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方面，我国主要致力于：第一，反对战争，维护和平，主张裁减军备，促进禁止核武器。1985 年我国主动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员额减少 100 万。我国政府多次表明：要求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一切核武器，中国决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搞核扩散，不帮助其他国家发展核武器，并且建议所有核国家就不使用核武器、停止核试验、停止核生产达成协议。第二，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侵略扩张行为，要警惕极少数人复活军国主义，同时表明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主张国家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当作为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参与国际事务，支持联合国及其安全理事会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发展等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反对少数几个国家垄断和操纵国际事务。第三，国与国之间的分歧和争端，应当遵照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准则，应当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通过谈判协商求得和平解决，不得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或者以经济制裁等手段施加压力。中国作为政治大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积极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进行不懈的努力。第四，中国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愿意同世界上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决不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强加于人，尊重各国人民对本国社会制度的选择；不输出革命，不搞意识形态的论战，求同存异，平等相待，与世界各国共同致力于全球的协调发展。第五，特别重视我国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有关边界领土争端等问题坚持通过谈判协商、争取双方互相让步，求得和平解决；即使一时解决不了，可以先搁置起来，搞共同开发，在经贸、科技、文化等领域加强交流与合作，增进了解和友谊。与周边国家协同发展的重大深远意义还在于为我国真正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国际关系树立良好榜样，并且使东亚成为和平稳定、共同发展的地区，为振兴亚洲、使亚洲腾飞、迎接“亚洲太平洋世纪”的到来多作贡献。第六，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加强同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是我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立足点，加强南南合作、促进南北对话和南北关系的解决，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中国从 1992 年起已经被批准接纳为不结盟运动的观察员国，同七十七国集团也已建立了密切联系，今后将进一步加强

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

从长远来看，要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最重要之点在于建立国际新秩序。在以前战争与革命成为世界主题的条件下，国际旧秩序就是由大国或大国集团依靠军事实力主宰世界、统治世界，通过战争争夺世界霸权，重新瓜分世界。那时世界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只有准备发动世界革命，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力求建立没有帝国主义，没有战争的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题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建立国际新秩序就要重新考虑、重新探索了。

邓小平同志早于 1974 年在联合国大会的发言中就讲到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问题，1982 年又提出要解决南北关系和加强南南合作以“改变国际经济秩序”[3]的主张。1988 年他进而精辟地指明：“世界总的局势在变，各国都在考虑相应的新政策，建立新的国际秩序。霸权主义、集团政治或条约组织是行不通了，那末应当用什么原则来指导新的国际关系呢？最近，我同一些外国领导人和朋友都谈到这个问题。世界上现在有两件事情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我认为，中印两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经得住考验的。……我们应当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4]1990 年又重申：“我们对外政策还是两条，第一条是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第二条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经济新秩序。这两条要反复讲。”[5]“现在确实需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准则。现在出现的新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是不能长久维持的。”[6]美国、日本和西欧国家一些领导人近几年也曾经提出关于“世界新秩序”的种种主张，说穿了实质上还是维护美、日和欧洲几个大国主宰世界旧秩序的修补。

我们并不否认大国在国际事务中肩负重大的特殊作用。但是，第一，在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已走上独立自主发展的新时代，必须做到国家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要作为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参与国际事务，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中每国都有一票平等的表决权；第二，要使大国严格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按各项国际法规办事，坚决反对并有效防止大国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第三，尊重各国人民对本国社会制度的选择，尊重各国的主权，反对任何外国、尤其是大国干涉别国内政；第四，各种国际分歧和争端要通过谈判协商求得和平解决，反对某些大国插手施加压力和用武力解决。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以保障世界持久和平和全球协调发展。中国人民将同各国人民一起，为实现这个长期的任务进行不懈的努力。我们深信，在世界大多数国家得到发展、人民普遍觉醒并坚持斗争之下，这个目标是能够达到的。

二、实现和平共处，扩大国际合作

在和平与发展已成为世界主题的新形势下，我国要实行对外开放，面临着如何同世界各国相处的问题。

自古以来，不论什么性质的国家，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不外三种状态，即热战冲突、冷战对峙与和平共处。1917 年十月革命胜利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通过的第一个法令就是和平法令。这表明社会主义国家愿意同资本主义世界各国和平共处，列宁于 1918—1920 年，多次声明苏维埃俄国希望“同各国人民和平共处”。然而长期实践经验证明：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以往很难持久地和平共处。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不论意识

形态或社会制度都是根本对立的。资本主义豺狼总想用武装入侵来消灭社会主义牛犊。而社会主义国家以往为了推进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也总是把自己当作策动世界革命的基地，大力支援世界革命，难以同资本主义列强长期和平共处。列宁于 1920 年 12 月 6 日在莫斯科党组织积极分子大会上曾经指出：“只要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它们就不能和平相处，最后不是这个胜利，就是那个胜利；不是为苏维埃共和国唱挽歌，就是为世界资本主义唱挽歌。这是战争的延期。资本家是会找借口来打仗的。”[7]历史上社会主义国家曾经 4 次遭到资本主义列强武装入侵：1918—1920 年 14 国武装干涉苏俄；1941—1945 年法西斯德国背信弃义武装进攻苏联；1950—1953 年美国盗用联合国名义武装打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1945—1954 年和 1961—1975 年法、美帝国主义先后在印度支那半岛对越南民主共和国发动武装侵略。在热战冲突失败之后，资本帝国主义国家仍然与社会主义国家冷战对峙，通常采用外交抵制、经济封锁、舆论攻击等手段，企图压眼、困死社会主义国家。早在 20—30 年代，西方就对苏联搞过冷战；1946 年以后更是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长期进行冷战，经常剑拔弩张，唇枪舌战，不断磨擦，互相对峙。其间也有过一段时间，双方和平共处，局势有所缓和，关系有所改善，经贸有所发展，协作有所推进。但是和平共处为期不长，交往不深，往往又被热战冲突或冷战对峙所取代。

1949 年我国建国以来，同西方国家的关系也经历了热战冲突、冷战对峙与和平共处这三种形式和状态。我国曾派出人民志愿军参与抗美援朝战争，还派出军事人员参与抗法援越和抗美援越战争，克尽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义务，有力地打击了并且挫败了帝国主义武装颠覆的阴谋。西方国家还对我国长期进行冷战。1954 年我国同印度、缅甸共同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领土和主权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以此作为处理国际关系、处理国与国之间争端的基本原则。尽管这些原则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赞同和支持，但是在 50—70 年代的国际背景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还很难得到全面贯彻和遵守。我国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过热战冲突和冷战对峙，直到 1972 年中日建交、中美政府首脑会谈后双方才转为和平共处。我国同某些民族独立国家也发生过武装冲突（如 1959、1962 年中印边境的冲突）和思想论战（如 1959 年发表《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1962 年发表《从中印边界问题再论尼赫鲁的哲学》）。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我国同某些社会主义国家也难以做到和平共处。

1978 年底我们党端正了指导思想和基本路线，总结了建国以来的实践经验，调整了对内、对外方针政策。这时国际形势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新科技革命的显赫成果和世界各国人民的有力斗争，使世界大战的危险降低，国际形势有所缓和，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的主题，各国具有远见卓识的领导人都把维护和平、避免战争作为稳步发展本国经济的首要条件，都把注意力转向高科技的发展和竞争。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就非常必要而且可能争取较长期的国际和平环境。我们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也就是要同所有国家和平共处。当今奉行和平共处方针同以往有很多、很大的区别：第一，以往和平共处是短期的，时常被热战冲突和冷战对峙所打断，当今可能较长期和平共处；第二，以往和平共处只是外交斗争的一种策略，当今和平共处已经成为对外关系的战略方针；第三，以往和平共处主要是针对西方发达国家，当今和平共处的

对象包括三类国家，即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可以说面向世界上所有国家；第四，以往和平共处只是作为国际阶级斗争的另一种形式，当今和平共处是以国际协作为主，协作中有竞争和斗争，竞争要遵循国际法规、协议和惯例，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第五，以往和平共处偏重于一般的原则，当今和平共处要以五项原则作为具体内容（互相尊重领土与主权的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这四个“互”包含政治、外交、军事、经济、科技文化等多方面的内容，多方面的协作）；第六，以往和平共处强调处理好国与国间的关系，国与国间的矛盾不诉诸武力解决，当今的和平共处则要求各国协同解决人类生存与发展所面临的众多全球性问题，如环境污染、生态平衡、人口增长、国际性犯罪、防止艾滋病等。

近十几年来，我国本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世界各国广泛建立和发展了多种协作关系，协调解决了一系列国际争端和全球性的问题，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创造了最有利的国际和平环境，争取了多方面的国际支持和援助，赢得了国际社会的信任和赞扬。当今还有人认为同资本主义国家只有斗争，不能合作；也有人只讲合作，不要斗争。必须警惕右，同时主要防止“左”，力争进一步扩大国际合作，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这样才可能加快国内经济的发展，力争实现隔几年上一个台阶的战略目标。近年来我国争取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的工作已取得重大进展。“复关”之后我国同世界各《的多边贸易合作关系将更加有保障，更能捍卫我国的正当权益，更易于处理好有关外贸的摩擦和纠纷，为我国扩大对外开放和国际合作创造更好的国际环境。引进和利用外资将从侧重加工业和小项目转向以能源和基础设施等大项目为主。出口商品将由以初级产品为主转变为以制成品和高新技术产品为主。我们要充分利用地缘经济的优势，着力加强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合作，积极参与区域性的活动，如东亚经济集团、东南亚国家联盟、亚大经济合作组织、日本海经济圈、图们江开发区等等，同时还要加强与周边国家的边境贸易和双边合作。到海外发行债券和股票，到海外投资和创办企业，参与企业跨国经营，这也是扩大国际合作的新举措。我国还参与国际环境与参与国际文化、教育、出版、卫生、体育等合作，与各国联手反对国际性贩毒、反对国际性走私、反对国际性恐怖活动、反对国际性刑事犯罪，促进通过和平谈判协商解决国际争端等。总之，我国的对外方针已经实现了从到处树敌、推进世界革命到远交近亲、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转变。我国当今实行的是以经贸、科技合作为中心的全方位环球外交，其主要具体表现是：睦邻周边，亲近亚大，远联欧美，广交非拉，融进世界，协和万邦。这些必将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提高我国的国际声誉和国际地位。

在对外开放、和平共处、国际合作中，还有一个反对和平演变的问题。“和平演变”本是美国国务卿约翰·杜勒斯于1953年针对社会主义国家提出的战略方针。帝国主义在武装入侵社会主义国家硬的一手屡遭失败之后，想改用软的一手来瓦解社会主义国家，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社会主义国家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当东西方超越热战冲突和冷战对峙、处于和平共处状态时，尤其是要警惕其和平演变战略。1985年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执政后，为强调缓和国际形势、同西方和平共处，对西方的压力步步退让，一味迁就，终于被西方和平演变过去，导致1989年东欧的剧变和1991年苏联的解体。这个深刻的教训值得重视。邓小平同志指出：“西方国

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 [8]西方的和平演变战略早在 50 年代就已提出，为什么到 80 年代末才发展为“世界大战”，并且应验奏效呢？和平演变并不是只依靠广播攻势和文字宣传，主要是以新科技革命的成果作为物质后盾，向社会主义国家显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高新科技还能得到很快很大发展，从而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比之社会主义国家，改善得更快更多。和平演变战略之所以能够得逞，除了依靠新科技革命成果作为物质基础之外，西方还针对社会主义国家原有经济、政治、文化体制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病，长期难以改掉的情况，集中火力使用三个武器，即市场经济、多党制和自由、人权等观念，发起猛烈的和平攻势。因此，为了有效地挫败西方的和平演变战略，不仅要为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反和平演变的思想教育，而且更带根本性的是要加快科技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奋起直追、迎头赶上世界新科技革命的潮流。为此就要加快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自觉地、主动地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步转轨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经济充满生机与活力；自觉地、主动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发展共产党党内民主、人民民主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根本端正党风，彻底惩治腐败；自觉地、主动地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发展社会主义自由与人权，真正形成既有自由又有纪律的生动活泼的局面。如果体制改革长期滞后或者没有配套协调进行，如果科技和生产力长期发展缓慢，势必引起党内外广大人民群众不满。这样就会给西方施展和实现和平演变以可乘之机。

人们经常引用西欧英、法等国在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的过程中多次出现封建王朝复辟的历史事例，以此说明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必然也是曲折的、有反复的。殊不知，欧洲封建势力能够复辟都是在新兴资本主义尚未创造出新科技和新生产力之时。到 18 世纪末至 19 世纪中叶，英、法资产阶级实现了体制改革、蒸汽化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之后，封建势力再也不可能复辟了。而且，德、意、俄、日等国的封建统治阶级还被迫主动从上而下进行体制改革，自觉地去发展资本主义和新科技，以适应世界的新潮流。由此可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新科技和进行体制改革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真可谓早改早主动，晚改陷被动，不改无出路。

（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注释：

- [1]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56 页。
- [2]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105 页。
- [3]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20 页。
- [4]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282—283 页。
- [5]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53 页。
- [6]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60 页。
- [7] 《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40 卷，第 78 页。
- [8]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44 页。

论邓小平的和平外交战略

丛凤辉

古往今来，任何一个国家都把外交政策列入治国安邦的基本国策之中，外交政策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国家安危和民族存亡。好的外交政策，即适合当地客观现实需要和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外交政策，必然能促进国富民乐、国强民安，反之则将导致国祸民殃、国亡民灾。

世界历史上著名的拿破仑帝国也曾威震全球而不可一世，但却毁于其外交政策的不适，他所推行的大陆封锁政策不仅没有达到孤立英国的目的，反而孤立了法兰西帝国本身。英国推行的反封锁政策使法国工业失去了许多原料来源，导致法国工商业危机爆发，不但使法国商品在欧洲市场上失去竞争能力，而且使法国与欧洲大陆各国的矛盾加剧，从而招致四面八方对拿破仑企图建立大陆霸权行径的强烈不满和反对，最终导致拿破仑侵俄战争的失败和拿破仑帝国的崩溃。

中国历史上也有过许多可惜鉴的经验和教训。唐朝开辟的丝绸之路打开了国门，促进了各国间的贸易往来，从而使国家得以兴盛；明朝明成祖选派郑和下西洋，从而促进了中国与一些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使社会得以繁荣；从明朝中叶起到鸦片战争的300多年间的闭关自守则导致了中国的贫穷落后与愚昧无知。

当人类历史进入到电子和信息时代，高新技术的突飞猛进引起产业革命和社会生活方式的科学化与智能化，从而赐给全球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的人们共享的文明财富，交通四通八达，通讯全球连网，时空距离相对缩小，人们的视听觉行范围扩大，知识堆积，信息爆炸，国与国之间的联系愈来愈密切，相互依存的关系愈来愈加强，进而愈来愈突现出全人类的共同需求和共同利益。本世纪前半叶，人类饱尝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忧患，经过了多少艰苦卓绝的奋斗，从黑暗中走向光明，走向全球和平与发展的崭新时代、辉煌时代。

历史在走自己的路，时代的主题随着历史的进程而不断地发生变化。过去那种固步自封、夜郎自大、为反帝反修而一律排外，时刻准备打仗的外交战略已被实践证明了是不适合中国国情、不适合世界历史发展的趋势的，必然要被新时代改革开放前进的洪流所淘汰。

邓小平的和平外交战略正是顺应了新时代的历史潮流并且适应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客观需要而产生的，具有深刻的现实内涵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邓小平和平外交战略的总体内涵

邓小平的和平外交战略按他自己所说的话，综合与归纳起来看，其总体内涵如下：

首要目标——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争取与维护世界和平；

根本原则——独立自主、真正的不结盟；

基本准则——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指导下，同世界上一切国家建立和发展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关系；

基本立场——立足于自己的实际，同第三世界各国广泛合作；

基本主张——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裁减军备，用谈判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

基本保证——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国际经济新秩序；

最高准则——国家利益；

最终目的——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振兴中华民族。

——这些内涵散见在他的各种谈话和报告中，体现了他的和平外交战略的总体精神或总的方针政策，可以归结为一句话：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战略。

二、邓小平和平外交战略的基本构架

邓小平的和平外交战略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逐步探索、逐步推广出来的，它一开始就牵涉到许多方面许多层次，纵横交错地随着改革开放的客观历史进程的迫切需要而不断地推出并使之愈来愈丰富，到如今，已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战略体系，其基本构架可以这样概述（初探式的）——

（一）世界主题论——对世界形势的准确判断

邓小平的和平外交战略首先是基于对世界形势的客观分析。他指出：“打世界大战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有资格，”[1]战争的根源来自于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原来的世界两极格局被打破，超级大国只剩下美国一个，而美国既想独霸世界，但又因正在衰退着的经济而力不从心，由此看来，“过去我们的观点一直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2]而现在，由于“苏美两家还在进行军备竞赛，世界战争的危险还是存在的，但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3]他说这个和平力量是指包括中国在内的占世界人口 3/4 的第三世界，也包括了美苏以外的发达国家，还包括了美苏两国的人民。[4]因此，“真正支持战争的没有多少，……由此得出结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5]“战争是可以避免的。”[6]

进而，邓小平高瞻远瞩地指出，如果第三世界和整个欧洲在下一个世纪 50 年里有一个可喜的发展，到那时候便“可以真正消除战争的危险”。[7]邓小平特别地强调了“中国现在是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的力量，不是破坏力量。”[8]“中国的发展对世界、对亚大地区的和平和稳定都是有利的。”[9]“中国发展得越强大，世界和平越靠得住。”[10]“如果说中国是一个和平力量、制约战争的力量，现在这个力量还小。等到中国发展起来了，制约战争的和平力量将会大大增强。……那时中国对于世界和平和国际局势的稳定肯定会起比较显著的作用。”[11]邓小平的分析是从两个方面来进行的：一方面是从政治的角度来观察和分析引起战争的力量（即战争的根源）与制止战争的力量（即和平的因素）的对比，前者正在衰落，后者正在发展壮大，从而得出准确的判断——战争可以避免，世界和平有希望；另一方面是从经济发展的视线来推论出和平力量将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地发展壮大，中国的发展将对世界和平起重要作用的辩证性预言。

邓小平从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的分析入手，从而得出对世界形势的准确判断，进而提出了新时代世界主题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是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12]一句话，当今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的问题。邓小平多次强调，这一主题思想的核心是发展问题，我们要争取更多的和平时间来发展自己，也只有发展了的中国才能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发展需要和平的环境，只有发展才能促进和维护世界和平，没有和平便没有发展，没有发展便不可能有长久的和平，和平与发展是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

邓小平对世界形势的准确判断闪耀着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光辉，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战略的推出奠定了思想基础，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二）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和平外交战略的根基

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体现了世界主题——和平与发展的根本原则：和平外交战略必须建立在独立自主的原则上，否则便会失去主权与国格，失去和平的根本保证；中国的发展必须以对外开放为前提，否则不能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而落后则必定要挨打、要被侵犯、被掠夺。

1. 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战略

邓小平坚持毛泽东、周恩来一贯主张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外交政策。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赋予“独立自主”的涵义有五个要点：一是从实际出发。“中国的事情要按中国的情况来办”；[13]二是自力更生。中国的事情“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14]三是不当别国附庸。“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15]四是“真正的不结盟。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16]五是不当头、不称霸。“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17]

邓小平赋予“独立自主”在外交政策上的重要性在于：一是和平外交战略的立足点。“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18]二是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的根本保证。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19]在国际关系问题上，“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20]三是争取世界和平的前提，是集中精力搞好国内四化建设的首要前提。

2. 对外开放的指导思想和实践

对外开放的内容是“三个方面的开放。一个是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开放，我们吸收外资、引进技术等等主要从那里来。一个是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开放”，[21]这主要指同他们做生意、搞技术合作、合资经营、技术改造等。“一个是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开放”。[22]总之，“开放是对世界所有国家开放，对各种类型的国家开放。”[23]

对外开放的目的是为了吸收和利用外资和外国智力，引进先进技术，借鉴和学习先进管理经验。

对外开放的重要性在于：（1）“谋求发展，摆脱贫穷和落后”。[24]（2）“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25]（3）发展了的中国才能维护世界和平。

对外开放的社会性质：“开放伤害不了我们”，[26]“不会产生新资产阶级”，因为“基本的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归集体所有，就是说归公有。……无论怎么开放，公有制经济始终还是主体。……不会是资本主义”。[27]总之，对外开放不会改变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

对外开放的“指导思想要明确”，“不是收，而是放。”[28]对外开放的意义在于：“历史最终会证明，帮助了我们的人，得到的利益不会小于他们对我们的帮助。至于政治上战略上的意义就更大了。”[29]

对外开放的方式：一是建立经济特区。经济特区是对外政策的窗口，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和海南岛的特区建设和发展的经验证明了“我们建立

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而且是成功的”。[30]二是开放 14 个沿海城市。大连、青岛……，“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31]就像“厦门特区不叫自由港，但可以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32]一样。三是在大陆各地有条件的地方可搞“三资”企业。“‘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33]

对外开放的原则：一是“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34]二是要“共同承担”风险，“不必担心我们的政策会变。”[35]三是“要小心谨慎”，[36]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决抵制外来腐朽思想的侵蚀，决不允许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我国泛滥。”[37]

对外开放的实践成就：在邓小平的对外开放思想的指导下，我国的对外开放经过 15 年的实践，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38]

从 1980 年起，我国先后设立了 5 个经济特区，总面积达 34713 平方公里；从 1984 年起国务院先后批准了 14 个对外开放城市，并在其中逐步兴办了 32 个国家级的经济技术开发区；1990 年 6 月国务院又批准了上海市开发和开放浦东新区；1985 年起，我国又开辟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门、漳州、泉州三角地区和辽东半岛、胶东半岛等一些沿海市、县为沿海经济开发区，共包含 41 个省辖市、218 个县（市），从南到北连线成片；1992 年初，又开放了 6 个长江沿岸城市和 18 个内陆省会城市；到 1993 年止，已成立了 52 个高新技术开发区、13 个保税区，开放了 34 个口岸，形成了东北、西北、西南的边境贸易合作区，在全国范围内，已形成了包括 900 多个市县的沿海、沿江、周边和内陆地区多层次、全方位的开放新格局。

对外开放的领域不断地向深广拓展，从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招商引资，到商业零售企业，外币经营业务，金融保险、旅游、房地产、饮食业等行业开放试点和逐步铺开。

在外贸体制上进行了大胆创新的改革，经历了放权让利、政企分开、承包经营、平等竞争、自负盈亏的各阶段；重点改革了进口管理体制，降低了 3,371 种进口产品的关税，取消了进口调节税；到 1993 年末，在我国注册的“三资”企业已达 17.5 万个，实际上总共利用外资 641.99 亿美元。到 1993 年止，我国已与世界上 221 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贸易关系；我国的进出口总额已达到 195 亿美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40% 左右，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为 3.2%，排行第 11 位；我国的境外企业已达 4,479 家，中方总投资 51,54 亿美元；我国对外经济合作业务已拓展到 170 多个国家和地区，累计签订各类劳务承包合同 4.1 万多份，合同金额 300 亿美元，完成营业额突破 170 亿美元，派出承包劳务人员达 67 万人次。

（上述统计数截止期为 1993 年底。）

邓小平关于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的科学结论是整个对外开放思想体系的基石。随着对外开放的发展进程，中国和中华民族正在全方位地进入国际社会和世界体系，在国际上采取了日益广泛的全面的互利合作态度，中国正在成为世界的中国。中国经济的稳步增长，对于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发挥日益重要的影响。正如世界银行所评论的，中国在生活水准提高的速度和规模上，是人类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美国前副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发表文章，称中国的改革将重新塑造整个世界。我国 16 年来对外开放的成就证明了：我国的对外开放是顺应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的，是符合现时代中国国情的，因而是正

确的、成功的。中国的发展必然对促进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维护世界和平起重大作用并作出应有的贡献。

（三）稳定国际国内局势——为争取世界和平所采取的战略

1. “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实施及意义 “一国两制”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大陆 12 亿人口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以港、澳、台的物质基础和技术力量补充大陆经济，加快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业。

早在 50—60 年代，毛泽东、周恩来就曾多次表明要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决祖国统一的问题，周恩来曾提出过国共两党为什么不可以第三次合作的问题，毛泽东也曾提出过如果和平统一祖国，台湾“一切可以照旧”，可以实行三民主义，同大陆通商，但互不派特务进行破坏活动。我们党的领导人也多次表示，国共两党通过对等谈判实行和平统一，台湾成为中国政府统辖下的自治区，实行高度自治，台湾地区政务仍旧归蒋介石领导，共产党不派人前往干预，而国民党可派人到北京参加对全国政务的领导，但外国军事力量一定要撤离台湾海峡。由此可见，两种制度在统一的中国内同时并存的思想已具雏形。从 1958 年的炮击金门事件起，到 1963 年初周恩来将毛泽东的有关台湾回归祖国的思想概括为“一纲四目”，[39]经历了许多艰难曲折的努力，由于国内外各种主客观原因，始终未能如愿以偿，但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已为第二代领导核心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播好了种子，开对了路子，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一国两制”的思想是邓小平于 1978 年底开始酝酿，到 1983 年夏基本形成的。1978 年 11 月邓小平在会见缅甸总统吴奈温时说：“在解决台湾问题时，我们会尊重台湾的现实。比如，台湾的某些制度可以不动，美日在台湾的投资可以不动，那边的生活方式可以不动。但是要统一。”[40]1979 年 1 月邓小平访问美国时发表的演说中明确地指出：“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了，只要台湾回归祖国，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41]后来，邓小平在会见香港总督麦里浩、日本首相大平正芳、美籍华人学者杨力宇等多次谈话中一再阐述有关的思想，强调要考虑到台湾的特殊地位，既要使台湾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又要使台湾拥有充分的自治权，因而为了统一，可以保留制度上的不同。

邓小平首次使用“一国两制”的概念是在 1982 年 1 月接见海外朋友时，他说 1981 年 9 月底由叶剑英代表我国政府提出了关于解决台湾问题的“九条方针”，“九条方针”‘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42]到 1983 年 6 月下旬，邓小平将“九条方针”归纳为“六点办法”，即：“祖国统一后，台湾特别行政区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司法独立，终审权不须到北京。台湾还可以有自己的军队，只是不能构成对大陆的威胁，大陆不派人驻台，不仅军队不去，行政人员也不去。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都由台湾自己来管，中央政府还要给台湾留出名额。”[43]“一国两制”的构想被运用到解决香港、澳门问题的过程中，引起了国际上很好的反应。从 1982 年 9 月起，中英两国政府开始了解决香港问题的谈判，到 1984 年夏，邓小平明确地指出：我国政府在 1997 年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后，香港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法律基本不变、生活方式不变，香港自由港的地位和国际贸易、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变，香港可以继续同其他国家和地区保持和发展经济关系。北京除了派军队以外，不向香港特区政府

派干部，派军队是为了维护国家的安全，而不是去干预香港的内部事务。[44] 他一再强调，用“一国两制”的办法解决香港问题，决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也不是玩弄手段，而完全是从实际出发，是充分照顾到香港的历史和现实情况的，他再三声明：10 亿人口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同时他也再三保证香港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在 1997 年后 50 年不变。只有这样做，才能保证香港的长期繁荣与稳定，从而真正达到祖国和平统一的目的。他说：“我认为有些国际争端用这种办法解决是可能的。我们就是要找出一个能为各方所接受的方式，使问题得到解决。过去，好多争端爆发了，引起武力冲突。假如能够采取合情合理的办法，就可以消除爆发点，稳定国际局势。”[45]

在邓小平“一国两制”思想的指导下，中英、中葡三国政府分别于 1984 年 12 月和 1987 年 4 月签署了关于香港和澳门问题的两个联合声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分别通过了两个特别行政区的基本法，至此，“一国两制”构想得到了法律保障，迈出了从理论到实践的关键性的第一步，并且得到了世界舆论的认可，同时也达到了稳定人心、稳定世界局势的良好效应。

总而言之，“一国两制”的构想是在现时代用和平的方式解决祖国统一问题的最佳方案，其前提是祖国统一，其主体仍是社会主义制度。它对台湾而言是国共两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第三次合作，属于中国内政问题，不容许任何外国干涉；对于香港、澳门则是中国恢复行使主权，结束外国殖民统治，涉及到中外关系的问题，符合处理国际关系的普遍准则——和平共处原则。

“一国两制”构想的伟大意义在于，它不仅是邓小平的伟大创举，更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它的理论意义不仅在于体现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思想路线，创造性地把处理国际关系的和平共处原则用以解决国家内部事务，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最具特色的一个内容，而且还在于发展了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关于国家的管理职能的理论；它的现实意义不仅在于可以避免武力冲突，有利于人心稳定和世界局势的稳定，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环境，而且还在于可以争取更多的和平时间来一心一意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它的世界历史意义则在于为国际上许多历史遗留的争端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有益的线索，”[46]并创设了实际操作的“范例，”[47]成为邓小平和平外交战略中最富魅力的新篇章，这将对当代世界格局的发展前途产生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产生难以估量的深远意义。

2. 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邓小平在 1984 年 2 月 22 日会见美国乔治城大学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代表团时指出：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解决问题的出路。即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国际争端问题，如：一个中国，两种制度的办法，“世界上的许多争端用类似这样的办法解决，我认为可取的。”[48]否则难免会爆发武力冲突。如果不要战争，只能采取这类的方式。为的是既能向人民交代，使局势长期稳定，也不伤害哪一方，为了抓紧时间搞建设，“有些国际上的领土争端，可以先不谈主权，先进行共同开发。这样的问题，要从尊重现实出发，找条新的路子来解决。”[49]“新问题就得用新办法”，[50]为的是“要把世界局势稳定下来”。[51]因为“中国需要至少二十年的和平，以便聚精会神地搞国内建设”。[52]

1984 年 10 月 22 日，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中指出：“‘共同开发，的设想，最早也是从我们自己的实际提出来的。我们有个钓鱼岛问题，还有个南沙群岛问题。……这样的问题是不是可以不涉及两国的主权争议，共同开发。共同开发的无非是那个岛屿附近的海底石油之类，可以合资经营嘛，共同得利嘛。不用打仗，也不要好多轮谈判。南沙群岛，历来世界地图是划到中国的，属中国，现在除台湾占了一个岛以外，菲律宾占了几个岛，越南占了几个岛，马来西亚占了几个岛。将来怎么办？一个办法是我们用武力统统把这些岛收回来；一个办法是把主权问题搁置起来，共同开发，这就可以消除多年积累下来的问题。……我们中国人是主张和平的，希望用和平方式解决争端。” [53]

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思想是继“一国两制”构想提出后又一个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好战略，深刻体现了邓小平的务实精神，这样做可以免去许多不必要的争议时间，集中时间和人力物力办更多的实事，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既不互相伤害，又能互相得利，从总体上是符合有争端的各国之间的共同利益的，也是促进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良策。搁置争议不等于不要解决问题，而是在找不到更好的解决办法的情况下，暂时搁置争议，把它“挂起来，如果我们这一代不能解决，下一代会比我们聪明一些，总能找到解决的办法”。 [54]

3. 解决双边及近邻关系

在解决双边及近邻关系的问题上，邓小平除了提出“共同开发”的战略外，还着重对中印、中越、中苏、中日等关系问题提出了一些解决的办法——

中印关系

邓小平在 1982 年 10 月 22 日会见印度社会科学理事会代表团时说：“中印两国都是发展中国家，但在世界上都不是无足轻重的国家。中印两国人口最多，加起来有十七亿，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以上。……在五十年代中期我们合作得很好。周恩来总理和尼赫鲁总理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世界所公认。” [55]

邓小平认为中印两国不存在谁威胁谁的问题，只是一个边界问题，对此，“双方都应该做些事情来恢复五十年代的友谊。” [56] 用“一揽子解决” [57] 的办法，互相做一些让步，采取一些合情合理的方式，问题是不难解决的。“即使一时解决不了，可以先放一放，在贸易、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还可以做很多事情，发展往来，增进了解和友谊，双方合作仍然有广阔的前景。” [58] 这里体现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指导思想，即搁置争议，发展合作。

1988 年 12 月 21 日，邓小平在会见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时进一步指出：“中印两国对人类有一个共同的责任，就是要利用现在有利的和平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 [59] “中印两国不发展起来就不是亚洲世纪。……这就像巴西不发展就不是拉丁美洲世纪一样。……中印两国如果发展起来了，那可以说我们对人类做出了贡献。……所有发展中国家应该改善相互之间的关系，加强相互之间的合作。中印两国尤其应该这样做。” [60]

邓小平把中印关系同发展合作紧密联系起来，他强调要“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 [61] 要明了发展问题是“发展中国家自己的责任”， [62] “要靠自己来摆脱贫困，靠自己发展起来。主要靠自己，同时不要闭关自守，可以多方面找朋友。” [63] 他强调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是非常重要的，是关系到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和世

界局势稳定的大问题。

中苏关系

早在 1984 年 10 月 10 日，邓小平在会见联邦德国总理科尔时就说过，要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同苏联发展关系，要改善同苏联的关系。[64]到了 1989 年 5 月 16 日，邓小平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说：“中国人民真诚地希望中苏关系能够得到改善。我建议利用这个机会宣布中苏关系从此实现正常化。”[65]邓小平进而总结了中苏两党在 50 年代末 60 年代前半期的激烈争论，他指出，经过实践检验后，证明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从历史上来看，从鸦片战争起沙俄就是从中国得利最大的两个国家之一，“以后延续到苏联。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侵占的中国土地，超过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66]十月革命后，苏联还于 1929 年占去了中国的黑瞎子岛，那是在斯大林时期，中国的国民政府同苏联签订的条约，承认了二战后美、英、苏在雅尔塔签订的划分势力范围的秘密协定中所规定的内容。[67]后来中苏进行边界谈判，我们总是要求苏联承认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侵害中国的历史事实。但如今，“鉴于清代被沙俄侵占的 150 多万平方公里是通过条约规定的，同时考虑到历史的和现实的情况，我们仍然愿意以这些条约为基础，合理解决边界问题。”[68]在此，邓小平采取的是尊重历史客观实际和现实情况的态度，表示要合情合理地解决中苏边界问题。这是符合科学的态度与求实的精神的。

邓小平接着叙述了在 60 年代，苏联在中苏、中蒙边界上不断加强军事设施、增加军队和导弹威胁中国的事实。邓小平一方面承认当时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论中，我们当时说的话也并不是都对，另一方面又一针见血地指出：“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虽然如此，我们从来没有忘记在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苏联帮我们搞了一个工业基础。”[69]

邓小平一分为二地分析了中苏关系的历史，强调对这些问题要“一风吹”，要“结束过去，开辟未来”。[70]他建议，从今以后在发展交往方面要“多做实事，少说空话”。[71]由此调整了中苏的紧张关系，这是他自己也承认的在外交上“已经做成的事情”之一。[72]

中日关系

1984 年 3 月 25 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说：“去年我们两国领导人在东京作出了一个具有卓识远见的决策，就是把中日关系放在长远的角度来考虑，来发展。第一步放到二十一世纪，还要发展到二十二世纪、二十三世纪，要永远友好下去。这件事超过了我们之间一切问题的重要性。”[73]他指出：“看得远些广些，有利于我们之间的合作。这种合作不是只对一方有利，而是对双方、对两国、对两国人民都有利。……我们欢迎贵国的大中小企业加强同我们的合作。我们希望日本政府对他们做一点工作，劝他们看得远一点。中国现在缺乏资金，有很多好的东西开发不出来。如果开发出来，可以更多地提供日本需要的东西。现在到中国来投资，对日本的将来最有利。”[74]

1985 年 3 月 4 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时表扬了“日本企业界对发展中日两国经济技术合作抱积极态度，是一种有战略眼光的决策”。[75]

1987 年 5 月 5 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朋友宇都宫德马等人时说：“发展中日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从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那个时候就开始了。……日本百分之九十几的人也是愿意中日友好的。”[76]中国人

担心的只是日本的极少数人的复活军国主义的倾向。我们不仅要批评、揭露这种倾向，而且要扎扎实实地做一些发展中日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友好关系的事情，不断地加深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要真正使“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下去”的口号成为事实。

后来，邓小平在同戈尔巴乔夫会谈时也指出过，日本是从鸦片战争以来在中国得利最多的两个国家之一，“日本占了中国不少地方，台湾就被它占了五十年。中国有很多地方被日本划为它的势力范围，特别是在北方，很多大城市有日租界。”[77]日本侵占东三省后，对中国的损害无法估量，中国因此死了几千万人。所以，日本欠中国的历史帐是最多的。抗战胜利后，我们收复了所有被日本侵占的地方。悬案只是一个钓鱼岛，但那是一个没有人烟的小岛。对此岛的主权问题可以先挂起来，目前可先采用共同开发的办法加以解决。

对中日关系的调整也是邓小平自己承认的他在外交上“已经做成的事情”之一。[78]

4. 改善与欧美国家的外交关系

中美关系

中美关系是我国对外关系链条中重要的一环，也是当今世界各种国际关系中最令人瞩目的关键纽结之一。中美关系几十年来风雨不停，虽然于1979年跨越了鸿沟，但一直在峰谷之间动荡不安。中美关系若处理得好，将对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和对全人类社会的和平与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早在1984年10月10日，邓小平在会见联邦德国总理科尔时就强调要在“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总政策下，改善同美国和苏联的关系。他认为当时“在改善同美国的关系方面有实际进展”。[79]1986年9月2日，邓小平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六十分钟”节目记者迈克·华莱士的电视采访时指出：“中美关系也有个障碍，就是台湾问题，就是中国的海峡两岸统一的问题。”[80]对这个问题，美国历来是介入的。早在50年代，麦克阿瑟和杜勒斯就把台湾看作是美国在亚洲和太平洋的“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81]所以台湾问题一直是中美建交谈判中最重要的问题。卡特执政后期，美国国会通过的《与台湾关系法》成为中美关系的一个很大障碍。邓小平由此引发出希望当权的里根总统能在中国统一的问题上有所作为，如可以鼓励、劝说台湾首先跟我们搞“三通”：通商、通航、通邮，以便增进海峡两岸的相互了解，为双方进一步商谈统一问题创造条件。[82]

1989年10月31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指出：结束严峻的中美关系，“美国应该采取主动”，[83]因为美国处于强者地位，中国处于弱者、受害者的地位，中美关系从我建国伊始到1972年的23年间，一直处于敌对状态，是由尼克松担任美国总统时改变了这个状况的。此后至今，中美关系的发展逐步建立了一个好的基础，即“两国在发展经济、维护经济利益方面有相互帮助的作用。中国市场毕竟还没有充分开发出来，美国利用中国市场还有很多事情能够做。我们欢迎美国商人继续进行对华商业活动，这恐怕也是结束过去的一个重要内容”。[84]

1989年12月10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总统特使、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时进一步指出：“中美两国之间尽管有些纠葛，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分歧，但归根到底中美关系是要好起来才行。这是世界和平和稳定的需要。”[85]“美国不应该把中国当作威胁自己的对手。我们没有做任何

一件伤害美国的事。1972年到现在的17年中，世界局势总的比较稳定，中美关系的发展是形成这样好的局势的一个原因，占的分量不轻。”[86]因此，恢复中美关系要双方努力，要互相尊重对方，互相照顾对方，双方都让点让步，总要找到好的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办法。

对中美关系的调整也是邓小平自己承认的他在外交上“已经做成的事情”之一。[87]他把中美关系的发展看成是稳定世界局势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他把中美关系的发展放在全球战略的高度，强调正确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最高准则是各国的国家利益，[88]因而必须在维护本国利益的原则的基础上，也考虑到对方利益，互相尊重与让步，这就体现了邓小平的和平外交战略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

中欧关系

在对外开放方面，邓小平强调要发展中欧贸易关系。早在1983年7月8日，邓小平就指出：“要扩大对外开放，现在开放得不够。要抓住西欧国家经济困难的时机，同他们搞技术合作，使我们的技术改造能够快一些搞上去。同东欧国家合作，也有文章可做，他们有一些技术比我们好，我们的一些东西他们也需要。……这是一个战略问题。”[89]1985年4月18日，邓小平在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时进一步指出：“在我们的对外贸易中，欧洲应占相应的份额。在外贸上应注意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技术转让，欧洲在这方面比较开放，当然，这只是比较而言。第二个是双方都应开辟贸易途径，贸易总是一来一往的，中国买欧洲产品，欧洲也要买中国产品。……现在欧洲在我们外贸中所占的比例不大，……我们一直在考虑加强同欧洲的经济联系，这是作为一项政策来考虑的。希望欧洲的企业界为中国商品进入欧洲市场创造条件。”[90]

在对和平力量的估计上，邓小平认为：“欧洲是决定和平与战争的关键地区。在过去相当长一个时期里，我们同东欧关系不正常。现在我们根据客观的判断，认为西欧和东欧都是维护和平的力量。东欧、西欧都需要发展，越发展和平力量越大。”[91]因为，欧洲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灾难，他们中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能力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才有资格，而战争一旦打起来，首先受害的将是欧洲，因此整个欧洲必须联合、强大、发展，才能抵御战争。欧洲在技术上比我们开放，“所以我们确定的政策是同欧洲，包括西欧和东欧，发展友好合作关系。这不仅是立足于中国自身的发展，也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92]由此可见，邓小平已把搞好中欧关系上升到：“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高度，把中欧关系的发展看成为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因此，他强调发展中欧关系是我们的新方针。

5. 军队建设

从维护世界和平的需要出发，邓小平强调军队建设需要做到两点：

一是裁军。“我们下这样大的决心，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员额减少一百万，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有力量、有信心的表现。它表明，拥有十亿人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并且用自己实际行动对维护世界和平作出贡献。减少一百万，实际上并没有削弱军队的战斗力，而是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即使国际形势恶化，这个裁减也是必要的，而且更加必要。”[93]

二是军队装备的现代化。邓小平指出：国防现代化是四个现代化之一，但四化总得有先有后，先把经济搞上去，一切都好办。要忍耐几年，到本世纪末，我们经济力量强了，就可以拿出比较多的钱来更新装备。可以从外国

买，更要立足于自己搞科学研究，自己设计出好的飞机、好的海军装备和陆军装备。[94]在这里，邓小平指出了发展经济与加强军队装备的关系，同时强调了自力更生搞好军队建设的思想。

6. 稳定国内局势，促进和平与发展

“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95]在稳定国际局势的同时，邓小平更注重稳定国内局势，因为这是稳定国际局势的重要因素之一，对此，邓小平主要做了三件事：

一是在对西藏的政策问题上，邓小平强调要真正立足于民族平等，着眼于把少数民族地区发展起来。[96]

二是在平息国内动乱中，邓小平竭力阻止内战发生，防止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97]他在1989年2月26日会见美国总统布什的谈话中指出：“中国正处在特别需要集中注意力发展经济的进程中。如果追求形式上的民主，结果是既实现不了民主，经济也得不到发展，只会出现国家混乱、人心涣散的局面。……民主是我们的目标，但国家必须保持稳定。”[98]在邓小平的英明领导下，党中央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迅速地平息了国内动乱，使四个现代化的建设步伐走上稳步发展的正常轨道。

三是当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发生动乱之时，邓小平充满信心地向世人宣布：“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变不了的。中国肯定要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谁也压不垮我们。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99]同时，他强调：“对于国际局势，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100]即稳住国内局势，脚踏实地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四）和平与发展——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1988年12月21日，邓小平在会见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时说：“世界总的局势在变，各国都在考虑相应的新政策，建立新的国际秩序。霸权主义、集团政治或条约组织是行不通了，那末应当用什么原则来指导新的国际关系呢？……世界上现在有两件事情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101]

1. 和平论——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

从政治角度来说，带有全球性的战略问题是和平问题，因而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就是建立维护世界和平的新规范。对此，邓小平的论述着重体现在5个方面：

一是国际关系的准则。“中印两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经得住考验的。……我们应当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102]我们要“在原则立场上把握住”。[103]

二是解决国际争端的方式。“只有两个方式：一个是谈判方式，一个是武力方式。用和平谈判的方式来解决，总要各方都能接受，香港问题就要中国和英国，加上香港居民都能接受。”[104]早在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就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强调：主权问题是不能谈判的。谈判不仅需要一定的时间，而且需要讲信用，说话算数。只有在中英双方根本谈不拢的情况下，中国才重新考虑收回香港的方式。也就是说，和平谈判是解决

国际争端的最佳方式，不到万不得已时绝不采取武力方式。

三是同一切和平力量合作。早在 80 年代初，邓小平就强调：“要争取和平的环境，就必须同世界上一切和平力量合作。”[105]“重要的是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合作，还有同欧洲、日本发展关系，加强合作。”[106]合作的立足点还是自力更生，但要实行开放政策，“利用国际和平环境更多地吸收对我们有用的东西，这对加速我们的发展比较有利。”[107]“我们欢迎发达国家同我们合作，也欢迎发展中国家相互之间的合作，这后一种合作是非常重要的。”[108]“第三世界要联合起来，共同努力奋斗。”[109]

四是正确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1984 年 10 月 31 日邓小平在会见缅甸总统吴山友时指出：“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10]1990 年 7 月 11 日，邓小平会见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时强调：“国际关系新秩序的最主要的原则，应该是不干涉别国的内政，不干涉别国的社会制度。”[111]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在五项原则基础上和平共处、相互合作，这是解决国际关系问题的唯一出路，而不是干涉别国内政、煽动别国内乱。“中国永远不会接受别人干涉内政。”[112]对于中日关系、中苏关系中的历史遗留问题，邓小平一再声明要“结束过去”，“开辟未来”。[113]重点要放在开辟未来的事情上。对过去的事情不讲也不好，总得有个交代，但历史帐讲完了就要“一风吹，一切向前看”，[114]过去的事就结束了，而开辟未来则重在“多做实事，少说空话。”[115]

五是正确处理党与党之间的关系。1983 年 4 月 29 日，邓小平在会见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央代表团时指出：“任何大党或者党都不能以最高发言人自居。”[116]1987 年 6 月 12 日，邓小平在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科罗舍茨时进一步指出：“任何大党、中党、小党，都要相互尊重对方的选择和经验，对别的党、别的事情不应该随便指手划脚。对执政党是这样，对没有执政的党也应该是这样。……因为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党都有自己的经历，情况千差万别。我们反对‘老子党’，这一点我们是反对得对了。我们不赞成有什么‘中心’，但我们自己也犯了点随便指手划脚的错误。这个经验告诉我们，党与党之间要建立新型的关系，因此我们提出了处理这种关系的原则。”[117]这一原则即是中国共产党第 12 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根据邓小平在 1980 年 5 月的有关指示精神而概括的：“我们党坚持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发展同各国共产党和其他工人阶级政党的关系。”[118]1987 年 10 月 13 日，邓小平在会见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卡达尔时再三强调：发展两党两国关系，对过去的问题一风吹，一切向前看，而关键的是要根据自己的特点，自己国家的情况，走自己的路。不能照搬别国的做法，更不能丢掉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尤其是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民主集中制等优越性。[119]

六是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邓小平不仅经常强调和平环境是发展经济的有利条件和国际机遇，而且经常强调“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永不称霸。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120]邓小平认为，在国际形势从旧的两极格局解体向新的多极格局形成的过程中，“中国算一极”，[121]而且中国是一个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东方大

国，正如“亚太世纪”[122]没有中国的发展是形不成的一样，世界的长久和平与发展没有中国的长久稳定和发展也是不行的。“中国现在是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的力量，不是破坏力量。中国发展得越强大，世界和平越靠得住。……我们制定中国的国策，同样也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123]因此，中国绝不当头，永不称霸，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人民一边，“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谁搞霸权就反对谁，谁搞战争就反对谁。……中国不打别人的牌，也不允许任何人打中国牌，”[124]“现在树立我们是一个和平力量、制约战争力量的形象十分重要，我们实荷上也要担当这个角色。”[125]

2. 发展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

从经济角度来说，带有全球性战略的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邓小平认为：“改变国际经济秩序，首先是解决南北关系问题，同时要采取新途径加强南南之间的合作。”[126]

一是要开展南北对话。邓小平在1984年5月29日会见巴西总统菲格雷多时指出：北方的发达国家越来越富，相对的是南方的发展中国家越来越穷。“南北问题不解决，就会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障碍。解决这个问题当然要靠南北对话。”[127]1984年10月31日，邓小平在会见缅甸总统吴山友时进一步指出：“南方要改变贫困和落后，北方也需要南方发展。南方不发展，北方还有什么市场？”[128]欧美国家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资本要找出路，贸易要找出路，市场要找出路，不解决这个问题，发展与再发展就要受到限制。很难说12亿人口的发达国家的继续发展能够建筑在30多亿人口的继续贫困的基础上。第三世界的大部分国家处于极其贫困的状态，他们的经济问题不解决，就会影响发达国家的继续发展，“总之，南方得不到适当的发展，北方的资本和商品出路就有限得很，如果南方继续贫困下去，北方就可能没有出路。”[129]可见，南北对话的关键在于，北方的发达国家要拿出钱来帮助南方的贫困落后国家发展经济，才能更好地继续发展自己的经济。[130]

二是要开展南南合作。“单靠南北对话还不行，还要加强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合作，也就是南南合作。第三世界国家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合作，可以解决许多问题，前景是很好的。”[131]“南南合作还有一个意义，可以推动南北合作。”[132]

三是中国的发展将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中国如果想在世界上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前提是快速发展高科技领域。对此，邓小平明确地指出：“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133]

四个现代化，关键的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正如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指出的：“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科学管理，是提高经济效益的决定因素，是使我国经济走向新的成长阶段的重要支柱。”[134]“科学技术进步和管理水平的提高，……是关系民族振兴的大事。”[135]

改革开放16年来，中国的科技领域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从而加速了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中华大地出现了一派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与腾飞，中国对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发挥着日益重要的影响，中国对于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国际局势正起着日益重大的

作用。

我们将继续努力“在争取和平的前提下，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36]“我们的目标是，到本世纪末人均达到八百元。……它意味着到本世纪末，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一万亿美元。……日子就会比较好过。……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再发展三十年到五十年，我们就可能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137]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她的持续稳定发展无疑将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较大的贡献。

中国正在成为世界的中国。

三、邓小平和平外交战略的意义

邓小平的和平外交战略主要是通过政治的形式，决策的形式，制定政策的形式，以及对国际国内重大问题的分析与看法等方式表达的，其特点是：简明、明确、包容性大、针对性强、内涵丰富深刻。其深远的意义如下：

历史意义：邓小平作为一个大国的领导人，不仅着眼于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而且以其宽广有思想视野回答了一系列当今世界的国际性的、长远的、全局的战略问题。其中包括战争与和平、发展与稳定、“南南合作”、“南北对话”等重大国际问题。这些问题能否解决和如何解决，都将对当今世界乃至人类文明的现在与未来产生重大的影响。

理论意义：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不仅敏锐地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和契机，而且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理论上表现出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和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巨大勇气，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做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

实践意义：邓小平作为一个以务实而著称于世的中国领导人，他的和平外交战略已成为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的指导思想，尤其成为我国正确处理外交关系，参与国际事务，包括在经济上、文化上等全方位的国际交往与合作等等的行为准则。16年来的实践已充分证明了邓小平和平外交战略的正确性。随着历史的前进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邓小平和平外交战略将显示出更灿烂的光彩，它的价值将会更充分地展示出来。

（作者是联合国世界和平工作中国研究院中美文化研究所所长）

注释：

[1][8][9][10][11][12][12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4—105页。

[2][3][4][5][9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6—127页。

[6][7][91]《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3页。

[13][14][15][18][19][34][37]《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页。

[16]《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7页。

[17][10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3页。

[20] [88]《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30页。

[21][2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9页。

[2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7页。[24]《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6页。

[25] [3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

[26]《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0页。

- [27]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1页。
- [28]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1页。
- [29][35]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80页。
- [30]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9页。
- [31][32]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2页。
- [36]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3页。
- [38] 《中国改革开放十五年》改革出版社，1994年，第217—246页。
- [39]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1995年第2期，第3页。
- [40] 《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述专题摘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版，第304页。
- [41] 《人民日报》1970年2月1日。
- [42] 《瞭望》周刊海外版，1987年3月30日。
- [43]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0页。
- [44]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8页。
- [45][47]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8页。
- [46]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0页。
- [48][49]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9页。
- [50][51][52]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0页。
- [53][54]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87—88页。
- [55][56][57]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9页。
- [58][126][134]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9—20页。
- [59]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81页。
- [60][61][62][63][101][108][122]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82页。
- [64][79][105][106]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82页。
- [65]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1页。
- [66][67]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83页。
- [68][69] [71][72] [78][87] [113][115]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4—295页。
- [70]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2页。
- [73][74]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3页。
- [75][129]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6页。
- [76]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0页。
- [77]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3页。
- [80][81]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69页。
- [82]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0页。
- [83][84]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31—333页。
- [85][86]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0页。
- [89]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页。
- [90]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9页。
- [92]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4页。
- [94][107][124][125]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8—129页。
- [95]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84页。
- [96]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7页。
- [97]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5页。

- [98]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84—285页。
- [99] [100]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321页。
- [102]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83页。
- [104]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84页。
- [109]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89页。
- [110][128][132]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6页。
- [111][112]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9页。
- [114][119]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6—257页。
- [116]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页。
- [117]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7页。
- [118]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06—407页。
- [120]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3页。
- [121]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3页。
- [127][131]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6页。 [133]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9页。
- [134]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版第16页。
- [135] 同上书，第16—17页。
- [136]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7页。
- [137] 同上书，第57页。

邓小平与打开中美经贸关系新局面的进程

宫 力

中美建交之后，邓小平把发展中美之间的经济贸易关系放在战略的高度加以认识，不仅为国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吸引了大量的资金和技术，而且为稳定中美关系的大局构铸了一个新的支点。他在打开中美经贸关系新局面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远见卓识，以及善于把握历史机遇的娴熟本领，给人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的经济贸易关系起源于 1972 年，当时毛泽东和美国总统尼克松刚刚在北京举行了历史性的会面，中美关系有所缓和。逐步发展两国间的经济贸易关系开始提上两国政府的议事日程，中美上海公报曾明确指出：“双方把双边贸易看作是另一个可以带来互利的领域，并一致认为平等互利的经济关系是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的。他们同意为逐步发展两国间的贸易提供便利。”[1]在此之后，中美经贸关系虽然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总的来说，由于中美关系尚未全面正常化，发展中美贸易还存在许多障碍，再加上中国国内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对发展对外经济贸易的重要性还缺乏认识，因此中美之间的贸易额一直增长不快，直至 1978 年底，中美双边贸易总额还不足 10 亿美元，这与两个大国在国际上的地位相比是极不相称的，随着邓小平奇迹般的第三次复出，改变这种局面的历史重任就责无旁贷地落到了他肩上。

1978 年 12 月，在邓小平和美国总统卡特的亲自拍板下，中美两国政府排除障碍同时公布了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中美两国在这一时刻宣布建交。固然有对付当时苏联威胁的因素在起作用，但除此之外，经济战略方面的考虑也是不应忽视的，从中国方面来说，打倒“四人帮”之后，国内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对外开放，需要扩大对外经济贸易，需要学习和借鉴象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的经验和科学的管理方法，并从美国那里取得发展经济所缺少的资金和技术，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全党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来，与中美建交、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几乎是同步，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1979 年 1 月 31 日，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在对美国广播电视界谈到他访问美国的三个使命时曾经指出其中有一项就是要“了解美国人民，了解你们的生活，了解你们建设的经验，学习一切对我们有用的东西。”[2]邓小平还说：“我们期望发展我们之间的政治、经济、科学和技术文化以及其他领域的关系能有广阔的前景。”[3]这番话说明了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同中美经济贸易关系发展之间的确有一种有机的联系。从美国方面来说，中国这样一个巨大的市场也是具有很强的吸引力的，在中国为实现现代化而积极引进西方发达国家的技术和设备的情况下，美国也有意通过两国关系正常化来推动中美经济贸易关系的发展。这样中美建交伊始，双方开始为克服发展双边贸易中存在的障碍，尤其是为早日解决最惠国待遇问题，进行了艰辛的努力。

1979 年 1 月 2 日，邓小平在北京会见美国国会众议院银行、财政和城市事务委员会访华团，在谈到中美发展经济贸易关系时，邓小平指出：中美贸

易有广阔的前景，美国科技水平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竞争力比包括日本在内的一些国家都强一些，但还有一些障碍，既然两国关系正常化了，这些障碍就应排除，比如最惠国待遇问题如能解决，障碍就减少了。

随后，邓小平于 1979 年 1 月 29 日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为期一周的正式国事访问，邓小平访美的目的除了同卡特总统就紧迫的国际局势交换意见之外，就是要全面推进中美在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为中国刚刚兴起的改革开放事业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1 月 30 日邓小平在美国外交政策协会等团体举行的招待会上指出，中美建交“为促进中美人民的了解和接近，为进一步发展两国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开辟了新的广阔的前景，今天中国正在加快现代化建设。我们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中美两国之间的经济往来，对于双方都有好处”。[4]正是本着这种精神，在访问期间，邓小平副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卡特总统代表美国政府签署了具有重要意义的中美科技合作协定和文化协走；方毅副总理、普雷斯总统科学顾问签署了两国在教育、农业、空间方面的合作的谅解的换文；方毅副总理、施莱辛格能源部长签署了两国在高能物理方面的合作协议；黄华外长、万斯国务卿签署了关于建立领事关系互派和互设总领馆的协议。中美双方还同意为互派常驻新闻记者提供方便，并同意签订贸易、航空、海运协定，双方将就此进行商谈，这些协定的签订有利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也有利于美国加强同中国的交流，它们是中美之间 30 年来签订的第一批政府对政府的协定，标志着中美之间的合作展开了一个新的时代。

在邓小平访美期间，中美双方还就解决两国被对方冻结征用的资产问题、签订长期贸易协定、航空协定和海运协定等问题交换了意见。邓小平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到最惠国待遇问题，他说，你们不解决最惠国待遇问题，我们偿还能力就受限制，最惠国待遇不只是中国的需要，也是美国的需要，而美国的需要并不比中国小。这番话点明了最惠国待遇问题是发展中美贸易急需需要解决的要害问题。

1979 年 2 月 24 日至 3 月 4 日，美国财政部长布卢门撒尔访华。中美双方从 3 月初开始进行贸易谈判，但进展缓慢，其主要原因是美国国内在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上有分歧。国务卿万斯等人主张对中国和苏联应“一视同仁”，谨慎从事，两头都要照顾，都应该给予最惠国待遇。万斯等人的这种想法显然是怕得罪苏联，但布热津斯基认为，由于苏联当时在动乱的伊朗煽动反美并支持越南在东南亚扩张，因此，参议院必将拒绝给苏联以最惠国待遇，这样一来也将殃及中国，因此应分别解决。1979 年 4 月，为了防止中美关系倒退，布热津斯基一再向卡特总统进言，必须对中国采取广泛的主动，特别应在最惠国待遇方面给予通融。[5]

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商务部长克雷普斯于 1979 年 5 月 6 日至 15 日率团访华，再一次与中国方面商讨中美经济贸易实质性问题，在开始谈判时，双方存在着不少分歧，但通过共同的努力，终于克服了种种困难，达成了一致意见，并于 5 月 14 日草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之间的第一个贸易协定。协定规定，为了使两国贸易关系建立在非歧视性基础上，缔约双方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双方同意，采取一切措施，促进两国贸易持续和长期的发展。在克雷普斯访华期间，中美双方还正式签署了 30 年前遗留下来的关于解决资产要求的协议和互办贸易展览的协议；两国有关部门签署了大气、海洋和渔

业、计量和标准、科技管理和科技情报等四项科技合作议定书；两国有关人员就海运和航空协定进行卓有成效的讨论，为签订这两项协定作了必要的准备；两国的企业管理人员也开始了有益的接触。克雷普斯到达北京时曾说，她这次来访的目的是：发展美中经济关系，扩大两国科技合作和建立两国企业管理专家之间的联系。现在这位美国部长的访问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中国副总理邓小平于5月10日会见了克雷普斯部长，并就进一步扩大中美之间的经济贸易关系交换了意见。双方表示要为保持中美经济贸易关系发展的势头作出努力。

二

随着中美贸易协定的草签，最终解决最惠国待遇的问题已提上议事日程。几年来，在中美双边贸易关系方面，中国的逆差越来越大，这种状况如不改变，势必影响两国贸易发展的势头。而解决最惠国待遇问题，既有利于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同时也利于中国从美国的进口。这一问题已引起了中美两国政府的注意。

1979年7月7日，中国对外贸易部部长李强和美国驻华大使伍德科克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北京正式签署了为期3年的中美贸易协定。根据这一协定，中美双方将在关税、手续税费用方面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向对方的商号、公司等贸易组织提供最惠国待遇，相互对等地保护专利、商标和版权，允许建立在本国领土内的对方的金融机构，根据最惠国待遇的原则开展业务，协商解决双边贸易问题等。这是一个重要进展。

然而好事多磨，中美刚刚签订贸易协定，美国国务院的一些人就主张把这个协定推迟到美国同苏联关系走上正轨时再提交国会批准，以免中美苏三角关系失衡。这种把给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与美国对苏关系联系起来的观点在美国政府中引起了争论，美国政府中有不少有识之士指出，在苏联拒绝对苏联的移民入境作出保证之后，推迟向中国提供最惠国待遇简直就是因为苏联顽固而去惩罚中国。这是不公平的。卡特总统经过慎重考虑于7月27日决定，限制战略武器协议在参议院一有进展便采取行动给中国最惠国待遇，他还接受蒙代尔副总统的建议，即在各种双边问题上都把中国与苏联明确区分开来。随后，经蒙代尔亲自向万斯国务卿呼吁，万斯应允宣布中国是一个友好国家，并允诺在1979年底以前建议给中国最惠国待遇。蒙代尔在1979年8月访华时，将这一基本决定告诉了中国方面。

此时，中国政府也在关注着这一问题的进展。1979年8月24日，邓小平副总理会见了正在访华的美国民主党参议员杰克逊时提到了这一问题。事后杰克逊在北京对报界说，中国领导人表示，美国推迟批准中美贸易协定，将会对中美关系产生不利影响。

1979年10月22日，中国对外贸易部部长李强访问美国，同美方进一步商讨中美贸易协定和纺织品输美定额问题。10月23日，美国总统卡特终于将中美贸易协定送交国会，签署了一项公告，指出根据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中国有资格获得最惠国待遇。同一天，美国商务部长克雷普斯在记者招待会上代表卡特总统正式宣布，中美贸易协定已提交美国国会要求批准，她还说：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间贸易关系协定包括双边贸易的条款，其中也有为两国进出口贸易提供不歧视的互惠待遇，即最惠国待遇的规定。第二

天，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分别以 74 票对 8 票和 294 票对 88 票批准了中美贸易协定。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厄尔曼称，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中美关系的转折点。

1980 年 2 月 1 日，中国外交部和美国驻华大使馆在北京互换照会，确认各自已经完成的必要的法律手续，从而使中美贸易协定即日起开始生效。协定规定：为了使两国贸易关系建立在非歧视性基础上，缔约双方对来自或输出至对方的产品应相应给予最惠国待遇。协定有效期为 3 年。协定规定：缔约任何一方如未在有效期满前至少 30 天将终止协定的意愿通知对方，则本协议有效期延长 3 年。此后仍可依此方法延长。

中美贸易协定的签定和正式生效，中美之间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是中美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为两国经济贸易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道路。在这之后，中美贸易有了迅速的增长，1980 年中美贸易总额达到 40 亿 8 千多万美元。相当于中美建交前 1978 年的 4 倍多。其中中国从美国的进口额为 38 亿 3 千多万美元。输入产品主要以农产品为主，包括谷物、棉花、大豆，此外还有合成纤维、化工产品等；中国向美国的出口额为 9 亿 8 千万美元。输出产品主要是纺织品、矿物原料等。这种状况是由于当时中美两国的经济需求所决定的。当时中国的农业经过 10 年“文革”尚未恢复元气。需要进口一些农产品以解燃眉之急；而美国自 60 年代后期纺织业逐渐萎缩，不得不从南朝鲜、台湾、新加坡等地大量进口，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纺织品打入美国之后立即成为一个有力的竞争者。

中美两国政府及其官员对于中美贸易的发展也给予了有力的支持。1980 年 8 月 31 日至 9 月 28 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率领中国机器制造业代表团对美国进行了长达四周的考察活动。在此期间，薄一波以副总理身份主持了 9 月 12 日在旧金山举行的中国经济贸易展览会开幕式，并以中美联合经济委员会中方主席的身份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参加了 9 月 16 日至 18 日在华盛顿举行的中美联合经济委员会第一次会议。9 月 17 日，薄一波副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卡特总统代表美国政府在白宫玫瑰园正式签署了中美民航协定、海运协定、纺织品协议和领事条约。

这三项协定和一个条约的签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民航协定将使中美两国之间结束 30 多年来没有例行定期直航班机的历史；海运协定将使美国的港口向中国的商船开放，而美国船只也将能够进入中国的停靠港口，从而进一步增加中美之间的贸易和商业机会；纺织品协议将使中国的纺织品更加有秩序地在美国推销，这不仅有利于中国扩大出口，也有利于美国的零售商和消费者；领事条约阐明了领事官员为两国公民提供服务的职责，将确保在对方国土上的本国公民的权益。以上的这些协定是中美建交以来，中美两国经过非常艰辛的共同努力才得到的，它们将造福于中美两国人民。

三

在中美贸易协定签定和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解决之后，邓小平又把发展中美经贸关系的聚焦点转向技术转让问题，这是中美之间的又一个棘手问题，同时也是一个事关大局的关键性问题。

美国在对华技术转让问题上曾一度实行严格的限制，中美建交之后美方在此问题上虽然有了一定程度的松动，美国商务部于 1980 年 4 月把对中国出

口从“Y”类调整为“P”类)，但步子迈得不大。为了取得美国的先进技术为国内的现代化建设注入新的动力，邓小平利用多种场合对美国朝野做工作，敦促美方在放宽高技术对华出口方面迈出更大的步伐。1982年9月8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指出，我访问美国时双方签订了科技合作的协定，但是中美建交以来，美国没有把一样比较象样的先进技术转让给我们。我同黑格谈过，他也感到惊奇。就连联合国帮助我们普查人口的电子计算机也谈了好几年，拖到去年才最后批准。美国过去长期把中国放在‘Y’组，26个字母，是倒数第二个。以后稍微改了一下（改成‘P’组）。邓小平认为，这种滞后的状况应尽快改变。

在中国领导人的一再要求和敦促下，美国作出了回应。1983年6月21日，美国政府正式宣布对华技术转让的新规定，将中国从美国出口管制分类的“P”组改为“V”组，即列入与美国友好的非盟国一组内。这是一重要的步骤。邓小平抓住有利时机，继续对来访的美国政界人士“吹风”。1983年8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民主党参议员杰克逊时表示，在技术转让问题上，美方有些松动，我们表示欢迎。但松动到什么程度，也还要看。邓小平还说，在技术转让问题上，重要的是中美能成为什么样的朋友，是普通朋友，还是比较好的朋友。

在此之后，美国方面逐步放宽了高级技术对华出口限制，由此促进了美国向中国的出口。其中高级技术的对华销售额比重有了较大的增长。而这对于促进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从1984年起，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的高速发展阶段，中国的经济改革日益引起美国的兴趣。中美之间以经济贸易为基础的交流与合作大大促进了双边关系的全面展开。到1988年，中美贸易总额首次突破100亿大关，美国已成为中国的第三大外国贸易伙伴；美国在华投资项目已累计达630个，协议金额34亿美元，占外国在华投资的14%。中美之间的科学技术合作和文化、教育、新闻以及军事交流也有了长足的进展。

中美经济贸易的蓬勃发展成为支撑中美关系大厦的一个新的、强有力的支点。中国方面把吸收美国的资金技术看成是实现现代化的大局，美国则把开拓中国市场看作是振兴美国经济的重要目标。中美两国在经济上的互相需求是显而易见的。1989年以后，虽然中美关系磕磕绊绊，但两国间的贸易却是以每年20.7%的速度增长，1994年，两国的贸易额已高达354.3亿美元，美国在华企业已达1.2万个，成为中国最大的外国投资者。随着近年来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迅速上升，经济优先成为中美两国领导人的共识，在这种情况下，中美经贸关系的持续发展对稳定中美关系的大局产生了积极和深远的影响。

（作者是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教授、法学博士）

注释

[1]《中美关系资料选编》（冬梅编），时事出版社1982年版，第7页。

[2][3]《世界知识》杂志，1979年第5期。

[4]《人民日报》1979年2月1日。

[5]布热律斯基：《实力与原则》（中译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

年，第 74D—742 页

邓小平的时代观、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

冷 溶

对时代的判定和对社会发展阶段的判定，是理论提出的基础，是制定方针政策的依据。因此，时代问题应该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要回答的首要问题之一。列宁首先正确回答了时代问题，才提出俄国革命一系列理论，创立了列宁主义；毛泽东也是从中国革命所处的时代和中国社会发展阶段出发，提出新民主主义理论，创立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 20 世纪 80 年代的产物，是正确分析中国社会发展阶段和当代世界基本矛盾、时代特征的结果，党的十四大报告在阐述这一理论形成原因时，首先指出，它“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

现在，我们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进行了充分讨论，但对时代的研究、主要是对时代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产生的关系的研究显得不够，往往把它等同于外交政策，习惯于按照“先内政后外交”的顺序，把这个问题放在后面来阐述。阐述的位置或许并不重要，关键要把它的理论意义，突出地强调出来。

时代问题在理论上的一个难点，是列宁的时代观与邓小平的时代观的继承发展关系。这个问题不弄清楚，一系列的理论观点在逻辑上就不彻底。这里引用过去不被人注意的邓小平的一段话，或许能对解决这个问题有点启示。

这段话刊登在新出版的《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的《发展中美关系的原则立场》一文中。邓小平针对美国一些人认为中国政府所信奉的意识形态旨在摧毁像美国这样的国家的观点，指出：“这样的观点至少不是八十年代的观点，也不是七十年代的观点，而是恢复了六十年代以前的观点。”[1]这段话说明，我们观察世界的角度在 60 年代前、70 年代、80 年代都不同。60 年代前，我们按意识形态的不同，将世界分为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广大的“中间地带”国家都分别属于这两大阵营。70 年代，我们按照毛主席三个世界的理论把世界上国家分为三个部分。80 年代后，我们发展了三个世界理论，提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发展是核心问题的新理论。

下面着重谈谈邓小平同志关于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思想的形成过程。

“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主题”、“两个转变”的思想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完整提法，是在 80 年中期才形成的。这是根据世界形势的客观变化得出的科学结论。

在 80 年代中期以前，世界上战争与和平的形势虽时紧时缓，但总的来说是趋于紧张的。而在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世界正处在最紧张的状态中，是两霸争夺世界最激烈的时期。苏联入侵阿富汗，策动越南入侵柬埔寨，都发生在那个时候。全世界都估计到，80 年代是个危险的年代。80 年代的开端就不好。“国际上很难预料会发生什么问题，但是，可以说是非常动荡、充满危机的年代。”[2]我们内部甚至估计，两霸战争布局在 80 年代中期完成，因此那时候可能爆发世界战争。我们提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就是要破坏两霸、特别是苏联霸权主义的全球战略，推迟战争爆发，使我们赢得长一点和平时间，集中精力搞建设。

我们在强调战争危险的同时也看到，由于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反对，美苏两霸的战略布局进行得很不顺利，第三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是使世界向着和平方向发展的最重要因素。邓小平指出：“我们有信心，如果反霸权主义斗争搞得好，可以延缓战争的爆发，争取更长一点时间的和平。”[3]而后来国际形势又发生了出人预料的变化。苏联的内外政策发生重大改变，苏联“南下战略”的受挫，与美国长期军备竞赛使经济上终于支撑不住，国际上和平力量的反对，国内改革要求的加强，都使苏联不得不改变其对外政策。这一改变的迹象在勃列日涅夫后期的1982年已出现。当时邓小平敏锐地指出，苏联有变化。以后经过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到戈尔巴乔夫，这一变化愈加明显。在这种情况下，美苏关系开始缓和，整个世界局势出现了由对抗转为对话，由紧张转为缓和的总趋势。也就是在这时，我们开始逐渐改变对战争与和平的看法，即“两个转变”的第一个转变。比如，邓小平同志1982年8月21日会见德奎利亚尔时强调：“战争的因素在增长，但制止战争的因素也在增长。”[4]再如，改变了对裁军谈判的态度，明确表示“我们是赞成谈判的”。[5]

随着美苏关系的变化，中美、中苏关系出现微妙变化，开始了“两个转变”的第二个转变。

基于对苏共同的战略考虑，中美自70年代形成一种“一条线”的关系。1979年初中美建交，但此后却长期处于冷淡状态。其原因，主要是美国认为中国为对付苏联威胁而有求于美国，因此，即使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冒犯中国，中国也会吞下去。中美刚一建交，卡特政府就提出《与台湾关系法》。西方的一些国家也持这种看法。向来不屈服于任何压力的中国政府，对此相应采取强硬态度。邓小平在1982年9月十二大开幕词中强调：“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6]

中美关系冷淡，中苏关系却开始缓和。从1982年起中苏恢复了副外长级谈判，两国也逐渐加强了经济文化交往。以后，根据苏联的变化，邓小平提出中苏间的三大障碍可以从一个问题上开始，即越南从柬埔寨撤军。改变了三大障碍一个不解决，中苏关系就不可能解决的态度，表现了灵活性。

中美、中苏关系的变化，使我们特别强调一贯坚持的独立自主政策。1982年9月的十二大政治报告中，突出地谈到这个问题，同年中央作出在外交上坚持独立自主的决定，邓小平说：“我个人爱好打桥牌，但中国在政治上不爱好打牌。”[7]他强调：“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8]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谁搞霸权主义就反对谁。在1984年10月的一次谈话中，邓小平讲得更具体，他说：美国总想与中国搞战略关系，不是过去没搞过。毛主席的时候搞过，但现在我们反对霸权主义包括美国。现在决不能与美国搞战略关系，我们既不与苏联搞，也不与美国搞，我们是独立自主。对美我们总保持批评态度。裁军我们讲两个，不但苏联裁，美国也要裁。美国也搞霸权主义，不光苏联搞。

这里要说明，独立自主是我们一贯的外交方针。邓小平说：“不仅今天如此，建国以后，在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领导我们国家的时候就是如此。”[9]在“一条线”时，我们也是坚持独立自主的。

美苏关系，中美、中苏关系的变化，使人们从1982年起对整个世界形势的看法和外交方针发生了重大改变。1984年至1995年，这一认识趋于成熟。

1984年10月31日，邓小平第一次提出和平问题和南北问题是两个“带有全球性、战略性和关系全局”的问题的思想。1985年3月4日，他明确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问题”的概念。同年6月4日，他在军委座谈会上，系统地阐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和对外政策的“两个转变”的思想。他在这一年会见罗马尼亚客人时说，你们1982年来时我们还没有转变，现在完成了这个转变。也就是在这段时间，我们对外政策的正式提法，由“和平的外交政策”改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强调“独立自主”和“和平”这两方面内容，这个提法一直沿用至今。

邓小平在阐述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问题时，指出：“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这是一个重要判断。发展是核心问题的观点反映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问题”思想的本质，应着重强调。

发展问题由来已久，它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兴起，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经济力量相伴随。第三世界原来多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二战后，它们先是以政治斗争为主，争取民族解放，国家独立。以后，经济斗争成为主要问题，这场斗争在70年代有了重大进展，1974年召开的第六届特别联大会议就是专门讨论这个问题的。在这次会议上，阿尔及利亚等国针对联合国计划开发署制订的援助不发达国家两个十年计划均已失败，富国越来越富，穷国越来越穷，世界经济秩序极不合理的状况，提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主张，邓小平同志在那次会议上作了系统阐述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的著名讲演。人们也许忘记他讲演中的另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主张。他说他当时“用了很长时间讲这个问题”。可见邓小平同志很早就关注这个问题。

发展问题过去与东西方之间紧张的冷战关系交织在一起，为战争与和平的突出矛盾所掩盖，而进入八十年代后，随着东西方关系的逐渐缓和，战争危险减弱，发展问题突出出来，成为世界的核心问题。当今世界上出现的许多矛盾、冲突的问题，都与这个问题有关，它已成为我们观察世界的出发点，是决定内外政策的重要依据。

我所以提出注意“发展是核心”的思想，正因为东西矛盾与南北矛盾实际上长期存在，只是重点发生了变化，不强调这一点就不能反映邓小平“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问题”思想的本质，也不能正确把握当今世界变化的关键。

基于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这里简要概括邓小平的三个基本观点。

第一，“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10]邓小平同志认为，发展问题不只是发展中国家自己的责任，也是发达国家的责任。因为发达国家面临一个再发展问题，不解决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发达国家的再发展也解决不了。

第二，解决发展问题的一个办法是加强南北对话。双方要互相沟通。北方发达国家有责任帮助发展中国家，南方发展中国家也应积极与发达国家建立联系，邓小平同志就要求我国要“加强同欧洲的联系”，注意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合作。

第三，第三世界的发展关键靠自己的努力，靠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南南合作”。邓小平同志说：“历史证明，越是富裕的国家越不慷慨，归根到底，我们要靠自己来摆脱贫困，靠自己发展起来。主要靠自己，同时不要闭

关自守，可以多方面找朋友。” [11]他强调：“我们欢迎发达国家同我们合作，也欢迎发展中国家相互之间的合作，这后一种合作是非常重要的。” [12]他提出，我们的对外开放包括三个大方面，强调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开放。他在1984年10月31日第一次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问题”思想时就是从这个角度入手的。

邓小平同志关于外交和国际战略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和“不当头”的观点。

邓小平在1978年5月7日的谈话中指出：“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永远不能称霸。”将来中国发展了，“如果中国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就不能实行霸权主义，仍然属于第三世界。如果那时中国翘起尾巴来了，在世界上称王称霸，指手画脚，那就会把自己开除出第三世界的‘国籍’，肯定就不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 [13]1979年3月30日他又指出：“毛泽东思想在世界上是同反霸权主义的斗争分不开的，而打着社会主义旗号实行霸权主义正是取得了政权的马列主义党背叛社会主义原则的最显著标志。” [14]他在1986年4月4日又指出：“十亿人的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十亿人的中国坚持和平政策，做到这两条，我们的路就走对了，就可能对人类有比较大的贡献。” [15]1989年10月26日他进一步提出：“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国家不能侵犯别国的利益、主权和领土。” [16]

这里，邓小平将坚持和平与坚持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社会主义必须是主张和平的。

社会主义本来是和平的象征。5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在世界上建立了“和平、民主、富强”的形象，但后来这一形象被破坏了。这与苏联等国家长期推行霸权主义政策有关。在历史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确实批判过“和平的社会主义”，对导师观点的片面理解，使我们不愿意过多强调和平。长期严峻的国际形势，西方国家的敌视态度和颠覆企图，也谈不上和平，加上我们自己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左”的认识，都使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是否要强调和平这一点的认识发生扭曲。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重新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这不仅包括社会主义要发展生产力，要改革，也包括强调坚持和平，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应该指出，毛泽东也是一贯主张和平政策的，但是把坚持和平与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这是邓小平的重要观点。他认为，是否坚持和平是区分真假社会主义的一个标志，是重新正确认识、并有重大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和内容。

与“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相联系，是邓小平同志永不称霸，决不当头的思想。人们已知道，邓小平在1990年12月24日与几位中央同志谈话提出了“不当头”的观点。但从新发现的材料看，邓小平在1982年8月21日谈话中就已经提出。他说，中国只是第三世界的一员，力量有限，作用也有限，不能当头头。“这是一种真实的政治考虑。” [17]这个观点可以追溯得更早，在70年代中期阐述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时就已提出，可见，这一观点并非是在两极格局解体后的形势下的一时的策略考虑，而是邓小平同志处理国际事务一贯坚持的原则立场，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必然要求。

(作者是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研究组副组长、研究员)

注释

- [1]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78页。
- [2][3]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41页。
- [4][5]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16页。
- [6]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页。
- [7][9]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15页。
- [8]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7页。
- [10][11][12]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82页。
- [13]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12页。
- [14]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72页。
- [15]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58页。
- [16]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8、329页。
- [17]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16页。

邓小平国际局势策略思想研究

周春元

一、学习和研究邓小平对国际局势要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的策略指导思想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意义

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已经诞生 45 周年了。它面对的外部环境是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动时期，新旧世界格局正在调整交替，国际社会各种力量正在重新组合，特别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出现大的曲折，其变化之大，影响之深，出人预料，引起各国政府、政党和人民的普遍关注。

在当代世界风云变幻、国际局势错综复杂的环境里，中国现在和今后怎么办？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要采取什么对策？中国人民应有怎样的思想准备？这是全国上下日夜都思考的大问题。

邓小平同志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设计师，为十二亿中国人民沿着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路线导航。他立足中国，放眼世界，高瞻远瞩，提出了一个对国际局势的策略指导思想，为我国制定对外方针政策奠定了可靠的思想基础。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正确看待国际局势的这一策略指导思想，“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1]这 3 句话，12 个字，是有政治涵义的，他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朴实语言表达了一条有完整内容的策略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待国际局势和参与国际事务活动的一个指导方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我们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把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好，要把握时机，充分利用有利的国际环境，坚持改革开放，加速发展经济，加强社会稳定，就应进一步深入学习、研究和应用邓小平同志这一光辉策略思想的指导方针。今天，我们研究邓小平同志关于和平与发展战略思想，就不能不研究邓小平关于国际局势这一有战略意义的策略指导思想。

二、冷静观察是认识国际局势的正确途径和起脚点

所谓冷静观察，是指头脑清醒地观察国际局势。就是说，我们不是头脑发热、感情用事地观察国际局势。观察国际局势之所以要冷静，是因为只有头脑冷静，才能正确观察国际局势，从而防止得出不正确的结论，避免导致错误而有害的行动。

我们知道，国际局势的各种现象和各种力量是错综复杂的，变化和发展是互相制约的，有些现象和本质又不易分清和识破，对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也很难一时分辨，特别是对一些国际活动的突发事件又难定性质，难识真伪，甚至有的具有进步和消极的两重性。在这种情况下，不经过冷静观察，就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明确主流和支流，分清敌人和朋友，找出有利和不利因素。所以，冷静观察是深入了解国际局势的必要途径和起脚点。邓小平同志讲到观察国际局势时坚定地指出：“要冷静、冷静、再冷静。”[2]当然，遇到问题要冷静，并不是对所有的人都容易做到的，但是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和政府，特别是其领导核心是完全需要和应该做到的。冷静既是观察国际局势的正确途径和起脚点，又是正确认识国际局势的必然要求和必要条件，能冷静观察了，就有可能进一步做到善于观察，即全面地、联系地、发

展地和本质地观察。

第一，在冷静的条件下观察国际局势，就要全面地观察，全面观察就要放眼于大局，要始终把握邓小平同志关于“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3]的战略思想，尽管世界风云变幻、国际局势复杂，我们仍要把握当代和平与发展的世界主流，力争长期保持和不失时机地利用对于我国有利的和平国际环境，以尽快地发展我们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

第二，在冷静的条件下观察国际局势，就要联系地观察。联系地观察就要立足于国内，分析中国发展和国际局势变化的关系，始终坚持从爱国主义立场出发，把维护祖国独立、主权完整和国家安全放在首位，坚定地捍卫中国人民的最高利益。邓小平同志指出，“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4]“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5]“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6]

第三，在冷静的条件下观察国际局势，就要发展地观察。发展地观察就要着眼未来，要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不为暂时的挫折所困惑，不为某些假象所迷惑，特别是不能把当前国际局势中的一切都看成漆黑一团，看不到希望，看不到光明。失掉信心，就失掉目标，就失掉一切。邓小平同志指出：“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凝聚力，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一切。”[7]

第四，在冷静的条件下观察国际局势，就要本质地观察。本质地观察就要抓住根本，分清敌、友、我的相互关系，顶住帝国主义的霸权势力和以武力相威胁的强权政治，它们的根本目的就是企图达到统治全世界，它们在国际上破坏世界和平、损害世界发展以及干涉别国内政的侵犯别国主权的一举一动，都是和它们的根本目的分不开的。它们利用和平演变的方式引诱社会主义国家逐步走向资本主义道路，甚至利用煽动内乱的手段来颠覆社会主义国家，其根本目的也就是企图变社会主义国家为资本主义国家，妄图实现统治全世界。因此，我们要认清自己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和重责，要立足本国，放眼世界，展望未来，抓住根本，团结世界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积极因素，把维护世界和平和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进步事业和正义斗争进行到底。这是中国人民的战略利益所在，也是世界人民的一致愿望和普遍要求。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现在是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的力量。”[8]“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也就是维护世界和平。”[9]

三、稳住阵脚是把握国际局势的科学判断和立脚点

所谓稳住阵脚，在军事上指率领作战的人站在战斗队列的最前方要沉住气，临阵不慌，即压住阵脚；在政治上一般指在斗争中的领导力量，在领导革命和建设时，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要沉住气，勿轻举妄动，即稳住阵脚，也就是说，这里指的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不受世界风云变幻、国际局势动荡的影响，而继续坚持沿着既定的路线向前进，即所谓稳住阵脚。

能不能稳住阵脚，对于执政的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特别是其领导核心，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至关重要。稳住了阵脚，党和政府在国际局势动荡面前不受影响和干扰，站稳立场，团结一致，坚定地沿着“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继续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稳定社会，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行到底，在世界发展中作出贡献，在国际竞争和挑战中立于不败之地。如果稳不住阵脚，在国际局势急剧变化面前，特别是在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出现曲折面前，党和政府及

其领导核心受到影响和干扰，惊慌失措，思想混乱，组织涣散，政治动摇，不坚持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会因此遭受挫折。所以邓小平同志在判断国际局势时指出：“中国自己要稳住阵脚，否则，人家就要打我们的主意。”[10]又指出：“第一，中国目前局势是稳定的。”[11]“第二，中国人吓不倒。”[12]“在判断中国局势的时候，这两点是必须看清楚的根本的两点。”[13]还指出：“我们是一个大国，只要我们的领导很稳定又很坚定，那么谁也拿中国没有办法。”[14]

稳住阵脚，就要正确看待人们普遍关心的几个热点问题：

第一，国际局势有一个战争问题，对于世界大战，只要苏美两家打不起来，别人没条件打，在今后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避免新的世界大战是可能的。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分析世界大战打不起来，真打起来我们也不怕。”[15]

同时也要看到局部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因为世界各种矛盾在深入发展，不少国家和地区的民族矛盾、领土争端和宗教纷争突出起来。甚至有的地方已经和正在发生流血冲突和局部战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仅要冷静观察，而且要稳住阵脚，当然，我们也不能示弱。

第二、国际局势还有一个方面是社会主义国家动乱。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发生过的动乱，它有主观和客观的多种原因，我们应该吸取教训。当它们动乱的时候，中国经过冷静观察，稳住了阵脚，坚持搞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稳定是改革开放和发展经济的保障条件，没有这一条，乱了阵脚，社会不稳定，中国就不能实现发展翻两番的目标，就不能发展社会生产力，不能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不能增强我们的综合国力，社会主义就显示不出优越性。因此，在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的条件下，首先是中国不要乱，要稳住阵脚，认真地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搞上去。邓小平同志指出：“我看总的局势是这样，唯一的办法是我们自己不乱。”[16]又指出：“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17]“别人的事情我们管不了，只讲一个道理：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变不了的。”[18]

第三，国内局势和国际局势的关系问题。对国内局势一个根本要求就是稳定。没有稳定的国内环境，什么事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邓小平同志指出：“道理很简单：中国人这么多，底子这么薄，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没有稳定的社会秩序，什么事也干不成。稳定压倒一切。”[19]

为了稳定国内局势，面对动荡的国际局势稳住阵脚，就要有全国人民的安定团结，首先是党的稳定，政府的稳定，特别是党政领导核心要稳定，这是关键。在现在就是要加强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加强和维护党中央的权威。邓小平同志指出：“关键是要形成集体领导。”[20]“现在很需要一个这么好的集体，比过去更加需要。这个集体要有个核心。”[21]“江泽民同志应该成为你们这个集体的核心。”[22]“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指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23]

第四，要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稳住阵脚。对国际局势稳住阵脚，主要是要在政治上稳住阵脚，即在实践中坚持基本路线不动摇，坚持战略部署不更改，坚决实现目标不转向。但也要解决在思想上稳住阵脚，即要做到遇事不慌，心中有数，思想坚定，信心十足，钢铁意志，在精神上要顶住。

如果在思想上稳不住阵脚，在政治上稳住阵脚就不牢固，就不可靠，就没有思想基础。在一定意义上说，在思想上稳住阵脚更重要，更是不可缺少的。

当然，在政治上、思想上稳住阵脚，还需要在组织上稳住阵脚，需要组织上的团结统一来保证，特别是中央领导核心要团结，这样，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做到全面稳住阵脚，齐心协力，行动一致才能巍然不动，泰然处之。

四、沉着应付是面对国际局势的应变对策和落脚点

所谓沉着应付，是指遇事要镇定而慎重地采取相应的措施。就是说，面对动荡的国际局势，要以冷静、稳住和沉着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采取相应的对策和办法并付诸实施，慎重从事，即沉着应付。

沉着很重要，只有沉着才能实事求是地、有把握地、有针对性地采取必要的对策和措施，应付国际局势的变化和发展，邓小平同志指出：“告诉同志们，遇事要沉着。” [24]

在沉着应付的策略思想指导下，我国对外工作采取了多方面的对策，取得重大成就，我国的国际影响日益扩大，国际地位不断提高，表现了中国对世界进步事业的贡献，我们在这方面的主要对策有：

第一，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始终是和平和发展的主要障碍，是国际局势动荡、剧变和战争的主要根源：发达国家的垄断资本和对外政策是世界发展中国家贫穷和落后的主要原因。为了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中国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维护我国的独立和主权，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是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目标。

在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中，我们的原则立场是鲜明的，有目共睹的。但又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甚至在一些问题上，有时由于客观条件的制约，在政治上实行必要的和容许的妥协。如经过和平协商达成有关协议，发表联合公报。表明我们在处理国际关系和国际问题上采用了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策略。

中国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中国自己也不称霸。而且不称霸的承诺是算数的，是永远的。表明我们对国际局势的科学判断和维护国际正义事业充满信心。

第二，建立国际新秩序是当前国际社会普遍关心的大问题。我们主张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认为国家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当作为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参与国际事务；国与国关系理应互相尊重、求同存异、平等相待、友好相处。对国与国之间的分歧和争端，应当严格按照联合国宪章和公认的国际法准则，通过协商和平解决，不得诉诸武力威胁。我们主张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不应成为发展国家合作关系的障碍，我们绝不把这些问题强加于人，也不允许别国把这些问题强加于中国。

我们也反对由少数几个国家垄断地操纵国际事务，利用各种借口干涉别国内政，侵犯别国主权。人权问题说到底是属于一个国家的主权范围内的事，我们坚决反对利用人权问题干涉别国内政。我们的这个原则立场是不会改变的。我们不怕威胁，顶住制裁，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第三，沉着应付的基本要求是把握时代的形势发展的国际机遇，争取利用国际社会客观存在的矛盾，利用一切可能的有利条件和有利时机，解决国

内问题。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握。”[25]利用矛盾和把握时机，既是沉着应付的基本要求和主要体现，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家和战略家应有的领导艺术和指导才能。

在可以利用的国际时机中，有利的条件和因素主要是：国际大环境和周边小环境都对我们有利；第三世界国家和团结合作也对我们有利；西方世界内部矛盾可以利用；原社会主义国家剧变的教训可以吸取；国际垄断势力与西方国家政府相配合，在经济上搞制裁、在人权上搞攻击、在香港和台湾问题上制造统一中国的障碍，又能激起我们发奋图强，变坏事为好事。

第四，沉着应付的根本目的是把中国的事情做得更好，中国面临着国内外的双重任务，主要是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办好。国内的中心任务和关键的问题是经济建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邓小平同志指出：“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26]还指出：我们要扎扎实实干自己的事。我们有信心把中国的事情做得更好。

为了把中国的事情做得更好，必须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针，加强和改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就是要实现伟大而艰巨的改革开放和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任务，但正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为此，关键中的关键，核心问题的核心，是把执政党的建设搞好。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对于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加强和维护党中央的权威，保证实现肩负的历史重任，把中国的事情办得更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五、对国际局势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的策略指导思想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典范

邓小平同志指出的“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这三句话，是认识过程的三个环节，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它紧密联系地构成一个完整的对国际局势的策略指导思想。冷静观察是认识国际局势的正确途径和起脚点；稳住阵脚是把握国际局势的科学判断的立脚点；沉着应付是面对国际局势的应变对策和落脚点。它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与当代国际斗争实际相结合的典范，是邓小平同志对科学社会主义战略与策略科学的一大贡献，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作者是中国政法大学政治学系教研室主任、教授）

注释：

[1][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1页。

[3][8][9]《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4页。

[4][5]《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30页。

[6]《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48页。

[7]《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90页。

[10][2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19页。

[11][12][1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6—327页。

[14][20][21]《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18页。

[15][16][17][18]《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321页。

[19]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31页。

[23]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5页。

[24]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86页。

[25]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4页。

[26]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5页。

关于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几个问题

顾德欣

邓小平同志曾多次使用“国际战略”的概念。所谓国际战略，是指主权国家在对外关系中较长时期和全局性的谋划。

邓小平的国际战略思想是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组成部分，它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提出了当今世界最重要的问题，指出了未来年代的发展趋向，以一套完整的理论和政策，开创了中国外交的新局面。学习、研究邓小平同志的国际战略思想，有助于我们全面领会和掌握邓小平的理论，有助于我们从更广阔的视野上去学习他观察和处理国际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一、邓小平同志对国际形势的战略判断

1、对时代内容的判断

对时代内容的判断指对人类社会由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全面过渡时期中特定阶段国际关系中心问题的判断。

从 19 世纪中叶开始，人类社会进入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全面过渡的历史时期。20 世纪 70 年代后，世界逐渐进入新时代，在新时代里，国际关系的中心问题是什么？世界人民面临的任务是什么？邓小平同志作出了科学的回答。他认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1]十四大报告概括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

从列宁到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世界共产党人以及中国共产党人对时代内容的基本判断是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结论是：“不是战争引起革命，就是革命制止战争。”“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

上述判断的依据是：

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 19 世纪后半叶的国际斗争实际，认为各国资产阶级在市场上斗争的同时总是联合起来对付各国无产阶级。这样，资产阶级是国际性的，无产阶级也是国际性的，无产阶级的解放条件同时是国际性的。因此，无产阶级斗争的胜利不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且会在几个主要发达国家同时发生。

列宁根据新的斗争形势，突破过去革命理论的束缚，提出一国首先胜利的思想并付诸实践。列宁设想一国胜利后迅速把无产阶级革命的火焰烧到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因此把俄国革命作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和阶梯。

在列宁逝世后的半个世纪中，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继续把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作为奋斗的国际战略目标。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根据国际斗争形势的变化，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对我们所处的时代作出了新的判断，在 80 年代中期，明确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面临的两大主题，指明了当代国际关系的中心问题，也指出了世界人民和中国人民面临的主要战略任务。

邓小平同志关于两大主题的论述揭示了当前世界战略力量的发展变化和特殊的斗争形式。这就是：我们处在世界社会发展的一个特殊历史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矛盾，但又具有一定活力；社会主义有着无限生命力，但经济、政治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世界社会主义和世界资本主义两大政治力量在一个较长时期内难以根本解决谁战胜谁的问题。双方势必处在一个积聚力量、相持不下的统一体中，呈现出竞争共处

的和平状态。在这一状态下，超级大国奉行的霸权主义政策仍是战争的根源，但由于世界和平力量的壮大，世界战争是可以抑制的，而最终解决世界前途的问题，主要看在和平竞争中综合国力的较量，即看社会主义国家能否在经济发展上赶上和超过世界资本主义。世界的前途，到头来是看谁创造出更高的劳动生产率。看谁拥有更强大的综合国力。邓小平同志在 90 年代初指出：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在翻两番的基础上，再用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我国综合国力达到世界前列，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真正体现出来了。” [2]

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说，我国全力以赴搞好经济建设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与义务，只要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就会屹立在世界东方，在两种社会制度的对立与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2、对当前形势的判断

邓小平同志在对特定历史阶段中心内容和战略任务作出判断的同时，还对当前国际形势作出具体判断。

（1）在较长时期内世界大战可以避免

80 年代中期，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争取比较长期的和平是可能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 [3] 以前总担心打仗，每年总要说一次，现在看，担心得过分了，在较长时期内不发生大规模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这个判断，是我们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的大前提，邓小平同志划清了战争与和平两种力量的界限，并通过对两种力量矛盾运动的辩证考察，科学地预见到世界战争与和平的发展趋势。他指出：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仍要提高警惕；但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爆发的因素在增长，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如果工作做得好，战争是可以延缓的。

随着苏联的解体，两极格局的终结，小平同志的这个基本估计可以看得更清楚了。原来有资格打世界大战的两个超级大国，现在一个解体了，一个野心很大但力不从心。

（2）战略格局走向多极化

邓小平同志在 1990 年的一次讲话中说，旧的格局在改变中，新的格局还没有形成。 [4] 恐怕要成十年、成十年的时间才能形成。党的十四大报告根据这一精神，概括为“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动的历史时期，两极格局已经终结，各种力量重新分化组合，世界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多极化的主要特征是美国地位下降，其他各极力量有所增强，到 90 年代初，西欧与美国实力大体持平，日本经济实力为美国的 2/3，日美经济实力的差距正在缩小。中国经济繁荣，政治稳定，综合国力增强，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又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正在成长为世界多极格局的重要一极，在新旧格局转换期，世界格局处于一超多强局面，多极化趋势加快，美国难以独霸世界。

（3）霸权主义是当代战争的总根源

早在 70 年代末，邓小平同志就指出，霸权主义是世界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是危害世界和平安全和稳定的根源。两极格局解体后，邓小平同志认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霸权主义仍是当代战争的根源。冷战结束前，霸权主义主要指美苏两家，冷战结束后，主要指美国。美国侵犯别国主权，推行新干涉主义，导致世界、区域不断出现紧张局势。

由于美国推行霸权主义政策，世界依然存在战争危险。目前，这种威胁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是大战不打，小战不断，局部战争和局部冲突频频发生；二是美国开始进行两个冷战，一是针对南方、第三世界，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国家。

（4）西方国家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上升

冷战结束后，邓小平同志特别关注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发展。他多次指出，现在国际形势不可测因素多得很，矛盾越来越突出，过去两霸争夺世界，现在比那个时候复杂得多，乱得多，这种矛盾突出表现在发达国家之间。在海湾战争和苏联解体后，邓小平同志指出，美国得分不多，得分最多的是别人，美国又面临两大对手，日本敢向美国说“不”，德国也敢向美国说“不”。这很值得注意。近年来，日美、日欧在经济领域内的激烈争夺完全证明邓小平同志这一判断的正确性。这一判断的重大意义在于：

全面持续地观察国际形势，不能把发达国家看成铁板一块，不能把我国面临的形势，尤其是“六·四”后的国际形势看成一片漆黑，不能认为形势恶化到多么严重的地步，要树立战胜困难的信心。

充分利用西西矛盾，及时并善于把握实际存在着的机遇，推动国际形势朝着有利于我国的方向发展。

二、邓小平国际战略的基本原则

1、独立自主原则

独立自主是中国共产党人一贯坚持的原则立场，同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政治家一样，邓小平同志维护党和国家“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赋予独立自主原则以新的内容。

邓小平同志在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同时，特别看重中国发展道路上的独立自主和创新，把“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视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在新的国际竞争中和国际斗争中的立足点。邓小平的探索是在中国原有社会主义体制的弊端已充分暴露、苏联模式的潜力已完全耗尽的情况下开始的，是在社会主义面临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的严峻挑战、世界上综合国力的较量日趋激烈的新形势下进行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能不能通过改革尽快摆脱传统体制的樊篱，走出一条既超越苏联模式又非全盘西化，既符合国情又顺应时代进步潮流的中国自己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就成为“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邓小平同志正是从这样的高度看待“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于中国前途命运的意义。社会实践和历史进程证明：苏联在西方浪潮冲击下迷失方向，照搬资本主义道路，把国家的命运拴在西方大国身上，从而丧失了国家主权和独立，演出了亡党亡国的悲剧；中国由于“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广泛地发展了同西方世界的交流与合作，大胆借鉴、利用西方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又没有做它们的附庸，更未吞下它们损害中国利益的苦果，从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2、国家利益原则

1989年10月，在中美关系处于非常严峻的时刻，邓小平同志在会见来访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重要谈话中明确提出：“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5]邓小平同志对尼克松说：“我知道你是反对共产主义的，而我是共产主义者。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

问题的。” [6]

邓小平同志这段话包含着丰富的内容：

它揭示了国家关系的本质。众所周知，在国际社会中活动的主体是拥有主权的独立国家。国家主权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因而源于国家主权的国家利益（包括国家安全利益、国家政治利益、国家经济利益及国际社会中平等权益）就自然成为国家对外政策的基本动因，成为国家对外行为的出发点和归宿。尽管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有时要受该国领导人阶级立场、党派背景和价值观念的影响，但最终还是围绕国家利益运行的。因此，国家间关系归根到底是围绕国家主权运转的利益关系。

它阐明了处理国家利益关系的正确准则，即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应当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不应当成为发展国家关系的障碍，更不能以某种意识形态因素为借口去干涉别国内政，损害别国主权；国家间的利益关系是相互的、对等的，应当把维护本国利益同尊重对方利益结合起来。因而，处理国家间的关系，只能发展合作，不能搞对抗。

80年代末以来，邓小平同志针对党内思想动态指出：“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 [7] 不论国际大气候怎样变化，只要我们争得了这一条，就稳如泰山，只要在本世纪末最后十年能够实现第二个翻番，就是我们最了不起的胜利，他深刻地阐明了中国在国际风浪中稳如泰山取得胜利的关键是继续毫不动摇地发展自己，继续集中精力办好中国自己的事情。

3、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在50年代中期提出来的，后来以中印公报的形式正式提出，并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承认。

1988年后邓小平同志曾在五次谈话中强调要运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去处理国际问题。

他在强调这一原则时，突出两个思想。一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二是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处理同大国的关系。

1989年10月，他在同国际友人谈话时说：“我特别推荐五十年代由我们亚洲人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今年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准则。” [8] 翌年7月，他又说：“现在确实需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准则。” [9]

国际政治新秩序是由邓小平同志于1988年12月同日本客人谈话时正式提出来的，与新秩序相对立的国际旧秩序的主要特征是以富掠贫，以强凌弱，以大欺小。国际新秩序核心是和平、公正、合理，它的实质是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国际剥削。

另一个突出思想是正确处理中国与大国之间的关系。“六·四”后，面对西方国家制裁、东欧剧变所带来的压力，邓小平同志分析说，中国的特点是建国四十多年来大部分时间是在国际制裁之下发展起来的。我们别的本事没有，但抵抗制裁是够格的。所以我们并不着急，也不悲观，泰然处之。” [10] 因此，中国具备同大国打交道的条件与可能。由于我们力量相对不够，需要集中精力搞好经济建设，也有必要继续同大国打交道。因此，小平同志说：我们谁也不怕，但谁也不得罪，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办事，在原则立场

上把握住。如何处理同大国的关系，他提出一方针：“同苏联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同美国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同日本、欧洲国家也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11]具体的做法，还是要坚持同所有国家都来往。在此基础上，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进一步创造有利于改革开放的国际条件。

4、国家关系不以意识形态定亲疏原则

邓小平同志指出：国际关系的历史不是看社会制度。国家间关系应从自身战略利益出发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

这一原则是对国际关系实事求是分析的结果，对我们进行国际斗争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国际关系中，各国都在寻求国家利益。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维护本国社会制度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必然是自己的重要职能，因而意识形态利益是构成国家利益的主要内容之一。但是，在国家对外交往中，意识形态利益只是作为国家整体利益的一部分被体现在各国的对外关系中。由于它是国家利益的一部分，因此，意识形态利益要服从国家整体利益的要求。这就决定了国家关系不完全以意识形态定亲疏。

小平同志提出这一原则的现实指导意义在于利用美国的两面性，维护与发展中美关系。

美国对外政策的两面性表现在：一方面，它要对中国实行和平演变，将继续在人权、贸易、军售、台湾、西藏问题上对中国保持压力，本质上不愿看到中国的统一、发展和强大。另一方面，它出于全球战略和实际经济利益的考虑，又不得不与中国打交道，以拓展在华市场，维持东亚稳定。

美国的这种两面性，为我们提供了在超越意识形态对抗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中美关系的可能性。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在继续打交道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对立的严峻性，应始终对美国保持应有的警惕。

5、党际关系原则

在如何发展与外国党的关系上，中国共产党提出四项原则，即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进入 90 年代后，这些原则突出地表现为一句话：不搞意识形态争论。

1990 年 3 月，在苏联局势急剧变化，其内部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迅速上升的情况下，邓小平同志在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指出：“不管苏联怎么变化，我们都要同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容地发展关系，包括政治关系，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12]

早在 1980 年，邓小平同志就提出：“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去探索，去解决问题，不能由别的党充当老子党，去发号施令。”[13]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这应该成为一条重要的原则。后来，他依据世界和平发展的时代特点和世界各国发展多样性的现实提出，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各国选择什么样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经济模式和发展道路是各国人民自己的事情，别国只能尊重不能干涉，“国际关系新秩序的最主要的原则，应该是不干涉别国的内政，不干涉别国的社会制度”[14]

邓小平同志主张“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他把不搞争论看成是他一个发明。不搞争论，决不是不分曲直不讲是非，而是尊重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坚信社会进步的总趋势和人民群众的力量；不搞争论，决不是不讲原则

随波逐流，而是有气魄容纳世界上的各种意见，有耐心等待实践和时间的检验，有决心做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只要历史证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就够了，别国的社会制度如何我们管不了，中国政治家和中国共产党人首先要为中国自己负责，办好中国自己的事情，这是中国政治家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职责，同时也是中国政治家和中国共产党人最大的国际义务。

6、睦邻友好原则

邓小平同志十分重视睦邻友好原则，主张积极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首先要争取一个和平与稳定的周边环境。在我国周边，始终存在着不安定因素、热点或潜在的冲突危险。要消除对我国的安全威胁，必须与相关的邻国协作配合，共同努力。因此，创造和维护与邻国和睦相处、友好合作、长期稳定的周边环境，具有十分现实的意义。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中国希望世界和平、地区和平，特别希望同亚洲国家发展友好关系，成为较好的朋友，这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长期的战略决策。

在实践上，他致力于改善和发展与邻国的关系。他强调，中日两国人民要世代友好下去；中朝关系不同一般，中朝友谊是用鲜血凝成的，经受过疾风暴雨的考验；中国和东盟是相互支持，相互援助的关系，双边关系应当是善意、真诚、谅解、尊重各自的地位与立场；中缅亲戚越走越亲；中巴两国是睦邻友好的典范；中印应改善关系，应该求同存异，中印作为亚洲的两个大国，对维护亚洲及世界和平有着重大的责任。近年来，中国与周边关系得到进一步改善，进入新中国成立以来最稳定时期，中国的国际地位也随之提高。中国通过稳定周边，在亚大地区的作用、影响增大。西方舆论普遍认为，没有中国参加，亚洲任何一个问题几乎都难以解决，中国对于亚洲建立新秩序是不可少的，

7、反霸原则

邓小平同志始终强调反对霸权主义。1989年后，他多次指出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是中国对外政策的主要原则。

为什么要突出反霸？因为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造成两个现实威胁，一个威胁是对世界的，另一个威胁是对中国的。

1989年10月，邓小平同志在同泰国总理差猜谈话中说：“过去两个超级大国主宰世界，现在情况变了。但是，强权政治在升级，少数几个西方发达国家想垄断世界，这点我们看得很清楚。”[15]我们必须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存在和继续发展保持高度警惕。美国失去竞争对手后，充当国际警察，它不断运用政治、经济、军事手段，到处插手世界和地区事务，动辄对一些国家进行制裁，肆意干涉他国内政，甚至公开推行军事干预主义，对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构成威胁。

两极格局解体后，虽然我国周边环境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但由于美国对我国采取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政策，我国在国际社会上遇到的困难增大了。美国在亚大地区的军事存在仍具有相当规模，在一般情况下，美国不至于同我进行军事对抗，但它从根本上不愿看到一个强大中国的崛起。除了施加政治和经济压力外，美国还把我国视为在亚大地区“制造麻烦的根源”，并通过大量军售，增强台湾和周边国家的军事实力，以牵制我国。

因此，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谁搞霸权主义，我们就反对谁；谁侵犯别人的利益，我们就反对谁；我们讲公道话，办公道事，这样的政策我们要坚持到底。

8、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原则

避开主权问题，先进行共同开发，这是邓小平同志在提出“一国两制”的办法解决香港与台湾问题的战略构想后，提出来解决国际争端的新办法，邓小平说，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解决问题的出路；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一个中国，两种制度；世界上的许多争端类似这样的办法解决，这是可取的，否则始终顶着，坚持下去，总会爆发冲突，甚至武力冲突。这是一个从国内和平与国际和平的大局着眼而提出的出色的、有创见的思想，在世界上以前是没有的。

在具体办法上，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切实可行的途径。他说，有些国际上的争端，可以先不谈主权，先进行共同开发。这样的问题。要从尊重现实出发，找条新的路子来解决。我国学者普遍认为。这是邓小平以实事求是原则为其灵魂的国际战略思想的一个重要范例。

（作者是国防大学世界经济政治教研室副教授）

注释：

- [1]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4页。
- [2]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3—364页。
- [3]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3页。
- [4]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3页。
- [5][6]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30页。
- [7]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6页。
- [8]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8页。
- [9]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0页。
- [10][11]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9页。
- [12]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3页。
- [13]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9页。
- [14]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9页。
- [15]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9页。

从丘吉尔的“铁幕”到邓小平的“一国两制”

黄凤武

本文无意对这两位大人物进行比较。他们两人是如此的不同，一位被其同僚称之为“头号反共人物”，[1]一位被誉为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总设计师，但有一点则是他们两人共同的：他们都曾叱咤历史风云，都是能以各自的政治艺术给历史打下烙印的人物。

正是通过不同的人物才正好反映出时代主题的变迁、发展。

—

从“The Unnecessary War”到“一国两制”

美国前总统罗斯福曾告诉丘吉尔，他正向公众征求意见，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应该起一个什么名称，丘吉尔立即说“The Unnecessary War”。[2]这个词在中文里有两种译法，一是“非必然的战争”；一是“不需要的战争”。无论哪一种含义，都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具有国际一流水平政治家们的共识，那就是：一定要消灭战争，不能再依赖战争来解决国际争端。

第二次世界大战告诉人们，人类社会要么中止其根深蒂固的用暴力解决争端的历史；要么人类社会的历史本身将被中断。

荒谬的是，虽然战争已经过去，我们却生活在一个连续不断地进行战争的世界。据前美国总统尼克松的估计，仅在1983年的夏天，就有15场战争和20场小规模冲突正在世界各地进行着。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80年代中尼克松写他的《真正的和平》小册子时，已经发生了140次战争，造成1000多万人死亡。[3]

这些战争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是仔细研究就能发现，最重要、最深刻的冲突根源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两种制度的冲突。对两种社会制度的冲突有多种描述，有所谓“两大阵营对峙”、“东西方矛盾”等等。这种主要的冲突制约着其他冲突，使人们看到二战后的世界各种冲突后面都有两种社会制度的因素在制约着。这就告诉人们这样一个道理，仅有消灭战争的愿望是不够的，重要的是要学会处理各种矛盾，使其不至于演化为战争；更重要的是要学会怎样让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共处。

承认社会主义制度在世界上的存在这样一个事实，是在丘吉尔时代以前就完成了的共识。但直到丘吉尔退出历史舞台，他都一直缺乏理解两种社会制度共存的政治想象力、政治艺术。

1917年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时，世界帝国主义是不承认它的，所以有10多个资本主义国家对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打到俄国去，消灭这个社会主义怪物，这是当时资本主义政治家的认识，但社会主义制度不但没有被剿灭，资本主义世界本身则生长出了希特勒法西斯主义。

丘吉尔成为国际性政治人物时，英、美都亟需联合社会主义苏联来抗击法西斯侵略。这使丘吉尔不得不承认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可忽视的现实。但即使在那时，丘吉尔也丝毫没有掩盖对这个现实存在物的故意。他把与苏联的联盟看作是为了消灭当时最凶恶的希特勒而与“魔鬼”结成的同盟。[4]即便是希特勒也看到这种“联盟”中的矛盾，希特勒在垂死挣扎之际都还期待着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由于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缘故而内江。[5]反法西斯战线的

领导人们明智地没有让其矛盾在希特勒被彻底消灭之前完全暴露出来。[6]

但反法西斯战争一胜利，两种社会制度的矛盾就突出了。综观丘吉尔晚年的著述，这位颇为雄辩的资产阶级政治家面对社会主义的强大是茫然失措的。他无力希冀“打进”苏联去，而希望能够“顶住”这股“邪恶的”力量，两个阵营相互顶着。防止共产主义的蔓延。不是用战争，而是用其它手段来消灭共产主义制度。这就是丘吉尔晚年为之奔走呼号的冷战政策。历史证明这是一种自相矛盾，目光短浅，缺乏想象力的政治思维方式。

世界上的矛盾长期顶着，互相僵持，最后总会导致战争。朝鲜问题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雅尔塔协议的背景下形成的。50年代初南北双方发生冲突，美国在所谓联合国军旗号下进行大规模军事干预而爆发了朝鲜战争。英国和阿根廷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的争议，因长期顶着互不相让，以致爆发了二战结束以来南大西洋规模最大的海上冲突，双方损失惨重。

历史用惨重的代价呼唤着新的国际政治思维方式。“一国两制”顺应历史潮流而生。这就是邓小平同志指出的：解决国际争端，要根据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办法，“一国两制”，这是从我们自己的实际提出来的，但是这个可以延伸到国际问题。

邓小平同志多年来有个想法，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用什么方法来解决这种问题，不但要有不用战争手段的愿望，而且要有行得通的和平的方式。小平同志提出的大陆与台湾统一的方式是合情合理的，统一后，台湾仍搞它的资本主义，大陆搞社会主义，但是是一个统一的中国，一个中国，两种制度。香港问题也是这样，香港与台湾还有不同，香港是自由港，这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世界上的许多争端用这种办法解决，我认为是可取的。否则始终顶着，这样僵持下去，总会爆发冲突，甚至武力冲突。如果不要战争，只能采取我上面讲的方式，这样能向人民交待，局势可以稳定，并且是长期稳定，也不伤害哪一方。

二

从“Iron Curtain”到“一国两制”

“Iron Curtain”（铁幕）一词是丘吉尔的专利。丘吉尔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与社会主义世界之间有一道不可逾越的屏障，这就是“铁幕”。铁幕对面的社会主义在丘吉尔的视野之外，他呼吁铁幕他这边的资本主义联合起来，求发展，求对抗。[7]这种铁幕理论基本上规划了50—60年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并不苛求于丘吉尔。但是，即便只用资本主义政治家的水平来衡量他，铁幕理论是否真正有利资本主义一方的发展呢？从短期效益来说铁幕的一边有了复兴欧洲等计划，但当历史的长画轴逐渐展开时，这种短期效益带来了人类历史发展难以弥补的灾难性后果，第一，铁幕一边的发展，是以谋求与铁幕另一边的对立为前提的，这必然带来铁幕两边的猜忌、对抗和仇视，由此引起的铁幕两边发疯似的军备竞赛，造成了对人类发展源泉的最大耗费。第二，把铁幕的另一边放在视野之外必然只片面追求铁幕内部的发展，既必然导致以牺牲别国人民的利益为代价，又必然导致拒绝别国人民的有益的发展经验，第三，当前世界经济发展已经形成了一个联系着的整体，铁幕一边的片面发展不可能是长期的、健康的过程。西方资本主义依靠掠夺别国人民发财，将沉重的债务锁链锁在别国人民的身上，现在这条锁链也无

情地锁住了西方的腿。这就是影响当今世界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也是让当代政治家们最头痛的问题之一：南北矛盾。矛盾的种于是由丘吉尔种下的。“铁幕”掩盖下的原来是一颗美杜莎的头。丘吉尔将观看美杜莎头的厄运留给了他身后的人。

“一国两制”的构想，作为当代世界政治科学最富有创造性的思维方式，它破除了铁幕的神话和迷信，打开了人们的眼界，两种社会制度不是彼此封闭地发展，二者之间不存在一条不可逾越的屏障。

“一国两制”理论比较“铁幕”理论，有显著的历史性和人民性这两个特点。人类社会是一个自然的历史发展过程，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是这个自然历史过程中的两个不同阶段，这两种制度在当前世界共存，归根结底是由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决定的。不能否定两种社会制度的不同，也不能人为地用“铁幕”将二者分裂，而应允许两种制度在交往中互相竞赛，同时将竞赛的选择权、裁判权交给人民。这正如邓小平在指出了两种不同制度可以在一国中并存后所说：留下的问题就是和平的竞赛，让人民去最终选择，不是打仗的选择，而是和平的选择。

“一国两制”从三个方面拓宽了人类社会文明进步和发展的思路。第一，允许在一个国家内从实际出发实行不同制度，以利于让不同制度的优越性或长处各自的条件下得以充分地运用和发挥，促进生产力更快地发展。第二，允许一个国家内实行不同制度，从社会主义的角度说，有利于它本身溶解、吸收资本主义中还有生命力的形式和手段，使社会主义有更丰富的内容和更大的吸引力。第三，它以在一个国家尚能实行两种制度的壮举，在世界范围内打破关于“铁幕”的神话的迷信，使人们在直接参与的两种制度和和平竞赛过程中就近观察比较各自的长短和优劣。

三

“铁幕”与“一国两制”的时空维度。

“铁幕”理论所适应的空间维度是明显的。从主观上看，它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政治理论的产物，以损害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和广大第三世界为代价。从客观上看，它从来没有得到过它的设计者主观设想的那么广泛的应用，而且从历史过程来看，它的应用范围越来越窄，对资本主义本身来说也感到负效应越来越大，大约在50—60年代，这种理论维系着西方世界抱成一团，但它是宣传共产主义扩张的恐怖神话为前提，播下了不信任的种子，引起了也包括欧洲资本主义各国在内的许多冲突。60年代中后期开始，“铁幕”两边各国分别被绑在美、苏两端，基本上只有利用“两霸”的兴起，而妨碍了包括社会主义、第三世界、甚至西欧资本主义在内的许多国家的正常发展，而且美苏两霸本身也为其各自在“铁幕”的两边“挑头”、军备竞赛而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铁幕”理论的时间维度也是很短暂的，它的消亡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从60年代中期开始，这个理论在世界上的影响就逐步消失，随着世界经济联系，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随着世界人民相互加深了解，到了60—70年代之交，基本上就沒有人再相信两种社会制度之间还横着不可逾越的“铁幕”了。有人将柏林墙的拆除定为“铁幕”理论最终失效的标志，那么这个理论影响历史的时间就是40左右。同时，我认为“柏林墙”只是一个象征问题，而实

际上,从 70 年代初尼克松政府打开对华的大门开始,就标志着西方本身最终抛弃了“铁幕”理论。

现在我们来研究“一国两制”的时间维度。

“一国两制”的空间维度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作为一套具体的方案,它首先适用于中国的香港、澳门、台湾。第二,作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一种创造性的政治思维方式,它的适用空间是极其广泛的。比如现今世界有许多领土开发、资源开发的矛盾,也可按一国两制的方式,采取“共同开发”方案;又如这个理论可以在世界范围内促进两种制度和平竞赛、人民主动选择等。可以说,作为一种政治理想和政治信念,它的适应空间将在一个长时间内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展开。

“一国两制”的时间维度,从香港来说,已明确为法律所规定的是 50 年不变。50 年以后可能更不需改变,变或不变将交给人民决定。同时,作为解决当今世界矛盾的政治思维方式,它的应用时间维度将延伸到整个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共处的时代。可以说在整个共处时代里,随着社会经济联系的加强,科学技术的进步,全世界人民互相了解的加深,“一国两制”所代表的政治信念将获得不断扩展的时间维度。

丘吉尔在其行将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曾写道:“我殷切地希望,新一代能够纠正以前的一些错误,从而根据人类的需要和光荣,控制住正在展开的可怕的未来景象。”[8]邓小平和丘吉尔都曾站在世界反法西斯战线的同一条战壕里,从这个角度说,他们是同时代的人。但邓小平的历史足迹则跨越到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由于有了“一国两制”的创举,和平与发展不仅是有了善良的愿望,而且有了——用丘吉尔的后任撒切尔夫人的话来说——“富有想象力的做法”。撒切尔夫人在归结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谈判的利益时说的话,是很有见地的: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无法解决的问题能够通过对未来富有想象力的做法得到解决;国际生活中的分歧能够通过保持有关社会的自治和特性得到解决。

“铁幕”理论与“一国两制”理论之所以有不同的历史作用和不同的时空维度,是因为它们各自代表着不同的时代主题,“铁幕”一出世就是面朝过去的东西,它生存于“战争与毁灭”的阴影之下”;“一国两制”一诞生就是面向将来的理论,它发展于“和平与发展”的阳光之中。

(作者是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研究部博士研究生)

注释:

[1]丘吉尔著《不需要的战争》,漓江出版社,第 199 页。

[2]丘吉尔著《不需要的战争》,漓江出版社,第 1 页。

[3]尼克松著《真正的和平》,新华出版社,第 3 页。

[4]丘吉尔著《不需要的战争》,漓江出版社,第 199 页。

[5]《第三帝国的兴亡》,世界知识出版社,第六编“第三帝国的灭亡”,第三十章中“希特勒垂死的孤注一掷”部分。

[6]关于这一点,西方史学界将 1945 年 2 月的“雅尔塔会议”定为冷战开始,幸方到 1947 年才是“冷战加强”。可以想象,假如冷战恶化于希特勒德国彻底灭亡之前,将会给人类历史带来多么大的浩劫。资料参见三联出版社出版的《世界史便览》“世界大事年表”部分。

[7]丘吉尔晚年曾将他 1947 年和 1948 年的演讲集成一册 ,比较全面地体现了他的“ 求铁幕一边的发展，求铁幕丙边的对抗 ” 的基本思路。参见丘吉尔著《欧洲联合起来》商务印书馆 1977 年版。

[8]丘吉尔著《不需要的战争》，漓江出版社，第 2 页。

坚持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论邓小平坚定维护我国国家利益的战略思想

洪 兵

邓小平十分关注国家利益问题。他的有关论述，涉及到国家利益的本质属性、地位作用、表现形式，以及分析和维护国家利益的原则、方法等各个方面，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有关国家利益的战略思想，了解邓小平的这一战略思想，将使我们深刻理解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正确认识我国的国家利益。而这一认识，正是我们正确确定国家战略目标，判断现实或潜在威胁和选择相应战略手段的前提。

一、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利益观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从表面上看是一种在相对固定的地理环境中维系各种社会集团的社会组织形式，体现出某种民族或地理的特征，但实质上，国家是与社会发展一定历史时期相联系，与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相适应，是一种阶级社会的政权组织，具有深刻的“社会性”和“阶级性”。恩格斯指出；国家是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是社会在一个有形的组织中的集中表现，但是，说国家是这样的，这仅仅是说，它是当时独自代表整个社会的那个阶级的国家。所以，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国家是占统治地位阶级的国家，其国家利益必然是在国家中占统治地位阶级的利益。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其国家利益反映少数剥削者的利益，与广大人民群众利益是对立的；而无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其国家利益与广大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是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集中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利益观所揭示的无产阶级国家的国家利益的本质属性，就是它的人民性。

邓小平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利益观。他在谈到有关国家主权、国家统一、国家发展等国家利益问题时，常常与人民的需求、愿望、情感紧密联系在一起。1982年9月，邓小平在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谈到香港问题时说：如果中国在1997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8周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人民就没有理由信任我们。邓小平在同一个来访的印度代表团谈到中印边界问题时说：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你们有人民感情的问题，我们也有人民感情的问题。只有采取“一揽子解决”的办法，才有可能各自说服自己的人民。他在谈到大陆与台湾统一问题时还指出：应采取“一国两制”的方法，“这样能向人民交代”。[1]这些论述向我们提示，邓小平所说的国家利益，是与广大人民群众需求和愿望分不开的，我国国家利益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利益，人民性是我国国家利益的本质属性。

对于邓小平的这一思想，我们应当从这样几个方面去认识和把握：第一，我国国家利益的本质属性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性质所决定的。在我国，无产阶级是人民的主体，其利益通过共产党的奋斗宗旨体现出来，而党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无产阶级作为国家统治阶级所提出的国家利益，理所当然地集中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第二，我国国家利益的基本内容正是人民群众最需要和最为关心的那些事情。邓小平强调：“人民生活确实好起来了，国家兴旺发达起来了，国际信誉高起来了，这是最大的事情。”[2]邓小平所说的这些最大的事情，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兴衰”、“荣

辱”，这正是国家利益的基本内容。第三，我国国家利益价值取向是通过人民群众的需求和愿望反映出来的。我国在决策事关国家利益重大问题上，总是以人民最普遍、最强烈的要求和愿望作为基本依据的。邓小平经常提醒我们，要多问几个“人民需要什么”，“人民答应不答应”，能不能“向人民交代”，从人民的意愿出发进行思考的抉择。正因为这样，我国国家利益才能始终与人民的共同利益保持一致。

二、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

1989年10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谈到：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战略利益出发，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差别，应当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用：“最高准则”四个字明确地指出了国家利益在战略决策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

理解国家利益的地位，我们应从“最高”这两个字的含义入手。第一，国家利益集中反映了全体人民的共同需求，是人民群众最关心的“最大的事情”，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安危、兴衰和荣辱。毫无疑问，这些“最大的事情”，必然是考虑国家关系时的最高准则。第二，我国的国家利益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国家利益集中体现并且高于阶级、民族和其他各社会集团的利益。第三，在处理国家关系时，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矛盾应当服从国家利益，我们要同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相同或不同的国家都保持友好往来。同时，要坚持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以牺牲国家利益为代价。第四，我国是一个大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作为一个大国有自己的尊严，有自己遵循的准则。国家利益作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最高准则，就是要根据国家利益决定自己怎样做，而不是看着别人的脸色行事。

认识国家利益的作用，应着重把握“准则”这两个字的含义。第一，国家利益是确定战略目标的准则。从根本上讲，我们的战略目标就是实现和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因此，总体战略目标必然是繁荣国家经济、增强综合国力和提高国家的国际地位。第二，国家利益是确定国家关系的准则，邓小平多次向外国来宾谈到，我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世界任何国家友好往来，对于一些历史隔阂、意识形态争论和社会制度差异等问题，可以采取互谅互让的方式解决，化干戈为玉帛。但有一点，邓小平是坚定不移的，那就是任何国家都不应损害中国的利益，“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3]第三，国家利益是判断战略决策是非利害的准则。各国通常都以国家利益的得与失，来判定战略决策的是与非，邓小平指出：中国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他还说：是非是涉及我国根本利益的是非，利害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能不能达到本世纪目标和下个世纪目标的重大利害。他强调，判定一项对内或对外战略决策是否正确，应当看其是否损害了国家利益。

三、维护我国的国家利益就是维护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

邓小平特别强调维护我国国家利益与维护中华民族利益的同一性。在涉及国家利益问题时，他经常提到“中华民族团结”或“中华民族子孙”。他所指的民族，不是单指汉族或少数民族，而是包括我国各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这个民族作为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主体，具有与国家相同的含义。邓小

平常把“中华民族”和“国家”这两个概念交替使用，指称一个对象，说明一个问题，他把捍卫民族利益与爱国主义联系在一起，把以民族利益为重的举动，视为维护国家利益的爱国行为。他一再向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侨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中华民族的祖国，维护中国和国家利益就是维护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

从理论上进行分析，国家利益与民族利益存在着这种同一性。在民族认同的基础上，人们可以超越某些分歧和差异而组成社会集团，构成国家的主体。所以，有人从这个意义上把现代国家称之为民族国家。国家利益代表了民族利益，维护了国家利益就是维护了民族的利益。

邓小平的这一观点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民族，人口占世界 1/5 多。中华民族的子孙有着共同的语言、文化，对国家有着自己独特的认同方式。中国人一向把“国”与“家”联系在一起，称其为“国家”。我们只有强调维护国家利益与维护中华民族利益的同一性，才能使中华民族的子孙们抛弃前嫌，在民族认同的基础上凝聚起来，形成整体力量，才能使全世界的中华民族子孙把我国国家利益视为他们自己的利益。邓小平指出：我们要争取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凡是中华儿女，不管穿什么样服装，不管是什么立场，都要有中华民族的自豪感，他多次申明，我国进行的事业是民族振兴的事业，我党维护国家利益就是维护整个中华民族利益，所有中华民族的子孙应当在国家利益的旗帜下团结起来。

这里需要着重说明，邓小平关于维护我国国家利益与维护中华民族利益同一性的论述，都紧紧围绕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的主权和统一、促进祖国繁荣昌盛等目的而谈的，目的是维护国家根本利益和为了世界和平与进步。这种团结完全是正义的，与“狭隘民族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

四、维护新时期我国的国家利益

依据邓小平的战略思想，分析和维护新时期我国的国家利益，应着重把握好以下几点：

（一）国家的主权和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

邓小平明确指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这句话指明了国家主权和安全在我国国家利益结构层次中的突出的地位，以及我们坚定不移地维护这一利益的原则立场与鲜明态度。

正确理解邓小平这一观点，应当着重把握好两点：第一，在国家主权和安全利益上，没有任何可以讨论的余地。在香港回归祖国的问题上，邓小平同撒切尔夫人这样谈到：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他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这清楚表明，我国无论在什么时候，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拿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做交易。我们要向国内人民明确这条原则，也同时要向世界各国表明这个态度。第二，抵制国际上的“主权过时”论，坚定不移地捍卫国家的主权和安全。目前，一些西方人士抛出了所谓“内战非内政”、“人权高于主权”等“主权过时”论，为一些西方大国粗暴干涉别国内政披上了合法的外衣。邓小平批驳了这种论调。他说：“西方的一些国家拿什么人权、什么社会主义制度不合理不合法等做幌子，实际上是要损害我们的国权。……他们不是联合国，联合国的决议还要大多数同意才能生效，他们凭什么干涉中国的内政？谁赋予他们这个权力？任何违反国际关系准则的行动，中国人民永远不会接受，也不会压力下屈服。” [4]

所以，把国家主权和安全始终放在第一位，旗帜鲜明地反对推行强权政治的国家干涉我国内政和威胁我国安全，是维护国家利益的根本性要求。

由于我国坚定地执行邓小平的战略思想，我国的主权和安全利益得到了很好维护。我国能够独立自主地行使自己的主权，其国际地位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尊重。目前我国的安全环境是历史上最好的一个时期，但是，我国的主权和安全利益还面临着一些问题，受到某些因素的威胁。一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以“人权”、“民主”为借口干涉别国内政，实际上企图损害（包括我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主权。二是祖国统一大业还没有最终实现。我国虽与英国、葡萄牙政府分别就香港、澳门回归祖国达成协议，但在落实这些协议的过程中仍有一些困难和阻力。在台湾问题上，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时常对我国主权提出挑战。三是我国与部分邻国存在陆地边界问题，并与一些国家在沿海海域和某些岛屿的归属问题上存在分歧。我国领土被侵占、资源被掠夺的问题还比较严重。我国国家利益的损失是令人痛心的。对于我国国家利益面临的问题和遭受的损失，我们应当依据邓小平以上战略思想严肃对待和处理。

（二）着眼国家的发展利益，增强我国的经济和科技实力

在邓小平看来，国家的发展利益主要表现在“民族能力”的增强和“民族、国家兴旺”等方面。“民族能力”，是指一个民族征服自然或不被其他民族所征服的整体力量，也就是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这种能力主要体现在国家和民族的科技发展水平和经济实力上。“民族、国家兴旺发达”也集中体现在一个民族和国家是否掌握了先进的科学技术，是否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社会文明程度和国际地位是否得到提高，所以，邓小平将发展国家经济和科技实力作为国家发展利益的主要内容和基本标志来看待。事实正是如此，观察一个国家是否兴旺发达，确定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其基本标志就是看这一国家的经济和科技实力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在各国中居于何种水平。因而，我们在考虑战略问题时，眼光是否长远，是否着眼于国家的发展利益，其关键就是看我们是否紧紧盯住国家科技和经济发展这一重大问题不放。

发展我国的经济实力，就是要解放和发展我国的生产力。邓小平认为，坚持社会主义，首先要摆脱贫穷落后状态，大大发展生产力，体现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特点。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展，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当今世界国家之间的竞争，实质上是综合国力的竞争。综合国力的竞争，归根到底又是生产力首先是科学技术的竞争。在这个竞争中，谁落后谁就会丧失战略主动权，谁就会受制于人，就会被动挨打。所以，邓小平强调，我国一定要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他说：“过去也好，今天也好，将来也好，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5]新中国成立以来，科学能力，在某些领导或某些方面，已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但是，我国整个科学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还很大。我们应当看到，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不依靠科学技术，而靠大量消耗资源来发展经济的作法，是不可取的：我国工业发展要改变设备陈旧、工艺落后、成本高、效益低的状况，离开科学技术是不行的；我国要进行人口控制，保护自然环境，也离不开科学技术；我国要增强国防实力，打赢未来的高技术战争，更是离不开科学技术。

邓小平还特别强调：“中国的最高利益就是稳定。”邓小平多次讲过：我国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最大目的是取得一个稳定的环境，中国要摆脱贫困，实现四个现代化，最关键的问题是需要稳定。中国要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安定的国内环境与和平的国际环境。邓小平之所以把稳定称之为“最高利益”，因为它是国家主权、安全、经济发展等国家利益在现阶段的综合反映和最高表现形式。当今世界，国际局势风云变幻，国际上一股动摇社会主义体制的浪潮难免不会波及到我国，“首先中国自己不要乱，认真地真正地把改革开放搞下去。”[6]所以，我们应当从整体上认识社会稳定对于实现国家各方面利益的重要性，切实把稳定作为国家最高利益，坚决捍卫之。

（作者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副师职研究员）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9页。

[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83页。

[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页。[4]《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48页。

[5]《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9页。

[6]《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

论邓小平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战略思想

汪徐和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着眼于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站在全球高度，高屋建瓴地洞察国际战略形势，针对纷繁复杂的国际争端，提出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崭新思想。这一战略思想不仅是解决我国与其它国家争端的基本指导思想，也为世界上解决国际争端开创了一条新路子，具有深远的意义。

一、抓住历史契机，提出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新思路

随着国家的出现和国际关系的形成与发展，国际争端就随之产生了。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引起国际争端的原因和根源是多种多样的，其范围有大有小，但国际争端大多涉及到国家的重大战略利益，其解决的好坏，不仅与当事国有直接的利害关系，而且对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产生重大影响。正因如此，人们长期以来为寻求国际争端的合理解决作过艰苦的探索和努力，1899 和 1907 年的两次海牙国际和平会议要求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但由于西方列强把战争作为国家政策，不到几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成立的国际联盟宣布以“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促进国际合作”为目的，但是由于国际联盟本身的性质，它在解决国际争端方面显得软弱无力。在希特勒德国悍然兼并、占领奥地利和捷克以及德、意法西斯干涉西班牙等重大事件中，国际联盟甚至姑息退让，以致加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并导致了自身的瓦解。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建立的联合国组织把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作为其宗旨之一，并建立了一套内容广泛的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制度。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这一原则未能得到充分的贯彻执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全球争夺势力范围，插手和干预世界各地的国际争端，不仅使国际争端难以和平解决，而且造成了许多新的争端。

进入 70 年代后期，特别是 80 年代以来，国际战略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美苏关系从以激烈的对抗为主变为以全面竞争和对话为主，整个国际形势开始趋向缓和，国际竞争的重点转向经济和科技领域，各国更加重视综合国力的提高。邓小平通过对国际战略形势的深刻分析，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问题的重要论断，认为维护和平与谋求发展是当代世界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世界各国都不希望世界发生争端，都希望现有的争端得到妥善解决；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增长，这对用战争手段解决国际争端是一种极大的制约；现代战争的巨大消耗和破坏，使战争手段日益与争端各方的根本利益相违背，而且，就解决争端本身来说，用战争手段并不能彻底解决双方的分歧，消除爆发点，相反还增加相互间的仇恨和隔阂，埋下新冲突和战争的种子。正是在时代特征发生重大变化的特定背景下，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成为世界各国的共同需求，而国际形势的发展又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提供了现实可能性。邓小平本着对历史、对国家、对中国和世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抓住时代赋予的历史契机，提出了具有崭新内涵的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新思路。

二、适应新情况，探索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新办法

邓小平强调指出：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研究和解决任何问题离不开

一定的历史条件。他在与外宾谈话时提出：“解决国际争端，要根据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办法。”[1]他以彻底的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精神，针对我国面临的国际争端和世界上一一些争端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提出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具体途径和办法。

（一）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促进领土争端的妥善解决

对于领土、资源争端，邓小平提出要从尊重现实出发，找条新的路子来解决。他说：“有些国际上的领土争端，可以先不谈主权，先进行共同开发。”[2]对于南沙群岛问题和中日钓鱼岛问题等争端，邓小平主张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所谓搁置争议，就是把那些有争议的主权问题暂时放在一边，避免双方激化矛盾。所谓共同开发，是从经济利益入手，用经济利益的共同纽带将争议中的各方连结起来，各方共同得利，为合理解决争端创造和谐有利的气氛，最终达到消除争端。邓小平这里所说的“先不谈主权”绝不是“不谈主权”，而是一个如何选择“谈主权”的时机问题。在时机和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谈主权，往往会把事情弄僵，陷自己于被动；在时机和条件成熟的情况下谈主权，往往会得到较好的解决。邓小平这一化争议和潜在冲突为合作的战略设想，符合争议各方的战略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有关国家的响应，减轻了他们对我国的疑虑和敌意，有利于争端的妥善解决。

（二）和平协商，合情合理地解决边界纠纷

针对我国与一些邻国之间存在的边界争端实际，邓小平提出了解决边界争端的基本思路：一是尊重历史和现实，“和平协商”，而不用吵架的方法，不用武力的方法；二是双方相互让步，并且能向各自的人民交待；三是在和平解决边界纠纷之前，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四是一时解决不了的，可以先放一放，不影响两国发展正常的外交、经贸关系，促进共同发展。按照这一思路，我国与印度、越南和前苏联有关国家就和平解决边界问题达成了原则协议或共识，缓和了边境紧张气氛。通过双方和平协商达成协议，订立边界条约，寻求合理的解决，是和平解决边界争端比较合理和有效的办法。

（三）求同存异，不纠缠历史旧帐，一切向前看，处理国家间关系

邓小平强调：“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3]对于与我国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上有分歧的国家，邓小平提出要彼此尊重，求同存异，如在中美关系上，“要彼此尊重对方，尽可能照顾对方，这样来解决纠葛。”[4]对于在历史上与我国有过矛盾、有过恩怨的国家，邓小平提出：不纠缠历史旧帐，一切向前看，如在中苏关系上“结束过去，开辟未来”，“实现关系正常化。在中日关系上，要看得远些，“放在长远的角度来考虑，来发展。”[6]对于我国与一些国家之间存在的历史遗留问题，邓小平主张通过和平谈判，寻求各方都能接受的方式加以解决。如同中英通过谈判解决香港问题和申葡两国解决澳门问题一样。对于我国与其他国家之间存在的政治分歧、贸易矛盾等，邓小平也强调通过平等对话来解决，对话比对抗好。

（四）联合国在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中应发挥更大的作用

1982年8月，邓小平对来访的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说，二战以来，大战没有，小战不断，其根源就是超级大国在挑拨、在插手、在相互争夺霸权。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第三世界力量、爱好和平的力量在联合国中有了越来越多的发言权，联合国应该而且可以在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中比过去发挥更大的作用。一个时期以来，联合国在世界冲突各地广泛开展调停、

调解与和平斡旋，在有些地方开展了维持和平行动，对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世界局势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但是，联合国目前还没彻底摆脱大国的控制，联合国的一些决议未能体现真正的公正、合理，这样不利于国际争端的和平解决。目前，人类所渴望的和平与发展依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从全世界、全人类的角度看，联合国是非常重要的，联合国在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上应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三、邓小平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战略思想的提出及其初步实践，开辟了和平与发展的新前景

邓小平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战略思想，是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提出来的，也是以维护和平与发展为出发点和归宿点的。它的提出及其初步实践，开辟了和平与发展的新前景，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

（一）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世界局势

邓小平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战略思想，为解决世界上许多争端提供了新的线索，有利于直接消除国际争端中的爆发点，稳定世界局势。世界上有许多争端，如政治分歧、贸易摩擦、宗教纠纷、种族冲突等，一直困扰着人类。过去，好多争端爆发了，引起武装冲突，危及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老办法不能解决，就要寻求新办法。否则，始终僵持下去，总会爆发冲突，要从死胡同里找个出路，“我们就是要找出一个能为各方所接受的方式，使问题得到解决。”^[7]如果世界上很多争端都从尊重历史和现实出发，考虑用和平方式来解决，世界的紧张局势就会大有好转，世界和平就越有保障。

（二）有利于集中精力发展经济

从世界角度来看，发展成为世界各国和全人类面临的共同任务，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迫切希望有和平安宁的环境，发展经济。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将使争端各方得到发展经济所需的和平稳定的环境，并且有助于争端各方排除相互关系中的障碍，增进了解和信任，从而为开展经济合作和交流创造条件。如中俄、中印、中越等就和平解决边界问题达成原则性协议或者达成共识后，不仅双边边境贸易和往来明显增多，促进了边境地区的经济发展，而且促进了中俄、中印、中越等国的经济合作。

（三）有利于遏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当今世界，对和平的最大威胁来自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他们插手世界各地的争端和冲突，甚至粗暴干涉别国内政，严重影响世界局势。历史证明，一个国家处于分裂状态，国内动荡不定，国家之间领土、边界、资源争端频频发生，往往给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干涉别国内政，提供了有利条件。争端各方如果能够和平协商，在没有外来势力插手的情况下，合情合理地解决争端，那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霸权主义得以制造事端的一些借口和条件，限制霸权主义的活动。如中国与英国政府就香港回归祖国达成协议，就避免了香港问题的国际化，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就难以插手。

邓小平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战略思想，是“一个对国际上有意义的想法”，^[8]是对世界和平、人类发展的一个突出贡献。菲律宾《世界日报》曾发表文章指出，中英香港问题的和平解决，给国际社会提供了一个典范，即无论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还是当代国际上发生的问题，都可以避免诉诸武力，用谈判的和平方式加以解决。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认为，这种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方法。可以为全世界树立合作的榜样。

四、辩证地理解和贯彻邓小平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战略思想

邓小平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战略思想，将是我国处理国际争端的基本指导思想。我们在理解这一思想时，要特别把握以下几个问题。

（一）和平解决国际争端，要坚持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

邓小平强调指出，我们是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也要以维护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一是在国家主权、安全等根本利益上丝毫不能让步，而对一些相对的非根本利益，可采取灵活的方式处理。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是国家的根本利益之所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9]二是把国家的长远利益放在首位。在当前，维护和平环境、促进经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要潮流，也是我们国家发展的大局。解决国际争端，也要服从和服务于这个大局。虽然象领土、资源争端的解决上，我国会损失一些当前利益，但从长远看，照顾了当前经济建设的大局，有利于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消除隐患，保障和平安宁的环境，促进我国的发展，这就从更长远的意义上和更高层次上维护了国家的利益。三是既要着眼于自身的战略利益，也要尊重和考虑对方的战略利益。在国际争端中，争端各方的共同利益是调解国家间矛盾、寻求争端解决办法的基本前提，不同利益的矛盾和冲突则是影响争端和平解决的内在根源。争端各方既要考虑到自身的战略利益，又要考虑对方的战略利益，在不损害各方根本利益的基础上双方都作些让步。

（二）和平解决国际争端，需要以国家的综合国力为基础

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能不能取得成功，其中很关键的一条就是国家要有一定的实力，在国际上有一定的地位。邓小平在分析中英香港问题谈判为什么取得成功时说：“并不是我们参加谈判的人有特殊的本领，主要是我们这个国家这几年发展起来了，是个兴旺发达的国家，有力量的国家，而且是个值得信任的国家，我们是讲信用的，我们说话是算数的。”[10]只要经济上去了，综合国力提高了，在国际上就有地位，解决国际国内问题就有牢固的基础。如果经济上不去，不仅解决国际争端难以实现，而且国内容易发生问题，从而引起动荡甚至内乱，并有可能出现新的争端。因此，我们要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提高综合国力，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奠定基础。

（三）力争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并不排除武装自卫的正当权利

邓小平在谈到台湾问题时指出：“我们坚持谋求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是始终没有放弃非和平方式的可能性。”[11]这虽是邓小平在谈到我国内政时提出的一条原则，但对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同样适用。因为当今世界并不太平，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以武力作为解决和干涉国际争端的手段，严重损害别国主权，使国际争端的和平解决受到干扰。如果争端一方或几方推行武力政策，企图以武力扩大事端，制造紧张气氛，维护既得利益，那受到威胁的国家则有维护国家利益、以战争反对战争的正当权利。新中国成立后，我们进行的几次边境自卫反击作战以及保卫祖国领海、领空的作战，就是以战争反对战争的正义行动。不排除武装自卫的正当权利，就要有以武力自卫的力量，并有必要的准备。因此，需要加强国防建设，不断提高军队的战斗力。

（四）和平解决国际争端，还有赖于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共同努力

时代的发展变化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提供了历史契机，使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具备可能性，但可能性并不等于现实性，要完全实现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还有赖于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共同努力。一是争端各方要从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世界局势的大局出发，加强合作，寻求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具体途径和方式。争端各方不论国家大小、贫富，一律平等，应在尊重历史和现实的基础上，互谅互让，寻求妥善的解决办法，使各方都能接受。二是联合国和区域性组织要摆脱霸权主义国家的控制，防止被极少数别有用心的大国所利用，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发挥更大的作用。三是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要团结起来，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对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干扰。只要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加强合作，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就大有希望。

（作者工作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

注释：

- [1]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87页。
- [2]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9页。
- [3]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6页。
- [4]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1页。
- [5]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2页。
- [6]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3页。
- [7]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8页。
- [8]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1页。
- [9]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48页。
- [10]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85页。
- [11]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86—87页。

邓小平外交思想初探

李 宏

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提出了一整套包括外交工作在内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他的外交思想包含的内容很丰富，其基本的方面有以下几点：

一、关于时代主题和国际形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对时代主题的看法和国际形势的判断有了变化，更新了以往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战争和革命时代”的论断。经过长期科学、细致的对世界大势和我们周围环境的观察和分析，邓小平认为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并在校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他科学地揭示了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即和平和发展。苏联解体、两极格局终结，世界格局新旧交替，朝着多极化的方向发展，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和平同发展是相辅相成，紧密相连的。没有第三世界民族经济的发展和世界各国的共同繁荣，世界和平是难以保持的，而和平的国际环境又是各国谋求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在和平中求发展，以发展促和平，正在成为一股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邓小平阐明了时代主题和国际形势的基本特征，它要求我们更新观念，决定了我国的内政和外交。

二、中国对外政策的出发点和目标。邓小平认为国家利益是对外政策的出发点，中国对外政策应根据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利益来制定。国家利益的主要内容包括安全利益、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文化利益。其中，国家主权是国家利益的最核心内容，一个国家没有主权就谈不上维护国家利益。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主权更为重要，要始终把国家主权放在第一位。邓小平认为政治稳定是首要的国家政治利益，它是实现其他国家利益的前提和保证。根据中国安全环境的变化，在四化建设的新时期里，中国国家利益的重点是经济利益。中国的国家利益同全世界的利益不是对立的，它是世界利益的一部分，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利益是一致的。邓小平的国家利益观不同于那种狭隘民族主义的国家利益观，不同于狭隘地强调中国自身的利益。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应是一种平等的关系。国家利益与世界利益的统一性，并不等于国家与国家之间不存在着利益冲突，当国家之间有利益冲突时，应注意不同国家之间也存在共同的利益，通过寻求共同利益来解决国家利益的冲突。为了实现国家利益，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是争取世界和平，要争取和平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强权政治，促进世界的发展，为我国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

三、全方位的对外开放。邓小平根据世界各国发展历史经验和当今世界基本特征与发展趋势，强调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闭关自守不行，开放不坚决不行，实行全方位的开放政策才是中国的希望。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孤立状态下实现现代化，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行的。对外开放是一种手段，它的实质就是吸收世界文明成果，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我们的对外开放是对世界所有国家开放，对各种类型的国家开放。邓小平还就对外、对内开放的范围、规模、领域、渠道、步骤、布局、形式等作了具体的论述，从而形成了我国全方位、多层次的长期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

四、独立自主的对外战略。邓小平认为，中国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独立自主，对一切国际问题都根据其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态度和对策。中国不看别国眼色行事，不迁就国际上的临时事变，始终坚持以是否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各国友好合作和促进世界经济繁荣作为判断是非的根本标准。邓小平在新的国际形势下，改变了过去结盟和“一条线”、“一大片”的外交战略，提出不打牌、不结盟的外交原则，在世界上树立我们“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独立自主是我国对外关系的基本立场，也是对外开放中必须坚持的重要原则。中国这样的大国搞建设，不靠自己不行，主要靠自己。我们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希望获得更多的国外资金和先进技术，但绝不接受任何国家的控制与摆布，绝不允许任何国家损害我们的独立、主权、安全和根本利益。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实行对外开放，而对外开放则要有利于增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能力。

五、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邓小平坚持“中国属于第三世界”的战略方针，重视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与合作，尤其与近邻的友好合作关系。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现在属于第三世界，将来发展富强起来，仍然属于第三世界。中国是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的命运是共同的，中国永远不会称霸，永远不会欺负别人，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中国这一票是第三世界的，是名副其实地属于第三世界不发达国家的。中国在国际问题上无所作为不可能，要有所作为，但中国永远不当头。邓小平主张第三世界国家要联合起来，维护政治独立，促进经济发展，共同努力奋斗。他在同第三世界一些国家领导人会谈时说：我们现在还不富裕，在财力上对你们帮助不大，但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经验教训告诉朋友们，这也是一种帮助。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一条最重要的原则，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各国要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制定发展战略和政策，创造自己的模式。第三世界国家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合作，可以解决许多问题，前景是很好的。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又是社会主义国家，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是中国的真正朋友，中国将坚持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团结与合作的对外政策。同第三世界团结与合作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基石。

六、警惕西方没有硝烟的世界大战。80年代后期，美苏关系缓和后，西方世界与第三世界之间的矛盾以及西方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仍然存在。邓小平分析说，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美国现在有一种提法，即打一场无硝烟的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为了对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们既搞“西化”，又搞“分化”，既保持“压力”，又保持“联系”的“两手促变”战略，邓小平提出一系列反对全盘西化、防止和平演变的方针。我们不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更不能丢掉我们制度的优越性。中国要搞现代化，绝不能搞自由化，在实行开放政策的同时，要刹住自由化风，在扩大对外交流的同时，要抵制外来的腐朽思想。在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时，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不可以让资本主义文化中对我们有有害的东西畅行无阻，绝不允许把我们学习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技

术和某些管理的经验，变成了崇拜资本主义、受资本主义腐蚀、让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泛滥，丢失社会主义中国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面对风云突变的国际局势，邓小平及时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的方针。他强调要抓住机遇，发展自己，把经济搞上去，并斩钉截铁地表示，现在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鲜明地坚持社会主义，防止和平演变。

七、关于“一国两制”。在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代世界两大主题的国际背景下，邓小平从中国和世界实际情况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为中国完成统一大业指明了道路，也为世界局势的稳定提供了新思路。1984年2月，邓小平提出：“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方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1]我们提出的大陆与台湾统一的方式是合情合理的。统一后，台湾仍搞它的资本主义，大陆搞社会主义，但是是一个统一的中国。一个中国，两种制度。香港问题也是这样，按照“一国两制”的方针解决统一问题后，对香港、澳门、台湾的政策50年不变，50年之后还会不变。“一国两制”，是从我们自己的实际提出来的，但是这个思路可以延伸到某些国际问题的处理上，为世界各国提供了国家间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一个范例，为国际上许多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些有益的线索。“一国两制”，使本来对立的两制关系能够和平共处，它主张在尊重历史和现实、互不伤害、照顾多方利益的基础上，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合理地解决一切国际争端，而不应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有些国际上的领土争端，可以先不谈主权，先进行共同开发。“一国两制”构想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很重要的一个内容，也是一个对国际上政治和战略有意义的想法。

八、关于建立国际新秩序。1988年12月，邓小平会见来访的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时，首次提出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张。他说：世界上现在有两件事情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邓小平强调现在确实需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准则，并主张中国要有所作为，积极推动国际新秩序的建立。中国的国际新秩序外交，以和平与发展为共同目标，反对建立任何霸权和强权政治；主张国际并存的两种制度和三类国家，即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对话合作；以国家主权利益为共同基础，照顾所有国家的利益，不要求摧毁任何一种社会制度，不排斥任何一个国家，实行“一球两制”。中国 and 世界各国人民向往的新秩序同旧秩序是相对立的。旧秩序是由帝国主义建立的，与战争相联系，以不公正、不平等、贫富差距悬殊的国际经济关系为基础，以强权为纽带，大国控制世界，而大多数国家和民族处于从属地位、不平等和贫穷状态。新秩序是由世界各国参与建立，反对战争，摒弃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富压贫和由一两个大国或几个大国垄断国际事务，寻求公正合理的原则为纽带，共同发展经济。国际政治新秩序同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是互相促进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是国际政治新秩序建立的基础，国际政治新秩序是国际经济新秩序建立的必要前提。国际新秩序的建立还需要世界各国长期共同努力才能实现。

九、党的对外工作和国际共运战略。邓小平在推进中国发展的同时，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形成了建立党际关系的一系列原则和方针，以及国际共运的战略思想。邓小平指出，党与党之间的关系，有两条原则一走要坚

持，即党与党之间的关系是平等关系，不是父子党的关系，任何国家的事情只能由那个国家的党和人民去判断。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对别国党有些事情我们是不赞成的，但是不赞成是一回事，指手画脚却是另一回事。国家无论大小，党无论大小应该一律平等。任何大党、中党、小党，都要相互尊重对方的选择和经验。各国党的国内方针、路线是对还是错，应该由本国党和本国人民去判断。一个党犯了错误，也要由自己去总结，自己去解决问题。一个党和由它领导的国家的对外政策，如果是干涉别国内政，侵略、颠覆别的国家，那么，任何党都可以发表意见，进行指责。由于每个国家、每个党都有自己的经历，情况千差万别，因此，我们历来主张世界各国共产党根据自己的特点去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离开自己国家的实际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所以我们认为国际共运没有中心，不可能有中心。我们也不赞成搞什么“大家庭”，独立自主才真正体现马克思主义。我们党根据邓小平的论断，提出了建立党与党之间新型关系的四项原则，即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判断国际共运的是非不能以一国一党的经验和实践作为标准，只能根据各国党的实践和经验来判断。社会主义没有固定模式，改革也要从各国实际出发，不要照抄照搬。要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本质，通过改革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要正确对待个人的作用，不要把一个党、一个国家的希望系于一两个人身上。对国际问题采取不争论的原则。苏东剧变之后，邓小平认为：只要中国社会主义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将始终站得住。国际共运虽陷入低潮，但社会主义没有失败。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个伟大的试验，对世界有重大影响。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象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了锻炼，从中吸取了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所以，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

十、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对世界的贡献。邓小平论述了我们国家和民族在现代、当代和下个世纪从“站起来”到“站得住”，一直到“有能力永远岿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变化。中国现在已经是一个政治大国，但还不是一个经济大国，仍然受到霸权主义的威胁。世界格局出现多极化的趋势后，邓小平对将来是怎样的多极结构未作定论，但他指出：所谓多极，中国算一极，中国不要贬低自己，怎么样也算一极。中国占世界人口的 1/5，如果中国能发展起来，就改善了人类 1/5 的生活条件；如果中国能有充分的安全，就意味着世界 1/5 的人可以生活在和平的环境里。维护中国的安全和稳定实际也是维护世界的安全和稳定，帮助中国经济的发展也是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中国的发展强大，有助于中国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所谓“亚洲太平洋世纪”，没有中国的发展是形不成的。如果中国要对国际共运、对人类做出重大贡献的话，关键是中国要真正地发展起来。邓小平论述了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中国必将经过“小变化”、“中变化”到达“大变化”，从而实现“振兴中华民族”，“真正对人类作出了贡献”的宏伟目标。随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成，中国成为一个经济大国，基本上实现现代化，综合国力达到世界前列，社会主义中国在国际上的分量和作用就不同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将会更加提高，在国际事务中也将起更大的作用，成为多极世界格局中重要的一极。中国可以为人类做更多的事情，在解决东西、南北问题方面尽更多的力量。

邓小平对国际问题深刻而全面地分析和论断，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极强的针对性。他提出的一系列重要的外交战略、政策和方针，适应了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成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的外交思想具有中国特色，是一个完整的、有机的科学理论体系，是成功地开展当代中国外交的理论依据和指导思想。

（作者是北京广播学院社会科学部副教授）

注释：

[1]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9页。

全面认清我国政府的对外职能开拓经济建设的外部环境

徐功敏

在政治体制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深入开展的今天，科学地厘定我国政府职能具有重要意义。关于政府职能，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政府职能历来有两职能说和三职能说两种，前者认为政府职能是对外反抗侵略，对内镇压敌对阶级和敌对分子，实行政治统治。后者认为政府除了上述两种职能以外，对内还有管理社会，发展经济的职能。两职能说实际上是把国家看成单纯的暴力机器，三职能说则认为国家对内除了政治统治以外，还有管理社会经济的职能。经过一段时间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检验，现在三职能说已占上风，很少有人再坚持两职能说了。这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发展。它为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确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等重大决策，作出了理论解释。

但是三职能说还是有缺陷的，这种理论观点已落后于实践的发展。三职能说认为政府的对内职能有政治统治和管理社会双重职能，但对外职能还停留在反抗侵略的单一职能上。世界上问题是复杂的，多侧面的。古今中外国家间固然有建立在强凌弱、大欺小、寓压穷基础上的侵略与反侵略、奴役与反奴役、颠覆与反颠覆、干涉与反干涉、渗透与反渗透的互相冲突和对抗的关系，也出现过和亲、交流、通商互市、共处共进、互利性的协议和各种形式联合的关系，这便是几千年人类文明史民族国家间的和战交替发生的根由。

战争的主要根源在剥削制度，和平是社会主义应有之义。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发布的第一个法令是“和平法令”。但是帝国主义视社会主义国家为洪水猛兽，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14个资本主义国家出兵武装干涉，妄图把苏维埃制度扼死在摇篮里的图谋失败后，接跑而来的是国际资本对社会主义苏联的包围、孤立和封锁。冷战转化为热战的危险就象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头上，时刻威胁着苏联的生存和发展。在这种险恶形势下，当时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政府的对外职能立足于反侵略、反干涉是可以理解的。列宁提出过和平共处的原则，苏联也赢得了大约20年和平建设时期，为反法西斯战争作了物质和精神准备，但是当时作为对外关系的指导原则条件尚不具备。新中国成立初期，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对站起来的中国人民是敌视的，我们顶住了他们的压力，坚持反对美国的侵略威胁，对他们的和平演变阴谋也有所警惕。与此同时，争取用和平方法解决两国争端。我们和苏联建立友好互助关系，积极发展同新兴民族独立国家，尤其是邻国的关系。1953年中印谈判中，我国首次提出以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关系的准则，得到印度的赞同。随着我国和平外交的扩展，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影响越来越大。1955年亚洲国家万隆会议公报提出的促进世界和平合作十项原则，实际上也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延伸。50年代末期以后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我们基本继续实行既定对外政策，在许多方面打开了国际关系的局面。在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友好合作，联合第二世界国家，结成国际反霸统一战线，缓和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关系，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等方面都取得了进展。但在“左”的思想影响下，曾经把国际阶级斗争形势估计得

过于严重，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立足于早打大打，准备几个方面都来打。“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备战、备荒、为人民”成为一段时期工作的指导方针。工业的投资布局也从备战要求出发，以经济不发达，交通不便利的西部山区为主，国防工业占据较大比重，这对全面均衡快速发展经济建设，不是最好选择。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随着工业重点转移，提出在坚持社会主义前提下，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任务。在平反冤假错案的同时，调整了国内的社会关系，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并且尽可能地把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伟大的事业服务。十五年来，基于世界形势的变化和国家建设需要，我们也调整了对外的方针政策。邓小平同志在1980年说，在非常动荡、充满危机的年代，如果反霸权主义斗争搞得不好，可以延缓战争的爆发，争取更长一点时间的和平。我们的对外政策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当然原定的独立自主、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等方面的政策还是坚定不移地贯彻始终的。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的前提下，确定对外开放的政策，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参与国际竞争与国际经济合作，引进外来资金、技术、人才和管理经验，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在祖国统一问题上，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创造性构想和政策，在确保祖国统一、大陆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同时，允许台港澳地区保持原先的资本主义制度，以维护其稳定繁荣，也有利于整个中华民族的福祉。

对外政策调整是从国际国内环境现实出发的。二次大战后两霸对峙，世界处于“恐怖平衡”之下。连绵不断的地区战争和国内战争，更使一些发展中国家人民流离失所，生命财产遭受损失。长期的军备竞争，吞噬了大量宝贵资源，妨碍一些紧迫的社会经济问题的解决。西方国家已由战后相对稳定发展进入胀滞和低速增长阶段，衰退和失业威胁到广大劳动者的生活，因此引导经济复苏和扩大就业不能不列入政治家的重要议事日程。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失误，影响了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需要调整政策。长期生活于贫穷落后境遇的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谋求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心情最为迫切。一些东亚国家和地区稳定发展的实例，更具有强烈的示范效应。这种发展经济上升为国家头等大事的世界潮流，正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东西南北问题，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的现实依据。当然，原有社会制度间矛盾、民族国家间矛盾、文化传统间矛盾并未消失。发展需要和平，和平离不开发展。生活在同一个星球上，彼此之间既有矛盾、对抗、冲突、斗争的一面，也存在建立在某些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合作、交流、对话、沟通等互相妥协的另一面。每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家和政府不能不看到，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建立合理的世界经济政治秩序对大家都有好处。人口、环境保护、资源开发等都是涉及全人类的问题，贩毒、恐怖活动及其他一些反社会的刑事犯罪常常会突破国界的。所以，国与国之间和平共处及一定程度的互利合作，不仅是美好的理想，也具备相当的客观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实现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演变的转折点，并逐步形成“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前提下，我国政府的管理社会、发展经济的国内职能越来越突出。从来国家的对外政

策是对内政策的继续和延长，并为对内政策服务的。我国原先的对外政策的许多方面是正确的，但也不能不看到，存在着“左”的影响。实践证明，一个贫穷落后、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的东方大国，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邓小平同志正是基于这种判断，才作出对外开放决策的，并确定为基本路线的重要内容，“一百年不变”。既然要扩大开放，国家之间求同存异，寻求合作，在和平共处原则基础上缓和国际关系是适当的。这将进一步改善我国经济建设的外部环境。但丝毫不意味着对亡我之心不死的敌对势力放松警惕。

从追述国家，特别是我国政府对外职能的实际演化过程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古今中外的国际关系既有互相冲突、对抗的一面，又有互利合作的另一面。这种国际关系反映在我国政府的对外职能上，既有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开展反侵略、反干涉、反颠覆、反渗透的斗争的一面，又有积极打开对外关系，扩大开放，在平等互利基础上达成某些协议或谅解的另一面。认清我国政府对外职能的两重性，就可能结识更多的朋友，组成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赢得良好的国际环境。同时也有利于在和平共处原则基础上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其中包括建立平等互利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国家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和工具，这个反映国家本质的论断是马克思主义颠扑不破的真理。而政府职能，则正象反映在对内职能上，有政治统治与管理社会两个方面一样，对外职能也有反对侵略与和平合作两个方面。理论应该能解释实践、指导实践，当实践已超越理论，理论就不能墨守成规，应该突破原有某些框框，提出新的观点，这也是遵照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一贯倡导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具体行动。

（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研究员）

“一国两制”战略构想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

郝智慧

用“一国两制”方式来和平实现国家统一的战略构想，是邓小平坚持从实际出发，在领导全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提出的一个全新概念和科学理论。1987年4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个特色，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对香港、澳门、台湾问题的处理，就是‘一国两制’。”[1]随着香港、澳门问题的成功解决，这一构想和理论日益显示出它的生命力和感召力。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实践的伟大成果，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当代中国的一个重大发展。

一、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一个新概念和新范畴

根据邓小平的有关论述，“一国两制”的科学涵义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根据本国宪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允许在这个国家的小地区和小范围内长期实行资本主义。但是，这个小地区、小范围的政府是这个国家的特别行政单位或地区性政府，不能行使国家主权。这个国家的主体是社会主义。具体他讲，就是在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主体地区10多亿人口的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和台湾这些特殊地区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可见，邓小平所讲的“一国两制”，是一个具有特定涵义的全新理论概念。

我们说“一国两制”是一个全新的理论概念，不仅仅因为它具有特定的内涵，还在于它具有不可移易的基本内容和特征。就“一国两制”的基本内容而言，主要包括以下六个方面：一是旨在用和平方式解决统一问题，并在国家统一、领土完整的大前提下允许个别地区的资本主义制度与主体地区的社会主义制度长期并存；二是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个别地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组成部分，不能行使国家主权，不能行使整个国家的外交、国防、宣战、媾和等权力；三是有国家宪法和有关法律作保证，不会因意外事件或人事变动而改变。如果实行不同制度的两地发生矛盾和纠纷，双方均应诉诸宪法和法律，通过和平途径来解决；四是指两个地区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以及意识形态、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存有明显的本质区别。个别制度不同，或者在各种制度上存有一般性质的不同，都不能视为“一国两制”；五是以一个国家、一个中国内两种制度都不变为基础，如果其中一个方面变了，“一国两制”也就不复存在了；六是谁也不吃掉谁，你搞你的资本主义，我搞我的社会主义。大家和平相处，互相尊重，互不伤害，互助互利，共同为振兴中华而奋斗。

就“一国两制”的基本特征而言，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单一制国家实行的一种国家结构新模式，具有复合制国家结构模式的某些特点。一般说来，单一制下地方政府的权力和自治程度要比联邦制下成员国政府小得多。然而，在我国单一制的国家结构条件下实行的“一国两制”，却在许多方面不仅超出了一般单一制下地方政府的权力，而且超过了许多联邦制下成员国政府的权力和自治程度。例如，特别行政区依据宪法和法律可以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立法机关所制定的法律，可以同国家颁行的法律不一致，但只要符合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

法律程序便有效；虽无外交权，但有外事权；财政独立，可以自行发行货币，自定金融政策；台湾特别行政区还可以拥有自己的军队，等等。二是国家的主体是社会主义，即中国的主体地区、10多亿人口的大陆坚定不移地实行社会主义。这是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和客观存在的现实，也是实行“一国两制”的前提。正是在这个前提下，才可以允许在国家的某些小地区、小范围内实行资本主义。

二、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相统一的光辉典范

毛泽东指出：我们的原则性必须是坚定的，我们也要有为了实现原则性的一切许可的和必需的灵活性。“一国两制”构想，创造性地运用了原则坚定性和策略灵活性相统一这个马克思主义战略策略的基本原理。它的原则坚定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大陆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中华民族完全取得独立、统一和富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逐步富裕起来。这是中国大陆10多亿人民的坚定信念和基本要求，是绝对不容许动摇的政治原则。也只有中国大陆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不变，坚持改革开放政策不变，才能保证按照“一国两制”构想所制定的一系列特殊政策长期不变。二是中国必须实现完全统一，必须收回主权，早日结束因人为因素而造成的民族分裂和海峡两岸隔绝的状态。恢复对香港、澳门行使国家主权，是关系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的大事，是海内外所有炎黄子孙的共同愿望。在这一点上也是坚定的和毫不含糊的。

但是，为了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实现民族大团结和国家领土完整，“一国两制”在统一祖国、坚持社会主义的前提下，又在某些特殊区域保留资本主义制度。同时，在具体政策和措施方面也有高度的灵活性。例如，按照历史上不平等条约规定的租借期限收回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由当地人自己管理，享有高度的自治权；特别行政区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变，法律基本不变；香港特别行政区仍将保持自由港和独立关税地区的地位，保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建议举行国共两党平等会谈，实行第三次合作，而不提中央与地方谈判；台湾回归祖国后，国共两党将持久合作，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台湾在对大陆不构成威胁的条件下，还可保留自己的军队，等等。这些具体政策和措施都是从实际出发，在考虑和照顾各方面利益与要求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这正是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相统一的主动体现。

三、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

“一国两制”构想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主要表现有三：一是主张把国内阶级矛盾、制度冲突放在国家和民族的总体利益下协调解决。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是我们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也是民族总体的根本利益。为了共同促进民族振兴、国家昌盛，全面发挥国家在组织建设方面的重要职能，充分调动国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和潜力。这深刻体现了国家的民族属性，为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增添了新内容。二是尊重实际、互不伤害，发挥国家在“特殊时期”的“缓和冲突”和“调停人”作用。面对大陆实行社会主义、港澳台实行资本主义的现实，主张谁也不吃掉谁，把相互矛盾、斗争的各方，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个阶级、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并存于一个统一国家之内，把矛盾和斗争置于宪法和法律的“秩序”范围里。这种对现实两种不同制度进行

统一的和平方式，无疑是恩格斯关于国家“调停人”思想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三是明确规定在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大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港澳台保留资产阶级性质的行政、立法、司法机关，台湾地区还可以拥有军队。在两种制度、两种阶级存在矛盾和斗争的情况下，规定由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来调节大陆与港澳台之间的关系，缓和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调停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与斗争。这样就把国家“调停人”和“缓和冲突”的作用由一个国家内的阶级范畴扩大到两种不同社会制度上，这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上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和发展。

四、对和平共处战略思想和战略原则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

和平共处是科学社会主义中社会主义国家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重要思想和原则。它是革命导师列宁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为了处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而提出的。在本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又进一步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使列宁的和平共处思想得到了丰富和发展，并成为国际社会所公认的处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和相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相互关系的基本准则。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明确指出：和平共处的原则不仅在处理国际关系问题上，而且在一个国家处理自己内政问题上，也是一个好办法。根据中国自己的实践，我们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来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这也是一种和平共处。根据邓小平的有关论述，“一国两制”的和平共处具有以下四个重要特征：一是在尊重历史和现实、照顾各方利益和要求的基础上，通过和平谈判方式合理解决问题，而不是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以大陆社会主义为主体；三是有国家宪法、法律作保障，也有国际法作保障。中英两国、中葡两国分别就解决香港问题和澳门问题达成的协议，实际上是一种国际法形式的保障；四是以国家间和平共处为外部条件和基本前提，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英国、葡萄牙、美国等有关国家共同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真诚合作，才能实现“一国两制”的和平共处。

五、发展了利用资本主义来促进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思想

利用资本主义来促进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是革命导师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提出的一个重要理论。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构想，把列宁的这一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境界。过去苏维埃俄国和新中国对资本主义的利用，只限于在社会主义政权下，允许某些资本主义经济成份存在和发展，引进资本主义的资金、技术、人才和管理方法。而“一国两制”构想则是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内容许某些地区保留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连同它的上层建筑以及生活方式，并要充分发挥这些资本主义地区在大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窗口”和“桥梁”的作用。大陆目前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要发展生产力，改变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状况，就必须实行对外开放。香港和台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技术也比较先进。特别是香港，是国际金融、贸易、交通和信息中心之一，与资本主义国家有着密切的联系，是国际资本的集散地。“一国两制”实行后，它们这些地区不仅本身能为大陆社会主义建设直接提供资金和可以借鉴的技术与经验，而且可以成为大陆对外开放的窗口和与国际市场联系的桥梁，通过这些“窗口”和“桥梁”，大陆可以更方便更快地掌握和了解国际市场的形势和信息，可以更多地引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技术、人才和科学的经营管理方式，可以更大规模地培养训练现代化的管理人才和科技人才，可以迅速地扩大进

出口贸易的渠道，这些无疑将大大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充分体现了邓小平这样一个重要思想：“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2]

需要指出的是，允许港澳台地区保留和发展资本主义，发挥它们的“窗口”和“桥梁”作用，并不是为了走资本主义道路，要在整个中国搞资本主义，实现某些人所说的“补课”、“全盘西化”，而是因为这些地区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经济尚有存在的价值，否则“一国两制”就没有实现的前提。至于港澳台的资本主义会不会冲击大陆的社会主义，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中国的主体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在国家经济中占着主导地位，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很强大，在这个前提下吸收外资和允许私有经济发展甚至允许港澳台地区长期保持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不变，都只是作为大陆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补充，有利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正如邓小平所说：吸收外资也好，允许个体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也好，归根到底，是要更有力地发展生产力，加强公有制经济。在小范围内容许资本主义存在，更有利发展社会主义，港澳台保留和发展资本主义“影响不了大陆的社会主义”。

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

统一战线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无产阶级进行革命和建设的重要思想武器。“一国两制”构想极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使我国新时期统一战线在性质、范围、方式、任务等方面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使统一战线的内容得到了进一步丰富和具体化。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使统一战线的爱国主义性质更加突出了。爱国主义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是我们国家统一的大趋势历经数千年而不衰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所在，也是重新实现国家统一和民族振兴的强大动力。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构想高举爱国主义旗帜，把民族和国家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放在首位，以实现国家统一、领土完整为目标，以爱国统一、振兴中华、实现民族大团结和大繁荣为实践口号。不管什么人，只要爱国、爱民族、拥护统一，就要团结，就要争取到爱国统一战线之内。邓小平在谈“港人治港”问题时指出：爱国者的标准是，尊重自己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只要具备这些条件，不管他们相信资本主义，还是相信封建主义，甚至相信奴隶主义，都是爱国者。二是使统一战线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了。在“一国两制”战略构想指导下，我国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已由“革命的爱国统一战线”转变为“爱国统一战线”，成为包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华侨在内的，由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组成的最广泛联盟。也可以说，新时期的爱国统一战线包括了一切有爱国心的中华民族子孙。三是为统一战线工作提供了新方式，开辟了新领域。在不同历史时期，统一战线的形式是不同的。根据“一国两制”战略构想，新时期统战工作要在祖国统一、繁荣、富强的共同利益之下，进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联盟与合作，这是一种崭新的统战方式。另外，“一国两制”下的“港人治港”等特别行政区政府，实际上也是一个统一战线的政权。正因为如此，“一国两制”使新时期统战工作的领域将由主要在大陆范围扩展到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由主要在国内开展工作扩展到面向世界，包括一切有爱国心的海外华侨

以及英、美、葡等国的领导人、重要人士、政府部门和民间团体；由主要对老一辈、执政党、著名人士进行统战工作扩展到新一代、广大爱国同胞和普通人士；由主要是政府部门、党和国家领导人做统战工作，扩展到各级政府部门、各种民间团体人士与海外有关系甚至无关系的广大群众；由主要在政治领域扩展到经济、文化、教育、体育和外事甚至军事领域。这样做，有利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使各种力量汇合在一起，共同为建设四化、统一祖国、振兴中华做出贡献。

（作者工作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一室）

注释：

[1]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18页。

[2]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

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国际机遇与挑战

吴仁彰

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总结历史经验，立足中国国情，把握世界潮流，绘制了跨越 20 世纪和 21 世纪的振兴中华民族的伟大蓝图。为了实现这一伟大蓝图，邓小平同志还制定了一整套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抓住有利的国际机遇，加速发展，实现分三步走的伟大发展目标，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 15 年来，中国的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 9.7%，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奇迹”，振奋了整个中华民族。这是邓小平同志的战略思想的伟大成果。

一、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难得的国际机遇

在现代条件下，国际环境对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有着极其重要意义。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要取得成功，决定于两个条件。一个是国内条件，就是坚持现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如果改革成功，会为中国今后几十年的持续稳定发展奠定基础。还有一个是国际条件，就是持久的和平环境。”
[1]

中国要实现自己的发展战略，首先必须分析国际环境，即对当代世界形势的特点、走向及其对中国的影响，作出正确的判断。一部《邓小平文选》第 3 卷，论述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发展战略时，都贯穿着对世界形势的深刻分析和估量，这几个方面的思想互相密切联系，构成邓小平同志的统一的战略思想体系。

目前的国际形势，十分有利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现在就是好机会，”中国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这是邓小平同志研究当前国际形势后得出的一个重要战略思想，一个已为实践所证明的科学论断。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正逢百年难得的机遇，为什么呢？

1. 时代主题的转变，已使中国有可能争取到进行现代化建设所必需的较长时期的和平的国际环境。

要建设，没有和平的环境不行。当前世界的形势，是过去我们估计那样“战争迫在眉睫”，“山雨欲来风满楼”？还是战争可以推迟或避免，从而使可能争取到较长期的、和平的国际环境？这是中国把战略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时首先遇到的问题。

邓小平经过“几年的仔细观察”，终于作出了科学的结论，1983 年 3 月，他正式提出：大战打不起来，以前总是担心打仗，每年总要说一次。现在看，担心得过分了。我看至少十年打不起来。1985 年 5 月份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进一步提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2]他还在这次会议上及以后的讲话中作了极为深刻的论证。

世界战争之所以可能避免，首先，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3]其次，是有资格打世界大战的是苏联和美国两个超级大国，现在苏联解体了，两个超级大国对抗的局面不存在了；第三，世界经济已在相当大程度上整体化，各国的经济日益彼此依赖，相互渗透，如摧毁对方，同时也摧毁自己的财富；最后，在核武器发展的条件下，双方都有“毁灭对方的力量”，核战争将给人类的生存带来严重的威胁。

世界形势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亚非拉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相继独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了自我调整，缓和了社会矛盾，促进了科技革命的发展，转入了相对的和平发展时期。

世界形势的这些重要变化，使时代的主题发生了转换，从过去的时代主题“战争与革命”逐渐转换为目前时代主题“和平与发展”。邓小平同志敏锐地注视着时代主题转换的重要现象，及时地进行了理论的概括。1984年5月，他首次正式提出，现在世界上问题很多，有两个比较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即发展问题。后来，又进一步指出，这两个问题是“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并进行了详尽的论述。

时代主题的转换，使中国有可能争取到较长时期的有利于发展的和平国际环境。这是中国现代化建设难得的国际机遇。自从鸦片战争以来，在长达100多年中，中国一直不断遭到外敌入侵或处在严重的战争威胁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又被迫打了3年抗美援朝战争。60年代至70年代，又发生中苏军事对抗，实行“备战、备荒、为人民”政策，“准备大打、早打”。可以说，在这漫长的岁月中，中国始终没有获得过较长一些时间的稳定的和平国际环境，总是“树欲静而风不止”。现在终于可能获得这种环境，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来说，确是百年难逢的良机啊！

2. 世界多极化发展趋势，有利于中国的对外开放和推进现代化建设事业。

由于世界发展不平衡的规律的作用，80年代以来，世界出现了多极化发展的趋势。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苏东国家相继发生剧变，苏联解体，标志着冷战时期和两极对峙的世界旧格局正在结束，世界进入冷战后时期，加速向多极化的新格局过渡。

邓小平同志密切地注意世界多极化的发展趋势，指出：“世界格局将来是三极也好，四极也好，五极也好，苏联总还是多极中的一个，不管它怎么削弱，甚至有几个加盟共和国退出去。所谓多极，中国算一极。中国不要贬低自己，怎么样也算一极。”[4]

在多极化条件下，中国“怎么样也算一极”，这有着非常深刻的意义。过去在美苏两大集团对抗时期，由于中国特殊的战略制衡作用，形成了“大三角”关系。现在在新的世界格局中，中国将以独立的一极发挥作用，从而大大提高自己在世界上的战略地位。这种形势将十分有利于我国执行独立自主的发展战略和维护和平、反对霸权主义的外交政策。

其次，多极化的发展趋势，打破了过去“美苏垄断一切”的局面，扩大了各国自由发展双边和多边关系的空间。这有利于我们在世界上寻找平等互利合作伙伴。哪里有利，我们就向那里发展合作关系。“我们同谁都交往，同谁都交朋友。”

还有，多极化的趋势，增加了我们利用矛盾、击破某些外国势力阴谋孤立和“制裁”我国的机会。1989年“六·四”事件后，一些西方国家对我实施“制裁”。当时邓小平同志针对对国际形势估计的某些悲观情绪，深刻地分析了从两极格局向多极格局发展过程中的诸矛盾，指出：现在“世界上矛盾多得很，大得很”，矛盾越来越突出。过去两霸争夺世界，现在比那个时候要复杂得多，乱得多。“我们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握。”[5]后来的事实证明，过去在两极格局条件下，西方国家不是铁板一块，现在多极化条件下，它们更不是铁板

一块。所谓“制裁”没有支撑多久，就土崩瓦解了。

最后，世界格局转变过程中，还会给我们提供各种暂时机遇。例如，苏东剧变后，原苏东地区要稳定下来需要一个过程，在一个时期内它们将难于建立大量吸收外国投资的必要环境，这就客观上造成了有利于我国吸收外资的机遇。

3. 世界形势中经济因素的作用日益增长，经济逐渐成为国际竞争的主战场，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广大的国际机会。

邓小平同志早在 1985 年即敏感地抓住这一世界形势发展的新趋势，指出：“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这种形势，无论美国、苏联、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不能不认真对待。”[6]

这种趋势是由两个因素决定的：（1）时代的主题已由“战争与革命”转换为“和平与发展”，世界竞争的重点势必逐渐转移到经济上。（2）世界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已使过去的军事实力为基础的世界竞争转变为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各国综合国力的竞争。在新科技革命条件下，一个国家的实力及其对国际局势的影响能力，已不以单纯的军事力量来衡量，而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来衡量。

在世界竞争中经济因素作用日益重要这一趋势日益反映在各国的对外政策上：在国家利益中，经济利益的地位日益突出；在国家安全政策中，经济安全的地位日益突出；在政府的对外职能中，促进和发展对外经贸关系的职能日益增强。各国政府直接施加影响，为本国企业争取扩大市场和有利的投资环境，创造竞争优势，已成为当前国际关系中引人注目的现象。

这对中国现代化建设是一个重要机遇。

第一，在这种形势下，某些外国势力已难于利用意识形态和政治问题为借口，阻挠中国的对外开放。1994 年美国克林顿政府宣布中美最惠国待遇问题与人权问题脱钩，是有深刻意义的。为什么过去坚持两者挂钩的克林顿政府要这样做呢？正如西方国家舆论所指出的，经济利益压倒了意识形态的争端。总之，形势比美国总统强。

第二，在这种形势下，世界贸易自由化已成为一种趋势。1993 年 12 月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达成协议，决定创建世界贸易组织，以及 1994 年 11 月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首脑会议通过的关于促进亚太地区贸易自由化的“茂物宣言”；均是这一趋势的反映。这是机遇，也是挑战。然而，首先是机遇，为中国进入世界大市场、参与国际竞争提供了广大的舞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外贸进口总额，已从 270 亿美元（1979 年）激增至 1957 亿美元（1993 年），1994 年将超过 2000 亿美元，发展之快，超过邓小平同志的预料（1985 年邓小平同志曾预计，到本世纪末中国外贸总额将达到 2000 亿美元）。[7] 对外贸易已日益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第三，在这种形势下，中国的大市场在世界上具有越来越大的吸引力，潜力之大，被公认为世界之首。克林顿延长中美最惠国待遇的原因，是“不能无视世界潜力最大的市场”；德国的“新亚洲政策”的核心，是推动德国企业界进入中国大市场；法国政府不得不修改有损中国主权的向台湾出售军火的政策，是有感于“失去中国大市场”的巨大压力；英国在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谈判破裂之后，最近又强调要使中英关系“重新变暖”，原因之一是“我们谈论那么久的那个巨大的潜在的市场（指中国市场）已经出现在我们的面前”，这对英国是“一个机会”。这种形势无疑对中国吸引外资、发展对外

经济贸易，是相当有利的。

4. 亚洲太平洋地区经济的较快发展，尤其是东亚地区经济的兴起，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地缘经济环境。

70年代以来，亚洲太平洋地区、特别是东亚地区经济的兴起已成为举世瞩目的现象。

1993年亚大地区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总额的54%以上，而且继续以高于世界平均增长速度之势发展。80年代和90年代初，东亚多数国家的经济增长都持续在7%以上。

中国是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大国，与本地区各国地理相近，交通方便，经济互补性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本地区经济的兴起，恰相呼应，彼此推动。

东亚地区各国是中国的周边邻邦，不仅有地利之便，而且文化传统方面有许多相同因素，国情相近，都是正在兴起的发展中国家（日本除外），易于彼此理解，相互支持。中国与东亚各国同时维持快速增长已达10多年，组成当今世界上独特的快速增长区，这不是偶然的，彼此推动，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总之，我们必须认清形势，抓住机遇，首先是认清国际形势，抓住国际机遇。国内的机遇难得，国际的机遇更难得。毛泽东同志说过，自从资本主义出现以后，世界的事情就联成一片了。这是50年前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深刻认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与世界的总形势息息相连。世界如此之大，事情错综复杂，不可测因素众多，非一国或一地区所能左右。有利的国际环境是很难得的。例如，20世纪上半叶世界上打了两次世界大战，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自卫力量薄弱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虽想发展但可能吗？只是在20世纪下半叶，时代的主题逐渐从“战争与革命”转换为“和平与发展”，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才可能获得有利于发展的世界总环境。应该说，目前世界的总形势对中国的发展是相当有利的，不仅使我们有可能争取到搞现代化建设所必需的较长时期的和平国际环境，而且还给我们参与国际竞争和在世界上寻求合作伙伴、发展对外经贸关系，一句话，为实现我国的对外开放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广泛的机会，使我们占有有利于发展我们国家的地缘政治经济条件。这是现代世界形势诸因素综合的产物，这是“机会难得啊”！

二、中国面临的严峻的国际挑战

毛泽东同志说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机遇与挑战是并存的，利益与风险是共生的，而且往往机遇越大，挑战越严峻；利益越大，风险越多。我们要抓住机遇，就必须认真对付挑战，化解挑战，变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

邓小平同志在论述中国发展的难得的国际机遇时，始终都提醒我们要重视严峻的国际挑战。他指出，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前时代的主题，但同时提醒我们“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他指出，旧的冷战可能结束，但同时又提醒我们：“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8]

在目前的形势下，中国面临的严峻的国际挑战，主要有三类。

第一类挑战，是政治和安全方面的挑战。

世界战争已经可能避免，但可能性不等于现实，和平问题“至今没有解

决”。要使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仍须世界各国人民作出很大的努力。

大规模的世界战争可能避免，但“小的战争不可避免”。冷战结束后，这种小规模的地地区局部战争时起时伏，在一些地方平息了，在另一些地方起来了，在一些地方则从未中断过。中国必须警惕注视这些“小的战争”，特别要注意那些对我国安全有威胁的小战争或可能爆发这类小战争的热点的形势。

然而，在目前，中国在政治和安全方面要应付的严峻挑战，首先是某些外国势力对中国实行的“西化”和“分化”政策。

所谓“西化”政策，就是邓小平同志说的某些外国势力要“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9]在目前的形势下，我们要特别注意三个动向：（1）以所谓“人权”问题促变。最近美国克林顿政府虽然把中美最惠国待遇与“人权”问题脱钩，但在“人权”问题上的斗争尚远未结束。西方国家仍在坚持“人权”政策（以“人权”为借口干涉别国内政），这是他们的“一项根本政策”。（2）“通过接触促变化”。某些外国势力看到孤立中国不可能，转而寄希望于通过日益扩大的接触，传播西方的政治价值观，促中国演变。（3）以扶持政治反对派促变。英国之所以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执意在香港推行所谓“政改”，实际上亦属于此类。

所谓“分化”政策，就是某些外国势力策划分裂中国的民族大团结和中国领土的阴谋活动。在目前的形势下，我们要特别注意两个动向：（1）某些外国势力鼓动和支持“台湾独立”运动或所谓“独立的台湾”的政策。最近，某些国家以各种名义提高与台湾往来的官员级别，试图突破“不与台湾发生官方关系”的界线，这是应该警惕的。（2）某些外国势力鼓动和支持西藏的民族分裂分子的活动。

此外，我们还必须密切注视南沙群岛的形势。

第二类挑战，是经济方面的挑战。

邓小平同志在谈到中国发展的国际机遇时特别提醒我们：“世界市场已被别的国家占去了，我们面临这么一个压力。”中国是在这样情况下参与国际竞争的。

现在，在国际竞争中我们正面临两种压力：

第一种压力，是世界贸易自由化的压力。如上所述，世界贸易自由化趋势，是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良好机遇，也是一场严峻挑战。首先，现在世界市场竞争，不仅是价格竞争，而且更重要的是质量、技术、信息和营销策略的竞争，在后几个方面我们并不占优势。其次，过去中国的国内市场在不少方面受着高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保护，这些贸易保护正受到世界贸易自由化浪潮的强烈冲击，艰难的中国复关谈判反映着这一严峻形势。毫无疑问，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将坚持维护“关贸协定”给予自己的权益，然而，延缓一些时间是可以的，但终归要与国际贸易规则完全接轨。这对中国的企业将是一场严峻的考验。

第二种压力，是世界一些国家和地区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在目前的形势下，贸易保护主义有一些新的特点，我们要特别注意三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1）地区集团的贸易保护主义；（2）以“反倾销”形式出现的贸易保护主义；（3）美国式的单方面宣布实施的贸易保护主义，例如，所谓超级“301”条款。

此外，还有一种邓小平同志称之为“友好的压力”。这就是我国周边的东亚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多年来保持着持续快速增长的势头，并已在世界市场上占有一定的位置。如果我们不抓住机会使经济上一个台阶，别人会跳得比我们快得多，我们就会落后了。90年代以来，越南、印度等国也加快了发展速度，在这昔日“落后的亚洲”上，一片经济起飞景象。“人们都在说‘亚洲太平洋世纪’，我们站的是什么位置？过去我们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现在比下也有问题了。”[10]这种来自友好邻国的竞争压力，也是中国在经济方面面临的一种严峻挑战。

第三类挑战，是科技方面的挑战。

50年代以来，世界进入新科技革命时代，然而由于“左”的路线干扰，中国“耽误了20年”，在60年代中国的技术水平与日本差不多，而到80年代日本成了超级经济大国，中国的科学技术落后了。邓小平同志以敏锐的观察力注视着世界新科技革命的蓬勃发展，及时地指出：科学技术已成为第一生产力；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

改革开放15年来，在邓小平同志的正确方针指导下，中国的科学技术已有较大的发展，然而，西方发达国家的科技革命浪潮仍在一波高过一波。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仍然与它们有着相当大的差距。现在世界的发展一日千里，每天都在变化，特别是科学技术，追都难追上。“下一个世纪是高科技发展的世纪。”[11]中国能不能抓住时机，“不安于落后”，在世界科技革命中迎头赶上，特别是要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这将是又一个严峻的考验。这对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有着决定性的意义。

三、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振兴中华

“抓住机遇，发展自己，”这是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多次向我们发出的号召。机遇是一种客观可能性，抓住它，才能成为现实，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它的作用，推动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要抓住机遇，这就需要一系列的条件，首先需要两个基本条件。

第一个基本条件：要有强烈的“机遇意识”。

所谓“机遇意识”，包括三方面内容：

1. 真正认识机遇的重要意义。什么叫作机遇？机遇就是在一定时间内诸种主观的和客观的条件综合作用所产生的有利于个人、集体或国家发展的机会。在国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会遇到有利时机和不利时机，会遇到一般有利时机和难得的有利时机。时机不利时，国家要重于巩固；时机有利时，国家要重于发展，这时候邓小平指出，思想要更解放一点，胆子要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几年上一个台阶。时机的有利与不利对国家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

2. 真正认识机遇的难得。“机会难得啊”！这是多么语重心长的话啊！机遇为什么难得？机遇有两个特点：一是时间性强，“一晃即过去”；二是变动性大，诸种主客观条件总和中任何一个因素发生变动，都会立即引起机遇的变动或消失。“时不再来，机不可失”，这是古代中国哲人对机遇特点的精辟概括。

中国是有过沉重的历史教训的。在有文字记载的4000年历史中，中国在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发展水平方面，一直处在世界前列，只是到了18世纪，欧洲开始进行产业革命，而清朝政权却日益保守腐败，对内反对改革和进步运动，对外实行闭关锁国，结果错过产业革命的有利时机。中国从此一步落

后，步步落后，戴了近 200 年的“落后”帽子，至今仍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3. 及时地善于利用机遇。及时地善于利用机遇，这是抓住机遇的第一个基本条件，即必须审时度势，因势利导，及时地制定一套既积极而又切实可行的利用机遇的方针、政策和办法。

根据邓小平同志的论述，要善于利用机遇，应实行以下的方针和政策：

(1) 及时作出决策。邓小平同志概括了一句名言：机会要抓住，决策要及时。(2) 紧紧扣住实现发展的战略目标。抓住机会，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发展是硬道理，不敢解放思想，不敢放开手脚，结果是丧失时机。(3) 抓住时机上台阶。发展应是波浪式前进，即在某一阶段，抓住时机搞几年，发现问题再加整理，尔后要继续前进。(4) 坚持改革开放。根本的问题是改革开放不能丢，坚持改革开放才能抓住时机上台阶。(5) 正确对待“稳”。强调稳是对的，但强调过分就可能丧失时机。稳这个字是需要的，但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稳这个字还得用。什么时候用，如何用，这要具体分析。但不能只是一个稳字。(6) 大胆探索。要抓住机遇，就必须坚定不移，大胆探索。思想要解放一些，胆子要大一些，步子要快一些。(7) 不搞争论。这是抓住时机的一个重要条件。不搞争论，是我的一大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8) 埋头苦干。抓住时机，埋头实干，干我们自己的事，少管别人的事。

以上八点，概括了邓小平同志直接针对利用机遇问题而发表的精辟意见，深刻地说明了利用机遇、加快发展的历史经验，对我们的现代化建设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抓住机遇的第二个基本条件，是迎接挑战，认真对付挑战，化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

机遇与挑战是对立的统一，它有一方占主导地位，另一方处从属地位。因此，要抓住机遇，就必须认真对付挑战。如果不能化解挑战，战胜挑战，机遇就会被限制或消失。

为了抓住机遇，实现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邓小平同志制定了一系列的对付挑战的方针和措施。1989 年“六·四”事件和苏东国家相继发生剧变之后，他把对付国际挑战的方针概括为三句话：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

冷静观察，就是面对国际风云变幻，要“冷静，冷静，再冷静”。有些问题不是一下子可以看清楚，一些深刻的矛盾刚刚暴露出来。不能看成一片漆黑，不能认为形势恶化到多么严重的地步，不能把我国说成处于多么不利的地位。

稳住阵脚，就是不信邪，不怕鬼，不怕压，不怕孤立，不怕制裁；就是把国家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就是坚持社会主义不动摇；就是中国不允许乱，压倒一切的是稳定；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沉着应付，就是只要不发生大规模战争，就紧紧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就是利用矛盾，区别对待；就是把意识形态与国家关系分开；就是谁也不怕，谁也不得罪；就是过头的话不说，过头的事情不做；就是同谁都来往，同谁都交朋友，谁搞霸权主义就反对谁，谁侵略别人我们就反对谁；就是永远不称霸，也永远不当头。

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依靠邓小平同志的正确方针，我们可以自如

地应付来自各个方面的挑战，化解各种不利的因素，从而使我们能够抓住目前难得的有利机遇，加快发展，实现我国分三步走的宏伟发展目标，振兴中华民族。

（作者是国务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

注释：

- [1]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56页。
- [2][3][6]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7页。
- [4]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3页。
- [5]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4页。
- [7]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9页。
- [8]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3、344页。
- [9]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44页。
- [10]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9页。
- [11]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9页。

和平的国际环境与中国发展的起点

李君如

和平与发展，是邓小平同志对当代世界纷繁复杂的问题中两个“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所作出的科学判断和概括，这一判断对于中国有什么意义呢？在这样的世界环境中，中国也有一个“和平与发展”的问题，这就是：“在争取和平的前提下，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简言之，即争取和平，发展自己。邓小平同志对这个问题有大量的论述，其中之一即关于和平的国际环境和中国发展的起点之间的关系问题。

一、邓小平同志的“发展起点论”

在再版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中，新增的《实现四化，永不称霸》、《用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方法改造企业》、《实行开放政策，学习世界先进科学技术》等文章中，提出和阐述了一个重要的观点：我们要把世界一切先进技术、先进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

对于邓小平同志的发展理论，国内学术界作过许多研究，但几乎都没有直接论述到“发展的起点”问题，因此很有必要提出来和大家一起学习和研究邓小平同志的这一重要思想。

邓小平同志提出“要把世界一切先进技术、先进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首要的也是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工作重点和发展路线是要实现现代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里讲的“经济建设”，不再是停留在维持传统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经济建设，而是逐步发展现代生产力的经济建设。邓小平同志多次明确指出，我们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一句话，就是搞现代化建设。既然我们的工作重点和发展路线是搞四个现代化，而我们的现实基础又是那么落后的传统生产力，那末，解决这一矛盾的出路，除了尽一切可能调动人民群众艰苦奋斗的积极性外，除了客观地确定分步骤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外，一个重要的措施，就是要千方百计地利用世界上一切先进技术、先进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只有起点高了，才能实现现代化。1978年5月7日，邓小平同志第一次提出“发展的起点”问题，就是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可能性这一角度来阐述的。

邓小平同志提出这一“发展的起点”，还是因为他清醒地认识到科学技术是没有阶级性的，以及世界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态势对我们的挑战。1975年在同“四人帮”斗争的时候，邓小平同志就已经根据马克思的思想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断。粉碎“四人帮”后，他不仅重申了这一科学论断，阐述了科技现代化是四个现代化的关键，而且强调了“科学技术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资本家拿来为资本主义服务，社会主义国家拿来为社会主义服务”，并以此为根据提出了现在世界上的一切先进技术、先进成果都可以为我所用，成为我们发展的起点的观点。与此同时，我们注意到，邓小平同志非常关心世界科技发展的动态。他形象地指出：“现在世界突飞猛进地发展，科技领域更是如此，中国有句老话叫‘日新月异’。”[2]他深刻地总结了历史经验，指出60年代前期我们同国际上科技水平差距还不很大，而这十几年来，世界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差距就拉得很大了，要加快我们的现代化建

设，必须学习和吸收世界科技成果。一是科学技术没有阶级性，我们可以利用；一是世界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我们不学习就赶不上时代。正是这两点综合起来，我们必须把利用世界一切先进技术、先进成果作为自己发展的起点。

如果说前面两个原因讲的是中国利用世界一切先进技术、先进成果作为我们发展起点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那么，其现实的条件性就是邓小平同志在提出这一问题的时候，充分地注意到了国际形势正在朝着有利于和平的方向发展，我们可以争取到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1977年底，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军委讲话中就已经提出：“国际形势也是好的。我们有可能争取多一点时间不打仗。因为我们有毛泽东同志的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和外交路线，可以搞好国际的反霸斗争。另一方面，苏联的全球战略部署还没有准备好。美国在东南亚失败后，全球战略目前是防守的，打世界大战也没有准备好。所以，可以争取延缓战争的爆发。”[3]这一重要判断不仅为历史所证实，而且因和平因素不断发展终于使我们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发展了这一新的判断。正是这一不断发展的有利于世界和平的国际形势，使得我们有条件在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进行合作交流，以便利用世界上一切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作为我们现代化建设的起点。

邓小平同志的这一“发展起点论”，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我们不能跟在西方资产阶级后面爬行的观点，揭示了后发展现代化国家追赶发达国家的客观要求，反映了当代世界的发展特点，是我们制定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科学指南。

二、“利用”的实质是开放和引进

邓小平同志的“发展起点论”，把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的理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和对外开放的理论融为一体，实际上就是要通过对外开放来引进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方法，把发展放到一个较高的起点上。他说：现在世界上的先进技术、先进成果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利用呢？他主张实行开放政策，学习世界先进科学技术。因此，开放和引进是中国在较高的起点上发展的重要一环。邓小平同志强调的“利用”二字，其实质就是开放和引进。

长期以来，我们在发展问题上举步维艰，十分困难。其中原因之一，就是闭关自守。这里有帝国主义封锁我们的因素，有林彪和“四人帮”破坏的因素，也有我们党工作上失误的因素。邓小平同志说：“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4]尤其是当今的世界已经成为开放的世界，无论是商品，还是技术、资金、信息、人才，都可以在全球交流。因此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同志在为党制定对内搞活方针的同时，提出了对外开放的政策，通过引进外资和技术、智力以及管理经验，来加快我们自己的发展。深圳等经济特区的经验、上海等沿海城市的巨变以及沿江、沿边和内陆省会城市的变化，都同党的开放政策直接相关。

当然，作为“发展的起点”，这种开放必须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开放，离开发展谈开放，不是我们所主张的开放；不符合发展要求，以“开放”为名行走私、贩毒之实者，更是我们反对的。因此，学习和掌握邓小平同志的“发展起点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开放、掌握开放、实现开放。

我们把开放和引进即利用世界先进技术、先进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并不是说我们的发展只能依赖于国外的力量。邓小平同志历来主张，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要发展自己的科学技术。即使我们通过开放引进先进

的技术和装备，也要有自己的改造和创造。而且，只有这种自己创造的“第一生产力”，才是社会生产持久发展的推动力量。但在我们相对落后的情况下，利用世界上已有的先进成果来发展我们自己，可以把我们发展的起点迅速提高，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是极其高明的一招。

三、重要的在于“抢时间”

历史告诉我们，实行开放是有条件的。邓小平同志说：我们现在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有好多条件，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没有，现在有了。中央如果不根据现在的条件思考问题、下决心，很多问题就提不出来、解决不了。他还认为，现在国际形势也有利于我们争取时间搞建设。这就是说，通过开放和引进，将世界上先进的科技成果为我所用，一要有条件，二要敢于抓时机。两者缺一，全谈不上。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落后的大国，能不能抓住机遇，尤为重要。这就是邓小平同志在论述“发展的起点”问题时说的：现在抢时间很重要。

抢时间，抓机遇，首先指的是要善于抓住和利用有利于我们搞现代化建设的和平因素。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世界大战难以打起来，国家之间的竞争已逐渐表现为以科技和经济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竞争。尤其是我国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坚持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国策，开展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外交活动。同周边国家的友好互利关系继续巩固和发展，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不断加强，同西方国家的关系经历了一段曲折之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但是，这并不是说世界已经太平无事了。当今世界变化多端，局部战争和民族冲突乃至种族残杀不断发生，尤其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在威胁着各国的独立和世界和平。世界各国都在争取在 21 世纪的世界格局中占据最佳有利位置。因此，我们决不能掉以轻心、稍有怠懈，必须认清有利的形势和潜伏的危机，紧紧抓住和平的因素，加强国际合作和交流，引进先进的科技成果推进我国的现代化。

抢时间，抓机遇，同时指的是要善于抓住和利用科技发展和经济发展的一切有利因素。现代科学技术正在经历着一场伟大的革命，我们由于过去工作中的失误，在这场关系人类文明前景的革命中落伍了，这仅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这场新科技革命尚未划上句号，而且有许多新兴的科学理论尚未进入应用和产业化阶段，更加灿烂的前景在等待我们。已有的新科技革命成果是我们可以直接利用的技术资源；已有的科学研究成果尚未进入应用和产业化阶段，更为我们提供了迎头赶上的机遇。加上我们自己创造性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发明，我们在科技现代化乃至在整个现代化建设中加快发展，实在是大有可为。关键是我们能不能抓住这些机遇，抢到时间。邓小平同志对此十分重视，在制定“863”计划时，他的指导思想就是中国必须“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5] 在视察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时，他明确地指出：“不仅这个工程，还有其他高科技领域，都不要失掉时机，都要开始接触，这个线不能断了，要不然我们很难赶上世界的发展。”[6]

这两个“抢时间”不是互相割裂的，抓住科技发展和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有赖于抓住国际形势发展中的和平因素，没有和平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就难以进行国际合作和交流，包括技术交流、科学交流和人才交流。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中国要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安定的国内环境与和平的国际环境。我们不在乎别人说我们什么，真正在乎的是有一个好的环境来发展自己。”[7]因此，要利用世界上一切先进技术、先

进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重要的是抓住可以为我所用的机遇，要抢到时间。

四、我们的雄心壮志在“先进”

邓小平同志的“发展起点论”除了强调“利用”二字外，尤其令人瞩目的是强调凡是为我利用的都必须是“先进”的。

他在论“发展的起点”时，说过要利用“先进技术”、“先进成果”、“先进装备”以及管理先进的技术设备和“先进的管理方法”、“先进的经营方法”等等。其中，一类属于生产力范畴，一类属于管理体制范畴，但都必须是在世界上先进的。他说：我们要以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我们要有这个雄心壮志。

“先进”的核心，在于真正的现代化，能赶上世界现代化的潮流。

1978年9月18日，在同鞍山市委负责同志谈话时，邓小平同志从技术设备、管理和人三个方面展开这一问题的论述：

第一是技术设备。他说：凡是引进的技术设备都应该是现代化的，必须是70年代的，配套也要是70年代的。世界在发展，我们不在技术上前进，不要说超过，赶都赶不上去，那才真正是爬行主义。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富有战略前瞻的思想，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我们有些地方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由于缺少这种现代化的眼光，加上对世界科技和经济发展的信息缺少全面的了解，引进了不少人家淘汰的技术设备或即将落伍的生产流水线，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联系这些教训读邓小平同志的著述，更觉其可贵。

第二是管理。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后，一定要按照国际先进的管理方法、先进的经营方法、先进的定额来管理，这是邓小平同志又一重要思想。这是他比较了鞍钢和日本钢铁生产的实际情况后，从肯定鞍钢改革设想角度提出的一个重大问题。这个问题不仅对于开放，而且对于改革，显然都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上海宝钢的特点，就是不仅引进了先进的技术设备，而且在引进的基础上加以创造，改革我们的旧体制，形成了先进的管理体制和管理方法，达到了世界冶金工业先进的生产水平，创造了一连串的奇迹。

第三是人。邓小平同志说：我们改造企业，为了保证应有的技术水平、管理水平，要有合格的管理人员和合格的工人。应该设想，经过技术改造，文化和技术操作水平较高的工人应当是大量的，否则不能操作新技术、新工艺和新设备。人的因素，无论在革命中，还是在建设中，都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我们决不能把强调人的决定作用的原理同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原理对立起来，两者是一致的。因为，在建设中起决定作用的人，不仅是具有较高政治觉悟、能艰苦奋斗的人，而且是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或先进的管理方法的人。

引进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引进先进的管理，以及培养相应的人才，是中国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必须的，也只有在和平的国际环境中才能获得的。因此，无论从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来说，还是从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客观要求来说，维护世界和平，发展我国经济，是我们一项长期的根本的任务。

（作者是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副局长）

注释：

- [1]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7页。
- [2]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2页。
- [3]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77页。
- [4]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78页。
- [5]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9页。
- [6]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80页。
- [7]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0页。

邓小平和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李敬德

199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对未来世界人口、环境与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21世纪议程》。

中国政府为履行自己的政治承诺，于同年7月，组织52个部门、机构和社会团体，根据《21世纪议程》的要求，着手编制《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以下简称《议程》）。《议程》从我国具体国情和人口、环境与发展总体联系出发，提出了人口、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相互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总体战略、对策和行动方案。1994年3月25日，国务院第16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了《议程》，并决定将《议程》作为各级政府制订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指导性文件。

人口和环境问题是一个国家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解决人口和环境问题有利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只有实现了国民经济和社会的长期稳定发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口和环境问题。本文试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结合学习《议程》第1章和第2章，谈谈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的总体战略。

一、攀登三座高峰——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

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所规定的奋斗目标。这个集中反映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的奋斗目标，作为祖国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的标志，就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总的战略目标。

为了选择和确定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党和人民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艰难曲折的探索历程。1945年，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最后胜利的时候，毛泽东指出，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党要领导全国人民，将中国建设成为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全国解放以后，1954年9月，毛泽东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开幕词中指出，要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明程度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以后，1957年2月，毛泽东提出，要“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1959年，毛泽东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1964年，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要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遗憾的是，由于我们党在指导思想上出现了“左”的错误，致使我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没有能够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延缓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通过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更深刻地认识和掌握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邓小平提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他强调指出，振兴中华民族，加快发展经济，

是民族的要求，人民的要求，时代的要求。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使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要特别注意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此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他还说，我们的国内政策，最重大的有两条，一条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一条是经济上进行改革，同时相应地进行社会其他领域的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要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我党明确地提出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目标。这个战略目标，我们可以把它比喻为攀登高度物质文明、高度精神文明和高度民主这三座高峰。实现这样的战略目标，不是轻而易举的。正如有的同志所说，攀登这样的三座高峰，没有空中索道，可以稳坐缆索悠然而上；也没有盘山公路，可以乘着汽车盘旋而达；也没有一级一级的台阶，可以举足拾级而登。从“一穷二白”的山脚登上三座高峰的道路，需要我们去探索，去开拓。然而，唯其如此，才需要中国共产党人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进行长期的坚韧不拔的奋斗；唯其如此，我们行将建设起来的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才具有更鲜明的中国特色，具有更强大的历史活力和蓬勃生机。

二、分三步走——实现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步骤

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步骤问题上，邓小平和我们党提出基本实现现代化三步走：第一步，从1980年到1989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人民生活解决温饱问题；第二步，从1990年到2000年以前，国民生产总值在1989年的基础上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从2000年到下世纪中叶，在2000年的基础上，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使我国进入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

这个分三步走的战略步骤，是在总结长期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它反映了邓小平和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和正确把握，特别是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认识的深化和提高。邓小平说，社会主义时期我们的失误主要来自“左”的方面，而“左”的事情从1957年就开始了。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完全违背客观实际情况，头脑发热，想超高速发展。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直到1976年，差不多整整20年。“左”的极端是“文化大革命”。同时，他指出，在那些年代，我们的国民经济处在“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而这时世界科技革命却在蓬勃发展，这使我们同世界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了。邓小平和我们党确定的基本实现现代化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步骤，正是汲取了上述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真正做到了既充分反映全国各族人民要求摆脱贫穷和落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又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积极而又稳妥地推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1979年12月，邓小平在与大平正芳的谈话中，对整个现代化的蓝图作了初步设想。他说：四个现代化这个目标，开始是毛主席、周总理在世的时候确定的。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到本世纪末，争取国民平均收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千美金，算个小康水平。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把邓小平提出的小康目标，确定为我国到本世纪末的奋斗目标。以后，邓小平进一步构思中国21世纪的发展战略，逐步形成三步走的战略步骤和目标。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正式确定了我国经济建设分三步走的战略部署。

同基本实现现代化分三步走的战略步骤和目标相联系，邓小平提出“力

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的思想和主张。他联系我国这些年的实践经验和国际经验，分析我国经济“台阶式”发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他说：“从我们自己这些年的经验来看，经济发展隔几年上一个台阶，是能够办得到的。”[1]他又说：“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曾经有过高速发展时期，或若干高速发展阶段。日本、南朝鲜、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就是如此。”[2]他强调指出，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而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但速度太低了也不行。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我国的经济的发展能不能保持适当的、较高的速度，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邓小平认为经济“台阶式”发展，符合事物波浪式前进的规律。

为了实现三步走的战略步骤和目标，邓小平提出了先富带动共富的重大战略方针。他说，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来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党的十四大根据邓小平提出的这一观点，明确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同步富裕又是不可能的，必须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以带动越来越多的地区和人们逐步达到共同富裕。

三、走好三全（全面建设、全面改革、全面开放）道路——实现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基本途径和条件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时进行政治建设和思想文化建设，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任何一个社会形态，都是一定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的统一体。社会主义社会也不例外。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思想文化建设这三个方面。在经济上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在政治上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在思想文化上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构成了我们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完整纲领。这三个方面，经济建设是中心，三者紧密联系，相互依存，缺一不可。如果缺少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社会主义社会就不完备，也不可能得到充分的发展。只有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一起抓，同时加强民主法制建设，才能建设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才能保证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同时进行政治体制和其他社会体制的改革，走全面改革的道路。毛泽东曾指出，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存在着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领导我们党极大地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的认识，并且找到了解决这种矛盾的正确途径和方法，这就是实行改革开放。邓小平深刻地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改革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可以说，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发展命运的大政策。全面改革是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途径和必要条件。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同时进行其他社会体制的改革，通过这种全面改革，逐步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思想文化制度和社会生活制度，就一定能够创造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社会主义。

坚持以三沿（沿海、沿江、沿边）、四引（引进资金、技术、信息、人才）为重点，走全方位的对外开放道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分析了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时代主题的新形势，分析了中国同世界所有国家发展关系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提出了“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的科学思想，把实行对外开放作为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方针，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他总结了我国长期停滞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指出：“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我们吃过这个苦头，我们的老祖宗吃过这个苦头。”[3]“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4]“根据中国的经验，把自己孤立于世界之外是不利的。”[5]我国的对外开放，是全面的开放。所谓全面开放，一是指要面向全世界，对所有国家开放；二是指在经济、政治、科学、技术、文化各个领域，有分析、有鉴别地吸收国外一切有利于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的东西。在邓小平的倡导和支持下，我国对外开放领域不断扩大，已初步形成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沿江、沿边到内地省会城市这样一个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开放的格局。党的十四大强调，实行对外开放是改革和建设必不可少的，应当吸收和利用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来发展社会主义，封闭只能导致落后。《中国21世纪议程》明确提出，中国政府把推进可持续发展的国际合作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实践证明，在当今时代，一切国家，只有坚持对外开放，才能求得生存和发展；我国只有坚持全面开放，才能全面搞活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从而建设全面发展的、对外开放的、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社会主义。

四、坚持三个基本（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政策）——实现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政治保证

党的基本理论，就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个理论，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最新成果，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它科学地回答了我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它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理论基石，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改革论、社会主义本质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为理论支柱，以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根本出发点，以实行改革开放为鲜明的时代特点，以坚持独立自主地发展中国为立足点。它是指引中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伟大旗帜。只有坚持党的基本理论不动摇，才能做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政策不动摇。

党的基本路线，就是以党的基本理论为指导的，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核心内容的基本路线。它明确地规定了党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奋斗目标和实现目标的途径、条件，是党在我国现阶段的政治主张和根本任务的集中体现，是事关全党工作、全国改革和建设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规定，是党正确地实施政治领导的基本形式和重要保证，是党的政治纲领和政治路线。实现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

党的基本政策，就是直接体现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内容和要求的一系列带根本性、全局性的方针政策。这些大政策，已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的大政方针，即基本国策。例如：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促进和保证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协调发展；实行改革开放；坚持“两手抓”，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坚持以按

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优先发展科技和教育；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实行宗教信仰自由；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坚持“一国两制”，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搞好环境保护，维护生态平衡；等等。

我们坚信，只要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政策不动摇，我们国家就一定能够做到坚持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并且能够正确地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把握好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稳定的程度，一定能够保证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的长期持续发展。

（作者是中共北京市委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主任、教授）

注释：

[1]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6页。

[2]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7页。

[3][4]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0页。

[5]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02页。

中国在东南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杨保筠

东南亚地区各国是中国的近邻，保持和发展与东南亚国家的良好关系，是保障我国在和平、安全的国际环境中尽快实现经济建设现代化的极其重要的环节。冷战结束后的东南亚，既为中国提供了机遇，也使她面临着新的挑战。

(一)

中国和东南亚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建立了悠久而密切的联系。时至近代，由于西方殖民帝国对东南亚各国实行殖民统治，中国也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使这种关系遭到削弱。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中国和东南亚各国的关系也经历了许多反复与曲折。

1978年，中国开始进行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发展经济成为全党、全国的首要任务。为了实现建设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目标，中国必须取得一个和平、安定的国际环境，特别需要与周边国家保持良好关系。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国的国际地位已大大提高。另一方面，东盟各国和东南亚其他国家也非常重视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维护亚太及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因此也在积极寻求改善和加强与中国的关系。冷战的结束，则为中国改善与包括东南亚各国在内的周边国家的关系提供了良机。使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关系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首先，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关系获得重大突破和进展。1990年中国与印度尼西亚恢复了中断达20余年的外交关系，并先后与新加坡和文莱建交，从而使中国与东盟的所有成员国都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1991年7月，中国政府代表作为马来西亚政府的客人出席在吉隆坡举行的第24届东盟外长会议；翌年7月则以东盟的特邀客人的身份参加马尼拉第25届东盟外长会议，这说明东盟对中国的重视程度正在不断提高。东盟国家普遍认为，中国国内局势的安定和经济的发展，是地区和平与稳定的保障，因而希望中国保持政治、经济的稳定发展，并表示愿意为此作出贡献。

东盟各国迫切希望中国在维持东南亚地区和平中发挥积极作用。泰国等国建议邀请中国在《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上签字。1993年7月，在吉隆坡举行的第26届东盟外长会议上，东盟邀请中国参加“亚太政治与安全合作论坛”，以便和其他有关国家共同探讨维护地区安全的途径。目前，中国与东盟各国政府、议会及各高层次之间的交往正在不断增加。1993年，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总理来华访问。同年7月—8月间，中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出访除文莱以外的东盟五国。这种高层领导人之间的互访对增进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的彼此了解和信任，进一步加强双方的政治和经济联系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由于中国和东盟各国在历史上均有遭受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和统治的经历，在政治方面可以互相声援。例如，针对一些西方国家把其

人权标准强加给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行径，中国和东盟国家都对此进行了揭露与反驳。除了政治关系之外，中国与东盟在经济领域中的关系发展得更快。

从历史经验来看，中国兴则南海（即东南亚各国）盛，反之，南海地区的繁荣亦受影响。改革开放十余年，特别是1992年以来中国经济取得的高速发展，使西方舆论普遍认为，中国在亚洲经济中将发挥火车头作用。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东盟各国经济普遍不景气的困扰较少，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所带来的巨大市场需求密切相关。为此，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等国都纷纷表示要扩大在中国的投资。例如：新加坡的公司1992年在华投资额已经超过前13年的总和。

1993年9月13—14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唐家璇在北京与东盟秘书长阿吉特·辛格就经济、贸易和科技合作举行首次磋商。双方决定，将建立中国—东盟经济贸易合作联合委员会和中国—东盟科学技术联合委员会，以审议中国与东盟之间的经贸与科技合作执行情况，研究进一步扩大经贸和科技合作的措施并提出建议，讨论双方共同关心的区域和国际经济问题。今后，中国与东盟在经济领域中的合作必将取得更大的发展。

冷战结束后，由于世界格局的变化，中国与印度支那各国的关系也迅速得到恢复与发展。

柬埔寨问题的政治解决，为中越两国于1991年底实现关系正常化提供了条件。此后，两国之间的交往不断增加，在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中的合作也逐步恢复和发展。目前越南亦在实行经济改革，需要安定的国际环境，希望与中国保持良好的关系。中越关系的改善，有利于地区和平，促进边境贸易的发展，对两国都有益。中国和老挝之间的关系早已实现正常化，并且正在健康、平稳地发展。

中国和国际社会一道，为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随着柬埔寨王国的建立，中柬关系必将得到进一步加强。中国政府已明确表示，将为柬埔寨的重建贡献自己的力量。

中国与东南亚最西部的国家——缅甸也保持着密切的良好关系。两国间贸易额已达2.3亿美元（世界银行则估计为15亿美元）。

最后，还应指出，东南亚是华人、华侨聚居的地区，中国与该地区各国关系的不断改善和发展，也为当地华人资本对中国大陆的257投资提供了较为有利的条件。

据估计，现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华人总数约为2500万，其中90%左右在东南亚各国。华人在这些国家拥有举足轻重的经济地位。由于近年来国际资本的流动性大幅度增强，东南亚华商也在寻求使其资本国际化，并向具有较大经济潜力的国家和地区流动，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巨大的市场潜力，廉价的劳动力。吸引了东南亚国家的华人纷纷到中国大陆投资。例如：泰国华人企业家、正大集团总裁谢国民在中国25个省市自治区共兴办了50多个子公司、100多家合资或独资企业，投资总额逾30亿美元。有“亚洲糖王”之称的马来西亚华人企业家郭鹤年领导的“郭氏兄弟集团”投资10多亿美元，在北京、杭州等地经营旅馆饭店，改造商业街，并于1992年10月初与广西北海市协议投资近20亿美元建设大型石化企业。菲律宾华人富商、亚洲世界（国际）集团创始人郑周敏于1992年7月与洛阳市签署长期开发合作协议，总投资金额超过20亿美元。另外，从印尼到中国福建省投资的数额也达到8亿美元左右，主要来自中亚银行、力宝集团和金光集团。

东南亚华人对中国的投资，不仅为中国加速经济建设提供了部分急需的资金，而且引进了先进的技术和设备，提供了科学的管理经验，加之华商在世界各地的庞大销售网络，使中国在国际市场上更具竞争力，从而扩大了中国的外贸出口，增加了外汇收入。利用外资开设的企业及各种旅游设施，也扩大了劳动就业促进了中国旅游事业的发展。今后，随着中国和东南亚各国在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中的关系的不断发展，东南亚华人在中国的投资也会进一步增加。

综上所述，冷战结束，为中国和东南亚各国建立密切的政治和经济关系提供了有利条件。而中国与该地区各国关系的不断增加和发展，对维护地区及世界和平与稳定，促进中国的四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二)

冷战的结束导致东南亚地区政治格局的深刻变化，也使中国在该地区面临着一些新的问题和挑战。

首先，美国及前苏联势力的收缩和中国经济的发展及国防力量的逐步增强，使西方一些国家乘机散布中国将填补美苏留下的“真空”的谬论，渲染所谓的中国“威胁”。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东南亚不少国家一方面希望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另一方面也对中国存有戒心和疑虑。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威胁论”就比较容易在东南亚地区赢得一定的市场，使该地区各国对中国旨在增强本国防卫能力的措施和部署极为敏感，甚至很可能出现东盟、印支国家一致对付中国的局面，这对中国来说，显然是极为不利的。

其次，一些历史遗留的领土纠纷和海洋权益争端显得更加突出。其中，最典型的是关于南沙群岛的主权之争。

南沙群岛扼守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咽喉要道，途经其海域的诸多航道，是东盟各国的经济命脉，也是美、日、俄、澳及西欧国家的重要海上通道，特别是该海域的大型石油和天然气田的发现，使南沙群岛及其海域引起东南亚地区有关国家的更大关注。

历史记载和考古成果均证明南沙群岛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中国立法机构于1992年通过的《领海法》以法律形式确定了这一事实。然而邻近我国南海海域的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文莱等国却宣称对包括南沙群岛在内的中国南海诸岛及其周围海域拥有部分或全部主权。除文莱外，其它三国已出兵占据了南沙群岛中的许多岛礁，有的已经在那里进行较大规模的石油及旅游资源开发，严重侵害中国的领土主权和经济利益。

南沙群岛的主权争端很可能成为进一步发展中国与东南亚有关国家之间的关系的主要障碍。一些原先彼此对立的国家正在寻求在南沙群岛主权问题上联合对付中国的可能性。例如：在1992年7月东盟外长会议前夕，越南表示打算同东盟在政治与经济上加强联系，并拟确立包括军事合作在内的合作态势，以求在有关南沙群岛主权问题上得到东盟成员国的支持，从而达到牵制中国的目的。此外，东南亚有关国家之间在南沙群岛的主权归属方面也存在矛盾。目前，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正在大力购置先进的武器装备，在所占岛屿上营建或扩建军事设施，增派武装人员。因此，由于南沙群岛问题而出现新的地区性冲突的可能性并不能被完全排除。

第三，一些大国纷纷试图加强其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而东南亚国家

也在利用这种局面搞大国之间的平衡外交，以便使它们互相制约，防止包括中国在内的任何大国在该地区拥有过大的影响。

冷战结束，美国和俄罗斯在东南亚地区的军事力量逐步收缩，但这绝不意味它们将放弃其在这里的影响。美国已明确表示，它将在东南亚保持足以应付任何可能出现的危机的足够军事力量。美国在日本和韩国仍驻有重兵，必要时可随时向东南亚地区调遣。特别值得警惕的是，美国正在利用各种机会和手段，离间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关系。例如：散布“中国威胁论”，在人权问题方面分而化之，对东盟国家持比较温和的态度，而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等等。

鉴于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势力和影响，俄罗斯也不甘心完全退出这个地区。俄外长科济列夫已多次表示，俄罗斯军队将留在越南金兰湾，并建议通过谈判组建一支旨在保障太平洋和印度洋航海安全的国际海军力量。越南则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也同意俄罗斯继续使用金兰湾军事基地。

印度是邻近东南亚的亚洲大国。近年来，其军事力量及武器装备水平都有较大提高。印度海军力量的不断扩充和趋于现代化，使它有能力和位于印度洋东北部的孟加拉湾、安达曼海及其邻近地区施加一定的影响。而东南亚的一些国家也想利用印度来制约中国和日本的影响。如马来西亚已于今年2月与印度签署了一项有关加强共同防务的谅解备忘录。另外，印度对中国西南地区拟议中的通过建设连接中国西南部和缅甸的大陆桥，以获得直接进入印度洋的通道的设想非常敏感。正在加强其驻安达曼群岛的海空军力量，以遏止中国在东南亚西翼的影响。

至于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特别是在经济领域中的影响之大已是众所周知。最近几年，日本的军费开支大幅度提高，它宣称要成为与其经济地位相适应的政治大国的表态，以及它向海外派遣自卫队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举措等，都引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备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东南亚各国的高度警惕。然而，日本对中国在东南亚的政治影响的不断扩大也存有戒心，特别是担心东南亚各国与中国联合抵御日本在该地区的影响。因此，它正在积极地表现出对东南亚事务的关切，寻求在解决地区争端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并借此制约中国。

面对美、俄、中、日、印等国在东南亚的存在和影响，东南亚各国在推行其“大国平衡外交”的同时，也有所侧重。看来，今后东南亚国家，特别是东盟各国将把美国的军事力量作为维持地区和平的筹码，依靠日本的经济实力来推动地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则寻求广泛发展与中国的关系，以保持地区局势的稳定。这就给中国如何妥善处理各方面的关系，保持和发展与东盟国家及印度支那半岛各国的关系提出了新的课题。

最后，台湾问题也可能成为影响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关系的主要因素之一。

台湾邻近东南亚诸国，经济发展迅速。目前，台湾当局正在利用经济援助等手段发动外交攻势，企图谋求国际社会特别是发展中的第三世界国家承认其作为独立政治实体的地位，并在此基础上实现重返联合国。

在东南亚地区，台湾方面的这种意图也是相当明显的。

长期以来，台湾与东盟国家一直保持着相当密切的联系。东盟各国是台湾的主要投资地之一。1993年，它在这里的投资有更大幅度的增长。例如：

1—7月，台湾在新加坡和菲律宾的投资分别增长了600%和484%。可以肯定，台湾与东盟的联系今后还会不断加强。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随着越南的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台湾与越南的关系得到迅速发展。台湾一直是越南的头号外来投资者。至1994年4月，双方已经签署126个项目，投资总额达16亿美元。同时，双方还互设了代表处，台北与胡志明市之间的航线亦已开通。1993年7月，越南派遣大型官方代表访台，其成员中有多名越南地方和中央政府及负责对外经济贸易的官员，特别是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武莺也随团对台湾进行了访问。

为了进一步拉拢东南亚国家，扩大在该地区的影响，台湾还打算在近期内建立一支类似美国“和平队”的自愿者组织，帮助受援国改善企业管理，发展经济。

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新形势下，中国必须在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东南亚地区各国保持和发展良好关系，以保障我国东南部的安全，促进政治、经济的不断发展。

为此，我们应当大力加快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步伐，进一步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在遵循“以我为主”的原则，改善和增强保卫祖国领海、领空的能力，以应付突发的危机和冲突的同时，与东南亚各国及和该地区有密切利害关系的国家加强联系，通过磋商建立彼此谅解和信任关系。特别要重视与东南亚各国建立密切的经济联系，通过共同发展经济来促进地区的繁荣，以保障东南亚和亚太地区的持久和平，从而进一步加速本国的现代化建设。

（作者是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东南亚研究室副教授，巴黎大学博士）

国际风云变幻中坚持和发展中国社会主义的正确方针

许俊基

科学地观察和判定时代主题，宏观地估量和把握国际形势及其发展趋势，是制定国际战略和内外政策的重要根据。在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带全球战略性两大问题的同时，还必须对当今世界发展变化中的新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制定正确的策略和方针，才能处理好对外关系，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和外部条件，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

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形势发生了二次大战以来最重大的变化，其主要表现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遭受空前的挫折。面对风云突变，中国的社会主义经受着严峻考验：一方面，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联合对我施加压力，迫使我国“西化”，步苏联东欧后尘，妄图使我放弃社会主义原则，告别社会主义制度；另一方面，国内既有来自右的方面的干扰，即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搞资产阶级自由化；也有来自“左”的方面的干扰，即否定改革开放，冲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这严峻的历史关头，邓小平同志以非凡冷静的头脑、敏锐的眼光、深邃的洞察力，从战略高度观察和分析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作出了令人折服的正确估计和判断，提出了“处变不惊”、“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发展自己”等一系列的策略方针，为中国人民指出了克服和摆脱危机的出路。

一、正确分析苏东剧变后的国际形势，为中国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争取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

80年代中期以来，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后，长达近半个世纪的两极世界格局被打破，但新的世界格局还没有形成，世界上各种政治力量重新分化组合，表现如下一些新特点和新局面：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美苏两霸争夺世界的局面转变成美国一超（级大国）与西欧、日本、中国等多强并存，由两极向多极化方向发展的局面，随着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集团对立的消失，各国从本国的国家利益出发，淡化意识形态的对抗，调整自己的对外战略，在安全利益相对有了保障的情况下，把维护经济利益看成是当前的主要战略目标，邓小平同志对当前世界上各种基本矛盾做了全面深入的分析，从而得出了如下看法：

世界大战可以避免。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估计，历来是我国确定发展战略的重要依据。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对战争与和平的看法一直强调战争迫在眉睫的危险。认为新的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要立足于早打、大打，因而在建设方针、布局上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去搞三线建设，“山、散、洞”的方针，就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邓小平同志根据80年代以来的国际形势发生的许多重大变化，得出了世界战争可以避免的重要结论，他说：“这几年我们仔细地观察了形势，认为就打世界大战来说，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有资格，一个苏联，一个美国，而这两家都还不敢打。”[1]就帝国主义加紧剥削和掠夺发展中国家和争夺世界霸权的本质来看，战争的危险确实存在，但人民不要战争，制止战争的力量远远超过企图发动战争的力量增长，成为阻止霸权主义者发动战争的强大力量；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虽然拥有最多的核武器，但他们处于均势，谁都没有取胜的把握，因此谁也不敢发动世界大战：

而且由于战争形式和条件的变化，靠战争来解决问题，对敌对双方都不利，在国际斗争中，经济、技术上的竞争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而各国把关注的重点更多地转向综合国力的竞赛方面。基于以上分析，邓小平同志得出结论说：“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2]以后，邓小平同志又曾多次反复阐述这个观点。苏联解体后，两极格局被打破，冷战结束，制约战争的力量进一步增强，世界大战的危险性下降。

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问题。邓小平同志在全面分析世界多种基本矛盾的基础上，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发展问题是核心问题的科学论断，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3]和平与发展问题关系着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也关系着整个世界的前途与命运。当前全世界的主要任务，就是要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共同发展。维护世界和平是当今世界的根本问题，是关系到人类存亡的头等大事，有了核武器，一旦发生战争，就会给人类带来巨大损失，人类在地球上所创造的一切文明能否得到保存，人类社会能否延续下去的斗争，已成为人类社会进步的前提。邓小平在这里把观察国际问题放到了全人类的高度，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在促进共同发展问题上，邓小平分析了两个超级大国相对衰弱，西欧，日本及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力相对增强，世界民族解放运动进入发展民族经济、巩固民族独立的新的历史阶段，以及新的科技革命正在全世界蓬勃兴起等一系列国际形势的新情况、新特点，指出当前世界上和平的因素超过战争的因素，发展问题成为最主要、最突出的矛盾，发展问题不解决，势必影响和平问题的解决。因此，同样应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上来认识，创造条件使发展中国家发展起来。要解决发展问题，归根结底要发展中国家依靠自己的力量来摆脱贫困。同时，应该实行开放政策，发展国际间的合作，不仅要靠南北对话，而且要靠南南合作。而且南南合作还可以推动南北合作。从一定意义上说，和平是发展的前提条件，而发展则是当今世界的核心问题。邓小平同志从新的角度考察当今的国际问题，内容极其丰富，对我们准确判断国际形势，制定正确的国际、国内政策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世界格局向多极化的方向发展。苏联解体后，两极格局终结，旧格局所压抑和掩盖着的许多矛盾在新格局形成的过程中日益暴露并尖锐起来，这为我国的外交斗争提供了广阔的回旋余地。邓小平同志指出：“美苏垄断一切的情况正在变化。世界格局将来是三极也好，四极也好，五极也好，苏联总还是多极中的一个。”[4]所谓多极，中国算一极。中国不要贬低自己，怎么样也算一极。”[5]

各国自身的综合国力在国际斗争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引起了世界政治、经济结构和力量对比的重大变化，邓小平同志指出：“还要看到，世界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这种形势，无论美国、苏联、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不能不认真对待。”[6]由于军事手段的作用相对下降，各国重视国家安全的同时已经开始把关注的重点更多地转向综合国力的竞赛方面，邓小平据此调整我国的国内外政策，提出：“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是争取世界和平。在争取

和平的前提下，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7]在对国际形势做出客观判断的基础上，邓小平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8]等一系列以不变应万变的灵活的策略方针。

二、贯彻正确的策略方针，立足于把国内事情办好

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对世界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严重挫折，科学地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客观地研究世界形势和发展趋势，找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和政策，其中，对待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就是：不称霸、不扛旗，不当头，努力发展自己。

马克思主义认为，对外政策是对内政策的延续，但对外政策反过来又极大地影响、制约着对内政策。其一，对外政策必然引起国际社会外交战略的相应反应，从而造成特定的国际氛围，制约国内政策生成与调整的大气候；其二，对外政策的性质和实施功效，在很大程度上关系着对内政策的成效和得失。

反对霸权主义是中国的一贯立场，邓小平同志明确表示：“中国 and 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的命运是共同的。”即使中国将来发展富强起来，仍然属于第三世界，“中国永远不会称霸，永远不会欺负别人，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9]中国“不称霸”、“不当头”，[10]既要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又不要当头，不要锋芒毕露、四面出击、咄咄逼人、到处树敌、引火烧身，而要“韬光养晦，善于守拙”。

“不称霸”，“不当头”并非不参与、不合作，而是主张在健康、平等的基础上发展同世界上一切平等待我之民族、国家的友好合作与交流。邓小平指出：“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但在国际问题上无所作为不可能，还是要有作为。”[11]在讲到中国的事情和在世界的作时，他说：我们不当头，但对发展中国家我们要做贡献，对社会主义我们要做贡献。

中国的不结盟不同于苏联 30 年代前后奉行的“天平盘”策略理论。中国希望并努力使自己富强起来，但中国富强起来不是为了欺侮别国，图谋结盟，更不是为着霸权，而是为了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中国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不屈服于任何大国的压力，也不同任何大国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不谋求同任何一个友好国家，包括第三世界国家结盟。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所倡导和参与的不结盟运动，抱着积极支持的态度。

中国的“不称霸”、“不扛旗”、“不当头”是由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核心任务决定的。邓小平说：中国要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我们需要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也正在努力创造、维护这个和平环境。邓小平还指出：“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12]他要求全国人民“横下一条心”，聚精会神”，[13]“一心一意搞建设”。[14]对于中国来说，最根本的是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排除各种干扰，集中力量搞好国内建设。

把国内事情办好，是贯彻上述一系列方针的关键所在，也是贯彻这些方针的目的。邓小平反复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的核心是把经济搞上去。要把握机遇，通过冷静观察来处理，通过稳住阵脚来对待，通过沉着应付来争取，以达到把国内事情办好。经济发展了，不管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就稳如泰山，世界社会主义就大有希望，即使出现再大的风险，天也不

会塌下来。

三、独立自主、决不当头还是国际共运历史经验的总结，是对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坚持独立自主，维护国家利益是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基石，在新的形势下，邓小平赋予独立自主的外交原则以新的内容，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在变化无常的国际格局中如何给中国的地位和作用正确定位，是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毛泽东一贯主张，立足本国，放眼世界。邓小平针对当前的国际形势，强调中国首先要把国内的事情办好，才能在国际社会中拥有更多的发言权，才能得到别国的尊重。二次大战以后苏联成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头，它凭借其实力地位，一再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结果破坏了国际共运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带来了恶果。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各国都有权独立自主地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搞中心、当头不符合历史发展潮流。苏联解体后，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希望中国当头，邓小平坚决表示：“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15]他认为我们没有足够力量当这个头，当了就会失掉主动权，中国的立场应该是谁也不怕，也不再靠近谁、针对谁，而是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谁搞霸权主义就反对谁，谁搞强权政治，就反对谁，谁搞战争就反对谁。不论对什么国家，都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展国家关系，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定亲疏，积极发展同一切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团结第三世界国家，是我国对外政策的基石，中国在第三世界有许多朋友，也有很高威望，但中国历来主张，在国际社会中任何国家，不论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平等的成员，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的从属关系，因此我们决不当头。

总结过去、思考未来，我们不难发现，导致社会主义出现曲折，固然有一些是一时很难改变的客观因素，但主要的还是那些可以改变的主观因素，比如指导思想的失误，体制模式的僵化，建设经验的缺乏等等，其中国际战略思想正确与否，关系着全局，是它的一个重要方面。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在它指导下的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的伟大实践，正是小平同志正确总结国际国内几十年经验教训的必然结果，它向世人昭示了社会主义的复兴之路。我们要密切联系实际，进一步领会邓小平同志的国际战略思想，坚定不移地执行他的一系列的正确策略和方针，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争取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和外部条件而不懈努力。

（作者是北京广播学院教授）

注释：

[1][2][6]《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7页。

[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5页。

[4][5]《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3页。

[7]《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7页。

[8]《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1页。

[9]《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6页。

[10][11][15]《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3页。

[1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5页。

[1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0页。

[14]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页。

改革、发展、稳定的辩证关系

杨梅叶

中共中央提出：“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其核心就是要正确认识和把握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关系。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邓小平对这三者的关系问题一再强调并作了深刻的论述。在他看来，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的，稳定是前提。因此，深刻领会邓小平关于改革、发展和稳定的战略思想，如何处理好三者之间的关系，是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

一、改革是强大动力

邓小平同志建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时，始终以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为基础的，为此，他提出了：“社会主义改革”论。

首先，“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是对改革性质问题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论断。小平同志说：“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1]其所以称为革命，这是因为，一方面它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的经济体制；另一方面它对社会各方面，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以至人们的思想观念，引起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和变化。小平同志说：“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2]

其次，“改革是中国生产力发展的必由之路”。邓小平同志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分析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的新情况所采取的战略决策。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主要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目标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同志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和方法，就是改革。他说：“我们的经济改革，概括一点说，就是对内搞活，对外开放。”[3]又说：“对内搞活，也是对内开放，通过开放调动全国人民的积极性。”[4]还说：“我们所有的改革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5]“我们只能走改革的路，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这条路才是通往富裕和繁荣之路。”所以，他说：“要发展生产力，经济体制改革是必由之路。”[6]

其三，“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邓小平明确指出：“总结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7]又说：“对内经济搞活，对外经济开放，这不是短期的政策，是个长期的政策。”[8]这就是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开放的、发展的，而不是封闭的、保守的。小平同志说：“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接着说：“我们现在讲的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开放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下开展的。”[9]“坚持改革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只有“坚持改革开放才能抓住时机上台阶”。

以上这些论述，清楚地告诉我们，改革是社会发展的进步的强大动力，只有改革才能促进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发展问题，实质上是改革问题，没有改革就不会有经济的持续发展，就不会有中国的现代化。

二、发展是根本目的

改革为了更好地发展，发展反过来促进改革，改革和发展是我们时代的鲜明特点，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形成了一系列的“社会主义发展论。”

其一，“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邓小平同志认为，中国发展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历史上有人想在中国搞资本主义，总是行不通。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因为，资本主义解决不了中国十亿人的贫困问题，解决不了中国十亿人发展问题，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富裕起来，而大多数地区、大多数人摆脱不了贫困状态，从而造成两极分化。而只有社会主义能够保障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共同发展。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关键就在于要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原则占主体，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以避免两极分化，达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共同发展。因此，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基本特点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允许和鼓励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贸经济与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共同发展；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允许多种分配方式存在；坚持共同富裕目标，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发展起来，以带动其它地区和其它人共同发展；实行计划与市场结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其二，“一切问题的最终解决，都要靠经济的发展。”“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邓小平说：“发展才是硬道理，大道理。”并且把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称之为“中国的发展路线”。加快发展，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经济是一切工作的中心，在改革、发展、稳定这三者中，推进改革、维护稳定都要有坚实的物质基础和良好的经济条件。因此，我们始终要把加快发展，摆在十分突出的地位，抓住机遇，立足现实，促进经济既快又好地发展。小平同志说：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因为发展太慢不利于增强综合国力，不利于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难以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因而不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因此，要争取一个比较满意的经济增长速度，凡是能够积极争取的发展速度，还是积极争取。

其三，“三步走”的战略思想与经济的协调发展。邓小平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出发，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和严谨的科学态度，提出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步骤。这就是：第一步，在80年代人均生产总值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从90年代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增强经济实力和国防实力，使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世纪中叶，再翻两番，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综合国力达到世界前列，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这是一个经济发展、国力增强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相统一的发展战略。这“三步走”是互相衔接的、不能随便超越的。为了保证经济的健康发展，就必须注意经济内部协调发展问题。一方面，现代化建设任务是多方面的，各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出现了通货膨胀要及时治理，结构不合理要及时调整；另一方面，要根据我国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实际，有条件的地区先发展起来，然后，先发展起来地区带动后发展起来的地区，从而实现经济在地区间的协调发展，并推动整个社会全面进步和高度发展，要十分重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各方面关系的协调发展问题。

邓小平同志的发展论，是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全面发展论。这是实现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理论，要把经济发展、政治发展和文化发展三者协调统一

起来。小平同志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思想，充分体现了他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战略思想。

三、稳定是前提条件

中国要摆脱贫穷，实现现代化，搞改革开放，稳定是前提，是发展经济和顺利进行改革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对此有不少深刻的论述。

其一，“我们搞四化，搞改革开放，关键是稳定”。小平同志反复强调：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这是站在全局的战略高度提出的认识维护社会稳定的极端重要性。我们既要认识到，改革的深入，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广大群众对党的路线、对改革开放是拥护的，总的说来社会政治环境是稳定的；同时也要认识到，当前确实存在一些不安定、不稳定的因素，诸如，地方社会治安状况不好，刑事犯罪增多，旧社会丑恶现象沉渣泛起，党和国家工作人员中的贪污腐化，行贿受贿，国内外敌对势力又千方百计制造混乱、挑起事端。因此，必须居安思危，时刻保持高度的政治警觉性，确保社会政治稳定，为改革和发展创造良好的政治环境。

其二，只有稳定，才能有发展。邓小平同志认为，稳定是加快改革和发展的前提条件，只有稳定，改革才能顺利进行，经济发展才有可靠保证。邓小平指出，要达到我们的目的，第一条需要政治稳定，……中国发展的条件，关键是要政局稳定，第二条就是现行政策不变。“一个是政局稳定，一个是政策稳定，两个稳定。不变也就是稳定。”[10]这就是说，中国要发展，必须有安定的政治环境，“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不可能搞建设，更不可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这些都搞不成。”[11]他还说：“我们坚定不移的原则是要有稳定的政治局面，以保证有秩序地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12]中国的主要目标是发展，是摆脱落后，使国家力量增强起来，人民生活得到逐步改善。要做这样的事，必须有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稳定是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人民群众需要稳定。稳定离不开人民群众，只要人民看到稳定带来的实在的好处，看到现行制度、政策的好处，才能真正稳定下来。不论国际气候怎样变化，只要我们争得了这一条，就稳如泰山，邓小平同志指出：“只有稳定，才能有发展。只有共产党的领导，才能有一个稳定的社会主义中国。”[13]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必然四分五裂，一事无成。

其三，在争取和平的前提下，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小平同志指出：我国经济发展除了必须有一个稳定的国内环境外，还必须要有二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他说：中国太穷，要发展自己，只有在和平的环境里才有可能。他深刻分析了我国面临的国际挑战和大好机遇，认为要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必须做到两条：一是要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主张用和平谈判的方式，以“一国两制”、“共同开发”的办法去解决国际争端，正确处理国际矛盾；二是要在国际事务中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

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谈话中重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我们的战略布局。这个战略布局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永远不改变。他还说：“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

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 [14]这就深刻阐明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辩证关系。在这里，四个坚持与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是相互渗透、相互制约、不可分割的。四个坚持，为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提供了有力的政治保证；而改革开放则赋予四个坚持以新的时代内容。因此，离开四个坚持谈改革开放，就会迷失方向，走到邪路上去，犯右的错误；离开改革开放谈四个坚持，就会思想僵化，固步自封，犯“左”的错误。

总之，中国的最高利益是稳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政局是稳定的，政策也是稳定的，这就保证了我国改革的顺利进行，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反过来，改革的深入和经济的发展，又进一步加强了我国社会政治局势的稳定。这就表明，改革、发展、稳定三者是互相促进、互为条件，辩证统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是在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推动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全面发展。

（作者是北京化工大学社会科学部教授）

注释：

- [1]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5页。
- [2]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0页。
- [3]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5页。
- [4]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5页。
- [5]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4页。
- [6][9]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8页。
- [7]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78页。
- [8]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79页。
- [10]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17页。
- [11]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99页。
- [12]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08页。
- [13]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7页。
- [14]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0—371页。

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国际机遇和挑战

朵天俊

当代世界的主题即世界的主要潮流是和平与发展。这个世界历史发展的趋势，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既有难得的机遇，又有严峻的挑战，是机遇与挑战并存。本文试就此问题谈点学习体会。

—

邓小平同志科学地分析了当代国际形势，认为当前存在着有利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国际环境。他说：“我们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握。”[1]他还指出：“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2]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们要抓住机会，发展自己，集中力量把经济搞上去，争取每隔几年使我国经济上一个新台阶。

所谓抓住机会，就是要充分利用国际关系和世界经济环境的变化所提供的一切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有利条件。综观当前国际环境，这种有利条件主要有下面几个方面：

(1) 世界发生大的转折，形势变化对我国十分有利。邓小平同志指出：“现在世界发生大转折，就是个机遇。”[3]战后，特别是70年代以来，世界正发生大时代的阶段性质变化的历史转变，即世界主题发生了一次巨大变化，由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当今世界，尽管其基本矛盾和其它各种矛盾依然存在，形势错综复杂，不稳定因素增加，但和平与发展的大趋势没有改变。特别是在苏联解体、美苏对抗的两极格局结束以后，发生世界大战的可能性更小了，邓小平指出：“我们分析世界大战打不起来，真打起来也不怕。”[4]世界正进入一个全局稳定和局部冲突的时期，这种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对我国进行现代化建设十分有利。

在和平与发展的大趋势下，过去那种较为紧张的中美和中苏关系，有了较大的改变。随着中美关系在70年代中期实现正常化和中苏关系在80年代末实现正常化，特别在80年代后期美国对外政策的重大调整以及90年代初苏联解体以后，尽管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仍然存在，但两个超级大国多年来对我国的军事威胁已基本消除。这对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不能不是一个有利条件。目前仅存在的唯一超级大国——美国也因经济实力下降（其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比重已由50年代初的45%，下降到现在的22%），推行霸权主义力不从心，这就使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不仅可以争取到一个较长时间的和平环境，而且有可能少受其干扰和压力。

(2) 可以利用西方国家内部矛盾，发展自己。苏联解体、两极格局结束后，美、日、欧联合反苏的政治基础动摇，东西矛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并非时时刻刻都是国际关系的主要矛盾，西方大国之间的矛盾逐步上升，日益尖锐。同时，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日本和德国经济实力迅速增强，特别是日本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991年增至27065美元，超过美国的22550美元。日本的国民总资产也超过了美国，成了举世公认的经济大国，也是世界最大的债权国。日本的经济地位使它不仅力图摆

脱美国的控制，要对美国敢说“不”，而且同美国经济磨擦严重，贸易战频繁。美国不少人认为日本已成为美国当今的主要对手。美国同欧洲在贸易逆差、农业补贴、银行利率和市场等一系列问题上也风波迭起，争吵不断。国家利益高于一切，西方主要国家之间的利害冲突使它们之间的离心倾向加深，为我国利用矛盾、发展自己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3)我国与邻国关系均有改善，周边安全环境看好。讲和平的国际环境，首先要有一个和平、安全的周边环境。60到70年代，我国与周边的印度、越南和苏联都曾发生过边境武装冲突，几乎是四面受敌。这种不安宁的周边环境，使我国不可能集中力量来从事国内的经济建设。随着国际气候的缓和以及我国一贯奉行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和平外交政策，使我国与印度、越南等周边国家的关系大有好转，一改过去四面受敌，变成睦邻友好合作关系，往日的战场变成了今日的市场，边境贸易日益扩大。同时周边的一些热点，如经历了12年的柬埔寨战争和10年的阿富汗战争也相继冷却下来。如今，四邻无战争，出现了我国同周边国家关系40年来最好的时期。这对我国的改革开放、建设和发展都是极为有利的。

(4)世界的主流已由军事对抗转向了以经济、科技为主要内容的综合国力的竞争。冷战结束后，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起着越来越突出的作用，与此相适应，各国为了争取在新的世界格局中处于有利地位，都特别重视发展经济和科学技术，展开了一场激烈的经济实力的竞争。自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加快了高新技术的推广应用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加上国际竞争的强有力的推动，目前，西方主要国家的经济已开始缓慢回升，加上其它重要因素到本世纪末和下世纪初，世界经济将会出现一个发展高潮。这对各国都是极为有利的时机。更应看到，亚太地区目前正处在相对稳定和快速发展之中，它的经济增长速度连续十年高于世界平均水平，预计这个地区将逐渐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中心。中国处于亚太重要位置，可以充分利用这种周边和国际有利的经济环境，加速自己经济的发展。

当今的世界已发展成为一个整体，国与国之间存在密切的经济关系。各国之间既竞争又合作，以此促进各国和世界经济的发展。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互补性很强。中国需要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西方发达国家需要中国的市场。中国经济繁荣，社会稳定，投资环境良好，市场潜力巨大，是吸引西方国家企业界的新因素。据估计，中国从1994年到本世纪末，进口总额将逾一万亿美元，西方国家已越来越看好中国这个拥有近12亿人口的巨大市场。我国与西方国家建立“平等、互利、长期、可靠”的合作关系，将促进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

机遇很多，仅上述几点已说明，中国目前的确面临着较好的国际环境和良好的机遇，我们要遵循邓小平同志的教导：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尽快把经济搞上去。世界上一些经济发展较快并取得很大成功的国家，几乎都是充分利用了有利的国际环境而获得的。战后的日本和德国，正是利用美苏长期冷战的机遇，加快本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从而在经济实力上成为今天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第三经济强国。亚洲“四小”和拉美一些国家在60、70年代，也是利用西方经济在战后快速发展时产业结构升级、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传统产业向国外转移的时机，转换机制把本国的经济搞上去，成为今天世界新兴的工业化国家。过去，我国因错过了几次大好时机，又遭受了“大跃进”和十年“文革”的两次严重挫折，使我国和一些发达国家相比落后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 15 年，我们充分利用了和平和发展的国际环境，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使我国经济在 80 年代上了一个新台阶，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今后，我们还要紧紧把握住当前这个难得的机遇，继续前进，去争取更大的成就。

二

全面地看，当前的国际环境对我国有利的一面，同时也存在不利的、困难的一面，即存在着严峻的挑战。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1) 各国综合国力竞争的挑战。综合国力是衡量一个国家一定时期发展水平的，是一个国家所拥有的全部实力和潜力及其在国际社会中影响力的反映。世界各国的竞争是综合国力的竞争。我国经过建国以来 40 多年的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 10 多年来的迅速发展，综合国力已有很大增强。根据测算，我国的综合国力在 1949 年占世界第 13 位，1980 年占第 8 位，目前已上升到第 6 位，并成为对国际局势起举足轻重作用的多极世界中的一极。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有不少如粮食、棉花、棉布、水泥、原煤、肉类已占世界首位，其它如钢铁、原油、发电量等也占到世界的前几位。但是，我国现有的综合国力还不强，特别是按人口平均的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还比较低，同我们这样一个拥有近 12 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的地位极不相称。当前，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已逾 5 万亿美元，日本也有 3 万多亿美元，而我国只有 5 千亿美元左右，加之我国人口多，按人平均的国民生产总值更比它们少得多。同周边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亚洲“四小”相比，也有明显差距。“四小”中的台湾，1992 年国民生产总值超过 2 千亿美元（约相当于当年中国大陆的 50% 左右），占世界第 20 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 1 万美元，占世界第 25 位；进出口总额 1500 亿美元，居世界第 14 位；外汇储备达 820 多亿美元（1991 年），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一位。大陆与台湾相比，在某此方面也存在差距。上述差距不仅反映国家与国家、国家与地区之间先进与落后的差别，而且反映两种社会制度——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所进行的历史性的竞争。竞争是优胜劣汰，它关系到两种制度“谁战胜谁”的问题，即关系到社会主义的生存和发展、前途和命运的问题。原东德在与西德的历史性竞争中落后于西德，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相当于西德的 50% 左右，结果东德被西德吞并了。苏联解体和演变最根本的原因也是经济没有搞好。前苏联国民经济增长率不断下降，由 60 年代的 7% 到 80 年代下降为 2—3%。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更是一年不如一年，经济出现了负增长。60 年代中期以来，三个五年计划的指标都没有完成。从而使苏联的综合国力在各国中的排列由 1973 年的第 11 位，下降到 1985 年的第 15 位。这使前苏联在同美国的历史性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加上其它因素的作用，导致了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失败。

社会主义面临着现代资本主义的严峻挑战。我们只有抓住机遇，加速发展，不断缩小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距，不断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并走在世界的前列，才能向人们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继续保持社会主义对人民群众高度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才能消除苏联、东欧剧变在世人心中留下的疑惑，坚定人们的社会主义信念；才能为反对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政策提供坚实可靠的物质基础，有效地防止和抵御和平演变。总之，只有不断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才能消除我们所遇到的各种困难，使

社会主义在同资本主义历史性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并最终战胜资本主义。

(2) 世界高科技发展的挑战。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力量。邓小平同志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当代，科学技术的进步，是直接推动生产力向前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国与国之间的经济竞争、综合国力的竞争主要表现为科学技术和人才的竞争。战后高技术群（信息、生物、空间、海洋、新能源、新材料）在发达国家的迅猛发展，对我国和其它发展中国家提出了严峻挑战。邓小平同志指出：“现在世界的发展，特别是高科技领域的发展一日千里，中国不能安于落后，必须一开始就参与这个领域的发展。” [5]

旧中国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经济和科学技术都十分落后。建国4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10多年来我国的科学技术获得了很大发展。目前，我国已初步建立了航空、航天、核能、生物工程、新材料、海洋开发、微电子和电子计算机、光电子及通讯工程等高技术产业体系；有一支300多万人的高技术产业队伍、有5000多个研究所、8000多个技术开发机构、100个左右具有国际水平的重点实验室。1993年，全国累计取得重大科研成果33000项，大大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但是，从总体上看，我们的科学技术还比较落后。根据有关资料，美国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贡献额为71%，日本为65%，而我国在技术进步比较快的80年代末期才只有30.1%。由于科学技术落后，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基本上是靠能源、原材料消耗和运量的大幅度增加取得的。创造相同国民生产总值的能耗，我国比世界平均水平高2至3倍。在利用现代通信技术手段传导的信息方面，我国还达不到发达国家的1/10。我国同发达国家之间在科技发展水平上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无可回避地面临着发达国家高技术的挑战。

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在两种社会制度历史性的竞争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资产阶级学者利用西方国家掌握的高新技术优势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他们说电子计算机的出现是资本主义重新兴起的朝阳，资本主义又“再生了”。这是违背历史发展大趋势的。我们认为当代科技革命不可能代替社会革命来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不可能使资本主义制度返老还童、永世长存。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从50年代开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带头掀起的这场全方位、加速发展的新科技革命，为西方社会创造了更多的物质财富，使其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出现了所谓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有较大改善，使社会相对稳定，阶级矛盾缓和，工人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西方国家正是在掌握了新科技革命优势并把社会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抛在后面的条件下，才使他们大力宣扬和推销的政治观点（多党制、议会制、三权分立）、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等起了作用，再加上其它因素的影响，促使苏联东欧政局剧变，使西方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的战略能够得逞。

历史的教训值得认真记取。面对西方国家高技术迅猛发展的挑战，我们要遵循邓小平同志“下一个世纪是高科技发展的世纪”，“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6]的教导，加快对高新技术的研究和开发，通过不懈地持续努力，提高我国在国际竞争中的技术实力和产业实力。

综上所述，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国际环境是机遇与挑战并存，机遇是主流。

但机会更多地意味着挑战，迎接挑战才能抓住机会。世纪之交和下一个世纪的挑战将是更为激烈、更为严峻的。我们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以新的姿态去迎接各种挑战，克服前进道路上的种种困难，抓住机会发展自己，尽快把经济搞上去。

（作者是首都师范大学政法系，政治学教研室主任、副教授）

注释：

- [1]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4页。
- [2]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5页。
- [3]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9页。
- [4]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
- [5][6]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9页。

把握时代主题参与国际竞争

潘自勉 何仕强

200年前发生的工业革命创造了现代生产力形式，社会变迁的形式发生了革命性的转换。由于现代工业生产方式是在崭新的科学技术基础上创造的经济高速增长的生产方式，社会财富的形态和积累方式都发生了重大的转变，经济因素上升为支配社会发展速度的主导力量，因而在由现代民族国家所构成的新的世界经济体系之中，高速发展社会的经济与文化因素对低速度发展社会具有强烈的传导性，进而产生“现代化效应”，并引起强化的适应性社会变迁。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现代化进程，这是一个世界性的发展现象。由于本世纪初，世界分裂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不同的现代经济体系，因而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成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对抗发展形式。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中，如何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正确方向，不仅要有求实的科学理性精神，而且还要有高瞻远瞩的社会发展理论。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从功能上看，只达到了狭义的国家工业化，它为彻底摆脱旧中国的被奴役地位、巩固国家的政治独立提供了必要的保障。而到了80年代，伴随着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以满足人民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为特征的标准意义上的工业化阶段才在我国真正开始。从国际上看，这正是冷战时代趋于结束的时期，经济优先已成为世界潮流。战后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全球化不断增强，相互依附性也更为重要，经济因素日益成为主导国际关系演变的重要因素。美国为了保持其霸权地位，克林顿上台伊始，就宣布了外交三原则，一是经济安全；二是军事安全；三是推广民主。这三项原则的中心是经济。美国已把其“经济安全”作为其外交政策的首要支柱，使其对外政策成为获取经济利益的手段。此外，各国正在进行以高科技为先导、经济实力为后盾的综合国力较量的同时，世界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区域化、集团化的趋势亦日益加强。去年，克林顿总统签署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欧共体统一大市场正式运转，《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几经周折后生效，欧洲经济联盟取得突破性进展；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向实质性合作组织迈出了重要一步；马来西亚一直在积极推动尽快启动《东亚经济论坛》；历时7年之久的乌拉圭回合谈判最终达成协议。这一切都说明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把发展本国经济、扩大对外经济合作作为自己对外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早在80年代中期，邓小平同志就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1]今天看来，这个论断不仅是正确的，而且也反映出邓小平同志把握时代主题的理论深刻性与预见性。这不仅有助于我们正确分析当前的国际形势，而且也有利于指导我们在企业经营战略上采取更大的主动性，去参予国际竞争和拓展经济实力。

纵观邓小平同志关于当今时代和平与发展的理论观点，可以发现他的基本思想有如下几个特征。第一，对整个世界历史格局和世界历史主题的把握十分清醒和深刻。邓小平同志从二战后世界格局的新变化出发，对世界历史的时代主题进行了新的审视和思考，作出了和平与发展已代替战争与革命成为时代的两大主题的科学结论。这就使我们彻底澄清了对世界历史时代主题认识上的偏差，真正把发展问题作为时代的核心问题来认识对待。他说：“在

争取和平的前提下，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2]第二，对建国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理论与实践经验教训的理性反思是高度自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在拨乱反正、不断解放思想的过程中，审慎地分析了当代中国存在的问题，指出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之所在，发展是中国的主题。他说：“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个问题要搞清楚。如果分析不当，造成误解，……结果是丧失时机，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3]第三，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制度选择及其方向的重要性认识是严肃而科学的。历史发展到本世纪的70、80年代，中国社会如何向前发展的问题十分突出地摆在人们面前：中国的国情有何特点？中国社会目前处于什么阶段上，社会发展的目标、动力、战略到底应当怎样去认定等等。在指导我们的原有理论已失去解释力的情况下，这一系列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迫切需要从理论上作出正确的回答，人民群众以及社会实践的需要呼唤着新理论的诞生。这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第四，超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三世界理论局限。20世纪中期的发展理论研究，占主导地位的理论主张是西方传统派的发展理论，突出的就是现代化的理论，其特点是，以欧美为中心，以发达国家为模式，以经济增长为目标。兴起于拉丁美洲的依附论反对和批判以欧美为中心的现代化理论，强调拉丁美洲和第三世界为发达的主要根源是由于受到来自美国等西方大国的经济政治影响。他们主张不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只能选择不同于发达国家的发展道路，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邓小平同志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立足于中国文化的民族特色，既批判吸收西方现代化理论所主张的“世界性的相互依存的增长”、“全球经济趋于一体”等思想观点，坚持反对依附论所主张的断绝与发达国家关系等观点，从而得出了“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的结论；同时又坚持反对西方现代化理论关于全盘西化的主张，吸取了依附论者提出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摆脱依附等观点，强调走自己的路。第五，强调稳定与和平对社会发展的极端重要性。历史表明，本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是在受到外部冲击而引起内部思想和政治变革并进而走上推行经济变革之路的，因此，各种社会矛盾和动荡的发生不仅会造成剧烈的社会分裂与冲突，而且也难于形成稳定的法治秩序。邓小平同志从对历史高度负责的角度，深刻表达了中国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内部环境和一个持久的国际和平环境的愿望：对内强调政治上的安定团结；对“港澳台”问题，主张用“一国两制”的和平方式来解决；对外强调中国坚持反对霸权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外交政策。总之，“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4]

依据邓小平同志的发展战略思想来看，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速度，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从宏观上说，这对中华民族的发展是举足轻重的，从微观上讲，这对一个企业的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然而，科技与教育事业的发展脱离了稳定与和平的环境是不可想象的。在今天，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已深入到“转机建制”的深层领域，原有和新生的各种利益矛盾，既是某种改革的动力与压力，又是某种社会不稳定的隐患。因此，正确处理好稳定、改革和发展三者之间的关系就显得十分重要，稳定是前提，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的虽已成共识，但在实践上仍有一些模糊认识尚需具体解决，比如，过分强调改革“破”的一面，而对“立”的一面认识不足；借“发展”之名来为短期行为辩护；或以“稳定”为名回避改革中的尖锐问题；或以“改革、发展”为由无视稳定的重要性等等。因此，中国国有企业（集团）要面向世界

范围发展自己的实力，首先就要在稳定与改革关系上做文章。从企业界的角度来说，这里所要求的稳定主要有三个含义：经营战略思想的相对稳定；企业家阶层的相对稳定；管理制度的相对稳定。可以说，求得这三种意义上的稳定局面，本身就是改革所要达到的或产生的效果。有了这种稳定，来自企业方面对科技与教育的真正追求，才会转化为对社会各阶层的普遍影响，即用理性的、规范的态度去接纳区别于暴力和权力价值观的法治秩序，进而产生出适应市场化要求的利益分化与个人分化。这不仅为企业改革向纵深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持和心理准备，而且也为人们接受国际社会惯例奠定了思想前提。显然，上述三种稳定的实现，企业自身是难以单独做到的，这里的关键是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位置要重新“定位”，尤其是政府影响企业的方式要彻底更新。否则，企业的稳定很难达到，这意味着企业改革只是政府行为，而无法同时成为企业自身的行为。于是，企业是否能在国际舞台上发展自身就成为了疑问。这时，所谓“把握时代主题、参与国际竞争”就是一句空话了。

结合企业工作的实际，我们切身体会到，我国生产力的多层次性，决定了所有制形式的多样化，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又代表了不同的经济利益关系，经济利益的多元化需要保持各自的所有权，而社会化的大生产又在时刻要求联合、协作及使用权的高度集中，这样，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股份经济，实行股份制，在保证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使用权变为集中，实现所有、使用两权分离，便成为合理解决我国生产力的社会化与经济利益多元化之间矛盾的基本途径。

社会主义股份制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基础上，在一定范围内筹集社会资金的一种企业组织和经营管理形式，是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对整个社会主义经济起着强大的凝聚效应。

股份制可以广泛集中社会闲散资金，增加社会主义积累，无需政府投资而自觉形成生产力，大大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改善企业生产经营条件，加快资金周转，提高经济效益。社会主义条件下大力推行股份制，按股份制模式重塑企业组织，还有利于企业真正走向市场，摆脱主管部门繁重的行政干扰，轻装上阵，主动灵活，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另外由于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紧密结合，在股份制企业内部形成强有力的动力机制，充分发挥人的主体作用，对促进生机勃勃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股份经济可以说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头戏”，它的发展，无疑对我国其它体制的改革产生深远影响，使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机制更加完善。当然，这得需要有一个稳定的政治局面和社会环境。

在我国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股份制试点，是深化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商品经济有机结合的有效途径，股份制企业改革试验在我国，特别是部分沿海城市已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但是任重道远，经济体制的完善，股份经济的进一步推广、成熟还需要金融机制、价格体系、劳工保障制度的一系列改革、配套。但股份经济将在神州大地继续以崭新的姿态和强盛的生命力影响着我国的经济生活，显示出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

我们广州经纬集团，就是在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下产生的一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它适时把握时代主题，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依照现代化企业管理的要求，广州经纬集团广泛吸纳国内外先进企业的管理经验。在机构

设置上，机关管理人员力求“少而精”，大部分人员放在第一线项目公司开发高新技术项目，抢占市场，创造高效益。在用人制度上，坚持打破铁饭碗，努力调动全体员工的积极性，实行人才招聘制并定期考核，不合格者一律淘汰。在工资福利及其他待遇上，则坚持拉开距离，实行高创利高待遇，并制定出严密的奖励制度，对公司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员工给予重奖。

我们通过学习邓小平同志有关和平与发展的理论，结合工作实际，深切体会到，跨越国界，瞄准国际制高点，与国际接轨，加入国际大循环，是现代化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因此，我们广州经纬集团根据宗旨“真诚至上，广结天下朋友，共同创造和分享财富”而制定一系列发展方略。公司将以建立广州国际化大都市为大背景，根据国家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扶持政策，以高新技术科研开发为龙头，多元化、全方位发展，充分利用和发挥自己的优势及科研成果，逐步联结有一定实力的国内外企业，兼并一些有发展前途的国有、集团、个体企业，公司将立足本地、面对全国，跨越国界，利用自己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处理废塑料技术，脑保健技术等几个高新技术产品，力争在短期内形成一个综合性、高智力化、跨国型的高技术企业集团。目前，已与马来西亚、美国、加拿大以及香港地区的一些财团，环保公司建立广泛的联系并频繁接触，架设国际金桥已经开始。科学无国界，公司将把环保项目推到国际上去，解决全人类共同关注的问题，在美国、加拿大及亚洲一些发达国家建立环保工程合资企业，建立股份制的环保工程联合体，形成“托拉斯”式的环保连锁厂，并发展其他高新技术，最终形成一个国际化的高科技企业股份集团。

（何仕强：广州经纬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潘自勉：广州经纬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5页。

[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7页。

[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7页。

[4]《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84页。

抓住机遇加快发展

赵树海 袁俊峰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把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邓小平同志于 1984 年 6 月指出：如果说建国以后有缺点，那就是对发展生产力方面有某种忽略。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当前我们应把发展问题放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地位。那么，怎样才能加快发展，使社会主义生产力水平迅速得到提高，日益赶上并超过资本主义国家，这就需要我们认真把握好当前社会主义面临的机遇。只有认识并利用好各种机遇，才能使社会主义更快更好地得到发展。

一、只有抓住机遇，才能加快发展

机遇，主要是指好的机会或条件。因机遇带有暂时性，所以在它来临时不认真加以把握，往往会失去发展的机会。无论对于个人还是对于一个国家或民族，认清并抓住机遇，其发展便会出现较大飞跃；反之，便会出现停滞不前的局面，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抓住时机，发展自己。”[1]

当今世界上许多国家，之所以在短短几十年内便取得了经济上的飞跃发展，就是因为它们看清了国际国内形势，紧紧抓住了机遇。战后，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首先是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瓦解，第三世界国家的力量日益壮大。其次，由于中国及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力量被大大削弱。可以说，战后 40 多年间，世界处于和平发展时期。尤其在 50—60 年代，正是世界经济稳定发展之际，日本就是在这—时期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日本政府在这—国际形势下，针对国内具体条件的变化，采取了保护产业、扶植出口这条贯穿对外贸易战略的主线。50 年代，为平衡国际收支，主要侧重保护国内尚未成熟的产业，实行了对进出口贸易和外汇的全面管制政策；60 年代，由于许多企业实力加强，为促使企业直接参加国际竞争，前五年主要采取贸易开放策略，后五年由于贸易顺差逐步增加而以资本开放为主；70 年代以来，由于同美国等一些国家出现贸易摩擦，实行了协调与竞争并举的贸易政策。前苏联在 30 年代，成功地利用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1929 年至 1933 年，资本主义世界经历了一场空前的经济危机。这次危机的主要特点是生产严重下降，对外贸易锐减，物价猛跌，工业危机和农业危机交织在一起，危机的范围广。而这一时期，苏联的国内形势主要表现为：国民经济基本得到恢复，已经开始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基本实现了农业集体化，等等，苏联政府正确地分析了形势，不失时机地抓住了西方严重经济危机的大好时机，大规模地引进了西方的资金、技术和设备，在国民经济中建立了大批的骨干企业，使苏联的工业产值跃居世界第二位。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也是由于他们在发展经济时，顺应国际国内形势，发挥本国（本地区）特长，分阶段、有重点，不同时期采取不同的方针。60 年代，利用了全球新技术革命造成的契机；70 年代，成功地利用了两次能源危机；80 年代，“四小龙”着重使产业结构向高技术化调整，如南朝鲜的“科技立国”，新加坡的“第二次工业革命”。

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动下，战后出现了一个人类历史上少有的生产快速发展时期。西欧、北美等国相继成为高度发达的现代化国家，一大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也成功地利用了这一机遇，全力投入现代化建设，较快发展

为新兴工业化国家。而正当许多国家快速发展之际，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我们没有抓住机遇，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由此看来，谁抓住机遇，谁就能实现快速发展；反之则成为落伍者。中国当前正面临很多机遇，我们必须抓住、抓紧，否则将失去机遇。

二、我国当前面临加快发展的极好机遇

一个国家若要加速发展，需要良好的机遇。当前我国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国际国内环境，从而好好把握机遇，即“要善于把握时机来解决我们的发展问题”。[2]

从国际上看，我国有许多有利条件。首先，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主题。由于苏联解体，两极对峙局面已经结束，世界正向多极化方向发展，世界大战在短期内还打不起来，会有一个较长时期的和平环境。霸权主义日益遭到各国人民的反对，要求和平的力量日益壮大，已经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增长。其次，我国在外交方面取得很大成就，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持续稳定发展，与越南、独联体等实现了关系正常化。第三，周边国家及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与我国的经济合作密切发展，他们对我国的工业制成品需求量很大，我国的产品在质量、档次等方面更适合他们，那里有广大的市场。同时，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呈现出“不景气”的局面，经济上不同程度地出现衰退，它们为走出困境，纷纷把目光投向中国市场。因此，我国对西方国家的吸引力越来越大，随着国际分工的发展，各国在经济方面的联系日益增强，国际市场不断扩大。最后，当今世界新技术革命迅速发展，经济区域化趋势加强，对我国经济增长十分有利。我们应充分利用这一机遇，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和产业调整，积极借鉴先进经验、资金和技术，加快经济发展。

从国内看，形势对我们加快发展也极为有利。首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已经具备了较雄厚的实力。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正在努力实现小康。在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积累也有较快增长，这种状况为我们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我国还建立了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加上我们丰富的资源，一定会有更快的发展。而且，十几年的改革开放，使沿海许多地区的经济已实现了飞跃性发展，这些地区在进一步发展的同时，可以带动落后地区从而实现全面发展。其次，我党在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不断深化，例如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认识等等，摆脱了以往许多观念上的束缚，全国人民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积极地投入到现代化建设中去。“十四大”提出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改革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加以展开。再次，我们在十几年来的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培养了大批经营管理人才，一批成功的典型已经涌现出来，这对于加快发展也极为有利。

我们在把握以上各种机遇的同时，也不能忽视还存在着压力和挑战，“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3]如果我们不扭转落后的局面，社会主义优越性就不能得到有力证明。目前，我国国有大中型企业效益普遍不好；国内资金仍很欠缺；由于资源分布不均而引起的矛盾也很突出；人口增长面临新的高峰，等等。这些不利条件都要认清并采取相应措施予以解决。可以说，我们面临的发展机遇是历史上少见的，但忽视了不利因素，同样不能加快发展。

三、抓住机遇，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发展

认清了以上所述国际、国内存在的各种机遇，怎样做才能真正把握好机遇呢？

首先，继续扩大开放，促进经济发展。邓小平在 1983 年 7 月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要利用外国智力”，“要扩大开放，现在开放得不够。要抓住西欧国家经济困难的时机，同他们搞合作。”这是一个战略问题。马克思早就指出，自从资产阶级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实践证明，我国实行的对外开放政策是正确的，目前，我们要在原有基础上，继续扩大对外开放，更加充分利用先进国家的技术、资金、先进的经营方式和管理经验，在国际、国内一切有利条件下，加快发展。

其次，要更加注重科学技术的作用。马克思曾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邓小平同志更进一步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4]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早已被世人公认。1978 年以后，我国科技现代化的进程开始加快，国家先后制定了“国家科技攻关计划”、“星火计划”、“火炬计划”、“863 计划”等等，但是，目前科技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在 1950—1989 年才达到 30%。[5]可见，要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科学技术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我国无论何时都应注重科技发展。

再次，要大力抓教育，培养大批人才。“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6]以往，我们在教育方面有许多失误，对教育的重视不够。科技的进步，经济的繁荣，归根到底要靠教育培养出的大批人才。战后的日本，教育的规模不断扩大，质量日益提高。日本政府把教育作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强有力因素”，这是日本战后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从中国看，教育总体水平还很低，到 1990 年，大陆 15 岁以上文盲半文盲达 2 亿多人，适龄人口大学入学率仅为 3%，而中等发达国家在 1987 年便达到 17%。[7]这种教育状况，需要引起足够重视。在加快经济发展的同时，必须大力抓教育。

最后，要继续深化改革，不断完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与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传统体制，被邓小平称之为“一种革命”，[8]这绝不是夸张。自实行改革以来，农村的经济有了很大发展。目前，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正在展开。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与此同时，“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化成功。”[9]由于我们的党对传统体制弊端的认识不断深化，以及这些年改革的努力，我们取得了很大成效。但无论政治体制还是经济体制，仍不能完全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还存在许多弊端，因此，“我们内部要继续改革。”[10]

综上所述，国际、国内形势非常有利于我们加快发展。只要好好把握机遇，并克服不利条件，社会主义中国一定会实现经济起飞，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将巍然屹立于世界之林。社会主义迟早会走出低谷，迎接崭新的社会主义时代。

（赵树海：北京师范大学马列主义研究所研究室主任、副教授；袁俊峰：北京师范大学马列主义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注释：

- [1]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5页。
- [2]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5页。
- [3] 《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述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38页。
- [4]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4页。
- [5] 《依靠科技进步进一步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载《人民日报》1991年5月24日。
- [6]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0页。
- [7] 世界银行：《1990年发展报告》。
- [8]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82页。
- [9] 《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述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13页。
- [10] 《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述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89页。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中国的发展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和繁荣

刘永平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发展需要和平，和平离不开发展。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经济要繁荣，世界要和平，已成为各国人民的普遍要求。中国人民面对新的国际形势，迫切希望在今后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以发展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中国人民也愿意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一、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这是邓小平同志总结了我国和世界各国发展的历史经验得出的结论。他说：“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1]“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2]

中国要加速发展，就必须实行对外开放。这既是中国发展的必须，也是适应社会历史发展的潮流。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从自然经济形态发展到商品经济形态，这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证明商品经济是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也是推动生产力迅速发展的经济运行形式。我们若想使生产力迅速发展，充分发展商品经济则是不可逾越的阶段。商品经济一开始就是具有社会性。从历史上看，商品经济最先发展起来的国家和地区，也是最早发展大规模世界贸易的国家和地区，也是广泛开放的国家和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从客观上就打破了闭关自守。商品经济的发展使生产、交换和消费打破了以往各地区相互封闭的状态，使地区与地区之间，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形成了广泛的交往关系。使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方面的联系日益密切。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世界市场逐渐发展。由于世界市场形成使生产、消费也变为世界性的了。马克思恩格斯也曾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新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恩格斯还指出：摆脱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框框的社会可以在这方面更大大地向前迈进。马克思恩格斯依据商品生产发展的规律，预计在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基础上生长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比资本主义更加互相广泛往来，开放。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列宁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曾提出：“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同世界发生联系是不能生存下去的，在目前情况下应当把自己的生存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联系起来。”[3]他提出要利用资产阶级的资本和技术，他说，当我们国家在技术上还极其薄弱的时候，怎样才能加速经济的发展呢？那就是利用资产阶级的资本。他还说：“把一些矿山、森林区、油田等等租给外国资本家，以便从他们那里获得能加速恢复苏维埃大工业的补充装备与机器。”[4]但是，由于他过早逝世，并未做出全面的解决。斯大林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当大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已占据统治地位，已能供应农

民必要的工业品后，特别是当世界上出现了一批社会主义国家，打破了原来资本主义的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后，他就提出了：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巩固。他认为社会主义国家通过相互之间经济上合作和互助，将巩固自己的“新的市场”。这就在实际上否认了世界市场的存在和国际之间通过合作发展本国经济的必要性。以至很长时间里，形成一种误解，似乎社会主义国家只应当和社会制度相同的国家发展经济往来，不应当也用不着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协作。这种观念曾障碍了我国发展对外贸易和经济往来。所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我们对外开放，主要是原苏联、东欧等国。后来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们的封锁，加上我们自己内部的原因，在实际上我们是闭关自守了。邓小平同志针对以往的实际状况，指出：“建设一个国家，不要把自己置于封闭状态和孤立地位。要重视广泛的国际交往，同什么人都是可以打交道的。在打交道的过程中趋利避害。用我们的话讲，叫对外开放。”[5]

二、对外开放是国策

邓小平同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仅明确提出了对外开放的概念，而且把对外开放提到国策的地位，把它作为长期的、不可忽略的发展国家的大政策。他指出：“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6]

我们要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就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市场经济我们缺乏经营管理经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虽有不同，但毕竟都是市场经济。要吸收搞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为我所用，以便我们少走弯路。

为了发展经济，我们需要资金，只靠我们自己的积累还不够。由于我们生产技术落后，管理水平不高，劳动生产率低，消费压力很大，积累资金有限，需要引进资金。如果单靠我们自己慢慢地积累，势必拖延经济发展的时间，失去有利于发展的时机。扩大开放可以吸收和利用外资，这也是世界上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常用的方式。

另外，从生产技术改造方面来看，我们的任务也很重。我们现有的企业大部分设备陈旧，工艺落后，急需进行技术改造，一切都靠自己从头摸索费时费力，这样会使我们和先进国家生产技术的差距拉大。事实上，当今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科学技术门类繁多，一个国家不可能开发本国需要的全部技术。近几十年来现代科学技术不只是在个别的领域或个别生产技术上获得了新发展，而且几乎在所有领域都出现了新的飞跃，产生了并且正在持续产生一系列新兴科学技术。因此，我们通过扩大对外开放，进行科技成果交流吸引先进的技术引进人才，促进我们的科技进步，这是我们加快发展的一条捷径。邓小平同志指出：“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7]只有学习先进才有可能赶超先进。引进别国的先进科学技术是利用别国的智力，以利于自己创造新的智慧。

从近些年世界经济发展的情况来看，凡是在发展经济上有所作为的国家和地区，都是十分重视并充分利用外部条件的。日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起来的经济强国，据统计，占世界人口1/40的日本，创造着世界1/7的财富，人均产值高达2.7万美元，超过美国跃居世界首位。日本经济取得如此

巨大的成就的因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大力吸收、引进全世界现代化的科学技术，加以改进、创新，为己所用。从国内各地经济发展的情况来看，广东的深圳、上海的浦东等地，这几年经济快速发展，也都是开放决策的成果。浦东新区的开发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发展速度快，二是进入新区的大项目多、三产多、高新技术项目多，新区内已有外贸企业 700 多家，内资企业 1400 多家，吸收外资 15.6 亿美元，内资 92.6 亿元。浦东的开发在发展经济上起了龙头作用，它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上海以至长江三角洲经济的发展。

社会化大生产的高度发展，使各国间在原料、市场以及资金、技术、劳务等方面的依赖程度大为加深，对外开放也必将成为各国发展自己的必要条件。根据联合国有关的统计资料：1970 年世界各国出口总额占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 11.4%，1980 年增加到 14.1%，1990 年已为 16.2%，预计 2000 年将达到 20%。而有些国家出口所占比重更大。

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寻求资金的有效配置，国际间的直接投资大为增加，跨国公司的发展失去了世界经济的国际化和全球化。据联合国有关资料，1970 年时全球有 7000 家跨国公司，1993 年发展到 3.5 万家，共有海外子公司 17 万家，遍及 160 个国家和地区。跨国公司的发展使许多产品的生产方式成为全球性的了。

跨国公司的增加表明世界经济的国际化和全球化发展。这种新形势推动各国经济向外发展实行开放型经济，否则就难以提高本国的劳动生产率，没有开放也就不可徒实现本国资源的有效配置，也不可能把世界的先进科学技术运用于本国，也不可能利用外国的先进管理和广阔的市场，加快本国经济的发展也不可能。所以邓小平讲：“总之，不要关起门来，我们最大的经验就是不要脱离世界，否则就会信息不灵，睡大觉，而世界技术革命却在蓬勃发展。” [8]

在开放过程中，我们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具有相对独立的经济体系，我们参加到世界市场中去，作为独立自主的一员，参加竞争，进行比较借鉴。

三、我国对外实行开放政策，是服务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我们一贯坚持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来办。我们以自力更生为主，对外开放在经济上是补充。我们的对外开放不论引进外资，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开发对外经济文化交流都是为国内的经济建设服务的。都是为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壮大社会主义的综合国力。在我们党的十四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坚定地指出：“在国际交往中我们绝不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强加于人，同样，也绝不允许别的国家将自己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强加于中国。我们的这个原则立场，是不会改变的。”我们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从来不是建立在共同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基础上，而只能是建立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对外开放是以互相有利为基础的。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更好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衡量改革开放是非的标准就是三个有利于：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

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9]这些话代表了中国人民的利益，表达了中国人民的意志，这表明中国的对外开放是有原则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组成部分。只要我们遵循小平同志提出的原则去工作，就不会因为开放而损害我国的主权完整和国家独立。

四、中国的发展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和繁荣

在和平与发展这两大主题中，发展是核心。在两极世界格局终结后，由于军事因素的作用下降，经济因素作用的上升，发展的问题就显得更加突出。邓小平同志指出：“发达国家越来越富，相对的是发展中国家越来越穷。南北问题不解决，就会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障碍。”[10]世界经济的发展完全证实了邓小平同志的论断。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虽然生产力有了很大的发展，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强化，但由于占世界人口3/4的发展中国家还没有完全摆脱贫困，购买力还低，没有形成吸收商品的重要市场，所以世界商品、资金、技术流动，基本上是在发达国家范围内兜圈子，使世界经济发展受到很大限制。现在的状况是，发达国家为商品、资金、技术找不到能够增值赚钱的市场而发愁，经济被经济衰退和高失业率所困扰；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却为找不到发展经济所需要的资金、技术而发愁，经济发展缓慢，人民生活贫困。发达国家如何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以及发展中国家之间如何加强合作，以求解决南北之间贫富差距。这是国际舞台上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是联结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桥梁，中国的发展，对于解决世界发展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中国是世界一个巨大的市场，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对于资金、技术和商品的容量越来越大，在帮助发达国家克服经济衰退和失业方面将起重要作用。按照西方国家每出口5亿美元可安置1万人就业的标准计，中国到2000年可以进口一万亿美元的设备，这就可以为西方国家创造2000万人的就业机会。这对承受高失业率压力的发达国家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巨大的帮助。更为重要的是，随着中国的发展和市场的不断扩大，一是资金、技术、商品的流动冲破了仅仅在发达国家兜圈子的限制，为在世界范围内流动开辟了道路；二是减少了发达国家之间为争夺市场而日益激化的贸易摩擦，使世界经济协调有序地发展。当然，中国的对外贸易发展，不仅进口要增加，出口也会相应的增加。这样也会产生互相竞争。但是，由于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总体上同发达国家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按照国际分工的原则，发达国家技术先进，生产高档商品较多，而中国技术水平较低，生产中低档商品较多，在世界市场上的互补性大于竞争性。

第二，中国的发展有利于东亚地区的发展和繁荣。从70年代以来，东亚地区一直是经济发展最有活力的地区。1990年以来，西方国家爆发了战后第八次经济危机，世界经济不景气，而东亚地区则不同。1993年全世界经济平均增长率仅略高于1%，而东亚地区（除日本以外）仍保持8%的高增长率。东亚地区的经济所以能够高速增长，同中国经济在1992、1993两年连续高速增长分不开。1993年中日之间的贸易额超过了300亿美元，中韩之间贸易额超过了100亿美元，大陆与香港、台湾的贸易额分别超过了250亿美元和110亿美元，中国同东亚其他国家的贸易额也有很大增长，1994年第一季度，中国不仅是东亚地区的重要市场，也是东亚地区投资的重要场所，中国引进的外贸，东亚地区占80%以上。一些西方舆论为了挑拨中国与东亚国家之间的

关系，硬说中国的发展影响了外贸向东亚其他国家的流动。这种观点是不符合事实的。一是，中国与东亚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引进外资项目的重点也不同，不会影响外资向其他国家流入；二是，竞争也是种动力，在引进外资方面通过平等竞争，可以促进投资环境的改善，增强对外资的吸引力，使东亚地区的经济更加充满活力。

第三，中国的发展有利于推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中国经济的发展，综合国力的增强，不仅可以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物质援助，而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国情同广大发展中国家有不少相似之处，中国发展民族经济、摆脱贫困的经验，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有重要的借鉴作用。中国的发展和强大，不仅为占世界 3/4 人口的发展中国家趟出了一条摆脱贫困的发展道路，而且为世界资本的流动冲破发达国家的狭隘界限，而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进行良性循环架起了一栋桥梁。中国的发展和强大，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符合全世界人民的利益。

（作者是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注释：

- [1]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64 页。
- [2]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78 页。
- [3]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第一版，第 32 卷，第 303 页。
- [4] 《列宁选集》第 4 卷，第 548 页。
- [5]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260 页。
- [6]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117 页。
- [7]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91 页。
- [8]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290 页。
- [9]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 页。
- [10]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56 页。

中国的发展与世界和平

阎志民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也是我甲国内和国际政策的两大主题。我国国内政策的主题是谋求发展，实现三步走的社会发展目标；国际政策的主题是争取世界和平。这两者之间是密切联系，互相促进、有机统一的。今天在第六届国际科学与和平周的学术讨论中，我想着重探讨邓小平关于中国发展与世界和平关系的理论，以及由此所决定的我国的外交政策，并借此机会回答世界各国朋友所关心的一个问题：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发展和强大起来以后，是否有利于世界和平。

一、中国的发展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制订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决心在下个世纪中叶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了加速我国的发展，实现三步走战略目标，我国非常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这主要是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

第一，有了和平的国际环境，我们才能集中力量、聚精会神地搞改革和建设。在过去的冷战时代，世界处于战争边沿状态，在我们国家的周围，50年代爆发了朝鲜战争，60年代爆发了越南战争，我国的海峡两岸也一直处在紧张状态。这种形势下，我们的党和政府始终有一种战争迫近的感觉，不能不把很大的注意力放在备战的问题上，也不能不把很多财力、物力用在国防和外贸上，整个经济建设的布局，也立足于准备打仗，搞一、二、三线。再加上我们的国内政策实行以阶级斗争为纲，发生了象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错误，这就使我国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在国内政策上，实行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移，但如果没有和平的国际环境，我们仍然不能集中力量进行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国家的发展仍然会受到很大的限制。基于这种考虑，邓小平同志和党中央重新分析了国际形势，认为世界战争的危险虽依然存在，但不是不可避免，我们至少可以争取几十年的和平建设时间，从这种判断出发，我们决心一心一意搞建设，大幅度地减少国防和军费开支，大规模地减裁军队和军事机构，在1985年宣布减裁军队100万，而且实行军转民的方针，利用军队的科研力量和生产能力，生产民用产品，在部队培养军地两用人才。与此同时，我们调整了国民经济建设布局，重点发展经济和技术基础雄厚的东部沿海地区和大中城市，用东部的发展带动中西部的发展，把国家的人力、财力、物力集中于经济、科技和教育的发展，等等。所有这些都大大加速了我国的社会发展。

第二，利用和平的国际环境，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政策，大力发展国际经济、政治、文化往来，广泛吸收外国的资金、技术和先进的经营管理经验等，加速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当今的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一个国家要迅速发展，必须积极发展同其他国家的经济文化往来，吸收和利用全人类的文明成果。何况我国是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更需要实行对外开放来吸引国外的资金、技术、人才，学习外国的先进的经营管理经验及科学文化知识。而实行对外开放的前提条件，是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正是利用了和平的国际环境，实行全

方位的对外开放，大量利用外资，兴办三资企业，积极扩大对外贸易往来，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发展。

由于在和平的国际环境下，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全面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发展远远超过了前 29 年的速度，也远远高于世界各国经济的平均增长速度。据统计，从 1979 年到 1991 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以平均增长率为 8.6% 的速度向前发展；工业年均增长 12.2%，高出世界年均增长水平近 10 个百分点；农业年均增长 5.9%，高出世界年均增长水平 4 个百分点；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7.5%，高出世界年均增长水平 6 个百分点。在这 13 年里，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 31.4 倍。1992 年初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讲话以后，我国国民经济发展进一步加快，到 1993 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 13.4%，是当前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

二、中国的发展增强了世界和平力量

中国的经济和整个的综合国力，在过去的 15 年里有了很大的发展，当前仍在以 10% 左右的速度向现代化迈进。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发展和强大了，是否有利于世界和平。对于这个问题，邓小平同志曾经有过明确的回答，他说：“中国现在是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的力量，不是破坏力量。中国发展得越强大，世界和平越靠得住。” [1]

邓小平同志的这个观点，是根据中国社会的性质提出来的。首先，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决定了我们是反对人对人的剥削、压迫和奴役的，当然也是反对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剥削、压迫和奴役的。因此，我们主张国家和民族之间的自由和平等，主张通过协商解决国际的争端和问题，坚决反对诉诸武力。其次，我们的国家原来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在鸦片战争以后的 100 多年中，不断受到外国列强的侵略、欺侮和压迫，饱尝奴役、侵略的中华民族，深恶痛绝一切侵略战争，酷爱和平和自由。坚持维护民族独立与平等。第三，我国是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大国，正象邓小平同志所说的，我们既是大国，又是小国，所谓大国，是指我们的国家面积大、人口多；所谓小国是指我们国家贫穷落后。当前我国人民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是奔小康、实现现代化，这就迫切需要世界和平、稳定，不愿意看到世界发生战争。邓小平同志十分明确地表达过中国的这种强烈愿望，他说：“我们诚心诚意地希望不发生战争，争取长时间的和平，集中精力搞好国内的四化建设。” [2]

正是由于以上几方面的原因，我国坚决奉行和平的外交政策，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任何侵略战争，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一支重要力量。中国在建国后几十年时间，从来没有侵略过别的国家，在国外没有任何军事基地，也没有侵占过别的国家的一寸土地，中国外交政策的和平性质，是全世界人民所公认的。

中国既然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那么中国的发展当然有利于世界和平。当前世界和平比冷战时期有了更多的保证，但是世界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还没有完全消除。其根本的原因之一就是制约战争的和平力量，特别是第三世界的力量，还不够强大。要巩固和争取世界和平，一个最重要的任务，是发展和增强世界爱好和平的力量。邓小平同志曾经同外国朋友多次谈到这个问题。他说：“如果说中国是一个和平力量、制约战争的力量的话，现在这个力量还小。等到中国发展起来了，制约战争的和平力量将会大大增强。” [3]他进一步展望 21 世纪，说：“如果下一个世纪五十年里，第三世界包括

中国有一个可喜的发展，整个欧洲有一个可喜的发展，我看那个时候可以真正消除战争的危險。”[4]这就是说，中国的发展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强，它会使世界和平更有保障。中国的发展需要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同样，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也需要中国的发展，二者是完全一致的和互相促进的。中国要以自己的发展，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世界各国同样欢迎中国的发展，以利于巩固世界和平。

三、中国奉行的是和平外交政策

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是由其国内政策的需要所决定的。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决定了中国必然奉行和平的外交政策。邓小平同志曾经深刻地阐明我国内外政策的这种内在联系。他说：“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搞好改革和开放，在国内需要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在国际上需要一个和平环境，根据这个情况提出了我们的对外政策，概括地说，就是反对霸权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5]中国外交政策的这种和平性质主要表现在：争取世界和平，是我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目的，也是我们外交政策的首要任务。我们坚决主张维护世界和平，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反对扩军备战和军备竞赛；坚决主张尊重各国的独立和主权，反对军事讹诈和侵略行径；坚决主张通过谈判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反对动不动就诉诸武力。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我们处理国家之间相互关系的基本准则。我国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一切国家建立、发展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往来；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建立国际新秩序。邓小平同志说：“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6]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是

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最好方式，而且运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甚至可以消除国际争端中的一些热点和爆发点。他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提出用“一国两制”、“共同开发”等办法，来解决国际热点和爆发点的问题，受到国际社会的欢迎和重视，同时也充分展示了我国外交政策的和平性质。

根据世界和平的利益和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独立自主地决定我们对国际问题的态度。邓小平同志认为，世界和平的最大障碍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因为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特点，是不尊重其他国家的独立地位和平等权利，经常侵犯别国的主权，干涉别国的内政，欺侮和歧视弱小国家，企图由自己国家支宰世界，支配它国的命运，这就必然引起各种矛盾、摩擦以至战争。所以我们在国际生活中是有自己的原则立场的，我们支持各国人民维护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斗争，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我们完全根据世界和平的利益和问题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我们对国际事务的态度，实行的是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最后我把自己的发言归结为三句话：中国的发展需要世界和平，中国的发展有利于世界和平，中国正以自己的发展和和平的外交政策，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作出自己的贡献。

（作者是北京大学马列主义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4页；

- [2]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7页；
- [3]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5页；
- [4]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3页；
- [5]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8页。
- [6]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6页。

论邓小平崭新的战争观洪保秀

洪保秀

邓小平同志在 1985 年 3 月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1]邓小平把纷杂万端的当代国际问题形象地归纳为东西南北四个字，并且指出东西是争取和平的问题，南北是争取发展的问题，从而揭示了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明确了时代的主题已由战争与革命转向了和平与发展。围绕这一主题，邓小平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结论和概括，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战争观。

一、在当代战争与和平的预测上，提出世界大战可以推迟或避免，局部战争和地区冲突成为当代战争的主要形式

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传统的观点认为，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对当代战争与和平发展趋势作出了新的预测和结论。1985 年 6 月 4 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过去我们的观点一直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我们好多的决策，包括一、二、三线的建设布局，‘山、散、洞’的方针在内，都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2]他接着指出：这几年我们仔细地观察了形势，认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邓小平关于世界战争可以推迟或避免的新论断，是科学分析国际形势而得出的正确结论。

一是随着东西方两大集团和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与对抗的结束，过去那种可能酿成世界大战的主要因素不复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两极战略格局，主要表现为以美苏为首的东西方两大集团的军事对抗。40 多年来，美苏互为对手，争夺世界霸权，成为引发世界大战的主要根源。在东欧剧变、海湾战争和苏联解体这一系列事件发生后，美苏对抗的旧格局已经终结，两个“超级大国”是一“亡”一衰，美俄迎头相撞而引发世界大战的危险大大降低，国际上各种力量正在分化组合，一时还形不成新的打大战的对立军事集团。

二是世界大国之间的军备竞赛退居次要地位，经济和科技的发展成为竞争的重点。目前，世界几个军事大国都在压缩军备，大国间的军备竞争已大大降温。与此同时，世界各主要国家都在进行经济改革调整，都在大力发展高新科技，以使自己获得经济和科技优势，获得战略上的主动权。大国之所以将竞争的重点，由军事转向经济和科技，是因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不同的国际环境，国际竞争中的军事手段和经济手段，或独立使用，或交替使用，或一并使用。在“冷战”时期以前，军事手段被视为主要竞争手段，国家可凭借军事实力获取利益；在当代国际社会，经济手段在很多情况下同样能够达到军事手段所要达到的目的，从而形成了以经济为主要竞争手段的国际竞争新态势。

三是世界经济向国际化和区域化、集团化发展，彼此互相渗透、互相依存，在客观上成为抑制世界大战的重要因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活动越来越走向全球化。跨国公司、国际兼并、合作经营、股权国际化等方

面的发展不断掀起新浪潮。世界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各国在经济关系上正在形成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方发动战争，打击的不仅是别人，也必将损害自己的利益。

四是核恐怖依然是制约战争的一个重要因素。邓小平同志在 1985 年 6 月指出：“苏美两家原子弹多，常规武器也多，都有毁灭对手的力量，……因此谁也不敢先动手。”[3]苏联解体后，虽然美俄核裁军的步伐在加快，两国总统还表示，双方将不再把对方视为各自战略核武器的打击目标，但是，它们仍掌握了世界 95% 以上的核武器。美俄核弹头现有总数 4.8 万枚，即使按已签署的裁军协议计算，双方核弹头仍将保持在共约 2 万枚的水平上，爆炸总当量接近 100 亿吨 TNT，仍相当于 50 万枚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投下的原子弹。因此，核恐怖依然是制约战争的一个重要因素。

五是世界向多极化格局发展，和平力量超过了战争因素的增长，对世界战争是有力的制约。旧格局的结束加快了业已存在的多极化趋势发展。美国虽然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但已没有独霸世界的经济实力；德国、日本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在上升，但军事力量的发展受到内外多种因素的限制；苏联虽已解体，但俄罗斯仍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核大国；第三世界国家虽然处境较困难，但在国际政治中仍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特别是中国政治稳定、社会稳定，对外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的重要力量。总之，世界多极化进程在加速发展，正日益形成一种各方力量相互制衡的局面，这有利于世界和平。

大战可以避免，但并不是说世界上就从此无战事。邓小平同志认为：“大战固然可以推迟，但是一些偶然的、局部的情况是难以完全预料的。我们应该想到，如果现在敌人打来怎么办？”[4]他还指出，虽然世界大战打不起来，但“小的战争不可避免”。[5]这就肯定了在大战打不起来的条件下局部战争的危险性突出了。冷战结束，一方面对话与缓和趋势增强，另一方面由于力量对比失衡，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过去被冷战掩盖的民族矛盾、领土争端和宗教纷争，日益激化起来，一些地区新的不稳定因素正在增长，以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小战”又呈增多之势。面对这种形势，各国都由准备全面战争转向对付地区性威胁，并提到军事战略和防务政策的高度，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把对付地区性威胁作为军队的主要任务。

二、在战争根源的判断上，指出霸权主义是当代战争的主要根源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私有制和阶级的存在是战争的主要根源。列宁提出“现代战争产生于帝国主义。”[6]邓小平同志通过对战后国际形势的透彻分析，明确指出：“当今世界不安宁来源于霸权主义的争夺”，“战争是同霸权主义联系在一起的。”[7]1985 年 3 月，他又指出：“中国在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领导的时候，就强调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并认为霸权主义是战争的根源。”[8]这是对战后发生的上百次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根源的科学总结，是对现代战争根源更深刻、更准确、更全面的揭示，是对马克思主义战争根源理论的重大发展。

邓小平同志在谈战争根源的时候，首先指明了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是当今世界最突出的危险，是当代战争的主要根源。他指出：“我们讲的战争不是小打小闹，是世界战争。打世界大战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有资格，别人没有资格”，[9]“超级大国奉行的霸权主义，威胁着世界和平。”[10]事实正是

如此。战后以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一直奉行霸权主义政策，进行了长达 40 多年的军备竞赛。他们积累的核武器占世界核武库总数的 95% 以上，具有将地球毁灭几十次的力量。美苏的军费开支约占全世界军费总数的 60%，他们凭借实力对外搞侵略扩张，严重地破坏了世界的和平与安宁。80 年代末以来，过去在世界上推行霸权主义的两个超级大国，苏联解体了，美国虽然受到削弱，但仍没有放弃霸权主义。美国声称“没有人能代替美国的领导地位”，其目标是建立以美国为主导的单极世界，实现“美国统治下的和平”。这种企图充当“世界警察”的强权行为表明，霸权主义依旧存在，霸权主义依旧是现代世界不安和动乱的根源。

其次，地区霸权主义是造成地区动乱的重要祸根。邓小平同志指出：“在国际上不仅有全球霸权主义，也有地区霸权主义。”[11]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局部战争表明，地区霸权主义是引起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的一个重要因素。某些中小国家依仗其在地区范围内具有的较强实力，推行霸权主义的扩张政策，不断制造事端，向邻国挑起武装冲突或局部战争。例如，1990 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导致了一场大规模战争，等等。事实说明，地区霸权主义是当代引发战争的重要根源。

在当代，既然霸权主义是对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胁，那么，要维护世界和平，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邓小平同志曾指出：“中国的对外政策，主要是两句话。一句话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另一句话是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12]他还强调：“谁搞霸权就反对谁，谁搞战争就反对谁。”[13]这些年来，正是由于我们坚持了这一外交政策，才使我们国家的政治分量更加重了，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

三、在维护世界和平力量的分析上，提出第三世界是和平力量的支柱，大多数发达国家也不愿打仗，全世界人民要求和平

如何看待世界和平力量？列宁把和平力量的重点放在无产阶级身上。斯大林提出了防止世界大战、维护世界和平主要靠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与强大。邓小平同志在继承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基础上，根据 80 年代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对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作了新的分析。

一是第三世界是和平力量的支柱。邓小平同志指出：“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这个和平力量，首先是第三世界。”[14]事实正是这样，第三世界国家长期遭受外国的侵略和控制，尝够了“落后就要挨打”的苦头。他们迫切需要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以便大力发展经济。第三世界国家为谋求自身的利益，积极维护世界和平，在各个领域采取不同形式与霸权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苏联入侵阿富汗、美国袭击利比亚、越南侵略柬埔寨，都遭到第三世界国家的强烈谴责。第三世界国家还利用自己拥有的丰富自然资源，扼守的战略要地和战略通道，作为反霸斗争的有力手段，严重削弱了超级大国控制世界的力量。苏联解体后，第三世界不少国家将面临更严峻的形势，现在他们正在努力加强联合，为维护其共同利益而斗争。

二是中国属于第三世界，是维护世界和平一支重要力量。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15]“第三世界国家中人口最多的中国的力量，是世界和平力量发展的重要因素。”[16]中国是个社会主义大国，又一贯奉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在反对战争、维护和平的斗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早在 50 年代，我国就倡寻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受到了世界上和平力量的赞同。在 70 年代特殊的国际环境下形成

的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中国握有充分的主动权，对美苏争霸起到了制约的作用。随着现代化建设的不断发展，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分量必将越来越大。

三是作为发达国家的第二世界，也是制止战争的一支重要力量。1987年5月，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指出：“欧洲是决定和平与战争的关键地区。在过去相当长一个时期里，我们同东欧关系不正常。现在我们根据客观的判断，认为西欧和东欧都是维护和平的力量。东欧、西欧都需要发展，越发展和平力量越大。”[17]邓小平同志还说：“美国人民、苏联人民也是不支持战争的。世界很大，复杂得很，但一分析，真正支持战争的没有多少，人民是要求和平、反对战争的。”[18]

从以上的论述中可以看到，邓小平同志关于世界和平力量的分析，极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阶级、意识形态或社会制度为标准的分析方法。他告诉我们，不仅各国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国家可以成为和平力量，而且资本主义国家也可以成为和平力量；不仅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可以成为和平力量，而且这些国家的政府在一定时期也可以成为和平力量。实践证明，邓小平同志的这一分析是完全正确的。

四、在解决国际争端的途径上，提出避免战争手段，采用和平方式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针对当时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存在和“冷战”时期的情况，都侧重强调要用革命的办法、战争的办法维护世界和平。在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的新形势下，如何解决国际争端、维护世界和平呢？邓小平同志创造性地提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可能主要依靠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以抑制战争爆发的新思路。他说：“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19]他还指出：“我们中国人是主张和平的，希望用和平方式解决争端。”[20]依据这一思想，他提出了解决国际争端、维护世界和平的一系列方法。

一是结束过去，开辟未来。邓小平同志在1987年10月会见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卡达尔时说：“我们之间过去的问题一风吹，一切向前看。”[21]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同志与戈尔巴乔夫会晤时提出：“我们这次会见的目的是八个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22]1989年10月31日，邓小平同志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就克服中美关系倒退给两国关系带来的消极影响问题时说：“我们在同苏联和东欧国家改变几十年不和关系的时候，总是首先肯定应该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现在是否可以这样说，我们同美国也应该结束这几个月的过去，开辟未来。”[23]邓小平同志的这些主张，不仅显示了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宽广胸怀，也显示了一个大国领导人和政治家的气度，对于改善和加强我国同世界各国的关系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二是寻求共同点。1987年2月，邓小平同志会见来华访问的印度外长时指出：“我们应该求同存异，边界问题不应该妨碍我们在其他方面改善关系。在国际问题上我们有不少共同的想法。”[24]1984年3月，邓小平同志同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谈话时强调：要把中日关系放在长远的角度来考虑，这“有利于我们之间的合作。这种合作不是只对一方有利，而是对双方、对两国、对两国人民都有利”。[25]邓小平关于寻求共同点的主张，是将正确处理事物统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用于处理国家利益矛盾的典范。过去“左”的思潮盛行的时期，在处理同资本主义国家以及关系紧张国家的问题时，我们往往注重双方的差异和矛盾，而对双方的共同点却注意不够，影响了我国的对外

关系，影响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寻求共同点的办法，不仅可以用于处理国家之间具体的矛盾与冲突，也可以作为当代世界和平与发展时期认识和处理国际关系的普遍原则。

三是实行“一国两制”。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也考虑到解决国际争端应该采取什么办法。因为世界上这里那里有很多疙瘩，很难解开。我认为有些国际争端用这种办法解决是可能的。我们就是要找出一个能为各方所接受的方式，使问题得到解决。过去，好多争端爆发了，引起武力冲突。假如能够采取合情合理的办法，就可以消除爆发点，稳定国际局势。”[26]根据这一思想，80年代，中国与英国、葡萄牙通过谈判，分别就香港、澳门问题达成联合声明。我国将按照“一国两制”的方针，于1997年对香港和1999年对澳门先后恢复行使主权。港、澳问题的圆满解决，将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对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振兴中华和维护亚洲及世界和平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也为和平解决国家间的历史遗留问题提供了新鲜经验。

四是对有些国际上的领土争端，可搁置争议，先共同开发。1984年初，邓小平同志在会见美国乔治城大学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代表团时指出：“有些国际上的领土争端，可以先不谈主权，先进行共同开发。这样的问题，要从尊重现实出发，找条新的路子来解决。”[27]1984年10月，邓小平同志谈到：“‘共同开发’的设想，最早也是从我们自己的实际提出来的。我们有个钓鱼岛问题，还有个南沙群岛问题。……这样的问题是不是可以不涉及两国的主权争议，共同开发。共同开发的无非是那个岛屿附近的海底石油之类，可以合资经营嘛，共同得利嘛。不用打仗，也不要好多轮谈判。”[28]这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又一个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稳定世界局势的新办法。这一主张，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欢迎。

五是和平对话。邓小平同志指出：南北问题“目前十分突出。发达国家越来越富，相对的是发展中国家越来越穷。南北问题不解决，就会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障碍。解决这个问题当然要靠南北对话，我们主张南北对话”。[29]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同志一直主张通过双边或多边谈判解决国际争端，进而达到稳定国际局势、维护世界和平的目的。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我国支持朝鲜北南双方进行对话并同时加入联合国，推动朝鲜半岛局势缓和与稳定；我国同联合国安理会其他常任理事国以及东盟各国一起，排除障碍，促进签署全面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协定，并为推动全面执行这一协定作出不懈的努力；我国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的“核裁军”和“常规裁军”两个提案，连续多年获得一致通过；我国既坚持原则又照顾现实的做法，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理解和赞扬。

实践证明，以和平对话代替武力对抗，有利于避免矛盾激化，这是邓小平同志为解决国际争端的又一创造。邓小平关于用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主张，符合历史发展趋势，对国际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然，由于帝国主义、霸权主义还存在，和平方式要在国际社会普遍实行，还会有一定的阻力和困难。但是，也应看到，由于爱好和平的国家不断增多和全世界人民的不懈努力，和平方式将对当代国际关系的稳定和世界和平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五、在战争准备的办法上，提出从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准备转入到和平时期建设的轨道

战争准备工作是同对战争形势的预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 50 年代后期起,由于我们过重地估计了战争的危险,认为世界大战迫在眉睫,提出要立足早打、大打、打原子战争,并以“一切从最坏的情况出发”为国防建设的立足点,全国各地“深挖洞,广积粮”,大搞“山、散、洞”、大小三线、“三北”各沿海地区构筑大量应急工事,等等,这些主张,都是着眼于为国家积蓄潜力和战争准备而作出的。但是,这种长期“盘马弯弓”的临战状态,严重地影响了国家经济建设,同时也影响了国防现代化建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冷静观察形势,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的判断,从这一认识出发,1985 年 6 月的军委扩大会议,作出了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的重大决策,即由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转入以现代化为中心的相对和平时期的建设轨道上来。适应这一转变,在战争准备上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不少新办法。

一是利用大战在较长时间内打不起来的相对和平环境搞好经济建设,为国防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邓小平同志指出:“四个现代化,集中起来讲就是经济建设。国防建设,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不行。”[30]邓小平同志这一论断告诉我们,以经济和科技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状况归根到底将决定一切。强国言重,弱国言轻,爱好和平的国家对于世界的发言权,是与这些国家的实力相联系的。我国是一个拥有 11 亿人口的大国,底子比较薄,属于第三世界,要从根本上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就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千方百计地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邓小平同志提出把经济建设作为中心任务的思想,对于我们做好战争准备、维护世界和平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二是军队建设要服从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在“忍耐”中求发展。邓小平同志指出:“现在需要的是全国党政军民一心一意地服从国家建设这个大局,照顾这个大局。这个问题,我们军队有自己的责任,不能妨碍这个大局,要紧密地配合这个大局,而且要在这个大局下面行动。”[31]他还指出:“四化总得有先有后。军队装备真正现代化,只有国民经济建立了比较好的基础才有可能。所以,我们要忍耐几年。”[32]在邓小平同志这一思想指导下,我军在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提供坚强有力的安全保证的同时,积极参加了国家重点建设项目以及抢险救灾活动,主动把国防科技向民用转让,军用机场、码头和港口支援民用,重视军地两用人才培养等等,为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做了大量工作。与此同时,国防系统遵照党和国家的决策,实行精简整编,减少军队员额,节约经费开支,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搞好农副业生产,减轻国家负担,变消耗为增值,极大地充实和丰富了和平时期的国防建设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新内容。邓小平同志还指出,“忍耐”是积极的,绝不是消极的,要求我们立足现有条件,努力做好各项工作,绝不能降低我军的装备水平和忽视人员素质的提高。这些论述深刻地反映了邓小平关于军队建设必须在忍耐中求发展的基本思想。

三是新时期的军事战略要从过去准备对付一般条件下的常规局部战争转向重点准备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来。从世界局势上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新的世界大战一直未能爆发,但局部战争却接连不断,中小规模的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已成为目前战争活动的主要表现形式。面对这种情况,世界各国纷纷调整军事战略。美国强调要随时应付地区性突发事件,遏制局部战争的爆发,提出了“应急反应”的战略原则;

独联体各国大都放弃了原苏联推行的全球扩张性军事战略，均把军事战略的首要目标放在周边地区爆发以争夺领土为内容的局部战争上，北约集团变“灵活反应”战略为“应付危机”战略，强调提高防范冲突和控制危机的能力。由此可见，对付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已经成为各国的共识。我们也应当为此做好充分准备。

四是加强军队的质量建设，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邓小平反复强调，要讲质量，讲真正的战斗力，搞少而精的真正顶用的。实践证明，加强军队质量建设是做好战争准备的一个十分重要问题。未来可能爆发的战争，大都为局部战争。这种类型的战争与全面战争相比，尽管参战的人数不多，作战的区域不大，但现代化程度较高，对军队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近期发生的几场局部战争来看，军队质量优势对于取得战争的胜利已大大超过军队数量的优势。因此，减少数量，加强军队质量建设成为多数国家军事战略调整的共同选择。同科学技术发达的国家相比，我军在武器装备上还有很大差距，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采取相应的对策，在现有的条件下，争取时间，加速发展军事技术，特别是军事高科技，研制先进的武器装备并争取尽早装备部队。同时，要结合我国的国情和现代战争的特点，研究高技术条件下，“以劣胜优”的新战法，弥补我军现代技术装备的不足。加强我军质量建设，还要从多方面努力。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把教育训练摆到战略地位；进一步完善编制体制；坚持从严治军、依法治军；实现军队正规化、科学化管理；加强后勤现代化建设；加强干部队伍“四化”建设，等等，这些问题解决了，我军的质量建设必将得到大大的提高。

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时代的战争观，是建立在对世界基本矛盾和基本形势的科学分析之上的，其正确性已被 80 年代以来世界形势的发展所证明。它不仅为我们正确认识当代国际环境和现代战争问题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而且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国防与军队建设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的指导作用。

（作者是国防大学科研部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副师职研究员）

注释：

[1][16]《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105 页。

[2][3][14][18]《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126—127 页。

[4]《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74 页。

[5]《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19 页。

[6]《列宁全集》第 21 卷，第 324 页。

[7]《人民日报》1981 年 5 月 18 日。

[8][9]《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104 页。

[10]《解放军报》1988 年 3 月 2 日。

[11]《人民日报》1978 年 11 月 9 日。

[12][15][29]《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56 页。

[13]《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128 页。

[17]《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233 页。

[19]《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49 页。

- [20]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88页。
- [21]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6页。
- [22]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2页。
- [23]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30—331页。
- [24] 《人民日报》1979年2月15日。
- [25]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3页。
- [26]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8页。
- [27]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9页。
- [28]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87页。
- [30]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04页。
- [31]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9页。
- [32]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8页。

拓展中国的和平基础理论研究之路——邓小平和平战略思想的指导意义

刘小林

进入 90 年代后，国际关系发生巨大变化。二战后以美苏双方对抗为主、合作为辅的均势结构已不复存在，全世界广大爱好和平的人民和力量已经摆脱了超级大国之间的军备竞赛、军事扩张导致全球性战争状态的威胁。然而，在当前多极化的转型期中，以民族、种族、宗教以及政治价值观冲突而导致的地区纷争不断，整个世界并不太平。如何在新的国际环境中争取世界持久和平，仍然是摆在全世界人民面前的一项重大任务，也是亟待各国从事和平研究的学者给予回答的一大课题。

一、国外和平基础理论研究现状及新动向

二战结束以来，和平研究已经由 50 年代初期分散、局部的研究，发展成具有世界性的、独立的跨学科研究领域。1948 年，联合国 8 名社会科学家以《社会科学家争取和平的呼吁书》为题，把影响世界和平的主要问题以及对策概括为 12 项课题。[1]由此打开了当代和平研究之门。50、60 年代，和平研究首先在西方国家发展起来，形成了一系列专门的和平研究机构和刊物，如 1956 年美国学者创办的《冲突解决杂志》(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以及由美国和平协会、世界和平基金会分别创办的《世界事务：国际问题评论季刊》(World Affairs: A Quarterl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roblems)与《国际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加拿大学者于 60 年代初组建了加拿大和平研究所，1963 年创办了《和平研究文摘》月刊。

其次，在欧洲，由挪威学者约翰·高尔图(Johan Galtung)主持，于 1959 年创办了奥斯陆国际和平研究所，出版了《和平研究杂志》(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成为蜚声国际的专门学术刊物。1961 年，荷兰成立了战争与冲突研究所。1979 年，联邦德国前总理、社会党国际著名活动家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主持的国际发展问题独立委员会，提出了《争取世界的生存——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经济关系的研究》报告，大大深化了和平研究的范围和内容。

战后日本和平运动高涨，由学者组成的各种和平研究团体、大学的和平研究机构不胜枚举，全国性和平研究团体以日本和平学会最为著称，该组织设立了大量专题研究项目，出版了和平研究丛书，创办了《和平研究》杂志。

我国在 50 年代也曾开展过声势浩大的群众性和平运动。当时由宋庆龄、郭沫若等社会名流发起、组织的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从事了大量维护世界和平的宣传、教育活动，并与国际爱好和平的组织、人士进行了广泛的国际交往。学术界也有相当的论文、论著问世。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年来，第三世界国家的学者、研究机构对和平问题的研究迅速发展起来。1966 年，在世界教友会组织的关于和平问题的讨论会上，印度学者 S·达斯古普塔(Sugata Dasgupta)提交了一篇题为《和平不足与发展紊乱》(“peacelessness and Maldevelopment”)的论文，引起各国和平研究学者极大关注。他提出的“和平不足”(peacelessness，或译有限和平、低度和平)的概念，对后来和平基础理论研究产生了一定影响。[2]除此之外，第三世界国家联合召开了一些会议，也促进了第三世界国

家的和平研究发展。

1986年，加拿大学者奈德（M.V. Naidu），在一篇题为《和平研究：性质与范围》的论文中，以下图综合概括了和平基础理论研究的课题与范围，从而勾画出这一研究领域的基本框架结构。[3]

{ewc MVIMAGE,MVIMAGE, !09101040_0329.bmp}

众所周知，和平研究绝不是一种可以实现价值法除的研究领域。这不仅表现在人们对维持和平等现实问题上存在诸多分歧，甚至在和平的基本概念、即什么是和平的问题上也是众说纷纭。[4]但大体而言，国外和平研究存在着两种倾向，一种是站在全人类共同利益的立场上，以实现人类持久和平为目标，致力于揭示现实世界“有限和平”的现状，要求从根本上改造不断引起暴力冲突的国际结构，也即追求积极和平的倾向；另一种是站在国家、地区安全的立场上，强调权力斗争和权力均衡，主张通过军备竞赛与控制等暴力方式维持“有限和平”的现状。[5]前者是战后各国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特别是以美国为中心的现实主义理论）不断进行批判、并超越其局限性而形成的跨学科、多元方法的和平研究；后者是受美国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影响而形成的国际冲突解决研究，以注重国际关系权力结构分配的分析和探索维持现有和平的途径著称。二者在立场、观点、方法上始终处于一种对立的状态。[6]

由此，当代和平研究呈现出彼此分裂、日趋疏远的学际关系。然而，人们不禁要问，积极和平研究与冲突解决研究之间果真是横跨着一道不可逾越的万里长城吗？和平研究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之间究竟有没有相互结合的可能性？

对此，一位日本学者——星野昭吉，在新近出版的《世界政治的变动与权力》一书中，以“和平的价值与权力概念”为题，对和平研究批判现实主义权力观念的基础上，对和平研究与国际关系理论的相互结合，做了一次十分有益的尝试。[7]

他指出，尽管以往的和平研究把权力与和平视为水火不相容的对立关系，但实际上，“权力既是和平的破坏者，同时又是和平的创造者。”[8]要实现“有限和平”向持久和平的转变，是不能脱离作为动力的权力的。同时，他指出，在形形色色的现实主义影响下发展起来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对权力的追求、崇拜达到了极端，权力意味着可以为所欲为地支配一切。然而，事实上权力绝不是单一的强制力量构成的，它还有作为接受权力、即受管制的一方的同意构成。权力是以作为统治者的权力主体与作为被统治者的权力客体相互结合的基础上存在的。当然，在现实的国际体系中，强制的力量要比同意的力量大得多。在以往的两极国际格局中，权力体系的分配，一方面由掌握直接暴力的美、苏双方为权力主体；另一方面由支配结构暴力的发达国家为权力主体。而作为权力客体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完全处于被支配的从属地位。国际安全仅仅以避免超级大国间爆发核大战为目标，中小国家间的和平完全被忽视了。作为超级大国军备竞赛的副产品，大量武器装备的军售和转移，造成第三世界经常处于战争状态。这种国际安全体系是以牺牲周边中小国家利益、维护中心大国利益为特征的，和平只是维护超级大国军事平衡关系的有限和平。冷战后，在多极化的转型期的国际体系中，仍保留了大国主导国际安全体系的某些结构，由不对称的南北关系而产生的结构暴力尤为突出，世界仍处于不安定的有限和平、消极和平状态。

在此分析的基础上，他又指出，南北间不公正的政治、经济分配结构必须加以改造，但目前的国际权力体系绝不可能发挥积极作用，发达国家是绝不会对自身权力体系进行改造的。“要实现彻底的改革，只有依靠权力体系的客体、受害者。”第三世界的力量“作为社会结构变革的权力（非权力的权力）是必不可少的”。[9]所谓“非权力的权力”是指“排除了强制支配关系，以平等为前提的、为实现人类共同利益和目的而进行的协调行动，……以及反抗强国、大国的抵抗运动”。[10]只有凭借这种力量的不断增长，才可能实现由不公正的世界秩序向公正的世界秩序的转变，才可能实现人类社会从“有限和平”向永久和平的转变。

二、邓小平和平战略思想的指导意义

邓小平同志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从 80 年代起，他领导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结束“文革”、开创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在 10 余年的政治实践中，他始终以冷静观察、客观分析的科学态度关注着国际局势的发展动向。他科学地揭示了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观。同样，他对和平问题的诸多思想和论断，也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战争与和平理论，为我国学术界关于和平基础理论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思想。

邓小平的和平战略思想与他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样，都是建立在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这一思想基础上的，它象一条红线贯穿邓小平和平战略思想的各个组成部分，这无论是他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对战争与和平的认识、对世界和平力量的区分以及两种力量的消长分析，还是他对实现世界和平途径的论证，以及对中国人民、第三世界人民与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共同向往和平、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表述中，都得以充分的体现。作为一个活跃在 80 年代国际舞台上的政治家，他既积极倡导和平、领导中国人民竭尽全力地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同时又坚持独立自主、平等与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从不把和平看成一种抽象、孤立的空洞概念，而是在现实国家间相互影响、制约、依存的复杂关系中切实地、稳步地推进世界和平进程。他的和平思想的核心是，一切从国际权力的分配，即各种力量的配置的实际状况出发，一切从中国人民以及世界绝大多数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实际利益出发，抓住一切机遇去争取有利于和平力量的兴盛和壮大。

具体而言，邓小平的和平战略思想大体可分为以下几个组成部分：

第一，“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是对 80 年代以来国际关系发展态势的科学判断。众所周知，由于客观和主观的原因，中国老一代领导人始终在国际战略指导思想上对世界大战爆发的威胁和紧迫性估计过高。但自 70 年代初中美关系、中日关系相继恢复和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以恢复，特别是进入 80 年代后，随着推行以反霸为核心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地位迅速扩大和提高。与此同时，美苏之间的战略对立关系渐趋缓和。1979 年，邓小平同志重新主持中央工作后，以政治家的敏感和远见，洞察了国际形势的变迁。1983 年，在多年细心观察基础上，他终于高瞻远瞩地提出了新的战略构想。他指出：“以前总是担心打仗，每年总要说一次。现在看，担心得过分了。”“这几年我们仔细地观察了形势”，“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11]1984 年，在他会见缅甸总统吴山友时，正式提出了：“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的科学判断。

应当指出，关于和平与发展问题，在此以前国际上早有议论，许多学者

对这两个问题都分别进行过相当深入的研究。但是，象邓小平同志这样明确的概括，特别是把它作为中国整个国际战略指导思想的出发点，这对当代国际关系是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的。

第二，对 80 年代以来国际格局中各种力量的配置、消长变化的客观分析。

1. 世界大战的威胁来自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苏美两家原子弹多，常规武器也多，都有毁灭对手的力量”，“因此谁也不敢先动手”。“美苏两家打不起来，就没有世界大战”。这是对战后美苏双方既相互争夺、又相互制约的战略态势的准确概括，揭示了美苏双方不断扩张的全球战略给世界和平带来了极大威胁；同时又指出了，双方的战略争夺中，蕴育着制约世界大战的因素，即彼此都掌握了毁灭对方的军事力量。

2. 制约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不断增长。在美苏长期的军备竞赛、战略扩张使双方均受挫折的同时，“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12]和平的力量首先来自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同时包括美苏以外的发达国家，以及美苏两国人民。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三的大发展中国家是维护世界和平最强有力的动力，包括美苏人民在内的发达国家的人民广泛的和平运动也牵制着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统治阶层推行战争和军备扩张政策。

第三，彻底解决南北关系问题是争取持久和平的根本途径。在谈到和平与发展问题的关系时，邓小平同志强调“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并把发展问题提到了“要从人类发展的高度来认识”。这是因为第三世界虽然崛起，成为维护和平的主要力量，但是其中“大部分国家仍处于极其贫困的状态”。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南方国家富裕不起来，就不可能真正成为维护和平的主要力量，甚至可能由此引起国际局势的动荡，世界和平就会成为一句空话。与此同时，邓小平指出，相互依存、共同发展是改善南北关系的出路，欧美发达国家面临着资本要找出路，市场要找出路等问题，而“南方得不到适当的发展，北方的资本和商品出路就有限得很”。[13]因此，发展的问题既是发展中国家自己的责任，也是发达国家的责任。只有按照公正、合理的原则调整南北关系，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才能促进持久、稳定的世界和平。

第四，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这方面，70 年代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的发言中，曾重申第三世界国家共同提出的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要求，并表明了中国政府的立场。80 年代，他指出：“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14]特别是在美苏冷战结束后，世界进入新旧格局转换时期，在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问题上，他更加强调，“现在确实需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准则。”[15]

三、努力开展中国的和平基础理论研究

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发展战略以及外交政策的重大调整，我国理论界对和平问题的关注日趋增强。各个学科领域不断出现有利于和平问题研究的新动向。这不仅与国际政治、世界经济、国际法、政治学等学科直接相关，而且涉及到更广泛的异文化比较研究、历史学、文学等领域，甚至连离现实较远的高度思维科学——哲学界，也由于冲破以往过分强调矛盾、冲突、

斗争的片面性，大量引入了系统理论等新理论，为人们在新时期重新审视、思考和平问题提供了新视野、新方法。

鉴于目前的现状与实际水平，我国开展和平基础理论研究应对以下若干问题给予注意：

1. 确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思想原则。这就是要求我们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阐明马克思主义和平思想的发展，特别是揭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的和平思想是如何继承和发展了以往马克思主义的和平观，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和平基础理论各个方面的系统研究。同时应当注意，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不等于以马克思主义的和平思想代替和平理论研究，和平理论研究应有自身独立的学科体系、理论范畴和概念。在一个以争取和平发展为国策的国家中，不仅应有政治家、外交家的思想和实践，也应当有学者对和平理论的系统阐释。

2. 确立捍卫人类共同利益的研究宗旨，明确从广大第三世界人民利益出发的基本人权概念。在这方面，目前国际社会整体发展、相互依存的程度日益加深，传统的本国利益为中心的时代已经让位于人类共存、人类共同利益为中心的时代，和平研究只能以人类共同利益为出发点和目标。但从现实出发，所谓人类共同利益，首先应予考虑和重视的是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利益。因此，基本人权的概念必须符合第三世界求生存、图发展的要求。

3. 加强与各国和平研究之间的国际交流，实现学科研究的国际接轨。就目前国内水平而言，我国和平基础理论尚未形成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这是与中国所处的国际地位不相称的。为此，我们应当广泛开展对外和平理论的研究，特别是开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和平理论研究。通过加强国际交流，早日实现学科研究上与国际接轨。

4. 加强和平理论的普及教育，提高国民和平意识、培养促进世界和平的国际人才。与战争不是人的本性一样，和平也不是人生而知之的。除了一定的社会条件外，教育的作用不可忽视。为此，和平理论不仅有高层次理论研究的任务，同时还面临教育广大人民群众的任务，这对世界上人口最多、并日趋国际化的中国，是一项意义深远、造福人类的大事业。

（作者是北京师范大学法律政治研究所国际政治教研室主任、副教授）

注释：

[1]神岛二部《日本政治学动向》，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52—154页。

[2]星野昭吉《世界政治的变动与权力》（日文），同文馆，1994年版，第439页。

[3]《加拿大和平研究杂志》（英文），17卷2号（1986年）第12页。

[4]格雷汉姆·伊万斯编《世界政治辞典》（英文），剑桥大学1990年版，第311页。

[5]星野昭吉《世界政治的变动与权力》（日文），同文馆，1994年版，第410—411页。

[6]罗伯特·考克斯《社会力量、国家与世界秩序：超越国际关系理论》，见罗伯特·基欧汉编《新现实主义及其批评者》（英文），哥伦比亚大学，1986年版，第207—210页。

[7]星野昭吉《世界政治的变动与权力》（日文），同文馆，1994年版，第407—443页。

[8]同上书，第422页。

[9]同上书，第434页。

[10]同上书，第437页。

[11]《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127页。

[1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7页。

[1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6页。

[14]《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6页。

[15]《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0页。

“邓小平和平与发展战略思想”学术研讨会综述

李淑琴

“邓小平和平与发展战略思想”学术研讨会于1994年11月8日在京召开。此次会议为第六届国际科学与和平周的重要活动之一。是由国际科学与和平周中国组织委员会、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北京市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会和北京市科学社会主义学会五家共同发起召开的。会议收到40余篇论文。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强卫同志主持了会议，国际科学与和平周中国组织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协副主席高潮、新华通讯社社长郭超人等出席了会议。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冯征代表五家致开幕词。参加会议者共153人，与会同志就“邓小平和平与发展战略思想”等问题畅所欲言，现将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邓小平关于当代世界两大主题是和平与发展的思想形成过程

对时代的判定和对社会发展阶段的判定，是理论提出的基础，是制定方针政策的依据。因此，时代问题应该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要回答的首要问题之一。列宁首先正确回答了时代问题，才提出俄国革命一系列理论，创立了列宁主义；毛泽东也是从中国革命所处的时代和中国社会发展阶段出发，提出新民主主义理论，创立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的产物，是正确分析中国社会发展阶段和当代世界基本矛盾、时代特征的结果。党的十四大报告在阐述这一理论形成过程时，首先指出，它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

与会同志认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主题”的提法是在80年代中期形成的。

在80年代中期以前，世界上战争与和平的形势虽然时紧时缓，但总的来说是趋于紧张的。而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世界正处在最紧张的状态中，是两霸争夺世界最激烈的时期。全世界都估计到，80年代是个危险的年代。

80年代的开端就不好，很难预料世界上发生什么问题，但是，可以说是非常动荡、充满危机的年代。我们内部甚至估计，两霸战争布局在80年代中期完成，因此那时候可能爆发世界战争。我们提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就是破坏两霸，特别是苏联霸权主义的全球战略，推迟战争爆发。使我们赢得长一点和平时间集中精力搞建设。

我们在强调战争危险的同时也看到，第三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是使世界向着和平方向发展的最重要因素。邓小平指出，我们有信心，如果反对霸权主义斗争搞得好，可以延缓战争爆发，争取更长一点时间的和平。后来，国际形势发生了出人意料的变化，苏联的内外政策发生重大改变。苏联南下战略受挫，与美国长期军备竞赛使经济终于支撑不住。国际上和平力量的反对，国内改革要求的加强，都使苏联不得不改变其对外政策。1982年邓小平敏锐地指出，苏联有变化。以后，这一变化愈加明显。在这种情况下，美苏关系开始缓和，整个世界局势出现了由对抗转为对话，由紧张转为缓和的总趋势。

随着美苏关系的变化，中美、中苏关系出现微妙变化。基于对苏的共同战略考虑，中美自70年代形成一种“一条线”的关系。1979年初，中美建

交，但此后却长期处于冷淡状态。中美关系冷淡，中苏关系却开始缓和。从1982年起，中苏恢复了副外长级谈判，两国也逐渐加强了经济文化交往。以后根据苏联的变化，邓小平提出中苏间三大障碍可从一个问题上开始，即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从而改变了三大障碍一个不解决中苏关系就不可能解决的态度，表现出了灵活性。

中美、中苏关系的变化，使我们特别强调一贯坚持的独立自主政策。1982年9月的“十二大”政治报告中，突出地谈到这个问题。邓小平强调：“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1]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谁搞霸权就反对谁。在1984年10月的一次谈话中，邓小平讲得更具体，他说，美国总想与中国搞战略关系，不是过去没搞过，毛泽东的时候搞过。但现在我们反对霸权主义包括美国，现在决不能与美国搞战略关系。我们既不与苏联搞，也不与美国搞，我们是独立自主的。对美国我们总保持批评态度，裁军我们讲两个，不但苏联裁，美国也要裁。美国也搞霸权主义，不光苏联搞。

美苏、中美、中苏关系的变化，使我们从1982年起对整个世界形势的看法和外交方针发生了重大改变。1984年至1985年，这一认识趋于成熟。

1982年10月31日，邓小平第一次提出和平问题和南北问题是两个带有全球性、战略性和关系全局的问题的思想。1985年3月4日他明确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问题”的概念。邓小平在阐述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问题时指出：“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2]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这是个重要判断。发展是核心问题的观点反映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问题”思想的本质。

发展问题过去与东西方之间紧张的冷战关系交织在一起，为战争与和平的突出矛盾所掩盖。而进入80年代后，随着东西方关系的逐渐缓和，战争危险减弱，发展问题突出出来，成为世界核心问题。当今世界上出现的许多矛盾冲突和问题，都与这个问题有关，它已成为我们观察世界的出发点。

二、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振兴中华

与会同志一致认为，“抓住机遇，发展自己”是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多次向我们发出的号召。机遇是一种客观可能性，抓住它才能成为现实，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它的作用。推动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

与会同志一致认为，我们一定要有强烈的“机遇意识”，真正认识机遇的难得。机遇为什么难得？因为机遇有两个特点：一是时间性强，一晃即过去；二是变动性大，诸种主、客观条件总和中任何一个因素发生变动，都会立即引起机遇的变动或消失。“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这是古代中国哲人对机遇特点的精辟概括。

当前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正逢百年难得的机遇。

1. 时代主题的转变，已使中国有可能争取到进行现代化建设所必需的较长时期的和平国际环境。

邓小平经过几年的仔细观察，终于作出了科学的结论：要建设，没有和平的环境不行。他提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大战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他还在这次会议上及其后的讲话中作了极为深刻的论证。

世界战争之所以可能避免，首先是世界的和平力量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其次，有资格打世界大战的是苏联和美国两个超级大国，现在苏联解体

了，两个超级大国对抗的局面不存在了。第三，世界经济已在相当大程度上整体化，各国的经济日益彼此依赖，相互渗透，如摧毁对方，同时也摧毁自己的财富。最后，在核武器发展的条件下，双方都有毁灭对手的力量，核战争将给人类的生存带来严重的威胁。

世界形势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亚非拉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相继独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了自我调整，缓和了社会矛盾，促进了科技革命的发展，转入了相对的和平发展时期。

世界形势的这些重要变化，使时代的主题发生了转换，从过去的时代主题“战争与革命”逐渐转换为目前的时代主题“和平与发展”。

时代主题的转换使中国有可能争取到较长时期的、有利于发展的和平国际环境。这是中国现代化建设难得的国际机遇。自从鸦片战争以来，在长达100多年中，中国一直不断遭到外敌入侵或处在严重的战争威胁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又被迫打了3年抗美援朝战争。60年代至70年代，又发生中苏军事对抗，实行“备战、备荒为人民”政策，“准备大打，早打”。可以说，在这漫长的岁月中，中国始终没有获得过较长一些时间稳定的和平国际环境，总是“树欲静而风不止。”现在终于可能获得这种环境，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来说确实是百年难逢的良机啊！

2. 世界多极化发展趋势，有利于中国的对外开放，推进现代化建设事业。

由于世界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80年代以来，世界出现了多极化发展的趋势。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苏东国家相继发生剧变，苏联解体，标志着冷战时期和两极对峙的世界旧格局正在结束，世界进入冷战后期，加速向多极化的新格局过渡。

邓小平同志密切注意世界多极化的发展趋势，指出世界格局将来是二极也好，四极也好，五极也好，苏联总还是其中一极。不管它怎么削弱，甚至有几个加盟共和国退出去。所谓多极，中国算一极。中国不要贬低自己，怎么样也算一极。

过去在美苏两大集团对抗时期，由于中国特殊的战略制衡作用，形成了“大三角”关系。现在在新的世界格局中，中国将以独立的一极发挥作用，从而大大提高自己在世界上的战略地位。这种形势将十分有利于我国执行独立自主的发展战略和维护和平、反对霸权主义的外交政策。

其次，多极化的发展趋势，打破了过去“美苏垄断一切”的局面，扩大了各国自由发展双边和多边关系的空间，这有利于我们在世界上寻找平等互利的合作伙伴。哪里有利，我们就向哪里发展合作关系。正如邓小平说的，我们同谁都交往，同谁都交朋友。

还有，多极化的趋势，增加了我们利用矛盾，击破某些外国势力孤立和“制裁”我国阴谋的机会。

最后，世界格局转变过程中，还会给我们提供各种暂时机遇。例如，苏东剧变后，原苏东地区要稳定下来需要一个过程，在一个时期内它们将难于建立大业，缺少吸收外国投资的必要环境。这就客观上造成了有利于我国吸收外资的机遇。

3. 世界形势中经济因素的作用日益增长，经济逐渐成为国际竞争的主战场。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广大的国际机会。

邓小平同志早在1985年即敏感地抓住这一世界形势发展的新趋势，指出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这种形势，无论美国、苏联，其

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不能不认真对待。

这种趋势是由两个因素决定的：（1）时代的主题已由“战争与革命”转换为“和平与发展”，世界竞争的重点势必逐渐转移到经济上。（2）世界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已使过去以军事实力为基础的世界竞争转变为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竞争。在新科技革命条件下，一个国家的实力及其对国际局势的影响能力，已不以单纯的军事力量来衡量，而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来衡量。

在世界竞争中经济因素日益重要这一趋势已越来越明显的反映在各国的对外政策上：在国家利益中，经济利益的地位日益突出；在国家安全政策中，经济安全的地位日益突出；在政府的对外职能中，促进和发展对外经贸关系的职能日益增强。各国政府直接施加影响，为本国企业争取扩大市场和有利的投资环境创造竞争优势，已成为当前国际关系中引人注目的现象。这对中国现代化建设是一个重要机遇——

第一，在这种形势下，某些外国势力已难于利用意识形态和政治问题为借口，阻挠中国的对外开放。

第二，在这种形势下，世界贸易自由化已成为一种趋势。

第三，在这种形势下，中国的大市场在世界上具有越来越大的吸引力。潜力之大，被公认为世界之首。

4. 亚洲太平洋地区经济的较快发展，尤其是东亚地区经济的兴起，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地缘经济环境。

70年代以来，亚洲太平洋地区，特别是东亚地区经济的兴起已成为举世瞩目的现象。1993年亚太地区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总额的54%以上，而且继续以高于世界平均增长速度之势发展。80年代和90年代初，东亚多数国家的经济增长都持续维持在7%以上。

中国是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大国，与本地区各国地理相近，交通方便，经济互补性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本地区经济的兴起，恰相呼应，彼此推动。

东亚地区各国是中国的周边邻邦，不仅有地利之便，而且文化传统方面有许多相同因素，国情相近，都是正在兴起的发展中国家（日本除外），易于彼此理解，相互支持。中国与东亚各国同时维持快速增长已达10多年，组成当今世界上独特的快速增长区，这不是偶然的，彼此推动，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总之，我们必须认清形势，抓住机遇，首先是认清国际形势，抓住国际机遇。国内的机遇难得，国际的机遇更难得。

5. 及时地善于利用机遇。这就是说，必须审时度势，因势利导，及时地制定一套既积极而又切实可行的利用机遇的方针、政策和办法。

与会同志一致认为，根据邓小平的论述，要善于利用机遇，应实行以下的方针政策：（1）及时作出决策。邓小平同志概括为一句话：机会要抓住，决策在及时。（2）紧紧扣住实现发展的战略目标。抓住机会，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发展是硬道理，这个问题要讲清楚，不敢解放思想，不敢放开手脚，结果是丧失时机。（3）抓住时机上台阶。发展应是波浪式前进的，即在某一阶段，抓住时机搞几年，发现问题再加整理，尔后要继续前进。（4）坚持改革开放。根本的问题是改革开放不能丢，坚持改革开放才能抓住时机上台阶。（5）正确对待“稳”。强调稳是对的，但强调过分就可能丧失时机。

(6) 大胆探索。要抓住机遇，就必须坚定不移，大胆探索。思想要解放一些，胆子要大一些，步子要快一些。(7) 不搞争论。这是抓住时机的一个重要条件。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8) 埋头实干。抓住时机，埋头实干，干我们自己的事，少管别人的事。

以上 8 点，是邓小平同志直接针对利用机遇问题而发表的精辟意见，深刻地概括了利用机遇，加快发展的历史经验，对我们的现代化建设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三、邓小平和平与发展战略思想的理论和政治意义

与会同志一致认为：邓小平同志创造性地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指出：国际上还有其它许多问题，但没有这两个问题带有全球性、战略性和关系全局的意义。邓小平把问题提到这样的高度，其深刻的含义有如下几点：

(一) 概括了国际形势变化的新趋势和新特点

对世界来说，关系全局的到底是什么问题？国际形势的变化及其发展趋势究竟把什么问题突出起来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有没有面临共同需要解决，因而可以合作的问题？类似这一系列问题，人们回答各异，提出解决的方案也难于取得共识，甚至出现对立。在国际问题上没有共同的语言，找不到可以彼此进行合作的基点，这对任何国家的发展都不利。问题的关键在于人们的观念和思想认识能否跟上时代发展潮流前进，能否确切反映国际形势发生的新变化、新趋势。邓小平同志正是在这方面高于同时代的一切人，看到了人们视而不见的问题，抓住了人们抓不到的关键问题。

世界和平，可以说是全世界人民普遍关心的问题，因此为争取和平而开展的各项活动接连不断，数不胜数，但究竟维护世界和平的可能性如何，有的人表现在心中无数，有的人在理论认识上抱否定态度。总的看人们处于担忧、恐惧和无奈之中。邓小平同志不拘泥于传统观念和分析这个问题的思想方法，而是从现实出发，观察了有资格打世界大战的美苏两国的动向，制约世界战争的社会因素和技术因素增强，以及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明确提出世界战争是可以避免的，维护世界和平是可能的，有希望的。

经济发展，是决定世界各国在世界发展中的地位 and 命运的核心问题。

(二) 丰富了马列主义时代观的内容

根据列宁主义关于区别社会历史发展不同时代性质和特征的原理，我们当今所处的时代仍然是列宁所揭示的，由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所开辟的新时代，即开始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本世纪上半期是社会主义取得了世界性大发展，大胜利的时期，而后半期共产主义运动出现困难和曲折，遭到局部的、暂时的失败。有人便对当今所处的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表示怀疑，认为当今时代的提法要改变。邓小平同志坚定地认为：一系列社会主义的胜利，尤其是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成就，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它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这实际肯定了列宁所揭示和论证的当今时代性质和发展方向。

我们有些人对列宁关于当今时代的提法产生怀疑，其主要原因，一是将时代的性质和特点等同起来；二是受传统提法的束缚，对当今时代特征的新变化未能及时作出新概括。这个问题由邓小平同志的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代

世界两大问题的创造性提法所解决。

回忆以往，列宁主义者和共产党人都是把时代的性质和特征作为统一概括使用的。这在客观上也是反映了那个时期的实际情况，即刚刚开始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其主题或主旋律就是革命和战争，其它问题列居次要地位。但这样的传统观念，难以说明现实问题。由于社会主义遭受重大挫折，资本主义处于相对发展，即没有革命形势，也没有迫在眉睫的世界战争。时代是否改变了，如果不能对时代面临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作出新的理论概括，就会导致在根本原则问题上发生动摇。

邓小平同志提出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正好同先前革命和战争的提法相对，他以无可争辩的事实表明，在我们所处的时代中，在时代性质和发展方向不变的情况下，其主要内容是会随着各种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决不是僵死不变的。现在看来历史上的革命和战争曾推动和导致了资本主义的部分死亡和社会主义胜利，而现今出现的和平和发展，从长过程看，也是不利于资本主义，而有利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因此，决不能因为时代主要内容的变化，而改变了时代性质和发展方向，相反是恰恰反映了时代的发展和进步，反映了时代的新特点。

邓小平同志关于当代世界两大问题的概括对时代的认识深化了。即在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既伴随有革命与战争的特定内容，也有和平与发展的特定内容，从而使列宁主义时代观的内容更加丰富，更加符合历史发展的实际。

（三）展示了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目标和任务

邓小平同志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突出问题的论断，即是对国际形势发展新变化、新特点和总趋势的科学概括，又是给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面临的共同目标和任务的明确提示。这反映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愿望和利益一致，以及开展广泛合作的基础，对中国人民来说，第一，明确了把国内工作的重点转向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际有利条件和理论依据；第二，确定了我国对外工作的基本指导方针和任务，实现了对外政策的两个重要的转变。对世界人民来说，它反映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要求和利益所在，指明了彼此合作的基础。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也需要中国，彼此需要在和平与发展上谋求尽可能多的合作点，尽可能多地消除分歧和障碍。

与会同志还就从毛泽东三个世界战略论到邓小平和平与发展主题论、邓小平同志的国际战略思想以及世界主题的变化与我国对外方针的调整进行了研讨。

与会者一致指出：邓小平同志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的战略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观，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在对当前世界形势科学认识的基础上，小平同志为全党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制定了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等一系列对内对外重要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邓小平同志思想的指引下，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因此很好地学习和研究邓小平同志的这一思想，对于我们深入学习和理解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更好地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具有重要的意义。

此次会议得到了国际科学与和平周中国组委会外联部副部长、联合国世界和平工作中国研究院中美文化研究所所长丛凤辉女士及广州经纬（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三友家具公司的大力赞助。

（作者是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研究室副主任）

注释：

- [1]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7页。
- [2]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5页。

